

西方政党发展路径及现代性变革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赵宬斐　著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073-37
9 787507 337679

定价：42.00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 11FDJ004

西方政党发展路径及现代性变革

赵宬斐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政党发展路径及现代性变革/赵宬斐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073-3767-9

Ⅰ．①西…　Ⅱ．①赵…　Ⅲ．①政党—研究—西方国家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西方国家　Ⅳ．①D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8933号

西方政党发展路径及现代性变革

著　　者/赵宬斐
责任编辑/韩　冰
封面设计/毛　淳　孙彦红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网　　址/www.zywxpress.com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力信诚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mm　16开　21印张　366千字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73-3767-9　定价：42.00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序言　西方政党政治的历史与走向：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可鉴之镜

摆在我们面前的赵宬斐博士的这本新作，无疑会再次激发人们展开对中国当下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中最重要问题之一的政党政治问题的深度思考。我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欣喜地看到：自从他攻读博士期间选择政党政治现代性这一领域作为博士论文，出版了相关论著，进而在复旦大学师从林尚立教授做博士后以来，他的政党政治现代性研究已经日益深化，学术水平不断拓展，学术思想日益深刻，学术观点日渐日新，学术话语日臻完善。政党政治是实现、表征和推进政治现代性的最重要内容之一。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后起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就进入百余年的“被动输入型现代化”进程，而后又在当下的1949~2050年的百年间正在经历“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因此，中国道路是在全面借鉴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结合自己的国情而选择、探索和逐步形成的。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中国的政党政治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完全相同、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格局，中国的政党政治现代性正处在无论就执政地位巩固、执政方式转变等而言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探索着自己的现代性政治之路。然而，中国的政党政治始终不可能完全游离于世界政党政治的文明大道之外而成为一个人类史上的“另类”，不可能自我封闭而不再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政党政治的一切现代性文明成果。西方也绝不仅仅是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他者”。全球化和现代性，使世界政治结构紧密关联；各国各类政党政治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毋宁说，今天我们在坚定地走

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全面正视西方政党政治现代性的一切发展现状，深入了解他们的来龙去脉，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深度理解、分析和解剖他们的发展规律和文明个性，他们的历史总体与阶段特征，他们的同一与差异；多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研究他们的发展结构和文明活体，使之成为我们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以资我们借鉴的镜子。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所遭遇的“左”的僵化思想束缚和右的思想影响很多，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解放思想、求真务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赵博士的这一新作，值得所有关注这一问题的中国人认真读一读。

该新作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解读：

第一，新作的研究视域和范式的独特性。一般说来，研究西方政党政治现代性问题广义地说属于“史”的范畴，或属于国外政治学研究范畴。通常学界的研究路径主要是采用国别的和流派的研究，对象领域相对狭窄和专一，长处是专而精，短处是难以对一个跨时长、涉及国别多、分支广而人物多的问题做总体上的把握。新作为了总体描述和研究西方政党政治现代性的整体脉落，采取了跨时段（从近代到当代）、全球性、多分支、整体性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对象是明确的，那就是整体描述西方政党政治的来龙去脉，便于读者对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脉络有一个总体的鸟瞰，便于从中发现西方政党政治变化的一般规律。

第二，新作对现代性流动的或反思性的理解。西方政党政治的现代性是一个在漫长岁月中的变化过程，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内涵变化一样，其中经历了经典现代性前期、经典现代性后期、后现代、新现代等不同的阶段。现代性内容不是固化的而是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因此，西方政党政治现代性所指就不是一个僵化的对象，而是一个变化的对象。我们对西方政党政治现代性的理解，以至于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都不能停留在上个世纪初叶的“五四”时期（经典现代性前期），而是要进展到当代。最初的西方政党政治的崛起的确是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代表。国家的政党政治内容就是将分裂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诉求在国家权力层面加以分配。在国家权力中全力维护自己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成

为政党政治的主要目标。因此政党政治始终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不将阶级、阶层的利益纷争直接超出合法的秩序，因而使国家权力分配游戏破产。执政的政党政治的一个经常性的关键，就是要尽量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因此，政党政治为了这一点，也不得不经常在各个阶级和阶层中妥协，以求得其他阶级和阶层的支持。然而，随着阶级斗争日益表现为合法的夺取国家执政地位的斗争，为了合法地上台执政，许多政党不得不将争取更多社会阶层的支持作为自己政党大选的出发点，于是政党就从经典现代性前期的特定阶级、阶层代表转变为（至少表面上转变为）后期的大多公民的“民意代表”。当政党日益模糊自己的阶级基础而力求扮演全民党的角色时，一个让所有政党政治执政基础发生裂变的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的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以各种组织方式成为政治共同体，如绿党、族党（如美国黑人政党）、性政治派别（如女权主义，甚至同性恋政党）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政党政治有了后现代的多元化、差异性的特色，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现代性政党政治又遭遇后现代差异性的解构。“微观政治”以“散兵线”方式日益消解国家政治的中心地位，非政府组织、网络组织又以各种持久的或瞬间即逝的直接民主力量活跃于西方的政治丛林之中，使原先为了国家政权而崛起的政党政治竞争体系的意义受到严重削弱，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原先大工业社会日益简单的阶级关系又重新复杂化，从而使政党与共同体关系日益模糊起来。新现代又在吉登斯、贝克和哈贝马斯的意义上重新崛起，新现代汲取了后现代对经典现代性“身份政治”或“同一性政治”批判的积极因素，以“流动的现代性”来重新审视现代政党的政治功能，因此，大尺度地考察各个阶段西方政党政治现代性变化的图景，成为这一新作的一大特色。

第三，认真分析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变化的历史，对于我们透彻了解其内在逻辑、科学评价其历史地位和功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原先作为恩格斯亲自组织起来的第二国际的成员党，从“反社会党人法”（“反社会党人法”全名为《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行动法》在中国通称“反社会党人法”或“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黑幕下处于的非

法地位到合法地位，再到通过议会道路获得执政地位，政党政治道路的变化与政党目标和性质的改弦易辙有莫大关系。欧洲社会民主党如何从原来的工人阶级政党经历了百余年的变化而成为现代的执政党，其党的宗旨和目标的变化，以及所提供的左翼政党政治的若干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我由此而相信，大凡一切关注政党政治现代性的国内读者，都能从中获得教益。

是为序。

任 平

2012年12月14日

导　言

关于政党政治的研究，无论从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还是从宏观结构与微观个案等方面进行研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深入分析、探讨与争鸣。尤其是随着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以及生态与风险危机带来的千变万化，政党政治为更好地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需要，在结构、功能、价值理念等方面及时作出调整与改变，以适应当今差异性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社会发展表明，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潮流，往往就需要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和时代命题与之相适应。目前，学界对政党政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政党”、“政党制度”、“政党政府”、“党政关系”、“执政方式”与“执政模式”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不仅具备了一定量的积累，而且取得了显著的质的提升。其中，塞缪尔·P. 亨廷顿、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鲍曼等国外学者从现代性角度研究政党政治，把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放在由经典现代性、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再到后现代性大变动的纵深、宏大、开阔的视野之中去把握、探讨与理解，并提出了如何建构政党现代性的一些研究范式与方法论；这些学者尝试从现代性角度研究政党政治，进一步拓宽了学界对政党政治研究的视野与思路，本文就是尝试从现代性维度，尤其是从西方政党的现代性这一视角对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考察、综合分析与系统梳理。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政治权威理性化、政治功能分化和政治参与

扩大化是政治民主化的三个重要方面。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吸纳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使他们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对抗或推翻现存政治体制的力量，从而造成政治动乱，而“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①]政党政治在政治稳定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②] 现代性政党的存在，一是可以通过政党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二是可以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可见在现代性的变迁中，“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③] 同样，萨托利也认为，政党在推动政治变迁和维护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因为“政党是利益表达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机构，杜绝一切政党将使一个社会失去控制，而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不能放任自流或期望其处于休眠状态。”[④] 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认为政党在政治现代化中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他在《政党》中认为政党与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政党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一个没有政党的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⑤]

每个国家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运作的特色都是由本国的具体国情，包括基本制度、经济社会结构、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决定的。所以，不同国家必然有各国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运作的各不相同的特点，不同的政党政治模式，不同的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但是，政党

---

① 〔美〕塞缪尔·P. 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三联书店 1998 版，第 367 页。

②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 1989 版，第 388 页。

③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 1989 版，第 373 页。

④ 〔意〕G.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 2006 版，第 65 页。

⑤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 1989 版，第 372 页。

政治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政治现象，不论隶属于什么样的阶级性，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其产生、演变与发挥作用的过程，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西方国家的政党经过长期的摸索，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规则和运作方式，其中有一部分反映政党活动的一般规律，成为许多政党的共识，值得深入研究，并可以为我所用。

一、西方政党演进与现代性变革的内在逻辑及判断

不同的政党制度、结构方式与组织形态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制度前提下执行着特定的功能。纵览西方国家政党演变的逻辑轨迹与发展路径，从最初的权贵型政党，到群众性政党、卡特尔政党，再到全方位型政党，无不适应西方现代性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早在18世纪70～80年代，具有现代性的政党首次出现在刚刚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在当时，由于议会斗争的需要产生了政党组织，一些政见相近的议员联合，便于在议会政治中展开活动，这种权贵党是现代性政党发展的雏形；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工业化在欧美的全面铺开摧毁了将政党政治控制在社会上层的努力，这也迫使权贵型政党进行结构调整与转型，有意识地吸纳社会民众参与政治，逐渐朝大众型政党模式方向发展，这种政党模式的出现是工业化中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表面化、阶级冲突尖锐化的结果。大众型政党的出现表明政党组织的制度化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社会阶级、社会阶层与群体发生激烈的变迁与重组，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和越来越具有独立的利益和力量，在政党之外给公民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参与和进入政府的渠道，这实际上是削弱了政党的基层组织向上输送领导人或组织选举的某些功能，因而也就削弱了政党的公职部分对基层的依赖以及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从而削弱了基层组织的地位。这就迫使政党内部的权力结构向有利于党

的公职部分的倾斜。这种发展趋势导致了全方位型政党的出现。① 一些大众型政党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变迁的要求，纷纷转向全方位政党发展模式。这种政党模式为了执政需要，所输出的政策不再针对性地维护社会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而是兼顾全体民众的需求与情绪，力争获得更广泛的选民支持，因此政党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选举事务上，努力地争取扩大选民数量，以使自己能在选举中获得更多的胜利。政党的变化是向着如何表达选民的利益而不是争夺选民的归属方向发展。因此，大众型政党更加强调问题和特性尤其是输出的政策能否获得更多民众的青睐，而不太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给予过多的关注。政党的这种转变，概括来说就是向以强调党的表达功能和通过辩论而竞选与输出政策为特征的追寻选票的政党转变，而淡化了与自己的支持者的过去的那种紧密关系。② 可以说制定全方位的政策和全方位地争取选民的支持是二战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70 ~ 80 年代以后西方政党发展变化的主流趋势，这一发展趋势造成的结果是政党的党魁等一些主要公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获得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因此，有学者提出，现代西欧有一些政党已经有超越这一阶段的趋势，正在进入卡特尔型政党阶段。③ 卡特尔政党是指政党内部一些公职具有特权地位，且这种特权地位的确立基本上不依靠政党其他部门与组织的拥护与支持，而是主要依赖政党与国家的密切联系获得的。

1968 年爆发于法国的革命运动，在欧洲掀起了一场非传统阶级政治性质的新型的文化抗议运动。从现在的历史高度看，1968 年的法国革命运动不仅是一个历史拐点，更是新社会运动的第一个雏型。此后不久，欧洲又在全球首先兴起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把欧洲社会运动发展推

① L. Svsand,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Norwegia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 S. Katz and P. Mair (eds.), How Parties Organize :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London: Sage, 1994: p. 15.

② Angelo Panebianco, 1988: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62 ~ 267.

③ Richard. S. Katz and Peter Mair, 1995: "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p. 202.

向高潮。新社会运动不仅表现在参加的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和影响最广泛，其表现出的性质与传统意义上的运动也有所区别，主要表现为西方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主流社会和体制的文化抗议运动。这场新社会运动与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影响深远，对西方政党本身的功能与结构及其执政方式与执政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与全球化、信息化交织在一起，促使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此期间，政党政治发展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与形式：一是出现了一些关注生态政治的政党；二是政党关注的问题逐渐远离于宏大政治叙事和意识形态，趋向于单一问题、具体问题和生活问题；三是政党发展类型与模式差异与多元。例如，一些“单一问题党”、反复无常的抗议党、平民党、极端派政党、意识形态型政党等层出不穷，尤其是一些极端政党的崛起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的左翼极端派政党，如意大利的红色旅、秘鲁的光辉道路党、日本的赤军组织和青民盟等。西方政党为积极应对社会结构变化与自身发展面临的困境，采取一些举措加强现代性变革：

一是提出了“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西方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大党老党例如社会民主党等积极地吸纳了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多元主义理念，将无阶级主体的或阶级主体身份模糊的，以及涉及小众的，即性别、种族、代际和生态等多元民主抗争主体整合到政党的理论和体制框架内。

二是倡导一种“新政治”观。基于对新社会运动、全球化以及信息网络化对传统政党政治造成巨大冲击的考量，西方主流政党纷纷变革，倡导了一种“新政治”以应对风险与危机。“新政治”倡导一种非阶级性、关注绿色生态的共同的政治行动，在本质上是社会多元主义的政治。

三是实现政党功能的现代性转换。西方主流政党为应对社会的变迁，调整了政党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代表性功能，例如利益的表达、整合，政策的制订等功能，同时加强了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建设，包括政治领导的录用、议会和政府的组成等建设，执政策略趋向于新中间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的成员，积极吸纳社会多元主义的“认同政治”，以丰富和完善政党的功能。

四是加强政党与社会的互动模式建构。西方政党在实施政策输出的时候，更加关注政党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政党在加强控制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与社会之间的基本互动模式发展。政党政治有意识地寻求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平衡。西方主流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既不是不断强调自己的阶级属性，也不是为了执政而放弃这种阶级属性，只是更加理性地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个治理与自由、秩序与民主的问题，期望通过政党政策的输出，对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五是促进政党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变革。西方主流政党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产生的深刻影响，加强“媒介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和“政策议程设置”建设，促进这三种议程互相接近与融合，以提高政党的新闻执政能力，尤其是运用媒体新闻来提高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和执政的合法性。

二、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西方政党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政党体系、政党类型、政党组织、政党意识形态、政党模式、政党参与、政党政府、政党社会、政党法制、政党认同、政党民主、政党选举、政党反腐败、政党变迁、政党制度化、政党职业化、政党市场化等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对西方政党的研究大多采取阶级分析法，过多强调社会制度的区别和差异，较少从共同规律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要在党的现代化建设的内容设计和方式安排上，吸收借鉴西方执政党多年摸索形成的、反映执政党活动一般规律的运作规则和运作方式，绝不能因为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率先实行的制度和方式就一概地拒绝排斥。国内学界对国外政党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国别研究和问题研究的方法，而较少使用理论化的科学分析或规范分析。事实上，西方政党理论本身是发展比较完整的，并且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政党理论的关注和引介

仍显不足。本课题在研究路径与方法方面主要采取：

一是政党类型学研究方法。类型学最初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后被应用于政党政治的研究中。政党类型学是西方政党理论中较为基础的部分，而西方学术界对政党类型学的研究也比较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希格蒙德·纽曼。纽曼开创了政党类型学研究的功能主义路径，他的研究路径主要以政党追求的具体目标和承担的相应政治功能为维度进行分类；此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卡雷·斯特罗姆和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沃林茨在纽曼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另一种功能主义路径。斯特姆认为，政策、选民和公职是政党竞争行为的三种功能取向。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冈瑟和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则尝试另一种整合路径研究模式。冈瑟和戴蒙德则从历史主义和组织学的二维视角来整合政党类型学的研究。本课题在研究构成中有意识地借鉴西方政治学界对政党采取的政党类型学研究模式，对西方政党为适应现代性变革产生的分类展开归纳、梳理与总结。

二是经验主义研究范式。本课题根据库恩范式理论对政党的产生采取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两种范式进行梳理。在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中，认为政党是人类历史经验的产物。人类的政治生活最初主要表现为神权政治，随后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经历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阶段。间接民主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多种形式，其中最经典的是代议制民主形式，代议制民主的政治行为主要是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来实现的。

三是规范主义研究范式。在规范主义研究范式中，认为政党产生的目的是使人类更好地规范和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遭遇到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避免冲突而趋向平衡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与困境，规范和约束双边关系，实现人类的价值追求，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发明了政党政治，并把政党嵌入国家与社会中，以政党来引导和规范国家与社会关系，确保人类政治生活更符合价值与德性。

四是政党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是借用社

会学理论的一种结构分析法，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结构中的各部分是按照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以保持整体的动态平衡。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把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引进政治学领域，对政党政治展开研究，认为政党在政治体制内的功能大体包括目标制定、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政治动员与社会化、政治录用。但是，政党所处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环境不同，那么政党执政方式的不同，其功能的重点与表现不同，政党结构方式也就不同。政党结构指政党有机体基本要素构成政党的组合方式，即诸要素以何种方式组合成一个完整整体，可以从组织要素、构成方式、政治角色三个方面去考察政党结构。本课题从结构 - 功能的理论视角，分析西方政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与执政价值目标等方面的变动，通过有效的组织和制度的供给，使得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功能很好地契合起来，使得社会的转型获致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保障。政党结构功能主义在政党政治领域内的意义有助于理解各种政党政治现象之间以及政党政治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为政党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框架，开辟了一条从部分与整体、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上进行政治分析的新途径，有助于进行综合性的政治研究，丰富了政党政治研究的内容。

综合一些研究方法，并进行有效地整合与升华，是一种理论模型、框架，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解现实的思想体系，以及科学共同体之间的最高共识。从对西方政党研究范式的认知与理解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真理或结论都是以特定的研究角度、研究方式、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即确定不移的研究范式为前提的，按照不同的范式去研究，即使同一政党政治现象也会得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真理性认知。

三、主要内容与观点

文章通过对现代政党出场的两种样态进行分析与梳理，指出现代政

党的出场样态，一般主要采取暴力与竞争性选举两种样态，分别对应于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国家维系竞争性的政党关系。通过竞争性选举谋取执政的政党，主要存在于经过较长时间民主政治实践的演进，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经验的欧美国家中；非竞争性或革命型政党主要是基于民族解放与民族国家建构，通过暴力或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存政治制度而形成的一些国家中。这两类政党由于出场的样态不同，其结构功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随着现代性的介入，政党制度模式及其政治功能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动。无论是经典现代性政党，还是反思现代性政党，其政治功能需要进一步调整与创新，当社会由经典性向反思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时候，政党制度模式及其政治功能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动。在经典现代性社会中，政党如何适应现代性发展，意大利著名思想家葛兰西提出了“总体性”现代性政党理论；而直接以民族解放、国家建构和严密组织构成体系的苏联政党，却极化为党国体制型政党；当欧洲共产党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作为新的社会主义流派时，欧洲社会民主党也纷纷提出改革主张，以图刷新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呈现出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错勾联，导致了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向。在传统主流政党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另类或非主流政党。这些政党以相对新颖、激进、搞怪甚至是杂耍式无厘头的政治表达与政策主张，与主流政党的政治行为相反，这些政党另辟路径来表达自己对传统政治和主流政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元叙述”的愤懑，关注生态政治和伦理政治、族群政治，追求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提倡抗议民主、激进民主，实现权力的边缘化、多元化、平面化和生活化，成为“反体制政党”。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的变革、网络社会的发展和新传媒时代的到来，以“皮下注射论”、“把关人”的控制理论和“沉默的螺旋”等理论构成的经典传播文论遭到了彻底的解构。在新传媒时代中，广大民众通过网络诉求民主权利，不仅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科层体制，同时也存在反对代议制民主的倾向。网络社会的发展，正悄无

声息地改变着人类的政治生活，使得以研究和揭示人类政治关系、政治形式、政治活动以及发展规律的政治学和人类的民主政治实践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社会所展现的空间政治学意蕴，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未来的政治生活，其对传统政党功能与公共领域必将造成巨大冲击。为应对社会运动可能对西方政党造成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网络与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更好地提升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适应性能力，西方政党正在试图调整传统政治功能，借鉴和吸纳亚政治、生活政治或共和政治等治理模式，需要自觉进行现代性转型，以应对传统政党政治可能遭遇的风险与危机，实现对传统“左”与“右”政治光谱的超越。

本课题的研究试图尝试弥补国内学界对西方政党现代性研究的缺陷，以拓展政党政治这一显学的研究领域与视野。主要特色大致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从主题确立及其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来看，本文在选择“西方政党”的方位后，即将立足点放在“现代性变革与转型”上。此举意义不仅在于对当前政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积极回应，而且还在于其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现代性政党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元素，试图为当今学术界研究政党的建设与发展规律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诠释与视角。

第二，从结构安排及其框架体系来看，本文按照现代性场域的政党政治的发展逻辑，首先从考查现代性政党生成的双重范式入手，对政党产生主要采取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方法进行梳理，以说明政党具有的现代性内涵与旨趣，同时将政党嵌入国家与社会中来研究，以政党来引导和规范国家与社会关系。目的是将政党使命的地位作用、政党活动的舞台天地以及本文研究的发端思路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能够迅速地进入探索抑或是共同探讨的境地。

第三，从涉及的实际内容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基本观点与意图来看，将西方政党政治纳入现代性的视域中进行研究，这不仅是对20世纪以来现代性理解上的丰富和完善，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政党的研究领域，为人们全方位地认识现代性政党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样不仅紧密了政党政治与现代民主的结合，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现代民主制度的

纵深思考和横向开拓。

在现代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政党政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现代性则是政党政治诉求的核心。对于政党中的现代性研究，是对政党政治核心资源的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经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政党也必将逐渐增加与世界各国政党尤其是西方政党的紧密联系。如果我们对世界发展大势认识不清，如果对国际上一些主要政党思潮变革转型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难以把握时代的脉搏，就难以吸取他人之长处，就难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我们党的事业发展、建设成效就难以有新的开拓。在这全球化浪潮之中，只有像当年龚自珍、魏源那样睁眼看世界，只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们才能融入世界。因此，对西方政党政治现代性的研究，在今天有其特别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们特别要清楚地认识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在政党的性质功能、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处理、政党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差别。在进一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特征，进一步研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执政的经验，进一步研究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兴衰成败历程的时候，绝不是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政党理论、思潮、倾向和实例加以比较、辨析、鉴别与综合，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当今西方政党政治的一切文明成果并结合我们东方国度的地方性知识。这样，我们才能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资源、执政方式、执政方略和执政环境的认识，真正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持，并将党的建设方略的命题置于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宏大的全球意识、世界眼光中来研究，从而丰富中国特色的政党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政党的发展规律，进而全面推进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第一章　现代政党生成考查的双重范式

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概念。他认为，范式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范式“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①] 库恩对范式的表述，实质上是表达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范式是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其内容表现为对科学研究中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是一种理论模型、框架，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解现实的思想体系，以及科学共同体之间的最高共识。从对范式的认知与理解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真理或结论都是以特定的研究角度、研究方式、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即确定不移的研究范式为前提的，按照不同的范式去研究同一社会现象就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真理性知识。本文根据库恩范式理论对政党的产生采取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两种范式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现代政党产生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

当人类政治从抽象的神圣时代转向了普遍化的世俗化时代的时候，人类就彻底摆脱神权政治并逐渐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最终获得现代性意

---

①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5页。

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多种形式与阶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大阶段。间接民主的发展态势主要是通过代议制民主形式反映的。在代议制民主过程中，所有的政治事务几乎都是围绕政党展开的并由政党主持和参与的。政党政治通过政党内部的选举、决策、党员的发展和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政党为实现公民的政治意愿，所实施的各种政治行为，包括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资源配置等内容，围绕权利与权力，进行讨价还价，协商沟通，通过竞争性选举，进行轮流执政，使整个现代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民主性得以巩固和扩大。

（一）由神权政治到民主政治

政治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政治虽然与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存在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并非今天意义上的政治组织。这些社会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摆脱了血缘关系，以地域为基础形成高度组织化的人类共同体才产生今天意义上的政治，其标志就是形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在人类政治形成的初期，人们把政治理解为“正义”或“善”，把政治看成最高的善，看成道德教化。在古希腊，“政治”的原意为城邦，指城邦中的公共事务。关于城邦政治的论述以亚里士多德最具代表性，亚里士多德研究城邦制度的根本性目的，是要探求什么政治制度最适合、最有利于人类社会集体善行的发挥和推行。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进行制度分析的出发点，是探索人类社会集体的善行，即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正义”的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定义和详尽的分析。[①] 他主要从五个方面探讨了正义：一是合法的，如在谈到强迫奴役是否具有正当性时，他在“合法的”这一意义上使用了“正义”一词[②]；二是合乎自然的，如他又认为劣种从属于优种是合乎自然的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17页。

(正义的)[1]；三是依人的常识判断为正当的，如他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能辨认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2]；四是在人们之间对某些事物的公平分配，如他认为正义即相等的人就应该配给到相等的事物；五是城邦所要达到的善，如他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3]。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所有的表述都直指“正义”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他认为；“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行为，在他们自己看内在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4] 城邦是追求最高最广的善的社会团体。“政治学的善就是‘正义’[5]；“政治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城邦以正义为原则”[6]。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政治的理解超越道德的范畴，把政治与权利联系在一起，认为政治就意味着普遍的公共福利与普遍的公共福利实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政治”的外延有了扩展。当代，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的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展，通过公民选举、特殊利益团体与高涨的社会运动，政治生活中纳入了更广泛的公共大众。

政治就是以武力、说服、妥协等方式，解决分歧和冲突，并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方法、途径和过程。从内容上看，分歧和冲突是由利益矛盾引起的，而利益矛盾是由利益的有限性与追求利益的无限性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政治，就是将利益分歧和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使之秩序化，使追求利益的积极行为得以持续进行。政治现象又与公共权力有关。公共权力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合法的强制力。解决分歧和冲突，意味着规约人们的行为，而规约人们的行为必须依赖人们普遍认同的和必须服从的约束力。政治，就是借助于公共权力使分歧和冲突秩序化与规范化。其核心是支配与服从。人类管理冲突并建立和维持政治秩序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且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纵观人类政治史，人

---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页。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
④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页。
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
⑥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页

类的政治生活方式经历了神权政治、王权专制政治、权威政治和民主政治等多个发展阶段，其中以神权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最具有代表性。

神权政治是宗教与政治的整合，是宗教权力（神权）与政权、宗教首领与政治首领、宗教机构与国家机构的结合，是世俗政权受制于教会的一种政治形式。西方神权政治起源于古代奴隶制时期，在中世纪欧洲封建时期发展到顶峰，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发生动摇，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神权政治论者认为政治权力来源于神的创造，君主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因此世俗政权要受制于教会，承认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神权政治主张形形色色，盛行于古代和中世纪，延续于近现代。比较有代表性的神权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君权神授。认为国王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世俗政权只能完全地依照神权政治的原则进行活动。二是天国至上。认为地上之城与上帝之城同存于天地之间，前者充满罪恶与苦难，人们在其中只能获得短暂的幸福与欢乐，上帝之城充满光明，在其中获得的幸福是永恒的。三是教权至上说。主张由僧侣、教士或先知代表神直接统治人民，又称“纯粹的”神权政治。四是天启律法。法律是体现上帝意志的，是上帝治理人世的工具，是世俗政权依照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启示和安排下制定的，所以人人必须服从。上帝亲自制定的永恒法、自然法和教会制定的神法，均高于一切世俗律法。五是末世神权说。主张神的代表或救世主将在末世前降临人世，建立完美的神权统治。神学政治思想的奠基人是古罗马时期的奥古斯丁，他主要依据《圣经》中的神学教义讨论政治问题，认为人世间的统治、奴役、邪恶、混乱等，都是人之原罪的结果，国家本身就源于血腥与暴力，是对原罪的补救。国家统治者是“上帝的代理人”，是由神意而获得统治权力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欧洲中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是神权政治的集大成者，他用基督教教义改造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政治观、道德政治观，把国家的起源与目的、统治权力的性质以及国家政体的选择等都归之于上帝的意志和安排，强调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因此现存的秩序和制度具

有绝对合理性，必须绝对地服从。在古代中国，神权政治观也相当流行。例如，殷周及先秦的“天命论”，认为人世间及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全知全能的超自然的“天”有意安排的。战国时期的“五德终始说”，即是以与五行说相对应的五种天命来说明人世间的政治变迁与朝代更替。在汉代的时候，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用天命论神化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要求“子民”必须服从“天子”的统治。这种神学政治观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在神权时代，剥削阶级借助于宗教信仰来巩固其专制制度，神化国王，用王权神授的思想和各种神化崇拜仪典对民众进行麻醉，实行神权的君主专制。把教会和国家融合一体，君主即教主，各级僧侣既管教务又管政务，直接统治人民。如欧洲中世纪的教皇国，就是实行神权政治。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神权政治虽被废弃，但某些国家至今政教分离并未实现，仍保留这种统治形式。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治合为一体，与国家机构保持密切相关的宗教机构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与宗教影响力十分普及和广泛，而且原始社会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结构特点十分明显，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根据这一制度，宗教是为维护政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代理人。

神权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和皈依就是正义和爱。人们通过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的关系，把正义与爱转化为利益分配的关系时，政治就从抽象的神圣时代转向了普遍化的世俗化时代。人们为解决利益分配对权利与权力关系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时候，就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

民主是伴随国家制度而产生的。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名词起源于古希腊，出自于古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s”（意为“人民”和“地区”）和“kratia”（意为“权力”和“统治”）合成，最初的含义就是“人民的统治”（The rule by the people）。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

otus)[1] 首次使用这一概念，是用来概括和表述希腊城邦这样一种政治实践。希罗多德在《历史》中首次提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据《历史》记载，约公元前522年，波斯国内集中商议选择政治形式时，有三派分别主张采用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三种意见，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激烈的辩论中，一个名叫欧塔涅斯的波斯人认为，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可能是主权在民思想的最初来源。希罗多德高度赞扬雅典民主制下公民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权利。在他看来，希波战争实际上就是雅典的民主政治与波斯的独裁政治之间的战争；雅典之所以击败波斯帝国，主要就是因为雅典的公民享有民主和自由，走向繁荣富强，而波斯则是一个专制国家，逐渐走向衰退。

雅典的民主是一种“公民自治的体制”（system of citizen self - rule）。它的基本特点是：公民大会享有无上权力；权力范围囊括城邦的所有公共事务；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立法与司法活动；公共官员通过直接选举、抽签和轮流（rotation）等多种方法产生；普通公民与公共官员没有任何特权之分等。雅典的民主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它的实施仅限于很小的城邦国家，它以奴隶通过艰苦劳动为少数“自由人”创造“自由”时间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济制度为基础，给少数人以公民权利而把妇女和奴隶都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美国学者萨托利专门论述了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根本区别：“古希腊人的民主与现代人的民主理想完全不同，是‘同名不同系’。”[2] 到了近代，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才得到广泛使用。因此，“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许多可能的政府形式之一，在这种政府形式中，权力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大多数人。换句话说，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全体公民有权并且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积极

①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 ~ 前42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西方文学的奠基人。代表作是《历史》，该书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书中众多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亦作《希腊波斯战争史》。

②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或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作为一种制度，民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公民的意志作为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决策以公民的意见为最终依据。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A. 达尔（Robert A. Dahl）曾经指出，民主是许多历史要素的“混合物”；现代民主理论和制度来自于古希腊民主、罗马和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共和传统、欧洲代议制的思想和制度以及政治平等的逻辑①。18 世纪，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和随之而产生的有关主权、合法性和公民等观念的哲学变革，传统的“神权政治”和“王权政治”走向衰落，民主思想得到了再一次的明确表达。19 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民主得到了真正开发的机会，从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实现了从理论向制度的转化②。20 世纪，民主化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进程。

“民主（Democracy）”概念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民主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民主思想。作为思想的民主以“尊重多元化价值观和宽容‘异端’思想、承认利益多元化和个体自由选择权”为主旨，它要求以尊重个体价值、自由和权利的方式构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主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关于公共权力来源与服务目标的民主制度。作为制度的民主规定了社会公共权力源于公民对个人私有权力中涉及公共利益部分的让渡而非来自于某种“超人”力量自上而下的赋予和分发。公共权力体系以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自主为基础，通过社会契约（宪法）的方式确立公共权力的实施范围、服务对象和服务目标，这种公共权力生成方式决定了作为公共权力执掌者的政府必须以改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提高个体价值作为其首要职责。民主的第三层含义是指作为公共权力运用方式的民主手段。作为手段的民主要求监督与制衡公共权力的行使、要求公共权力行使主体的多元化和多层化。民主思想的基础是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核心理念在于，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

---

① R. A. Dahl, 1989 : “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Yale University, p. 13.

② Micheal Levin, 1992: “The spectre of democracy”, Macmillan Ac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p. 34 ~ 35.

断者，凡是与决策利害相关的个人都有权参与决策。每个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只有他自己才有最深切的感受，他人无法确切地认识和了解。每个人“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① 任何先知的教诲、权威当局的计划，都不能代替个人对幸福的主观体验。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凡是与决策利害相关的个人都有权参与决策的制定，在此过程中，人们可以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审慎选择。民主思想的本质是尊重个体自主权力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多元化。构建于人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民主思想是民主制度的灵魂。“尊重个体自主权力和社会多元化”的民主思想，不仅引导出“主权在民”的思想（政府的权力来自民众的让渡与授予）、权力制衡的思想，也必然引导出容忍“异端”的共和主义（容许少数与多数的和平共处）、权力分散的“联邦”机制。（1）任何权力的合法性获得都将成为政治的基础；（2）个体的各种权利保护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价值标准；（3）有限政府的理念逐渐得以确立；（4）权力的有限性和制约性；（5）政治民主选举成为必要；（6）权力的运作需要严密的法律程序给予规范与制约。

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方式的高级形态，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的和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主要包含以下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民主体现为一系列的理念体系。任何权力的合法性获得都将成为政治的基础。第二个层面，民主体现为一系列的原理体系。比如，人的尊严原理、平等原理、自由原理、主权在民原理等等。第三个层面，民主体现为一系列的原则体系。比如，讨论原则、妥协原则与多数原则等等。讨论原则，首先是指以异议、意见、反对派的存在为前提，并以讨论的方式交流各自的不同意见，求大同存小异，制定同一政策的方式和途径。其次，是指和平地解决分歧和冲突的方式和途径。讨论是公开地交流不同意见，让公众了解并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方式和途径。调整相异或对立的各方的意见，以达到相对一致的方式和过程。第四个层面，民主体现为一系

①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页。

列的制度。制度主要指规定各政治主体的产生方式、行为方式及其相互之间的稳定的关系模式。最基本的制度有代议制度、政府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舆论制度等等。第五个层面，即实践层面，民主体现为一系列的行为过程。如选举行为过程、决策行为过程、参与行为过程等等。

其中，民主政治的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就是指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终极所有者，是国家权力的源泉，是国家权力的控制者，实质就是权力在民，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早论及这方面内容的是法国学者让·布丹（Jean Bodin）[①]，他在《国家六论》著作中对这方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享有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主权的本质属性即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这个最高权力属于谁呢？对这个问题在事实上作出不同回答，成为区分国家属性的根本标准。若主权属于君主，这种政治就是君主政治；若主权属于贵族，这种政治就是贵族政治；若主权属于人民，这种政治就是民主政治。布丹的主权观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布丹之后对人民主权思想做出完整系统地论述的代表人物是法国思想家卢梭[②]。卢梭在政治发展领域最早确立了"人民的统治"或者更准确地表述为"人民的权力"[③] 即"主权在民"的思想（卢梭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民永远是主权者）。

① 让·布丹（Jean Bodin，1530～1596）是近代西方最著名的宪政专家，他的《国家六论》也被誉为西方关于国家主权学说的最重要论著。布丹出生于法国，年青时在大学攻读法律，毕业留校任讲师，后在巴黎任律师，16 世纪 70 年代任王室检察官，被聘为亨利三世的宫廷法律顾问。1576 年布丹发表了《国家六论》，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国家主权学说。

② 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 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③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 页。

“主权在民”的观念，最终实现了现代政治共同体制度的合法性，和过去的君主统治、贵族统治、寡头统治和专制统治不同，是一种“法理型”统治。这种“法理型”统治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是以人民的同意来取代上帝或神的旨意，和过去的统治合法性建立于世袭地位上，以君权神授是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截然不同。卢梭认为，主权的实质就是全体的意志，主权属于人民，每一个人都可以构成主权者的一个成员，但主权并不存在于哪一个人身上，人民作为集体才构成主权者。主权不受限制，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不可侵犯。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之所以成为民主学说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篇章，就在于他宣告了君主、贵族对于国家权力所有权的破产，而另行确立了人民对于国家权力的所有，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自此以后，人民主权就成了民主政治的第一法则。

人民主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率先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根据这一学说，认为国家是由人民根据自由意志缔结契约的产物，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人民，而不属于君主。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其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如果不按人民的授权办事，则人民有权将其打倒。由于人民主权思想代表着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与要求，因而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自然而然地把人民主权作为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人民主权原则相对于君主专制时代的“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来说是一大进步。一些发达国家的宪法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法国宪法宣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日本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天皇之“地位基于主权所在之日本国民之总意”；意大利宪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以宪法所规定的方式及在其范围内行使之”；德国基本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美国宪法开宗明义提出，“我们美国人民，为着建立一个更完美的合众国、树立正义、保证国内治安、筹设国防、增进全民的福利并谋吾人及子子孙孙永享自由幸福起见，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如下”等等。人民主权思想的确立，从根本上否定了王权至上、神权至上、君权神授的观念，撕掉了笼罩在国家头上的神授光环，从而完成了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以权力在君到以权力在民

的伟大历史性转变，对推动西方民主制度的改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人民主权原则是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民主化浪潮及其所建立的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石，它已为一切民主或自诩为民主的国家所认同。但是，由于人民主权原则的思想发展极为复杂，各国对其基本内涵理解不一，故而相应的制度表现形式也相差甚远。人民主权原则即便在其支持者那里也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内涵，而是存在着作为“抽象原则”的人民主权原则和作为“具体原则”的人民主权原则的思想分野。对原则采取的不同的理论取向自然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必然。可以说，人民主权思想的发展是充满着反驳、赞同及扬弃的崎岖之路。当代一些著名政治学学者，例如熊彼特、波普、达尔等学者认为，在精英政治理念的主导下，国家权力由少数政治精英所掌握，人民不可能成为国家权力的享有者，因此，人民主权是虚构的，根本不可能存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人民主权基础的“公意”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公意并不一定是合乎理性的，也并不一定能自然产生合乎真理和善的要求，多数人一致也可能专制和暴政。当代政治学学术大师哈贝马斯在考察人民主权思想流变的过程中，运用其创立的交往行动理论来重新阐释人民主权思想，从而试图化解学界对卢梭人民主权思想中理想主义成分的不满与困惑。哈贝马斯指出：“这种整体主义的政治实践概念，现在也已经失去了它的光泽和推动力。在实现所有公民对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中之平等参与的艰难过程中，内在于人民主权概念本身的矛盾也暴露出来了。人民，所有国家权力应该从此出发的人民，并不构成一个有意志有意识的主体。”①应该指出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西方学界对人民主权论的诘难，承认该理论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但他并没有彻底否定人民主权的合理内核，即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应由人民来支配的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而是力图对其加以完善。所以，哈贝马斯也反复在其论著中指出两者的区别。他说：“政治参与权利所涉及的，是用法律形式对公开的意见形成和意志

①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27页。

形成过程——其结果是有关政策和法律的决议——加以建制化。这种过程应该以交往形式而发生，而这种交往形式，如我们所看到的，从两个角度使商谈原则发挥效力”[①]；“根据人民主权原则，一切国家权力都来自人民，在这个原则中，既包含机会平等地参与民主意志形成过程这种主观权利，也包含公民自决的建制化实践这种客观法的创造可能性作用。”[②]哈贝马斯的人民主权论认为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找适宜的连接点，以便架起人民主权的交往权力和现实的制度化国家权力之间的桥梁，同时还必须求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它不仅对主权内容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且上升为对政治联合体的正统性和合理性的解读。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将主权、法律与公意连接起来，从而达到对人民主权论的全新认识的目的，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无疑对现代民主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民主政治的演进及样态

现代民主的理念更多地承袭了古代雅典的民主遗产，那就是以公共事务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追求一种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方式。民主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范式。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③]将民主发展范式概括为以下八种：即雅典民主制、保护型民主制、发展型民主制、直接民主制、竞争性精英民主制、多元民主制、合法民主制和参与民主制。这八种民主范式大体可以归为两大类型：即直接的或参与的民主（Direct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和自由的或代议的民主（Liberalor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④]

---

①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5页。

②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7页。

③ 戴维·赫尔德（1951～　），现为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华莱士讲座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政治学家。在政治理论、社会理论、民主理论和全球化研究方面造诣颇深，尤其是在民主问题的研究方面影响甚大，主要著作有《民主的模式》、《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民主的前景：东西与南北》等。

④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直接的或参与的民主和自由的或代议的民主就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直接民主，指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的重合，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直接民主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在具体问题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来作出决定，但是整个国家的主导制度仍然可能是间接民主。在具体问题上的直接民主只不过是一个补充。二是指整个国家在体制上的直接民主，例如雅典民主。这种体制上的直接民主的典型制度安排是，公民大会是最高的立法机关，每年开会约40次，每次一整天，法定人数是6000人。另有500人会议，由10个部落中各派出50人参加，负责日常的行政事务。严格意义上的直接民主仅指的是国家体制上的直接民主，古雅典的城邦制度是其中的典型。然而，在现代民主制度运作的今天，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在体制上完全实行古雅典式的直接民主。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地方政务中，尤其是乡镇政务中，直接民主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民主以及城镇民主生活中一般仍然采取直接民主。

在理想状况下，在直接民主下通过直接的参与可以表达更多的真理，换句话说，民主表现形式越直接，表达出来的真理或真实情况可能就越多越真实。但是，正如法国思想家泰纳所指出的那样，1000万人的无知加起来不等于一点点有知。直接民主要求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高度地参与，表面看来参加的人越多，实质上每个人发挥的真正作用就越少，多数人比少数人易操纵。正如《联邦党人文集》① 的开篇就已经指出："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

---

① 《联邦党人文集》：1787年5月，根据美国联邦国会的邀请，在乔治·华盛顿的主持下，在费城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的原定目的是：修改执行已有八年之久的《联邦条例》。但是，经过了近三个月的秘密讨论以后，会议不仅否定了这个条例，而且重新制定了一部取而代之的新宪法。因此，这次会议就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新宪法在费城会议通过后，要由十三个州的代表会议分别批准，而且规定有九个州同意，即可生效。但是，在各州的批准过程中，对新宪法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拥护，一种反对。因此就发生了美国历史上一场最激烈的论战。本书就是这次论战的产物。它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文集，也就是后人所熟悉的《联邦党人文集》。

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所以，直接民主往往是政治野心家的“天堂”。早在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指出，纯粹的直接民主制与暴君制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英国政治理论家柏克则从法国大革命中察觉到了直接民主的诉求与暴政的内在关联，他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一书中指出，法国大革命声称要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民主制，而事实上是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地变成一种灾难而又不光彩的寡头政治；塔尔蒙在《极权民主的起源》一书中在对法国大革命研究中，也发现了直接民主的追求与极权主义的后果之间的逻辑联系。他睿智地总结道：“高度情感化的集体政治行动势必抹杀私人生活领域，富有激情的群体可以施加极其暴虐的压力，政治扩大到人类生活所有领域，不留丝毫余地，这就是走向极权主义的最为便捷的途径。”[①]直接民主的实践过程可能满怀着道德激情和革命狂热，但是，这种政治行为既可能缔造伟业，也可能演变成毁灭性的暴政，把社会和革命者自己“推向最终的彻底崩溃”。[②] 对此，亨利·泰纳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评说卢梭的名言：“人民主权的教义落在群众手里，将解释为并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无政府状态，然后延至一个统治者出现，落在他的手里又将解释为并产生出一个完整的专制形态。”[③] 著名的精英主义理论家米歇尔斯研究所发现，大众比寡众可能更容易被操纵和控制[④]。严格意义的直接民主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即使是雅典的民主也不是绝对的直接民主，因为在这种大会之下并不是所有公民都参加的，而且其行政部门的管理仍由部落推举出来的代表来完成。直接民主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直接民主操作成本较大、风险系数较高。直接民主主张全民参与政治，排斥在政治方面的系列分工与操作程序。由于缺乏沟通交流的缓冲，这样做容易导致直接的对抗和情绪化，其风险和代价往往超出了

---

① 〔以色列〕J. L. 塔尔蒙：《极权民主的起源》，伦敦西屋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47 页。

②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43 页。

③ 转引自卡西勒：《让·雅克·卢梭的问题》，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3 页。

④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51 页。

社会一定的承受和担当能力。直接民主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由于常常诉诸全国性的表决和集会，其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都很高，而且容易造成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导致造成政治压倒一切的现象产生。甚至对直接民主情有独钟的法国民主思想家卢梭也承认，在能够实行直接民主的范围内，经济不能太发达，人民不能太富裕，人民不能有私心，尤其是地域范畴要适当控制。直接民主的风险系数较高，主要表现在其政治行为过程是一种此赢彼输的零和博弈，可能加剧社会冲突与对立，直接民主易在社会中造成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裂，使少数派的立场、利益和权利受到压制。从历史上看，这样的民主一旦付诸实践，就难逃内乱外患之灾，或因落入专制者的魔掌而倾覆，或沦为大国的附庸而瓦解。

二是直接民主在实施过程往往导致极端的立场。因为直接民主要求全民对每一个问题都持明确的，或赞成或反对的立场。它无视问题的复杂性和含糊性，这种决策往往鼓励人们诉诸一时情绪的快意，而不是理性的缜密判断。直接民主的决策方式往往是一刀切的方式，而无视许多人在许多问题上并无明确立场这一现实，直接民主存在一种价值走向极端的偏好。

三是直接民主缺乏缓冲机制。直接民主一般排斥民主程序，中间层次和环节较少，缺少对信息和意见的过滤机制，为意见表达中的操纵和情绪化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直接民主在程序上缺少过滤机制和纠错机制，因缺乏足够的理性和慎重，很容易陷入情绪化的陷阱之中，往往导致灾难性后果。

四是直接民主过于强调集体公权可能导致对个体私权的侵犯。直接民主的实施过程总是号召民众以大众的利益投身政治行为过程中，强调集中和团体，反对个人自主，把政治参与视为基本义务，要求民众对国家的绝对的献身，变相地剥夺了个人处理其私人事务的自由权；直接民主否定公与私的界限，要求民众以个人身份直接参政，这就排斥了市民社会和中介结构的利益聚合功能，把社会彻底原子化，让个人直接面对国家。

古希腊的民主可以被称为直接民主的样板，并被人们称为一种“极

端的民主”，是因为这种民主模式把直接民主运用和发挥到了极致。在当时的雅典社会中，不仅用直接民主的方式产生政府的行政官员，还用此方法来决定军队的首领和法官的人选；甚至用同样的方法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命运，古希腊国家与历史的最大的悲剧之一：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最经典的明证。雅典民主的极端化不仅使民主在操作、效率和规范方面陷入困境[①]，而且使民主因缺乏慎思和理性，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被视为“暴民政治”或“愚民政治”而大遭污垢和贬斥。直接民主极容易沦为极权民主，因为直接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人世间的一切事务民主化，它要求的不仅是政治的民主化，而且要求经济的民主化、社会的民主化、道德的民主化，甚至以全球民主化的名义要求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民主化”。这种没有节制、没有边界的全面化、直接化的民主要求极易为以人民和民主的名义篡权和专权的人铺平道路。直接民主虽然本身存在诸多困境，但是，在现代性社会中，网络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到来，为直接民主的再次复兴准备了充分的营养与条件，当今社会出现的电子民主就是直接民主功能的一种延伸和拓展，尽管电子通讯技术仍然不是每个公民都可以加以利用的，但其发展前景甚为乐观，像美国、瑞士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民主以及城镇民主生活中一般仍然采取直接民主方式。

相对于直接民主来说，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自己的意愿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负责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务。间接民主常常又被称为代议制民主，即人民通过其代表来进行统治，而不是直接进行统治。在间接民主下，主人与主事是分离的，用约翰·穆勒[②]的话说，人民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由于人民并不亲自主事，所以间接民主要求有一整套的监督机制来对人民的代表及由此产生的政府进行监督和防范，以免仆人滥用权力变成主人。但现代性社会中的间接

---

① 有关详细介绍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15～116 页。

②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 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

选举和精英政治未必就是间接民主的实质表现。因为，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未必真的有权参政议政；精英政治未必是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他们的权力未必受到人民的监督。

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相比，成功地解决了规模、成本与时间等问题，其解决的手段除借助代议制外，还借助联邦制、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制度。这样，作为间接民主的代议民主大大地扩展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成功地解决了民主在现代社会和大国所面临的难题。由于间接民主允许通过代表来参与政治，于是政党政治也因此而产生。和直接民主相比较，间接民主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间接民主实施限于一定的范畴。间接民主由于只把民主限制在特定的政治生活范围中，避免了社会的彻底政治化，维持了公与私之间一定的界限，把参政当作公民可以自愿运用的权利，从而避免了在决策问题上的一刀切和绝对化。

二是间接民主本身存在缓冲性特点。由于间接民主通过一级一级的代表机构和代议程序对民意进行一层层一道道过滤，从而可以有效地克服民意中的非理性的情绪，避免决策受大众一时情绪的支配、一蹴而就、仓促行事。此外，为了防止对少数的压制，间接民主还通过法治、分权制衡、违宪审查和舆论监督来防止多数人的意志变成专横的意志，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民主沦为多数人的专政。间接民主在认可多数决定的民主政治核心原则的同时，特别要求对多数的权力加以控制。

三是间接民主以自由市场为根基积极维护个人自由与民主。间接民主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物，经济自由、财产权、政治自由和参政权为间接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坚固的依托。在这种环境中，间接民主不排斥个人的自由，而且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牢固的保障。由于在间接民主中，存在一个不受政府干预的私人领域，为市民社会和包括政党在内的民间组织的发育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从而有效地克服了直接民主下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尖锐对立，使得代议式的间接民主真正成为自由的民主。

四是间接民主具有灵活的包容性。在实施间接民主过程中，也可以

允许在其内部有直接民主因素（如公民表决）的存在，而不会妨碍其在体制上的间接民主的性质。如果一个间接民主的国家在其基层政权中引入一些直接民主的要素，那么这个国家仍然是间接民主的国家。反过来，一个直接民主国家如果其在基层政权上采用间接民主的原则，则很难想象这个国家在国家体制上仍然可以归入直接民主类。可见，直接民主比间接民主要脆弱得多，而间接民主则显然可以给人们提供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但是，间接民主一直潜藏着一些无法克服的困境：主权与治权方面存在一定的疏离；民众利益诉求和代表利益表达之间的矛盾；多数决定与少数权利保障的矛盾。这是间接民主需要改革与完善的地方。

从上述分析来看，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并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分支或者两个截然的对立面。其实，民主制度在实践操作方面具有超乎人们想象的复杂性。直接民主是人们不间断地直接参与行使权利，而间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先赋予人们一定的权力，并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和监督。

直接民主论者要索取的不仅是更多的政治权力，而且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无限扩张的权力，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一种与个人的自由根本对立的制度。而间接民主是一种自由民主，其目的是保障其公民的自由。直接民主强调政体的单一性和纯洁性，民主越直接就越纯正。间接民主是一种混合政体，有效地结合了宪政、共和等不同政体的优势，并借助其它政体的优势来克服纯粹民主的弊端。直接民主是一种纯粹和无限的民主制度；而间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的有限民主制度。直接民主论者把民主看作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终极目标，并以此抽象的理想和目标来彻底改造现实社会。间接民主则把民主看作是一种手段，它仅仅服务于公民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目标，这种民主为人类的幸福和安宁而存在，而不是人们为之而活着的目标。直接民主是一种最直接的、最粗糙的政治结构，它没有功能分化，没有过滤器和安全阀，与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相比之下，间接民主是一种多层次的、多次过滤的决策过程。间接民主正是依靠程序上的过滤“装置”才获得了靠直接性不可能获得的防范力和制约力。

（三）现代政党的生成

随着间接民主的深入发展，人们创造了代议制民主模式来规范、丰富和完善间接民主。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中，由具有法定选举权的公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由代表代为议政，最终实现人民主权的确立。代议制民主制度，创造性地解决了权力行使者的合法性问题，解决了权力行使者是极少数、权力所有者是绝大多数这样的矛盾，标志着人类自我管理水平、管理技术的巨大进步。代议民主制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古典到现代的演进过程，其间无数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首先应当提及的是洛克。洛克第一次明确阐述的个人权利说、分权学说、议会主权论等等，都为代议民主制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洛克首先强调，“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他的准绳。处在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它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①

作为间接民主的典型代表，代议民主制是指人民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按照一定的程序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以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代议民主制更加注重和强调民主程序，主要通过各级代表机构和代议程序对民意进行过滤、筛选和归并简约，可以有效地克服民意中的非理性成分，避免政府的决策受大众一时情绪与感性的影响和支配；代议民主既尊重多数人的意志，又保护少数人的利益，防止民主蜕变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从上述对代议制民主制度定义来看，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承认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即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二是由人民通过一定可操作的规则和程序，选举产生一定数量的“代表”组成代议机构或其他权力机构；三是这些机构根据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行使国家的立法及行政之权力；四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对人民负

① 〔英〕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页。

政治责任，即人民保持有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收回其权力以重建委托关系的权利。

这种人的自由状态，正是代议制政府需要保护的、而又未必言明的人的生存状态，虽然它只是一个至今不能达到的“应然”的目标，但它的确为代议民主理论和制度的发展方向标示了一个可资依据的终极价值，并且依洛克看来，个人的权益具体地体现在个人的财产权利上面，保护个人的生命与自由，尤其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构成了政府产生的理由。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大创新，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来保障个人的权益与自由，而作为代议制政府基础的最具近代意义的三权分立学说，正是由洛克开始，形成其对美国等国家的政府架构创建上的巨大影响力。洛克所言的三权是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这与现代的三权不尽相同，但他认为：“在一个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之上并按照自己的性质、即为了保护社会而行动的有组织的国家中，虽然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立法权既然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这是因为，受委托来达到一种目的的权力既然为那个目的所限制，当这一目的显然被忽略或遭受打击时，委托必然被取消，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的人们手中，他们可以重新把它授予他们认为最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保障的人。因此，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团体、即使是他们的立法者的攻击和谋算：有时候他们由于愚蠢或恶意是会对人民的权利和财产有所企图和进行这些企图的。因为任何人或人们的社会并无权力把对自己的保护或与此相应的保护手段交给另一个人，听凭他的绝对意志和专断统辖权的支配。当任何人想要使他们处于这种奴役状况时，他们总是有权来保护他们没有权力放弃的东西，并驱除那些侵犯这个根本的、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自卫法的人们，而他们是为了自卫才加入社会的。所以可以说，共同体在这方面总是最高的权力，但是这并不能在任何政体下被认为是这样，因为人民的这种最高权力非至政府解体

时不能产生。”①

这一段话表明，在代议制政府中，立法权居于最高的支配地位，但是最终的控制权却应当始终被掌握在人民手中；同时可以看出，早期确立的议会主权原则对于巩固代议制政府，起到了实质性的奠基作用。英国思想史上在这方面研究比洛克还要早一些的是哈灵顿（詹姆士·哈灵顿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对代议民主制理论的贡献也可谓功莫大焉。在其代表作《大洋国》中，哈灵顿对代议制政府构建所提出的具体设想，在实践上所起的影响可以从如下例子中管窥一二。他通过提出“均分与选择原则”，证明为了达成国家政策之公平，应当实行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相分离的办法，这一原则在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同时哈灵顿的代议民主制度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制度建构，美国参议院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规定参议员任期六年，其思想资源就是出自《大洋国》一书。哈灵顿的思想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如潘恩、杰斐逊等等。美国思想家杰斐逊不仅是代议制政府的积极建构者，而且是代议民主制理论的思想先驱之一。他同时提出代议民主制制度所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人民应该具备控制政府的能力；政府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并执行人民的意志；政府必须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等等。英国思想家密尔所著的《代议制政府》无疑是代议民主制政治理论发展历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密尔在这部书里，系统地整理了前人的理论，同时进一步阐发出自己的代议民主制理论，并针对英国的代议民主制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大量有现实意义的改进办法。密尔认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② 密尔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通过总结前人的理论和观察现实的

---

① 〔英〕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1~92页。

② 〔英〕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政治情形，已经意识到代议制政府有其自身的局限，代议民主制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如果代议机关权能过大，将不可能实现代议制政府被赋予的目标，代议机关的职能应当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界限之内；代议民主制制度的建设也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因为它同人类社会的其它政治制度一样，充其量只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密尔指出，代议制本身也存在众多的缺陷和弊端，如智力条件不够，或者可能有阶级立法的危险等等。而上述种种情形未尝不是20世纪各国政治生活中的真实状况。密尔甚至突破了简单的多数原则的框框，认为只代表多数的民主制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民主制度，制度的设计应当要让全社会的智力和利益两方面因素都能得到全面的代表。问题在于代议民主制存在的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人民和代表的疏离和多数决定与少数权利保障的矛盾，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以人民的名义来掩饰，所以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与隐蔽性，它的后果往往会导致政治共同体的失范或变异。因而卢梭曾经对英国代议制作出过如此辛辣的描述，他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① 因此，为解决民主代议制中主权与治权在政治理论中的悖论，在宪政秩序下一个能够保障和平衡各方面利益诉求的政治共同体无疑是最为可取的方案。这种政治共同体能够在价值层面易于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平衡，能够有效规范政治民主的运作，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落实如多数原则、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原则、代议制原则、有限权力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这种特殊的政治共同体就是政党。因为人类社会中，人们产生的分歧和冲突是由利益矛盾引起的，而利益矛盾是由利益的有限性与追求利益的无限性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面对这些冲突和分歧可以通过政党这种政治共同体，综合和协调各种利益，并将利益分歧和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使之秩序化，使追求利益的积极行为得以持续进行。政党是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化、利益谋取和利益代表的

① 〔英〕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1页。

产物，是现代性政治特有的制度组织形式。如果民众生活在政党这种政治共同体中，由于处在政党的公共权威治理之下，民众各种行为的可预期性就非常明显，从而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合作提供了便捷条件，降低了社会合作的风险。另外，在政党这种政治共同体中生活的民众在解决纠纷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社会成本要远远小于不存在共同公共权威情况下纠纷解决所必须的时间和社会成本。由于政党公共权威的形成已经预设了被治理者的同意，因此，当人们的利益诉求、利益表达出现了纠纷的时候，政党的权威具有完全代表当事人做主的当然合法资格，并能够提供充分的沟通与表达的渠道，相对于缺乏政党的社会合作来说，它具有明显的社会优越性，从而成为人们进行社会合作的第一选择。一方面，由于政党的权威为每个人都设定了一定的行为规范，使得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具有比较高的可预期性，从而提高了人们进行社会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效率；另一方面，政党权威的有效性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合作的各种风险和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

代议制民主作为架通人民民主与治国精英的桥梁，是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来实现的。脱离了现代政党，代议制民主也就无法实现，这也是政党现代性本质的体现所在。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为了节省选民在选择议员或政治性行政官员时所付出的高昂交易费用，或为了节省后者在寻求选民支持时所形成的庞大交易费用，就必须具有一种专业性政治组织或者政治共同体。这样一来，这种政治组织或共同体一方面可以代表选民来选择议员或政治性行政官员，另一方面又能够代表后者来寻求选民的支持，这种组织就是现代大众型政党。可以说，“政党组织是代表选民来选择议员和政治性行政官员，同时也为议员和政治性行政官员寻求选民支持的专业性组织。政党实际上是节约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交易费用的产物。”[①] 哈德罗·德姆塞茨也认为政党的出现正好弥补了现代民主的一些不足。他说：“如果政治民主是完全的，政党就几乎没有存在的

①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9 页。

理由。"[①] 可见，政党是不完全民主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已经有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又不可能实行全体社会成员直接管理的条件下，为了节约主权者与其代理人之间的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政治组织，是少数代理人与多数主权者之间的中介性组织。政党是现代民主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表明："人类的政治发展已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得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多数）能够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成长到能够直接管理社会（即不需要借助于凌驾在社会之上的组织而由全体社会成员直接管理）的程度。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人类的政治发展提供能使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条件、形式、方法等等，同时又在限制着人们对于社会的直接管理。这样便形成在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条件下的少数人的政治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党政治。"[②]

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党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和集团所组成，它树立起鲜明的党纲和党章，提出明确的执政方案，郑重推出其候选人，并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各种宣传工具，向选民反复宣传其政纲和候选人，以便使自己的政纲为选民所接受，把自己的候选人输送到总统、首相或议员等岗位上去。政党的行为降低了选民的时间、精力和信息费用等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候选人在吸引选票方面所产生的通常是极其庞大的费用。在政治选举中，政党的通常方略是：针砭社会问题，确立自己的政治立场，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出将要实施这些方案的候选人。问题、立场、方案和候选人四位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竞选纲领。它与其他政党的竞选纲领结合在一起，供选民判别和选择。这样不仅使问题得到了集中，而且还降低了选民在面对分散问题时所存在的无力感，使之从幻觉上感到自己对政治结果的投资影响力上升了，满足了选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偏好。

这样一来就可以给政党共同体一个合理的定位：政党是连接民众和

---

① 〔美〕哈罗德·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纬度》，陈郁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7页。

②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公共权力的桥梁，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如果政党获取执政地位，那么它的定位：它一边连着社会民众，另一边连着公共权力。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关系：政党和民众的关系，政党和政权的关系，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政党和其他组织的关系等等。在政党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有权就公共事务发表并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但又不具备强迫他人服从己见的权利；在彼此独立的见解中，尽可能地寻求一致，保持最大限度的宽容；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处理公共事务的同时，给少数人提供一个变成多数的机会。这种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就是由执政党与在野党构成的现代政党制度。政党共同体本身不是公共权力，但是它的目标就是直奔公共权力，力求控制公共权力。在当代世界，政党共同体在政治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党的政治功能一般包括处理政党的内部事务和政党的外部事务两个方面。内部事务，包括执政党内部的选举、决策、党员的发展和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等内容，这部分内容通常属于政党自治的范畴。政党的外部事务活动，是指政党为实现公民的政治意愿，所实施的各种政治行为，包括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资源配置等内容。现代政治基本上就是政党政治，因为所有的政治事务几乎都是围绕政党展开的。政党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围绕权利与权力，进行讨价还价，协商沟通，通过竞争性选举，进行轮流执政，使整个现代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民主性得以巩固和扩大。早期的政党活动只局限于议会或政府内部，并没有将触角延伸到社会，使各社会阶层的民众都卷入到政党的活动中来。1832 年英国的议会改革，使选举竞争从议会内转向议会外，导致政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革，即从派别性、体制内政党向现代大众型政党转变。自此以后，任何政党想要在轮流执政的格局中获胜，都不能停留在议会或政府内部，而必须走向社会，依靠社会大众的支持才能上台执政。

前文主要采取了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分析了现代政党政治的生成。人类的政治生活发展主要是通过最初的神权政治到民主政治再到政党政治的螺旋式的演进而获得丰富的内涵。人类社会中的神权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这三个层级的内容是依次出现的，它们不仅获得了“连

续性”的延伸，同时又具有“共时性”的存在。这种层级架构，呈现出的是递进性、延伸性和现实性。三个层级围绕着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使政党政治不仅获得了历史的存在，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第一个层级中，随着人类在政治行为中，对权力和权利之间反复交错的认知的深入，逐步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神权政治便走向了末路，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政治，人类政治生活进入到第二个层面——现代民主政治。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不仅使权利与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相互分离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现代民主不仅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即“政权的一切和平的起源都是等于人民的同意”，而且真正实现了权力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中的双向性运作和存在。现代民主的一些基本内容如平等、自由、权利、主权在民等思想也将随着国家（政治共同体）与公民（市民社会或社会共同体）之间权力和权利交换关系的深入发展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内涵和现实的意义。正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与权力的反复交换，使政治现代性获得了物化的外在形式——政党政治。在人类政治生活的第三个层级中，政党政治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主要通过政党内部的选举、决策、党员的发展和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等内容，实施其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资源配置等政治行为而推进政党共同体的现代性发展。现代政治制度正是通过政党这个政治工具，在国家（公共权力）和公民（市民社会）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使两者避免直接发生冲突，过滤一些不和谐的因素，确保社会的稳定。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民主性通过政党组织公民参政、议政，经由理性、合法性的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和沟通，从根本上完成了民主形式的转化，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实现“人民的统治”，即“政权的一切和平的起源都是等于人民的同意”，[①] 从而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获得“法理型”政治统治。通过对神权政治、现代民主政治与政党政治三个层级架构的把握，可以对现代政党政治是如何产生的，获得一个完整的政治理解。在这三个层级中，每一个上层都是对下层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现代政治制度，就是以制

---

①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赵伯英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度的形式，获得“法理型”统治，对现代民主的精髓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政党政治，通过发挥自身的强大的政治功能，组织公民参政、执政，不仅使现代政治制度保持新鲜的生命力，而且使其内在的合法性与民主性得以巩固。政治科学领域的一切知识均源于对经验的累积与提炼。如果要对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做到很好的把握，就必须对人类政治生活中各种现象进行长期的观察、比较、分析、归纳与提升，由此构成经验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认识途径。本文主要通过人类政治层级的跃迁对政党政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把握，并使政党政治在政治层级跃迁中获得丰富的延伸和扩展。

二、现代政党产生的规范主义研究范式

西方政治社会学经典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传统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往往导致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很难实现融合。在二元框架下，国家往往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的公共权力，为了维护等级与秩序而越界干涉社会私域中人们的生活；社会私域中的人们为享受最充分的自由和自主，往往无视等级与秩序的存在，一味追求“原子”化个体生存方式。面对现代文明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困境，人们把政党嵌入国家与社会之中，较好地解决了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将两方的冲突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纳入政党政治之中，使国家与社会在冲突与矛盾之中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均衡。人类通过政党政治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功能，集私人性与公共性于一体，把人权与公民权有效地整合在一起，确保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张力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是政治学中长期关注的最重要和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研究，也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众多学科。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得以生发和拓展是基于三个最基本的假设：国家产生于社会，社会离不开国家，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且保持密切的勾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源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建立于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王权相对抗的历史基础之上，从宏观上可归为两大流派，即由洛克开掘的“社会先于、高于国家”的架构和由黑格尔传承的“国家先于、高于社会”的架构。这种将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理论，反映了近代西方国家和社会权利的分疏以及二者达到某种制衡的过程。因此，它不仅成为西方世界社会实体建构的模式，而且也确立了其在学术领域的价值地位。在洛克和黑格尔之后，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关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二元论观点入手。他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国家——公民社会”的分析模式倒了过来，形成“物质生产——公民社会——国家”的分析模式，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公民社会去解说国家，从而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证国家与社会的矛盾与对立，从而揭示了国家的一般属性问题。他认为自原始公有制社会解体以来，国家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代表，具有反映不同阶级社会阶级内容的鲜明的阶级属性。此外，国家还具有一切阶级社会所共有的一般属性，即国家本身同社会相互矛盾与对立的基本属性。从国家的起源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国家自始至终都是社会的对立物。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样，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1]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更之中。不同的时代与流派有着不同的诠释，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同一流派，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永远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现实发展的外化和再现。国家与社会的嬗变历程，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

发了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之间的理论论争，也掀起了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三波热潮。从“小政府、大社会”与“大政府、小社会”的规模之争，到“弱政府、强社会”与“强政府、弱社会”的职能之别，再到“中政府、中社会”的中道选择，这种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发展的宏观脉络，是诠释国家干预的合法诉求和社会自治的合理根基的重要途径。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终极模式；两者间的关系取向，主要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这样一来国家与社会关系需要一个新的视角：国家与社会之间具有协作性，即强调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两者之间要寻求一种双向的适度的制衡关系，国家既要对社会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同时也要承认社会的独立性，为其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一个合法的活动空间。而社会既要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捍卫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又要积极培育多元利益集团，为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为了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去寻求和建构一种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具有协作性的社会资本，使得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权利问题。围绕个人权利的得失产生了“国家路线”和“社会路线”两条基本的路径。

持“国家路线”论者认为，国家不必代表某一种社会力量，它有着自己的目标、利益、资源和执行组织。有着管制权力和使用强权的合法性地位，它通过一系列组织实现支配或权威。国家是一个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组织实体。所以，国家权力具有整合社会伦理和谋求公共福利的义务，而不仅仅是消极地维护一个安全的社会秩序。在黑格尔看来，政府的权力如果是有限的，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国家逐渐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意义，超越于个体的人而存在，并被逐渐物化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与一般的个体公民相比，国家高高在上，不受任何限制，国家是惟一的，既不可分，亦不可转让，更不受时效约束，对国家权力的任何限制都是不可容忍的。

持“社会路线”论者认为，由个人简单集合构成的社会产生了政府

(国家)，政府与社会始终要保持一种信托关系，如果政府亵渎了社会的信任，社会具有重新选择政府的自由。对社会而言，政府的作用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它不能任意干涉社会的秩序，这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权力只是源于人民通过契约而让渡的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对政府是否违背契约而对社会造成致命的侵害要由社会来做裁判者。因此，多元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公民社会决定国家，公民社会对国家享有最高裁判权。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通过国家——社会二分法来看待问题，认为国家与社会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打破了过去的关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的视角，以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埃文斯（Peter B. Evans)、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公与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理论，认为国家与社会存在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二者是互相形塑的。[①] 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关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形形色色的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超越了传统二分法对单方面的片面强调，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对国家权力和作用的认识转变，对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实世界有着重要影响。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核心是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合作关系，强调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发生作用；在分析方法上，主张对国家与社会这样过于宏大的概念进行分解，将国家与社会看作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交织。此理论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即“国家在社会中”与“国家与社会共治”。

“国家在社会中”研究取向以乔尔·米格代尔为代表。1994年，米格代尔主编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第三世界中的控制与转型》一书，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冲突、适应及创造，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State in Society）的研究方法。2001年，米格代尔出版了专著《国家在

---

①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 and Society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eter B. Evans ed. , State - 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Elinor Ostrom, “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 Coproduction, Synergy, and Development”, in Peter B. Evans ed. , State - 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pp. 85 - 118.

社会中：研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形塑和相互建设》，对“国家在社会中”进行了理论总结。从方法上看，米格代尔认为，“国家中心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统一整体，将国家拟人化，看作可以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采取理性行动，这种分析方法掩盖了国家形成过程和社会中争夺控制权力的斗争的复杂性，因此需要打破国家一体化的概念，来分析国家的不同部分如何与社会不同部分发生联系。

由于国家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是政治统治，而代表国家的政府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是政治管理。政治统治的内容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关系，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政治管理的内容则是政府与全体人民之间的关系，即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两者关系应当分工明确。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所涉及的是政治管理的内容，也就是作为国家具体体现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因此，米格代尔提出需要对国家概念进行分层。米格代尔认为，要对国家采取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将关注点从国家高层转向国家的不同部分，尤其是国家组织结构与社会相接的国家底层，将国家分为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析。他认为国家自上而下可以分为四层：最高决策中心，指的是国家机器顶端的最高行政决策者；中央政府，指的是国家决策的神经枢纽，它制定国家政策、安排资源的分配，并对最高决策中心负责；地方政府，包括地方的政府部门、立法团体、法院、军事和警察机构，它们在一个固定的次国家范围的区域内执行上级政府政策，制定并执行地方政策；执行者，指的是直接面对社会执行国家政策的人员，例如收税员、警察、教师、士兵以及其他直接执行政府规定的人员，他们直接与社会打交道。由于国家组成部分的多样性，因此对同一问题很难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每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自身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反映了不同行为者基于不同压力下的不同行为的聚集与整合。

事实上，国家和社会都不能摆脱传统的历史关系而独立存在，它们都承载着历史的传统性。因此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种原有的习俗、传统和秩序不断地被组织到社会或者国家的范畴之中。如果不对这些因

素的转化进行历史分析，而是简单地把它们作为自生自发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现代社会的内在危机。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当我们在批判国家中心的历史观念，而强调来自社会力量的时候，恐怕不能忘记——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的形成与进化离不开各种超经济的力量，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干预，这是国家的一种创制或制度安排的结果。[①] 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系列的规范与秩序。如果没有规范与秩序，社会就不会有正常的生活。但是，国家赋予社会的规范与秩序如果不建立在社会认同和自觉遵行的基础上，是不会得以确立和长久维持的。对人类社会来说，国家的存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国家如果是对社会进行无限扩张和统治必然会窒息社会的发展。因此，要对代表公共权力的国家活动界限给予明确地划分，即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的国家应在一种合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国家行使公共权力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从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形成的角度给予深刻地解释。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权力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统治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范畴，其基础在于利益及利益冲突，事实上是一种调节矛盾的有组织的现实力量。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②] 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权力的论述为我们认识权力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显然，国家权力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权力概念不同，它是一个政治范畴，是在伴随阶级、国家产生之后才出现的一种公共权力。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均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这是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任何社会生活都需要一定的习俗和一定的法律规范，但法律规范在社会上不会得到自动的服从，所以必须有一定的权力对其加以约束。权力的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的秩序。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权力源

---

① 汪晖：《死火重温·"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3～16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4 页。

自人类自身的需要，即防止社会被外部力量消灭。社会权力的必不可少，还在于社会内部各种需求的不对称。社会不可能形成完全对称的互惠关系，因而形成不平等的关系。权力往往被用来维持或防止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形成。这种人类初级社会中的权力与这种国家产生后形成的国家权力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国家权力是在一般权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而产生，并且凌驾和超脱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权力。国家权力实际上就是特指政治权力，事实上又可统摄和包含其他权力，在其实质上是特定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用以强制地分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恩格斯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这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从国家的所谓"公共性"这种暴力实质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组织严密、手段发达的权力系统，是能够不断提取社会资源，维持特定的统治秩序，巩固自身，实施利益分配的公共权力机器；而阶级利益之争则赋予这种公共权力以鲜明的本质属性。国家权力是自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出现以来，经历社会分工、社会分化直至私有制与阶级社会产生之后，逐渐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交往、没有社会，则无所谓国家，也无所谓国家权力；从其性质和归属来说，国家权力无疑是特定社会群体诉求与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一定的政治主体总是主导社会公共生活并与一定的政治客体相对应，特定的国家权力问题被特定的利益群体或利益群体的联合力量所掌握，成为事实上阶级的联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统治。

但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在于社会，其阶级性必然在质和量上与社会性保持某种一致性；反过来，在阶级社会，国家权力的社会性也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否则就难免导致政治失范。国家权力根本上的矛盾性，使其在不同的特定历史时期，总是不可避免地凸显其某一方面：或是阶级性，或是社会性。阶级性与社会性问题相伴而行，资产阶级民主学家洛克认为："……国家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①] 恩格斯科学地指出了阶级社会中国家权力的统治职能与社会职能之间的辩证关系："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②] 事实上，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和平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保持二者之间的协调，国家权力才能保持其权威基础及其完整性。也正如此，尽管历来的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级的联合，可以掌握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并能充分利用国家机器来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动员，但出于对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和完整性方面考量，则会尽量采取种种从意识形态到现实国家各种制度安排的办法以全民利益的代言人形象进行统治，采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技术和手段来掩盖阶级统治的本质和真相。惟其如此，才能将阶级实质隐藏于"社会"的表面之下，才能获得所谓政治的合法性。归根到底，国家权力是整个社会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集体调节力量，国家权力发展出国家及社会存在的基本关系、结构和制度，并使社会成员的生活淹没于其中，国家权力是社会发展一切问题最终的解决力量。国家权力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近似地看是存在于"公域"中，而其运行却是在"公域"与特定的"私域"中，而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往往存在和作用于特定的社会"私域"中。因此，国家权力区别于一切私域中的权力，它是对整个社会

① 〔英〕洛克：《政府论》，赵伯英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23 页。

负责的公权力。正因如此，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代表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家尼科斯·波朗查斯认为，“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①

随着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西方政治学界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定位，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使人们对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突破了以往“国家本位”的围城，转变了“自上而下”的传统政治思维方向，把目光聚焦在与国家相对的社会这个层面，从而开创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的政治思维。这一理论显示，公民社会所具有的消极防御和积极参与功能，是其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中介体的原因所在。近现代以来，作为一种独特范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对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对现代西方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的萌生与培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在“20 世纪后期，伴随着全球性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思潮对抗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泛滥和侵蚀，探究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思想界的焦点性论域，并试图从这一路径上对国家与社会间的紧张乃至对立关系做出批判和反思，以此重构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② 可以说“市民社会”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国家”在其疆域内的“孤独”处境，使“国家”有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对立面。正是这一“国家”对立面的形成，生成了“国家意识”，并进而引起了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大转型。

所谓“市民社会”，则是指那些源自于保护个人自由的思考以及反对政治专制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源自于对市场经济的弘扬以及对国家干预活动的应对的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而逐渐产生的相对于国家以外的实体社会，而这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又形成了市民社会中的两大认知传统：一个传统是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观念。洛克式的观念，从其自由主义的根源看，隐含有显而

---

① 〔希〕尼科斯·波朗查斯：《国家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8 ~ 109 页。

② 邓正来：《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 23 页。

易见的但未必截然二分的两种思想导向：其一是透过市民社会前国家（或前政治）的身份（identity）或品格而表现出来的所谓捍卫个人权利或反权威的“反政治”导向，套用杰里米·瓦尔德伦的话说，这种理论，“首先是一个反抗的理论”。[①] 在这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天赋权利，而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权力的限度。其二是透过市民社会外于国家（或非政治）的规范框架而显示出来的社会完全可以不需要国家权威干预而自己管理自己的“非政治”导向。这种导向受到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激励，进而在实践层面导致了一个受制于自身规律（“看不见的手”）而毋需国家干预的经济体系的出现。这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近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开始从宗教、政治等传统权威式组织原则向自由放任经济的自发性组织原则的演化。另一个传统则表现为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的架构。实际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真正分野是由黑格尔完成的[②]。一如雷德尔（M. Riedel）指出，“透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黑格尔向其时代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亚于近代革命所导致的结果，即通过政治集中而在君主……国家中产生了非政治化的社会，将关注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正是在欧洲社会的这一过程中，其‘政治的’与‘市民的’状态第一次分离了，而这些状态于此之前（即传统政治的世界中），意指的是同一回事。”[③] 其基本内容是：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相别又相依的关系。“市民社会依靠从国家得到睿智的领导和道德的旨意。……然而，国家也仰仗从市民社会得到实现它所体现的道德宗旨所需的手段。”第二，虽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相互依存，但黑格尔指出，它们又处于不同的层次。国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它代表不断发展的理性的理想和文明的真正精神要素，并以此地位高于并区别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安排以及支配市民行为的私人道德规范，一言以蔽之，国家以此地位运用并超越市民社会。第三，由于市民社会是由

---

① 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洛克”条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27 页。

② B. Crick, 1964: “In Defence of Politics”, p. 123.

③ M. Riedel,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and the Problem of its Historical Origin”, in Z. A. Pelcynski, ed.,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p. 3 ~ 4.

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所支配，它在伦理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不自足的地位，因此，对这种不自足的状况的救济甚或干预，只能诉诸于整个社会进程中唯一真正的道义力量，即国家。[①] 关于“市民社会”的复兴，一如查尔斯·泰勒所言，所要复兴者，“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在此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

相对于国家来说，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亦即市民社会在维护其独立自主性时力争自由并捍卫自由，使自己免遭国家的超常干预和侵犯；市民社会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益社团，这些社团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政治诉求表达它们的利益，在这一意义上，市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由于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是以反抗专断权力和争取自由民主为目标的，因此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呈现出了“利益多元需求、权力分散制衡、组织异质独立”的特征，进而广泛形成了排斥单一性和独占性机制的强烈诉求。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制衡国家权力的功能，经常使其与国家关系处于对立和紧张状态，为此，西方国家也在不断进行着调适和修正，竭力调处个性与共性、公域与私域、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厘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及其公民之间达成某种妥协与均衡，进而实现社会协调发展。这样的调适和修正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及其公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博弈和分割。

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民主力量的强大确实给国家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社会民主力量为政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迫使国家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但是，公民社会又必须严格服从法律，支持国家为维持公共秩序、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各种重大行动；另一方面，国家要能够顺应公民社会的民主要求，持续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和

---

① B. Crick, 1964: “In Defence of Politics”, p. 123.

创新，在关键时刻愿意与公民社会就重大宪政问题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同时能够适度控制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进程和步骤。国家与社会之间建构协作式平衡关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保证政治体系的连续性，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不仅有利于民主转型过程的平稳，而且也有利于民主转型后的巩固，使民主政治发展能够走一条和平的渐进式道路，不会出现自下而上的政治动乱。人民可以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国家，民间组织开始在各个领域发挥联系和沟通的重要作用。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社会与国家之间不再是原来那种简单的命令服从的关系，而更多地体现为国家法律规制下的一种协商谈判与讨价还价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尽管发生在西方，但是其进步性和趋向性则是人类社会的，是人类获得政治解放和平等自由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西方模型只有在历史意义上说是西方的，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则是全球性的；特别是随着市民社会理论和实践的不断系统化和深化，社会与国家之间日益显现的“牵连与互动”，充分体现了超西方的价值观念，并获得现代性意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国家与社会之间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结构关系。市民社会已经提出了国家民主化和全面参与政治的要求，但现行政治体系本质上仍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国家权力仍然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督，国家行为的约束在许多领域是自我约束，还没有转换成制度约束和社会力量的约束。公民社会在某些领域已经可以与国家进行对等谈判，但还没有获得法治所保障的独立地位，尤其是社会的自治能力还没有形成，缺乏足够的制约国家的力量。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国家与公民社会各自付出积极的努力，国家更为主动地引导、规范公民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公民社会则以理性的有节制的行动参与和制衡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协作式平衡关系，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结构性基础。国家允许公民社会自由结社，并允许民间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立法过程，使那些具有代表性并与国家合作的功能性社团在代议机构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发挥

主导作用。国家与公民社会经过这种阶段式的合作，一方面可以促进代议制民主的发展，使其符合现代民主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公民社会与国家激烈对抗的局面。

（二）政党的嵌入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塑

英国学者吉登斯[①]在评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文章《文明的公民社会：论重新确定国家和社会的任务》时指出，一个公道、合理的社会要求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这三方面的力量必须是均衡的。需要一个好的、主动的政府，但政府管得过多就会很快官僚化；还需要一个合理的市场经济，但过分强大的市场会使一切都商业化，而这是不值得企求的；最后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但是如果它太强大，社会会蜕化成无政府状态。因此，一个好的社会要使这三方面保持平衡。这三者之间平衡关系的建立依赖各方度的把握，这需要政治家的治理艺术，需要企业家的管理艺术，需要公民社会公民的生活艺术。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和谐相处、相互作用的社会，应该是长期的和可持续的。

在吉登斯看来，对于好社会的判断和内涵可能要历经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强大的政府，甚至是官僚化的政府；第二阶段是建立强大的市场经济，甚至是一切都商业化的向钱看的市场经济；第三阶段是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甚至是无政府的公民社会；第四阶段是三者矛盾和冲突的协调与平衡，达至一个理想的好的社会。这个路径也就是他作为学者为社会所设计的所谓“乌托邦的现实”，就是理想付诸于现实的过程。他认为最好的社会是这样的：人们有能力去应变，同时自我身份并不缺失，并且感到稳定与信任。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应当是一种建立在公民自主权利基础上的多元差异的社会，其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是三个基本的组成

---

① 安东尼·吉登斯（1938～　）：当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曾提出“第三条道路”、“全球化”、“乌托邦现实主义”等重要理论。被媒体称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目前为英国上议院议员。著作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等四十余种。

部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政府在政策管理、规章制度、保障平等、防止歧视或剥削、保障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及保持全社会的凝聚力等方面更胜一筹；市场方面在创新、推广成功经验，适应迅速的变化，抛弃不成功的和过时的活动，完成复杂和技术性任务方面往往更胜一筹；社会则在完成微利或无利可图的任务，需要同情心和对个人关心和尊重的任务，需要顾客或当事人方面具有广泛信任的任务，需要亲自动手和直接关心的任务以及牵涉到贯彻道德准则和个人行为职责的任务方面更胜一筹。政府利用法律、法规、政策等公共权力规范，力求保持社会公平与稳定；市场通过协议、契约等规范，追求效率与效益的最大化；而社会通过自治性规范，寻求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政府、市场、社会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确立起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对于民主政治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英国学者赫尔德认为，没有稳固而独立的市民社会，自治原则就不可能实现。但没有负责提供坚强有力的再分配手段（当然还有其他手段）的民主国家，市民社会的民主化也不大可能成功。然而，如果国家过于强大，公民社会处于依附地位，那么民主进程就无从启动，政治发展会陷入停滞或者徘徊状态；“国家无限发展所造成的如此种种不虞后果，恰恰说明了国家权力、行动及权威的发展超越了其所应有的限度。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是国家限度的最终表现，它实际上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危机。”① 如果公民社会力量强大，并走向激进，虽然能够推动政治发展，但也有可能颠覆政治秩序，破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反而不利于政治发展，甚至可能出现政治衰退。因此，“民主化必须寻求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取得制度上的平衡”。② 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作式关系，彼此之间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衡。按照林茨和斯特潘的看法，就是要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仲裁机制，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制度化、常规化、结构化。

① 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1 ~ 242 页。

② 〔埃及〕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联合国与民主化》，载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 1999 版，第 312 ~ 313 页。

国家从公民社会那里接受信息、压力和周期性的更新，并与公民社会就民主权力的构造与运作的种种方式达成可行的协议。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想平衡关系，单独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任何一个方面是无法实现的，这就需要政党出面来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政党作为在民主体系中特殊的政治结构，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在政治社会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党总是力图影响人们对各种问题的偏好，唤醒政治冷漠者，并且发现新的问题，提出议题，动员民众来支持自己。特别是通过选举等国家重大政治生活事项，政党展示它们过去的成就，讨论国家的政治未来。

这样一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嵌入一个能够为它们提供制约和纠错功能的政党制度，既能够保护社会领域中存在的成熟和完善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为这些组织维护公共权益、提供公共服务，也能够制约国家不应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以保障由众多民间自治组织形成的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主领域。这些民间自治组织在社会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且能够得到公众和国家立法机构及政府的尊重，进而使公民们能够以权力委托者的身份并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一方面去影响和监督政府，另一方面与政府携起手来共同治理社会。政党制度的存在不仅为提高和增强社会的自治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架构起了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沟通的桥梁。另外，政党组织通过组织选举，降低了个人作出选择的所需成本。总之，政党组织为选民所提供的服务“大大降低了选民作出政治选择的时间和能量耗费”。[①] 政党使公民参政秩序化，增强了公民参政的效能感。在政治过程中，公民的利益表达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充满矛盾与冲突，而政党则是缓和冲突的制度化机制。政党通过利益聚合，使为数众多的利益要求被吸纳进入政纲，从而“以一种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②]，使公民参政进入秩

① Fred I · Greestein, 1963：“theamerican Party Ssytemand the Amerrican People”, Prentice - Hall Inc, p35.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74 页。

序化轨道。而实际上，只有当公民参政秩序化时，才有利于实现其收益，增强其参与效能感。因为只有在秩序化的政治参与中，公民的利益表达才能被顺利地输入政治系统而影响公共政策。因此有学者总结说："随着参与的扩大，政党出来组织参与，随着政党的发展，它又促进了参与的扩大。"[①] 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政党作为沟通公民与政府间联系的链环，为公民参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从而保证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民主性，这也正是政治过程中政党存在之必要性的基本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政党通过组织公民参政，在社会与国家之间设置了一个"过滤层"，把社会民众参政限制在政治体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从而保证了政治体系的合理性。对此，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塞特指出："在每一个民主政体下，社会集团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制度表现出来的，政党制度在根本上表明了阶级斗争向民主形式的转化。"[②]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③]

目前大多数的国家都采取政党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国家权力的更替和对社会生活的日常公共管理。政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从语源学上来说，政党（party）意为"部分"，仅为社会中的一部分因素，它们在某些联合统一体中与另一部分人相互对立、各不相让。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是指在一个政治实体中的分裂、冲突和对立。因此，从政党的自身属性来看，它必然代表并为实现某些特定社会成员、群体利益而存在和发展，因此，通过获得公共权力、运用公共权力而实现和保障特定利益是其根本任务和基本出发点，也是其归宿。但是，政党的自身特性与国家权力的社会性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矛盾，政党如何处理这种差距和矛盾根本上由其阶级本质所决定，而这反过来又影响和决定了不同政党的社会历史命运。在现代政治制度中，"执政党

---

① 〔美〕波尔斯比等：《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10 页。

② 〔美〕布来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73 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77 页。

的一个重要任务，既不是在执政过程中不断强调自己的阶级属性，也不是为了执政而放弃这种阶级属性，而是如何在保持阶级属性不变的情况下又体现出自己是执掌公共权力的力量。"[①] 而且，政党处理国家权力的基本方向与形式决定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制方式及其所决定的文化关系。在私有制条件下，政党不过是以国家权力为私有制基础上的特殊利益服务；在公有制条件下，政党可以获得以国家权力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的现实条件。无论是实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还是实行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政党政治都体现了某种共同的特征（党政关系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现代民主制度是确认"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它有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两种不同类型，这两类民主制度各有特点，适合于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的需要。对于选择人民民主的国家，相应的党政关系体制也就是其所必需的，政党必须遵循国家权力的社会性与阶级性的协调。其间的区别只是在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由这一制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政党必然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仅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代表整个社会前进的先进方向，政党强调国家权力的社会性是自身阶级属性的体现，是自觉的要求和作为；而自由民主的西方政党政治本质上则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是资产阶级借以维护统治秩序获取本阶级利益的精美包装和外壳。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不一致使政党必然要寻求将政党权力转化为社会公共权力，使本党意志、要求充分体现于国家权力的结构和运行过程中，而成为执政党或是参与执政就成为政党必然的选择。所以，无论是表面的还是实质的，协调国家权力的阶级性与社会性，至少在实际政治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实际上也表明，政党欲保持对国家权力的拥有和行使，则必须将阶级性与社会性作一合适的结合。这也就是现代政党政治中政党获得并长期保有国家权力的基础和前提。

政党对社会的重要性体现在，政党通过掌握公共权力而获取执政地

①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 页。

位进入并控制政府，并在全社会层面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这样一来，政党通过对社会利益的调配产生了一系列的治理与自由、秩序与民主等关系，实现了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基本互动模式。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适度的分离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政党制度的存在确保国家不要过度地行使权力，去侵占社会自身组织能力，对社会的良性发展形成障碍；同时确保社会不要过度自由、散漫反过来影响国家的威望与权能。政党制度的存在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了适度张力并为它们提供了稳定有效的沟通机制，同时也会使自身在国家权力和社会利益的调整与协调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增强自身执政能力和合法性认同。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直是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也是政治学中最基础性的命题。在西方学术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渊源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建立于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王权相对抗的历史基础之上，最初受到世人关注的是“社会先于、高于国家”洛克式的版本与“国家先于、高于社会”黑格尔式的版本。这两种版本无论具有多大差异，但都基于一个共同点就是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更之中。不同的时代与流派有着不同的诠释，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同一流派，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从围绕个人权利的得失产生了“国家路线”和“社会路线”的冲突与融合；到“小政府、大社会”与“大政府、小社会”的规模之争；到“弱政府、强社会”与“强政府、弱社会”的职能之别；再到“中政府、中社会”的中道选择，以及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公与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理论。通过这种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发展的宏观脉络梳理，说明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个复杂交错的问题。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一直是西方政治社会学所探究的核心内容。国家独享某一领土范围内对暴力的合法性使用权。国家和社会围绕资源争斗，主要是赋税率的确定。国家与社会间是以某种“交换”为条件的：国家因为独享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可以利用公共权力为社会提供保护与秩序，并得到社会物质的支持；而社会为了

维护安全、自由就必须向国家支付一笔费用，购买国家“出售”的系列公共服务，两者之间得以和平相处，这是国家与社会的理想状况。但在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很难达到一种均衡，两者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当矛盾无法解决时，国家与社会就可能陷入“诺斯难题”或“诺斯悖论”。在这种情况下，政党适度地嵌入国家与社会之中，使国家与社会的两维对立变成三维制衡，这样就凸显出政党的价值所在。国家与社会容易产生越界冲动行为，依靠单纯的国家制度和单纯的社会制度则做不到维持均衡这一点，必需考虑政党、国家和社会三方面的维度。在二元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往往通过以民主程序获得的公共权力，为了维护等级与秩序而越界干涉社会私域中人们的生活；社会私域中的人们为享受最充分的自由和自主，往往无视等级与秩序的存在，一味追求“原子”化个体生存方式。政党介入国家与社会之中，就较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将双方的冲突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纳入政党政治之中。政党之所以具有调停和规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能力，是因为政党面对经常处于变动与矛盾中的国家与社会双方，依靠自身组织的创新功能。

在国家与社会两个场域，运行于政治体制的正式（合法的、立宪的）部分和非正式（社会的）部分，把国家形式上的结构与社会中的各种不同成分（如公民及其经济、文化、宗教等组织）联系起来。一方面与国家权力保持有效的沟通和联系，这不仅决定着政党能否及时解决执政过程中的困难，而且决定着政党能否持久地获得与国家权力动态发展相适应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使政党与国家权力实现动态协调；另一方面，政党又与社会权利保持密切联系，以代表与平衡社会民众的利益自居，围绕自身组织目标建立一系列组织纪律与组织机构，形成功能完整的运转机制，来带动社会贯彻和推行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对社会发展的主导。政党的价值存在体现于促进国家政治功能健全、部分公民权利进步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章 现代政党出场的双重样态

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是现代政党出场表现出的主要样态。竞争性的政党关系是指那些在宪政框架中竞争执政的政党间关系，这种政党关系集中体现为执政党与反对党（或在野党）的关系。竞争性的政党关系主要存在于经过较长时间民主政治实践演进，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的欧美“民族—国家”。非竞争性政党主要是基于民族解放与“民族—国家”建构，通过暴力或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存政治制度而形成的一些民族国家。这两类政党由于出场的样态不同，其结构功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涉及的现代性意义也具有很大的差异。在“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中，通过这两类政党功能的发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具有的差异性和比较性特点。两类政党在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伦理秩序与法治秩序、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竞争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依法维护着适度制衡关系，追求一般是生活政治；而非竞争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基本还保持着总体性单向演进的态势，虽然追求的仍是解放政治，但是已经由魅力型政党向法理型政党逐渐转变。

一、现代政党出场的双重样态

现代政党起源于现代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政党是代议制、民主制、民主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在发展中遭遇冲

突与危机的结果。法国著名政治学者迪韦尔热认为现代政党通过两种方式而产生：一是“体制内产生的政党”，二是“体制外产生的政党”，一般简称为“内生党”和“外生党”。所谓“内生党”是由议会中的反对派发展为现代政党，是议员在议会政治活动中逐渐联合起来而形成的政党；而“外生党”则是指在代议机关之外产生的政党，是对政治中的统治集团发起挑战并要求在代议机关有自己席位的政党。这种观点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人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来审视现代政党的生成与发展，把“体制内产生的党”看成一般意义上的起源于西方民主制度上的竞争性政党，而把“体制外产生的政党”扩展为通过革命或暴力推翻现存政治制度与政府的非竞争性政党。美国学者拉帕隆巴拉和韦纳在《政党和政治发展》一书中则从政治体制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政党的起源：认为在社会要形成国家时会发生“三个历史性的危机”，即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危机，新秩序整合的危机，在新秩序里大众参与的危机；每个危机都是现代政党形成的直接原因。反过来，现代政党又是解决这些危机的唯一手段。无论是竞争性政党还是非竞争性政党，既是政治制度危机的产物也是解决危机的手段。在现代政治文明中，这两种政党的出场的样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与相关性。

（一）政党与暴力的关系

从发生学角度来考察，一个国家的政党及政党制度的产生和确立，是特定政治环境下社会和思想进程的历史产物。美国学者哈耶克认为：“人们之所以使用这些传统和制度，乃是因为它们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可资运用的工具；它们是累积性发展的产物，而绝不是任何个人心智设计的产物。[①]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政党确实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物，可以说现代政治制度在演进过程中，其功能与调整更多的是通过政党来体现的。政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具有很大的地域性和差异性，根据政党的属性、纲领、目标和价值以及产生的背景、条件等可以

① 〔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页。

划分多种类别。本文为了行文的需要，从政党与竞争关系的视角，把政党分为竞争性政党和非竞争性政党两大类别。竞争性政党一般产生于体制内，主张通过竞争性民主选举程序获得公共权力谋取执政地位；而非竞争性政党一般产生于体制外，主张以暴力或革命手段，以推翻当下的合法性政治体制和政府而获得公共权力进行当政。通常来看，竞争性政党产生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及其议会民主制度后，新兴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了的旧贵族、封建保守势力等派别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政权、维护本集团利益而逐渐创设的规范各派别相互关系以及各派别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制度。因此，西方的政党制度往往是议会斗争的产物。其中英美的两党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在那些实行非竞争性政党或者说体制外政党制度的国家，主要是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往往是在争取民主独立与国家建构，并通过暴力斗争的方式，推翻既存的政权制度而逐渐形成的，并在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政权时得到确认与认同。

非竞争性政党由于处在当时的合法性体制之外，在获取合法性统治地位之前，一般被宣布为非法政党而遭受当政者的镇压与绞杀。这类政党通常标榜以某个阶级为基础，并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它存在的主要价值在于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是其本质特征。这类政党往往通过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来确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分化谁，并采取暴力或革命的斗争方式进行政治活动。非竞争性政党产生的环境及条件一般表现为：民主资源稀缺，集中氛围浓厚，以秘密方式建党，党员以严格纪律服从党组织与上级，政党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党外民主资源不足；党内上下级关系简单，下级根本无法监督上级，下级对于上级的指示、命令很少能参与有效的决策，更不敢不执行，党内缺乏民主与平等。对于民主，在许多时候被这类政党看作一种革命的手段。

非竞争性政党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在长期的战争中，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魅力型领导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人马、班底，个人权威受到崇尚。这种情况下，通常仅靠一

个革命领袖，这种革命领袖产生于特定环境，他往往一呼百应，而且革命党在实际操作中也通常会把体制力量凝聚到领袖的身上，通过他动员民众，领袖对于革命党非常之关键；第二，要有一整套思想体系或者意识形态，它通常是革命领袖提出来的，在全党得以贯彻与执行；第三，要有一个铁的纪律，这是战争年代的需要，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可能进行民主协商，即便有，也是很小范围的，体现在成员关系上，必然是领导命令型，靠铁的纪律来凝聚、整合这个党。

这类政党在结构功能方面：一是注重意识形态的构建。当政党在成立与发展的时候，总要论证自己存在的价值，说明其代表与如何代表哪个阶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从而表明自己的性质、纲领、目标，以及在上台执政之后要实行的大概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说政党建立初期，是以“为何需要它”的面目出现的，注重于政党意识形态的构建，即论证它的合法性，表明自己的独特性与标新立异，以吸引广大民众加入自己的政党，或者促使民众支持其政策等。

二是政党的目标明确。任何性质的政党大都有一个首要目标，不同政党有不同的首要目标，同一个政党不同时间也会有不同目标。这些首要目标一般包括夺取政权或者参与政权，争取选票最大化，职位与权力最大化，争取党员的代表性与参与性最大化，为政策与意识形态辩护最大化。以夺取政权为目标取向的政党成立初期，一般是以为政策与意识形态辩护最大化为目标。首要目标在很大程度决定了政党的活动内容与方式以及政党结构的变化。这类政党一般是以反现政权的面目出现的，这就决定了其生存与发展的条件：（1）有崇高的理想与目标吸引力及其阐释现实生活的能力；（2）具有一大批献身于政党事业的积极分子；（3）从事严密纪律型组织的秘密活动；（4）深入群众发动与组织群众；（5）创建自己的军队。崇高的理想与目标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政党生存的首要条件。政党的成员一般必须在意识形态层面达成一致，成为党内活动的必要条件，否则容易引起党内分裂。由于一些政策、意见分歧往往与立场、路线联系在一起，并且以秘密的活动方式限制了政党党内的民主争论范围与民主运作，容易导致把分歧看作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

这样就会把党内争论看成敌我斗争。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倾向，虽然给党内生活带来一定干扰，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斗争可以保持党内纯洁。而由此带来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就容易把一些意见与政策取向一致的人看作派别，导致党内意见与政策争论不够充分、民主，不易形成妥协，使其容易形成党内集权的氛围。在党外，阶级分析方法的应用，意识形态的宣传，很容易把党员与民众复杂的认识过程简约化。对此，政党结构的分化与创设就有了约束性框架。

三是崇尚纪律与权威。这类政党由于产生条件的特殊，因此注重纪律与权威性。例如，“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往往成为这类政党的主要纪律约束，并在实际政治行为中，树立具有高度权威性的领导体制。非竞争性政党制度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分权机制，很可能走向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即通过党组织对国家以至全社会实行高度控制。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非竞争性政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在消灭异己之后，用党员占据和充实所有的行政职位，达致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其结果，必然导致普选制的废除和党政不分。表面上是政党与国家并存，实际上政府是政党的影子或傀儡，呈现出一种“无形状态”。对此状况，托马斯·马沙利克曾形象地说，即使是一个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两种权力源——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表面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喧嚣的政府机器掩盖和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

当下，这类政党急需要解决的就是自身的结构弹性问题，即政党制度结构所具有的民意吸纳能力、抗拒风险与危机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这类政党往往存在于刚独立或解放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巩固新生政权与推动社会发展。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总结过：“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数量多寡无碍于它拥有强壮之势；而在低度现代化的国家，一党制可强可弱，但多党制却毫无例外是软弱的”,[①]“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与高水平的

①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8页。

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有的。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①] 可见，一党制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一旦巩固政权的任务完成后，当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民主政治时，一党制度却往往差强人意，很难适应现代性社会发展。如苏联一党制形式，在取得一定效率的同时，也往往由于沟通机制不灵而积累了大量的弊端，积重难返。经济上不足以取得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展，政治上则缺乏民主，党群关系严重疏远。这些就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制度性剧变埋下了伏笔。[②] 而非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为应对社会的变迁，这类政党要突破以往把政党仅仅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观点的束缚，从而认识到政党是现代社会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力量之源在于市民社会。政党要恢复一般性政党的特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到桥梁与纽带作用，不仅要代表与沟通好利益诉求，更要平衡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社会层面培育各种完善的表达机制。规范政党与国家政权、社会、各个组织和群体的关系，使制度结构更具弹性，更好地吸纳和整合更多阶层、群体的利益要求。

（二）政党与选举的关系

现代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这样的判断一般得到了合法性的认同与肯定；但反过来说政党政治就是现代民主政治，这个逻辑判断就很难获得人们的合法性认同与支持。因为前提条件在于，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现代政党产生以后，现代民主政治主要是通过政党政治来体现与完成的。可以说现代民主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政党政治，但政党政治的活动就很难归属于现代民主政治。因为政党不仅有竞争性或者说体制内政党，还有非竞争性或者说是体制外政党、集权专制政党甚至法西斯政党；竞争性政党的存在获得法律效益，享有一定的

①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页。

② 王长江主编：《世界政党比较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

合法性，政党之间的公平竞争是民主政治充分与必要的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基本的、最低的标准。而在非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中，一般不存在政党与政党之间在法制与民主程序框架下的自由竞争，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准，也就是非民主的体系。

民主政治的最高理念是“主权在民”，统治者的统治必须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现代民主政治理论的大师美国学者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曾指出，民主政治并非一种理想的情境，而是实际上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使有意参与决策的政治精英，透过选举的渠道彼此竞争，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取得政治决策的权力。另外一位美国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家达尔（Robert A. Dahl）认为，民主政治包含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参与，二是竞争。参与指的是选举权应普及全体公民，重要公职人员均应由选举产生。所以，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安排，一个国家如果不举办选举，重要公职人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不管用世袭、委派、任命，或以暴动、政变等手段取得政治权力，都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在这种民主制度环境中生成的政党如果谋求执政地位，只有通过竞争性选举，在选举过程中，各个不同的政党提名候选人，提出不同的政纲政策，供选民抉择，在公平的地位上彼此竞争。现代公民由于分工日益精细，对其专业知识以外信息往往所知有限，因此在面对众多良莠不齐的候选人时，常常不知该如何抉择。而政党为了胜选，取得多数和执政的权力，对于候选人的提名必须特别慎重，如此一来选民即可透过政党事先筛选过而推荐的政党候选人，再从中加以选择。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性政党所谓的竞争，指的并不是一种竞争的程度，而是一套竞争的架构或制度安排，在这套架构下政党可以合法组成，彼此公平竞争，来争取多数选民的支持，取得执政的权力。在欧美国家，政党虽然在现代性社会政治运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宪政的制度性安排则是现代性社会政治运作中第一位、基础性的因素，政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政的尺度。这正如亨廷顿曾揭示的那样，政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

制度安排首先规定了各参与政治竞争的政治主体的平等地位。所以，

政党之间为争夺国家公共权力的竞争，只能是平等政治主体之间的竞争。政党为争夺国家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始终在民主宪政框架内进行。政治主体无论大小、强弱，都可以自由、平等进行政治竞争、争夺国家公共权力的机会与权利。严格地讲，这种多党政治的平等竞争有着双重要求：一方面，在形式上政党的政治身份应当平等；另一方面，在实质内容上，进行政治竞争的政党应当势均力敌。因为只有势均力敌，才能打破垄断，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还是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抑或是法国的四大党两大政治派别，这些政党或政治集团之间往往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它们在力量上是大致对等。只有在力量大致相等前提下的围绕争夺国家公共权力的竞争，才可能是多党间的真正的自由平等竞争。如果，政党各派别竞争的力量过于悬殊，则在没有展开竞争之前，胜负已定。这样的力量不对称竞争，容易走向政党垄断。

在一个竞争性的政党体系里，通常会有两个以上的政党彼此竞争与互动，除了战时或非常时期，所有政党联合起来组成联合政府或战时内阁，平时一定会有执政的党，也会有反对或在野的党。政党要提出不同的政纲政策供选民抉择，政党之间彼此竞争、彼此反对，存在反对党或在野的党，反对执政党或反对政府的政策，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常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体系或国家和政府的层次分开，应该将基本原则和政策议题分开。政党之间的竞争只能围绕着政策议题来竞争，在基本原则上各相关政党应有共识；反对党可以反对政府，但不可以反对国家。唯有各相关政党在基本原则上都有共识，它们才能平和、理性地从事政策议题的辩论和竞争。这些重要的基本原则包括政党政治、国家认同、宪政体制和选举制度。在现代性社会里，政党为争夺国家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始终是在民主宪政框架内合法性演进的。

这类竞争性政党一般是体制内产生的政党，在某些西方国家，政党是由议会内部的政治派别发展而来的，由议会中的反对派，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为政党。人们把这种类型的政党称“内生型”政党，如英、美等

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世界上最早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党是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1679 年，英国议会内部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议员和代表贵族利益的议员，围绕詹姆士王位继承权问题形成两个政治派别，在这基础上发展成为自由党和保守党。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自由党内部发生分裂，其右翼并入保守党，其左翼加入了迅速崛起的工党。从那以后，工党取代保守党轮流执政。英国两大政党的领袖，都是由各自的下议院议员选定，并通过议会党团而独揽党内大权。执政党领袖担任内阁首相，因此又控制了国家行政权力。可见，英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与内阁的形成基本上是同一个过程。

这些政治派别最终走出议会发展成为竞争性政党。政党是自由结社的产物，它是在政治空间展开“共同竞争”的组织，他们吸收和动员游荡于政治领域的各种利益及思想，并试图以这种力量为依托去夺取政治过程的持续支配权。政党始终以控制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争夺国家权力为目标；离开了国家权力，政党几乎不能对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力。当然，政党并不是以武力夺权，而是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所以，政治竞争与选举活动密不可分，可以认为，选举制度成了竞争性政党制度也许不算过分。围绕着议会或总统的选举，各政党才有竞争的目的，竞争的理由和竞争的内容。政党之间的竞争对人民来说就是一种选择的过程。只有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争夺公共权力时，人民才有选择的自由与可能。所以政党总是尽可能地宣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争取到最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从而在选举中获胜。在这个意义上，政党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两个或几个政党之间进行的政治游戏，与普通民众毫无关联；政党竞争是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社会的利益选择，这种竞争选择既是形式性的，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实质性内涵。而选举则是对这种选择的一种程序性、仪式性的确认。政党之间为争夺国家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往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充满悬念。但是，政党如果仅仅为争夺公共权力而进行竞争，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只能导致社会分裂为两大集团，互相厮杀，造成社会的无序与纷争。这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意看到的。理性地看，政党

不仅是冲突的力量，同时也是整合的工具。所以竞争并不仅仅意味着刀光剑影，意味着厮杀，竞争性政党制度实际上是在合作框架下合法性的竞争。

这类政党产生的环境及条件一般表现为：民主、自由和竞争的资源充沛，集中与等级的氛围淡薄。从宪政层面上看，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性安排，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形式的权力分立，互相牵制与制约，从而保持权力总体上的平衡，使得权力专断的可能得以减至最低限度。但是，权力分立只是权力制约的制度性安排之一，而不是权力制约的唯一制度性安排。现代性社会权力制约的制度性安排，除了权力分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正是竞争性政党制度与权力分立制度的契合与统一，才在总体上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权力制衡的现代民主政治结构与框架。离开了竞争性政党制度，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权力分立本身就有可能被悬置，或者成为形式。现代性社会竞争性政党制度有助于及时纠正执政党的失误，避免造成长期危害。无论是实行两党制国家，还是实行多党制国家，其政党制度均是竞争性的。在那里存在着众多的政治主体（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是其典型状态）为争夺国家公共权力展开激烈竞争。这种竞争集中体现在几年一次的选举中。

竞争性政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祛魅力型重法理型。这类政党和非竞争性政党相比较，不看重魅力型领袖、个人权威与英雄气质，更重视法治、规则、监督与分权。二是不存在完整的思想体系或者意识形态。这类政党因为产生于西方民主自由竞争的制度中，存在于体制内，不需要建构宏大体系与树立绝对权威，因此不需要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指导与规训选民，在意识形态方面一般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随时根据社会实际发展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三是注重民主协商与自由。注重与社会各民间组织、团体的协商与沟通，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这类政党主要通过民主、自由竞争获取公共权力，在政党内外更注重民主协商，无论党魁、一般党员还是公民，不存在铁的纪律约束与等级限制，一般是平等、自由的政治主体。阶级、阶层和各个群体之间强调调和与合作。四是注重对公共性的维护。竞争性制度要成为执政党、拥有获得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根据，就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尽可能“大多数”这一“整体”的存在。正是规律性与周期性的选举制度，才保证了政党对于公意、公共性的尊重与维护。通过规律性与周期性的选择制度，在保证国家权力公共性品格、确证国家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亦保证了政党对于公意、公共性的尊重，以及由此所确立的政党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正是这种国家权力与政党执政二重合法性确证，使得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的权益能够得到基本的尊重与保护。这也意味着，现代性社会背景下的公共性是多元社会主体间在宪政框架下基于公共理性的自主达成，而不是由某种外在力量的赋予。它通过政党政治这一具体政治生活机制鲜明地凸显了国家的公共性品格，并以政党竞争这一独特机制维护这种公共性。现代性社会中的多元主体，为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而组织成为各式各样的团体或组织时，政党就是公民们组织起来的一种有效方式，且这种自我组织起来的政党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某一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掌握国家公共权力，利用手中所操控的国家机器，可以更好、更方便地为其所代表的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服务，与此同时，它也就为其他政党的存在留下了广阔空间。在现代性社会中，通过政党间的互竞及其角色互换，通过他们所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开放的历史过程中会得到相对平衡，进而使国家的公共性品格得以体现。

政党之所以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是因为它承担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竞争性政党的结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功能。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认为政党是表达要求的渠道。这就是说政党首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代表手段，它们是代表民众表达要求的工具或机构。由于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中介，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外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集中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同时政党还可以对所代表的利益进行

综合与协调，尽量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当前，整个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新的分化组合，在总体上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复杂化和经济利益矛盾显性化的发展态势。

二是政治资源聚合功能。任何政治系统要维持、发展或有序化，必须有一定的政治资源供给，政治资源的流失或不正当移动会造成系统政治资源短缺，轻者影响政治系统功能的发挥，重者导致政治系统瘫痪。从资源流动的角度，分析政治资源移动的方向、过程和后果。一般而言，任何具有政治交换价值的东西，都可称为政治资源，包括财富（金钱）、社会及政治地位、声誉、友谊、职业、知识、信息、能力、投票、立法权、对传播媒体的控制力、对警察和军队的支配、武装威胁、时间等等。一般地说，可资政党获取执政或参与政权以维持政治稳定，或推动政治社会变迁、政治发展的任何物质或非物质因素，或提升政党的形象、公信力和影响力等资源都可称为政党的政治资源。

三是政党的参与功能。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随着公民普选权的逐渐获得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民要求参与政治过程，相应地就必须有一种组织和协调公民参与政治的政治共同体，而“政党就是随着公民选举权的扩大，以及各种集团试图通过动员选民去支持那些对不同利益都有吸引力的政策以谋求公职而得到发展的”。[①] 从政治过程上看，投票是普通公民控制政府的制度化了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政党在公民参政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党简化了公民参政的程序，降低了参政的成本。政党作为一种解决“民众参政危机的制度机制”[②]，之所以能吸纳为数众多的公民参政，就是因为政党组织本身有着良好的政治参与成本——收益结构。政党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使得公民在推举公职候选人、收集有关公共事务和候选人的信息乃至作出最终选择等方面的基本程序都大大简化了。而政党组织的活动，可以使选民通常依据自己的党派认同感或公共政策取向直接作出判断和选择，所以说政党组织

① 〔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2 页。

②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孙嘉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9 页。

的活动，“使问题两极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使选民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① 总之，政党组织为选民所提供的服务，“大大降低了选民作出政治选择的时间和能量耗费。”② 再者，政党的存在可以使公民参政秩序化，增强了公民参政的效能感。在政治过程中，公民的利益表达千差万别，政党通过利益聚合，使为数众多的利益要求被吸纳进入政纲。另外，政党在这方面还表现出政治录用功能。所谓政治录用功能，即把社会精英接纳到党内来、使党成为社会各阶层、集团中最优秀分子的代表，成为给社会公共治理提供人才的可靠资源库的能力。政党这方面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储备”与“输送”上：一是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党的系统并储备起来，因而任何一个政党要实现其纲领和目标，除了需要大批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之外，还离不开社会精英的加盟和支持，有作为的具有感召力的政党必然有一套感召、吸引社会精英的价值理念；二是通过一定的法制程序和方式将党内的精英输送到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团体中去。

四是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或进行政治游戏的方式或状态。从政党制度的内涵来看，政党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同政权的关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及其自身运转、行使国家权力或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方法、规则和程序的总和。仅从政党制度的定义来看，政党制度是政治生活中极为复杂的政治现象，不仅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是千差万别的，没有统一的政党制度模式，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是不可以照搬和完全模仿的；而且，各国不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千差万别的，没有绝对对称性的政党制度。可以说，复杂性、多样性、差异性是各国政党制度的常态，非对称性是世界政党制度的普遍现象。③ 那么政党制度的基本功能则是指这一政治活动的方式或状态所追求的社会效果或者更准确地表述为治理社会的效果。政治社会化就是通过社会政治组织与社会个

---

① HughA · Bone, 1974： “American Politicsand PartySystem”, Mcgraw—HiokllBoCompany, p22.

② FredI · Greestein, 1963：“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Prentice—HallInc, p35.

③ E. E. Schattschneider, 1942 ：“Party Converment”, New York：Rinehart &Winston, . p1.

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传播社会的政治文化，培养政治人格的过程。政党的政治社会化，是指政党凭借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向社会传播本党的政治纲领、主张以及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提高人们的政治素养，培养具有一定政治立场的政治人，从而推动社会的政治发展。

政党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利益聚集与利益表达、纲领和政策制定、社会化和政治动员、政治精英的形成与输送。这些功能是无论以何种标准划分的各类政党所普遍具有的。但从中西对照的角度看，不同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功能又存在明显差异。政党与政权以及政党间结构模式的差异决定了政党所履行功能的不同。相比较竞争性政党最突出的政治功能就是赢得政治选举胜利，将本党领袖送入政权机构。离开选举，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样一种以选举为主的功能定位，是西方政党的一大特色，它意味着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直接干预相当有限。而同时，反对党却起着特殊的作用。

在现代意义的政治生活中，政党制度与民主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 E. E. 沙特施纳德认为的那样，毫无疑问，政党的产生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政党创造出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体不容置疑地与政党制度互栖共生。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制度，无论政党制度是否平稳，无论有多少政党，无论他们是以追求中心（Centre－Seeking）还是远离中心（Centre－Fleeing）的方式进行竞争，可以说民主需要的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塞特对此这样概括："一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保护其国家不受公民不满引起的破坏：抱怨和攻击针对的是那批仍在其位、仍谋其政的官员，而不是整个制度。"① 不稳定的政党制度能使一部很好的宪法失去作用。而一个平稳的温和的政党制度则在希特勒后的西德、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实现了民主。② 尤其是在西方政党理论界中，往往是以两党制与多党制为出发点

① 〔美〕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8 页。

②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7～228 页。

的。即认为只有至少存在两个政党的制度或叫做“竞争性政党制度”，才能保证民主的真实性与有效性。而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没有这一制度优势，这也正是这一制度面临的最大困境所在。如何在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内，克服这一缺陷呢？关键就在于政党自身的建设。具体说，就是发展党内民主与主动强化参政党的监督职能。一些学者就指出，党内民主的发展可以成为多党制的替代物，可以通过扩大差额选举所产生的党内竞争来取代多党竞争的潜在可能性。这样既能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又能适应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客观需要。

（三）政党的双重样态比较

竞争性政党与非竞争性政党是现代政党出场的双重样态，这两种样态的政党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通过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伦理秩序与法治秩序，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和魅力型属性与法理型属性等方面反应出一定的差异。

1. **在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方面的差异**。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自享有的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具有不可区分性，不可共享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点。最早提出国家主权理论的是法国古典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让·布丹（Jean Bodin），他在《论共和国》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主权理论。他认为，主权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高于法律、不受外来权力限制的权力。此后，主权理论经过格劳秀斯（Grotius）、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等学者的论证，得以逐步完善和丰富。主权最终被人们确定为是国家不可缺少的根本属性。在17~18世纪之际，以英国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学家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给主权理论注入了新鲜的内容。他们认为，国家主权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的。洛克和卢梭关于主权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洛克提出的是议会主权观，而卢梭提出的是人民主权观。无论是洛克主张的议会主权观还是卢梭主张的人民主权观，都意味着主权理论的彻底变革，那就是无论是国家还是国家主权的行使最终都要服从并且服务于人民的意志——“公意”。洛克认为，人民拥有

最高权力，议会实际上掌握最高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归于人民的委托。而卢梭则直接提出，主权的实质是全体的公意。公意（general will）一词由狄德罗首先使用，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作为其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系统展开。按照卢梭的解释，“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归依”；它与个别意志或众意相区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①] 而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②]

由主权演变而来的人民主权理论一般成为非竞争性政党的合法性与价值目标的来源。可以说一般性政党都公开宣称权力来源民众，对于非竞争性政党来说不仅政党的权力来源于民众，而且政党的价值存在就是为民众谋福利。

“人权”概念，最早是由荷兰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格老秀斯提出的。格老秀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专门论述了“人的普遍权利”；格老秀斯之后的荷兰另一个思想家斯宾诺莎则首次提出并论证了“天赋之权”的概念；英国的思想家洛克则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人权理论，他总结、归纳了前人关于人权理论的成果，使之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法国思想家卢梭则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点出发，推演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并把自由、平等提到了政治权利的高度。

人权即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属于应有权利的范围，是指作为人应有的权利。其次，人权就实质而言，是国内法管辖的问题，又是一种法律权利。再次，人权还必须是一种实有权利，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人权是在人的自然属性之上对人的应有道德权利的期待，它充满了人的偏好或价值选择，人权的实现离不开人的社会属性。“人权”又与“主权”存在一定的联系。“人权”这一概念是通过“自决权”的中介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的，既然自决权是建立国家主权的一个途径，而且由于自决权的核心又是尊重人权和民主选举权，所以“人权”就顺理成章地高于主权。1789 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宣告，公民权利是天赋

①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9 页。

②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5 页。

的、自然的、人人平等而具有的、不可消灭的权利。同时也要求"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捷克总统哈维尔就宣称，人权高于国家权利，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相对于非竞争性政党来说，竞争性政党在其政治行为实施过程中，虽然承认国家的主权论，但是，更偏好于人权论。竞争性政党认为人权实质上表现为公民的一种"自决权"，但是这种"自决权"是以民主选举权的形式体现的。竞争性政党作为由民众群体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如果想获得公共权力谋取执政地位，必须通过自由竞争性的民主选举程序，获得足够选票，被民众授权才能够成为执政党。最后，现代国家从法律意义上说，也是由民众选举代表，组成国家，由民众集体授权给国家，以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和执行社会公共意志，维护民众的正常有序的生活。从这点出发，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而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

人权和主权的关系是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动的。在现代政治制度中生活的人们不仅重视主权，更加重视人权，尤其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主题。随着生态运动、族群政治、妇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人权的维护与发展。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过，在人权问题上，不仅不需要新的理论，而且新的理论可能破坏现有的了解。侵犯人权显然会危及和平，而漠视国家主权则一定会真正造成混乱。

如何调适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好地契合人们的政治生活，是现代政党政治发展首先考量的问题。从现代法哲学和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人权与主权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在现代政治文明中，不仅人权是人民的人权，主权也是人民的主权。我们应当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国家权力乃是公民权利的派生和延伸，作为原始权的公民权利应当独立于作为派生权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不得也不应当超越于公民权利之上，公民权利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出了界线。国家权力从宪政理论上将其设计为保障和促进社会成员即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并作为公民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公力支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权

力和公民权利之间一直存在相互冲突和消长的关系，主要是政党的介入，尤其是非竞争性政党，这类政党基本上控制一切权力和资源，对人权的维护和推动不够。但是，如果政党借口人权的保护而干涉其他政党的内政，也是不容许的。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认为，“在维护人权问题时必须尽量谨慎，以免保护人权被用来当作侵犯各国基本管辖权和破坏各国主权的跳板。”国家如果“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以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它将一无所用。”①

社会通过法律和舆论来规范个人的行为。当一个人表现得鲁莽、刚愎、自高自大，不能在适中的生活场域中生活，不能约束自己免于有害的放纵，追求兽性的快乐而牺牲情感上和智慧上的快乐——这样的人只能指望被人看低，只能指望人们对他有较少的良好观感；而他对于这点是没有权利来抱怨的，除非他以特殊优越的社会关系赢得他们的好感，从而具备资格博取他们的有益效劳，而不受他自身缺点的影响。② 这里是说假如他（政府）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该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了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但它渗入生活细节更深更广，而且它奴役到了人类灵魂的本身。因此，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与无知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他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的这种趋势——对于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关于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要找出这个限度并维持它不遭侵蚀，这对于获致人类事务的良好情况，同防御政治专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③

因为国家的存在是由于人们需要有一个能够维护群体利益和人的权

---

①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0页。
②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3页。
③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页。

利被侵犯时得到公正救济这样一个团体，才自发组成国家。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其权力不是神授，也不是天然的，正如英国思想家霍布豪斯所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充分公民效率的一切。"[①] 应当说是权利派生权力，权力服务权利。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就须"打破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②] 既然"主权者"即公民积极主张自己应有的不可剥夺和转让的权利，那么作为"治人者"的掌握国家公器的政党共同体在实施政治行为过程中首先要依法保障人权并承担责任与接受监督。竞争性政党与非竞争性政党在主权与人权方面的认识与主张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一般是主权与人权并重，在现代性社会中更重视对人权的维护；后者一般重主权而轻人权，但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发展，在保证其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也逐渐适度放权，重视和推动人权的发展。

2. **在伦理秩序与法治秩序方面的差异**。任何社会都存在一定的伦理规范体系。所谓伦理就是将善的良知转化为善的规则和原则，使其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功利性。伦理作为善的规则体系是人类意志的自觉呈现，其善正义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迁升、进化和复杂化。伦理体系则以善为核心，规范着人的利他、去私、合群、他爱的行为、责任和义务，并建构着善待他人社会秩序的正义取向。社会伦理涉及到人际和社群关系的合理、正当、公平及社会秩序的有效性和正义性，需要通过善的原则化、具体化和制度化来判断人伦关系中的公正、合理、正当，即善正义是在制度安排中体现出其合法性的。政党作为人类现代文明中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同样具有伦理诉求。政党的伦理是指政党在实施政治行为过程中，运用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需要遵守的伦理规范及伦理准则。由于现代政治伦理不仅关注"实然"层面，而且更加关注"应然性"的价值层面。可以说伦理最一般的要求是："不仅应该说明

①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② 董炯：《权利至上、制度设计及其运作》，《比较法学》1998年第3期。

人们怎样去行动，而且应该说明他们应该怎样去行动。"① "应当"是一个反映伦理学最本质特征的核心范畴，它意指一种道德的可欲性和非现实性。在这种最一般的意义上，政治伦理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同时也必然是一个价值判断。所以，揭示政治的"价值"性质以及政治的"应当"指向，就成为政治伦理的基本之义。政治的这种"应当"指向，决定着政治伦理首先应该是一门关于政治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

基于此，在讨论和分析政党伦理时，要对政党的政治实践是否合乎道德进行一种伦理审视。因为这不仅隐含着对政党政治理念的价值追问，而且还隐含着对政党的正当性、对权力运用的规范性以及是否合乎道德性的价值追问，也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出政党伦理所蕴含的实质。

竞争性政党与非竞争性政党追求的制度伦理存在一定的差异。通常情况下，竞争性政党是把"法"作为正义性基础和核心价值原则，"法"成为竞争性政党伦理的根本性所在。而以"法"为核心的政党伦理蕴涵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物权与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权力趋向于分化与制约。而非竞争性政党一般把"礼"作为其正义性基础和核心价值原则。从"礼"的正义性制度伦理派生出的是"以善抑恶"的崇善制度伦理的善正义，它蕴涵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合"性正义价值取向，并使权力趋向集中统一。

偏重于"法"的政党承认人的自私自利性和个人利益矛盾冲突的合理性是政党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动力所在。这种制度伦理观认为，人天性中具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倾向，人的利己动机优先于利他动机而存在。个人对社会的关心是以社会对他的关心为前提的。从人的这种天性本能的动机出发，人的恶德性也就昭然若揭：这种制度文明对社会诉求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人性恶倾向，把人类对自我利益的追逐看成社会进步的"普遍的动力"，并力图通过社会公共选择的合力，形成一种使坏人

① 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9 页。

所能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竞争性政党制度，最终增进社群的秩序与和谐，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善。

非竞争性政党侧重于崇尚中心主义，并建构起一套仁、义、礼、智与信等制度体系作为制度伦理的体现。这种制度伦理是以集体主义为基础，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以忠诚与服从为伦理秩序的。这种政党伦理的核心是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化和行为方式的“秩序”化，形成社会组织与家族紧密相联贯通式结构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其特征表现为以人性善作为制度伦理的出发点，以忠孝为原则的“亲亲尊尊”上下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善正义，通过善的发育形成以“礼”为核心“敬德”、“保民”的政治价值观；奉行以忠孝为准则的人际交往原则和重农抑商的经济价值观念即通过设定身份等级制度把上下级关系固定下来，把世间的不平等建立在朴素的伦理情感上和对生命、祖先的感恩上。再者，通过对政党领袖的忠诚感情与献身精神又是维系政党制度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获得升迁机会或利益分配的必要条件。人们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只有从伦理情感上自愿接受，否则就是不忠不孝。这样就实现了“亲情”与“专制”巧妙的结合。

在现代性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是竞争性政党还是非竞争性政党在对伦理规范的诉求方面，都要适应现代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需求。

首先，要具有宽容性。这种宽容性具体表现为不同政治意识的并存、碰撞与融合，主流执政意识的主导地位与非主流执政意识的合法存在。还表现为各种政治主体与客体相互之间能够通过民主协商、平等对话以及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它既是现代民主政治、法治政治应有的伦理品质，也是现代政治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

其次，要具有制衡性。现代性政党的制度伦理蕴含着制衡与均衡。而现代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制衡与均衡，制衡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均衡是为了防止无谓的利益冲突。没有制衡，制度就会因缺乏必要的张力而松弛，制度因有制衡而存在，也会因打破制衡而消亡。虽然政党的制度伦理的制衡既是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也是不同责任、利益和义

务的均衡，但是都具有权力制衡和利益均衡的精神。

最后，要具有公共性。基于应当的层面，任何政党的权力都具有公共性。政党执政在本质上是一种合法性的统治，其合法性不是先验的，而是来自于统治者的合法性证明与被统治者的价值确证，是二者在价值上的互动和契合的过程。政党不仅代表某些集团与阶级的利益，更要平衡与满足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这是政党的公共性所在。因此，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如何确保权力的公共性，如何使执政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和拥护则是关键，这便涉及执政伦理的主旨。统治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公平与正义便是执政伦理的首要价值。人们对正义的追求由来已久，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家的眼里，正义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专门评判政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视作执政的首要价值。“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①

3. **在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方面的差异。**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是一对文化变量。从文化层面上来看，集体主义文化是以大家庭为中心，以集团主义为基础的；而个体主义文化是以核心家庭为中心，以个人主义为基础。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思想文化同样对政党现代性的差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常来看，竞争性政党的制度文化包含着更多的个人主义元素，而非竞争性政党的制度文化中则包含着更多的集体主义元素。

两类政党的制度文化形成的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其思想和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在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中一般形成了以家族集团为中心的集团文化，而欧洲的一些国家中，由于漫长的中世纪实行分权制的缘故，逐步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集团文化。集团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社会集团的生活能力，其理论动机来源于原始宗法动机或善的动机，主要从社会整体立场考察有效地组织个人，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整体社会，使整体社会或集团有秩序地运转。它是由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和涉及个人行动方式的“秩序”两大部分构成的社会秩序理论。

---

①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版，第 3 页。

集体主义价值观通常是以亲族主义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天然纽带，族群观念比较强。在这种传统下，每个人都必须把大“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视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政治制度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典型的“家长制”。家长或类似父亲的角色是权力的核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是权威式的管理者，要求下属绝对地服从，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和对抗行为，上下级之间有很大的权力距离。个人有较强的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倾向，不希望突出个人和标新立异，而更关心得到群体的认同，对有权威的社会组织仍然有强烈的依赖心理，希望被组织接纳和保护，得到关怀、指导。在集体主义的文化里，把自我视为整个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把自己融入集体当中，集体主义和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界和伦理学界的学者如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1982）、泰勒（Charles Taylor，1979，1989）、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1984）和瓦尔泽（Michael Walzer，1983）等学者所说的“社群主义”[①] 存在很大的不同。

信奉集体主义的政党在政治行为中，往往会以集体的名义下，要求所有的人都被要求为某一个“代表集体”的极少数牺牲自我。一些人的权利急剧膨胀，更多人的权利随之消失。普适的个人价值，个人尊严、个人内心的道义准则和独立的人格很难在这种集体的名义下获得彰显。“集体主义”并不在于重视集体，而在于无视个人，宣扬“集体主义”的真正目的并非弘扬和肯定集体，而在于蔑视和否定每一个个人。那个

① 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社群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新集体主义。它反对新自由主义把自我和个人当作理解和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变量，而是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他或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的。因此，社群才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变量，而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由他或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社群概念根本上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到的“城邦”也即“政治社群”。当代社群主义者基本秉承了亚里士多德、梯尼斯等人的关于社群的基本思想。桑德尔、丹尼二·贝尔、迈克·华尔采、戴维·米勒等社群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群主义作了种种论述。但是，社群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社群对于自我和个人的优先性。社群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关于理性的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的前提是错误的或虚假的，理解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社群既是一种善，也是一种必需，人们应当努力追求而不应当放弃。正义优先的原则要求权利优先的政治学，而善优先的原则要求公益优先的政治学。因此，用公益政治学替代权利政治学，便成为社群主义的实质性主张。

“集体”是如此地虚无缥缈，它既不是个人的有效集合，也不为由个人组成的集体服务，它只是一个被权势者创造出来否定“个人”的冠冕堂皇的抽象概念。权势者往往把自己打造成集体的化身。集体主义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而个人主义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集体之上。整个社会褒扬前者为“天下为公”，贬低后者为“自私自利”。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定义下来，对立起来。

个人主义一词主要来源于拉丁文，意指不可分的个体。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是作为对个人主义的一种表述。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如英国的 T. 霍布斯等，把个人主义普遍化为永恒不变的人性，并使之成为道德的主要内容和判断善恶的重要标准。到了 19 世纪，德国的哲学家 F. W. 尼采等人进一步使个人主义的理论观点系统化，把个人作为价值的基础和评价社会的唯一标准。在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相信，所有的价值以人为中心，个人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所有的个人在道义上都是平等的。个人主义推崇自我独立、个人隐私和互相尊重的价值。个人主义反对权威以及对于个人的控制，特别是由国家进行的对于个人的控制。个人主义认为，允许每个人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去选择其目的和方式是最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的。个人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把自己的干预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即仅仅在于立法和维持秩序，以及防止个人干扰别的个人。个人主义同时相信应当按照个人所希望的方式获得财产、持有财产和出卖财产。许多社会学家的思想都是在这类对比中形成的。例如，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提出的从“共同体”向“社会”的过渡、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说的从“机械社会”向“有机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学家波普尔所理解的从“有机社会”向“抽象社会”的过渡等都蕴涵着人的个性解放、个人独立、个人自主和个人自由的思想与理念。

个人主义信奉自由，崇尚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他们信奉自由放任的社会组织形式，信奉市场的力量，不愿意政府过多干涉自己的行为，不太强调社会等级的不同。他们不愿意服从政治权贵，也不愿意顺从上级。在他们眼里，人人生而平等。平等主义意味着平等的权利与机会，

并尊重别人的权利与机会。在解决集体问题时，往往通过投票来获取多数人意见。个人主义者一般信奉自我约束、依靠自我。

个人主义主张国家应该仅仅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保护个人能在不侵犯他人同等自由的情况下作出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这与集体主义的理论相反，集体主义要求国家必须迫使个人替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在实践上，个人主义最关注的是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暴力机器和恶法的侵犯。个人主义最极力避免的是商业和产业力量被过度集中于国家的手上，因为这会造成两个问题：民选的民意代表并没有能力和责任感去处理这么多公司，同时也会造成公共行政牵涉到大量的资金；在个人主义者看来，“国家的健康”是根基于个人各自追求利益的努力上的。但是，个人主义也可能采取极端的形式，例如个人无政府主义与民粹思潮。

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单元，是判断价值标准的出发点，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主义认为，群体才是社会的单元，是判断价值标准的出发点，社会是由群体组成的，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必须服从群体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个人主义跟自私自利是不能划等号的。集体主义表现为人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他们信奉权威人士，尊重长者意见，互相谦让，避免冲突。这类政党仍然强调层级观念，崇尚集体归属感，不鼓励挑战权威意见，强调群体胜过个人，强调和谐胜过冲突，强调通过协作来与对手竞争，强调合作互惠，强调成就感与归属感，强调义务与责任。

4. **魅力型与法理型的差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而且，如果存在某种合法性基础的话，权威人物在困难的处境之中也有时间和能力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① 一般说来，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如果人们就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常常是导致内战或革命。从根本上说，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政

① 〔美〕G. A.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6 页。

治权力“正当”、“合法”运转所必需的资源和支持。它一方面表明政治权威具有使被治者认为其统治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被治者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一旦政治权威具有这样的合法性，政治权威所制定、倡导和实施的法律，就能获得被治者的普遍信仰和尊崇。所以，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不仅使政治统治成为了“正当”、“合法”的统治，而且能使政治统治成为成本较低且相对持久稳定的统治，法治的实现也因此而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那么政党的权威如何获得合法性呢？关于合法性的概念与内涵，学界给出了很多解释，有的认为，“它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①] 有的认为，“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②] 从启蒙运动以来，合法性问题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权力，并非来自于“天意神授”，而是来自于民众相互缔结的“政治契约”，通过合乎法律的制度与程序的“自下而上”的让渡与授予的结果。法国学者雷蒙·阿隆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在于“统治权利”，合法性就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看，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③]

在现代民主政治场域中产生的政党，这种特殊性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功能就是作为一种平衡和保障机制来解决现代民主制度中民主与自由的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有效规范政治民主的运作，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落实多数原则、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原则、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那么政党共同体的合法性问题就是由国

① 〔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林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② 参见〔美〕杰克·普拉诺等著：《政治学分析词典》，“合法性词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 〔法〕雷蒙·阿隆：《民主与极权主义》，加利马尔出版社1976年版，第52页。

绕“权力与服从”而产生的诸多政治元素所构成。而政党一般被认为是为了在国家内行使权力而组织起来的人们的机构，“政党是寻求使用合法的手段去追求它们的目标的组织”，“能够用竞选手段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时候就这样做的那些组织就是政党。”[①]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个政党，在执政之前，它追求的是努力获得民众对它的支持以取得政权；而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它要追求的目标是不断增强和扩大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换句话说，政党获得公共权力的来源只能是公民的授权。“政党就是人们为了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赢得政府权力而组织的政治团体。”[②] 通常情况下，政党是通过选举赢得政府权力。选举，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是人民，意味着国家乃至整个政治权力都必须归属于选民。但它厘清了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的回归。政党享有一定的合法性就获得了一定的权威，合法性越高其权威也越高。

德国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③]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并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梳理，认为传统型权威——“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魅力型权威——“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法理型权威——“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④] 英国学者弗兰克·帕金把上述内容简述为：传统型的——服从我，

① AlanWare，1996：“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

② 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③ 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韦伯在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韦伯并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④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因为我们的人民一直这样做。个人魅力型的——服从我，因为我能改变你们的生活。法理型的——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法定的长官。[①] 传统型权威是一种最古老的权威形式，来自于习俗、惯例、经验、祖训等。由传统权威支配的社会组织，统治者依照传统形成的组织规则来治理臣民，他们的统治权力的获得“是依照传统传下来的规则确定的”，同时“对他们的服从是由于传统赋予他们的固有尊严”。[②] 很显然传统型权威缺乏现代性的支持，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魅力型权威又可称之为超人权威或神授权威，它建立在非凡人格、英雄气概、创业奇迹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来自于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马克斯·韦伯指出：“魅力只能‘唤起’和‘考验’，不能‘学会’和‘硬记’”，[③] 这也就深深意味着靠非同寻常之事进行统治的魅力型统治却很难进入平凡的生活，因为一旦陷入平凡的生活，就意味着其衰落过程的开始。可见，魅力型统治一般只适应社会冲突和转型期间或者社会获得稳定的初期，很难作为进行有效统治的稳固制度的基础。因为“任何持久的政权都不能仅仅依靠它的公民们对伟大人物的信仰去赢得对它的统治的服从。”[④] 法理型又可称之为法定权威，是建立在相信规章制度和行为规则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统治类型。这种统治类型是按照“可预计的规则”的统治，统治越是“脱离人性”，这种可预计性发展得就越充分。[⑤] 法理型权威以规则为统治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点，只有根据法定规则所发布的命令才具有权威，人们普遍遵守规则、信守规则，规则代表了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法理型权威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是追求现代性的体

---

① 〔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2 页。

②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51 ~ 252 页。

③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78 页。

④ 〔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6 页。

⑤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97 页。

现。相对传统权威和超人权威，它最稳定且最有效率。这种权威下的组织关系是法定的，组织的行为规则体现了理性。所以，它是现代性社会最为普遍的权威类型，其他两种权威类型最终会向第三种权威类型演变。

从历史角度看，政党政治的权威模式演变也非常契合马克斯·韦伯对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的历史的考察、梳理与分析。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转型，非竞争性政党必然面临由传统权威型政党向现代法理型政党转变，这是重塑现代政党政治权威的现实选择。非竞争性政党和一般传统政治制度因习俗、惯例、经验、祖训等而获得传统型权威不同，而是通过暴力或者革命手段，以非凡人格、英雄气概、创业奇迹获得魅力型权威，这类政党一般通过革命或暴力手段，成功获取政权，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建构。最初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革命合法性”，随着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政党开始大力推进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随之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也发生着重大转变，转向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①。

这种“政绩合法性”政党依然是“魅力型”政党，必须加强“法治”，转向“法理型”政党统治。“法理型”政党统治强调“基本正义规则统治”。即在法律统治的国家中，任何政治共同体包括政党在内皆不得超越法律。

“魅力型”政党向“法理型”政党切换，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观念的

---

①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8页。“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个内涵非常复杂的概念，但大体包括合乎法律性和合乎社会规范性。这个概念最早由马克斯·韦伯系统阐述，广义地指所谓的合法性是由道德、宗教、习惯（custom）、惯例（convention）和法律（law）等构成的合法秩序（a legitimate order）；狭义的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合法性”意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来自由有关规定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讨论的焦点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某一社区或社会范围内，以价值观念或建立在价值观念基础上达到规范所认可的方式——有效运行；第二是这种有效性的范围、基础和来源”。马克斯·韦伯从价值中立的立场，根据政治合法性基础不同，把政治秩序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神圣魅力的统治、传统的统治和法理型统治。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明确了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和事实的二重维度。“政绩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体系符合价值规范的“有效运行”。

转变，也不仅仅是工作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一种体制的转换。无论是非竞争性政党还是竞争性政党，如果要在当今现代性社会谋求发展与壮大，今后发展方向是必然向法治靠拢。

首先，政党主张要保持与国家意志的一致性。政党法律是政党制定的有关自身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通称，本质上是政党及其阶级意志的凝练，而不是党的领导机关更不是政党领袖个人意志的反映。由于政党是政治国家的一部分，政党政治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政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实践形态，所以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①] 政党法律与国家法律相协调是政党法治的前提条件。满足这一前提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政党认同现存国家意志，在现存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大框架下立党执政。此即“国家位先，政党位后”的政党法治类型。另一种是政党否定现存国家意志，通过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废除旧法律，建立新法律，而求得政党主张和国家意志相一致、政党法律与国家法律相协调。此即“政党位先、国家位后”的政党法治类型。政党和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根本发展目标相一致；政党的阶级、社会基础与国家的阶级、社会基础相一致；政党治理理念和国家治理理念相一致；政党法制建设进程与国家法制建设进程相一致。

其次，政党要保持阶级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性。政党组织基础的阶级属性和政党品质的政治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法治必然带有“阶级”印记。但是，政党又具有一定超然于特殊阶级性和利益性的普遍性，这是源自于自身现代性的要求。阶级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性主要通过政党的政治行为体现，同时根据公平、正义作为评判依据。

最后，政党要严格遵守自身法治的规约性。政党的活动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和限制，即政党基本法。政党基本法就是以政党法律制度作为政党活动的支撑点，把政党治理乃至政党前途命运希冀于政党法律制度的健全和权威性上。其显著特征是政党运作的逻辑起始于政党法律，又归结于政党法律。政党法律既是政党活动的主导者，也是政党活动的评判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

者，政党活动在整体上是按照党法——党权——党法的逻辑顺序展开的。政党法治的价值意义在于通过政党法律的形成和至上权威的确立，构成对政党权力的制约，目的在于保障和实现政党意志。在政党生活中，政党法律是政党意志的体现，是没有感情的政党智慧，从而把政党权力寓于政党法律之中，由政党法律来承载，由政党法律来实现，由政党法律来评判，整个政党处于依法而立、守法而行的法治状态之中。政党法治的现代性属性，实质是一种政党治理。执政党应推崇法律人治理，为执政党由传统威权型政党向现代法理型政党转变聚集人力资源。法理型政党必然要求有熟悉和精通法律的人存在其中，法律知识在政党及其组成的政府治理人员的专业知识中应占主导地位。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无论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是一般政府官员有法律背景的人占了相当大比例。[①]执政党应强化宪政意识，为执政党由传统权威型政党向现代法理型政党转变提供理念支持。执政党应要学会在宪政制度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实现社会秩序，而不是通过政治运动、政治高压或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达到所谓的安定团结。政党法治既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其要义在于建设和落实。也就是说，从政党的立法、守法到执法的所有方面和环节，都必须体现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性，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原则体现在政党生活的各个领域，贯穿于政党活动的整个过程，使之成为政党的行为准则和治理的实现机制。

政党法治具有双重意义，主要表现在政党治理与国家和社会双重治理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一方面，由于政党不是存在于国家之外或国家之上，所以政党活动必须限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而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国家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同样适用于政党。它不仅适用于政党外部关系的调整，也适用于政党内部关系的整合。政党法治既是一种新型的政党文明形式，同时还是这种新型政党文明形式

---

① 据中国政法大学程燎原教授的统计归纳，美国总统从华盛顿至克林顿共 41 人。其中律师出身者 25 人，另有 4 人接受过法学教育或从事过法律职业工作，占总数的 70%。副总统共 47 位，其中 32 人曾任律师，另有 4 人接受过法学教育或从事过法律职业工作，占总数的 76%。在欧洲政府官员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的实现机制。政党文明包括政党意识文明、组织文明、制度文明和行为文明等内容，而贯穿其中的是政党灵魂或政党精神。现代政党政治，政党灵魂或政党精神的实质是政党法治理念，即是说，政党法治是现代政党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形态。一个政党的法治水平从总体上反映着政党文明的发展程度，它既集中反映着政党权力产生的合法化程度，也反映着政党内部关系调整及其外部关系运作的合法化程度，因而从整体上反映着政党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

二、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国家的维系

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国家的维系，政党活动都构成了国家的重要现实内容。离开了政党活动，国家政治生活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在民族国家中，政党的现代性内涵主要体现在担负着国家建构与国家发展的双重任务，在政党领导下各个政治共同体围拢在国家主权的旗帜之下，以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共同塑造出自己的政治权威。民族主义正是通过在政党的领导下以民族国家主权建构为追求的目标，以对于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忠诚为依归，本质上体现为是一种现代政治。如果说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政党主要职责就是争取主权与发展权，那么，在民主国家的维系与发展中，政党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保护人权与推动民主发展。民主国家建设的核心是人民主权，它强调个体的生命尊严与社会的公平正义。人们通过政党的方式表达与维护自身的权益，并进入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在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中，政党在对待主权、人权、政党秩序与政党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可以从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方面的差异，政治行为与政治理念方面的差异和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差异等方面给予充分的解释与说明：

（一）政党与民族国家的建构

英文中“民族”（nation）一词来源於拉丁文“natio”意为“生存之

物”，而 natio 又与古希腊文 aci 的过去分词 natus 存在密切关联，意为“生育”。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逐渐获得了政治方面的含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一词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在现代政治中，民族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色彩已经成为该词的主要含义。德国政治学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曾说过：“在谈到‘民族’这个概念时，我们一再指出它同政治实力的关系。”①

可见民族概念形成于近代以来的欧洲，“指的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中的统治民族，也就是以本民族为主体建立现代国家的民族。因此，民族的概念直接与国家的概念或者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自治相关联。”② 从现在所使用这一概念的情况看，人们更看重它的政治含义。建立本民族的国家成为民族实现自主的主要标志。对民族主义来说，它既是工具，也是目标。作为工具，它是用来维护和促进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实现和维护个人权利的，而最主要的目标则是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从民众角度来说他们参加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除了为了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外，还希望实现个人权利，这也是民族主义更为深层的目标。

罗恩（D. Ronen）在论述这一点时曾指出：“基本的不是人在一个民族中去找到他的身份或成为民族一部分的渴望，而是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实现他或她的自决的个人存在的渴望。为了达到此目的，个人有时采取民族身份方式，有时采取阶级、少数民族或种族身份的方式。”③ 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是政党承担了创建与缔造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政党通过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与缔造，获得了领导国家的合法性。政党在民族国家建构中主要承担以下基本功能：

1. **政党构成了民族国家中主导的政治共同体**。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民，基于同命运、共甘苦这一事实而萌生的共同体感，基于共同语言和文化传承的“自己人”认同，结成同种同族同

---

①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452 页。

②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 页。

③ D. Ronen, 1979: “The Questforself - detrtmina - tion”, Newhavenand London, YaleUniversity Pre, p. 52.

利害的政治共同体，并表达相同的国族感、国族意识、国族愿景与国族认同。在政党领导下各个政治共同体围拢在国家主权的旗帜之下，以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共同塑造出自己的政治权威，从而获得对于此种权威的自由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而为民族。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离开政党这一共同体，若进行空间叙事与理论逻辑铺陈，在事实上完全不可能。民族主义正是通过在政党领导下以民族国家主权建构为追求的目标，以对于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忠诚为依归，本质上体现为是一种现代政治。政党共同体，将各种社会组织收拢于自己的疆域之内，而屏蔽了一切对于既有状况和格局的可能质疑，正是基此前提，政党共同体提供了将个人、族民、国民、市民和公民诸种身份统合一体的制度条件，使得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族群共同体，一个追求国族利益边界最大化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一个具有历史自觉与文化自觉，明悉如何在全球体系中寻求国族的最佳生存与发展之道的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足以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

其一，观念设计。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国家是具有思想家与政治家自觉设计国家形态的特点的。民族主义就是这种设计的观念工具。但是，具有民族主义自觉性的，不是所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而只是少数建构或加入政党（或政党萌芽状态的各种组织）的领袖人物具有的政治理念。这些人就成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提供者。他们从党派立场出发思考国家建构问题的视角，也就决定性地影响国家今后的实际建构状态。

其二，制度供给。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常常是处于传统政治实体制度供给短缺的状态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因此，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尝试足以供给替代传统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它就具有组织国家的“先天优势”。无疑，在民族——国家中，这类以革命手段，通过暴力途径谋求政治权力的政党，通过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与宏大的意识形态对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贡献主导性意见，并通过民族国家的现代制度建构把思想理论落实到实际政治过程之中。

其三，社会动员。这类政党根据自身优势把传统社会中各类散沙般的共同体组织起来，向现代社会转变，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政党的现代组织方式具有的社会凝聚功能促使政党与现代国家运动合拢。由于政党取得了建构国家的优先权，政党由此替代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中心作用，政党具有组织社会的社会动员"先天"特质，因此，政党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有利位置，成为主导的政治共同体。

2. **政党为民族国家建构提供秩序。**从人类历史发展经验来看，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是要求统一和集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求有同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统一成一个整体，这是基于按照集中与统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考虑的。当政党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位置之后，它对于社会秩序就享有了设计、指引的自然先导权，政党统帅了一切。如果政党不进行集中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经济市场、语言的统一和文化的同质性就无法建立，统一的国家制度也就无从维持。因此，政党必然要求统一民族市场、民族语言等，并把这种统一贯穿到政府的工作体系以及传播体系、教育体系当中；政党关于统一民族语言的运用、统一民族意识的灌输，这些对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都是最基础的条件。这一过程在很多方面来看确实与现代民主的要求是冲突与矛盾的。因为现代民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要求权力下放、分权与制约；但是这种发展趋势是和社会发展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在初期可能基于现实的考量，更需要集中，而对民主的诉求可能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实际需求而越来越强烈。我们应当放逐与开阔视野，不必从进步与落后、自由与保守、民主与专制的角度去理解和看待这一现象。实际上，从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来说，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制度的完善是对立统一的，这两个方面，离开哪一面都不行。民主制度是为了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利益和要求，但是人民大众又分属阶级、阶层、民族、教派、社区、地方等不同的集团，因此民主制度本身也充满了矛盾。如果没有民族国家这种框架来框定这些矛盾，那么这些矛盾足以使一个国家处于涣散状态。如果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各种

矛盾经历相互对立、激烈斗争，经过一个综合、聚合的过程形成统一的政策，能够满足各个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那么国家才能很好地运转起来。

政党在推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正是通过各种政策把民族国家的大厦点点滴滴地建构起来的。政党一方面要培养向心力，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民族离心力，二者之间的博弈是个很古老的政治游戏，政党对此一定要拿捏好、掌握好分寸与火候。民族的形成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是人们往往容易把它理想化，强调语言上的统一性和文化上的同质性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实际上，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多是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不但要得到国内各个民族拥护，还要得到国际方面的承认，当符合国际法时，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才算真正地建立了起来。如果政党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在理论与实践过程中过于关注民主，而没有把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法律化、制度化、理性化，那么对民族国家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如果对所有的民族国家做一个考察就会发现，实际上民族国家的建构都是强权斗争博弈，根据各自利益要求形成的分割。这个过程充斥着暴力与残酷，所以马克思讲民族国家是用暴力锻造而成的，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现代文明催生民族国家，它倡导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都应该是独立的主权单位，彼此平等、互不干涉。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政党不仅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族独立与现代国家的成长，更重要的在实现共同体重构过程中，对社会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与调控，并提供了合法性秩序。

3. **政党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提供威权**。在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维系中，政党的使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政党使命首先是在民族的生存竞争中，实现民族国家的整合性建构，而不是国内社会分化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诉求聚合。这样一来，政党必须有更高更普遍的价值理念来支撑民族主义的、定位于民族竞争的政治诉求。因此，在大多数后发民族——国家中，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就特殊地表现为政党对国家的领导，以及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

地位。这种威权思想的存在及核心地位的取得，实则缘于政党在这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担负起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这些民族——国家在未独立以前，大多属于受帝国主义侵略与控制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摆脱贫困与压迫的境遇，是这些民族国家共同的愿望与要求。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得首先把处于四分五裂的国家整合起来，这种整合必须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权威性的像政党这样的政治共同体来统帅与引导。这些国家的政党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的一个极为重要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作为利益表达的工具，更是作为民族动员与融合的旗帜存在，承担着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建构的英雄主义的使命与历史的重大责任。政党通过动员、整合民族，并领导全民族取得民族独立，进而自然取得对国家的领导地位。

政党的领导地位的权威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为民族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①] 实现上述原则与结构的融合，需要权力的垄断与集中，所谓“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②] 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③] 因此，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是主权独立，它必须依靠政党追求国家权力的整体性与强制性。在取得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政党还要担负起领导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任，由于这些民族国家在独立前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基本上还处于前现代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中，因而，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首先得动员、组织、整合社会力量，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政党始终有一种道义性的使命担当与领导责任。关于政党与民族国家的这种复杂的关系，美国学者亨廷顿

---

① 〔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主编（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8 页。

②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7 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45 ~ 147 页。

给予了充分的解释。他认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要存在一个强大的政党及政党体系。在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过程中，通常会建立一党或一党为主的政治制度。① 在政党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中，亨廷顿认为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因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意味着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政党就不仅仅是个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在缺乏合法性的传统根基的情况下，人们就只好在意识形态、领袖魅力和主权在民中去寻求合法性。民族国家为了能够长期存在下去，意识形态、领袖魅力或主权在民等各种合法原则又都必须体现在一个政党的身上。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因为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的制度化身。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民族的政治动员滞后，需要一个自觉建构国家的强势政党来号召建立国家，政党占据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它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建立国家（政府）的特权。政党替代了民族作为国家建构活动的主体。政党意志又恰恰是在与民族意志的形成中扭转民族意志，以至于高于民族意志的情况下引导民族转向国家的。在阶级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唯一能够担当起中心支撑作用的就是政党。由政党来领导、凝聚社会上分散的各个阶级，来建设现代国家。政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也就是党建国家。例如，审视任一国家政治发展的逻辑，可以看出国家建设维系于政党，政党强则国家强，政党败则国家败，政党如果不能把分散化的社会整合成为一个总体性社会，国家建设就不能成功，国家建设对政党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也对政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政党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国家责任意识。政党

①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6～387页。

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枢纽，是国家建设的主体。指称为全能主义政治，这是一种以单位制为细胞、以纵向组织为中介、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以行政区划分割整个社会，社会组织呈现为一种蜂窝式状态，通过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以及有效的干部队伍来实现对社会生活方面的渗透和整合。借用美国学者舒曼（Franz Schurmann）的话来说这种国家形态就像一个由不同种类的砖块和石头组成的巨大建筑，而意识形态和组织则充当着这个巨大建筑物的粘合剂。在这种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全能主义国家形态中，国家几近垄断了全部重要的物质财富和信息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进行严密和全面的控制。

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政党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转型，自身同样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是政党国家化、国家政党化。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政党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的产物，政党一产生就直奔主题，那就是国家建构与民族复兴。政党占据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领导地位，并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因此，它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建立国家（政府）的特权。这样一来，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国家结构与政党结构互化，政党很容易控制一切，可能形成一种全能主义政治。

二是缺乏公共性情怀。在民族国家建构中，领导实现民族独立的政党不仅肩负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使命，同时也必须遵守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就是自身现代化的问题。因为，政党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组织形式，政党应当在党政功能区分、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以及政党间关系方面，有普遍的公共性价值情怀。政党的功能在于组织参与、综合不同利益、充当社会势力与政府之间的桥梁，要整合与平衡各方面的政治表达与利益诉求，其呈现与履行的公共性特质越来越彰显，而民族国家中的政党亟需在这方面补课。

三是权力的过分独大。与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政党主要承担对民主功能的维系不同，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政党是一个建立在具有支配民族命运基础上的强势、独大的政党，不仅实现了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而且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独占。将国家与社会的一切权力收摄于政党，从国家

暴力机器的独占，到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利用，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理独占，国家与民族均退隐到政党的背后。

四是缺乏自主的日常生活。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政治生活、组织行动方式与日常生活贯通起来，将所有关乎“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方方面面连接起来，加以高压控制。党化思维、党化制度与党化生活成为整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政党、国家、社会还没有真正做到相互分权相互制约，尤其是社会日常生活中还缺乏真正的自主性，就很难培育出理想的公民社会与理性的公民。

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初期，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问题深深地隐匿在革命的激情后面，当民族国家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政党组织与领袖集团都一时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喜悦之中，并显示出建设与发展国家经验不足的劣势。这种相对劣势是在民族国家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之后，愈加显示出来。民族国家建立后，大都没有发育健全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运行制度和弹性的社会控制制度，尤其重要的是缺乏契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法制度安排，各种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导致成为某种形式的集权专制政体。

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强势作用方式被楔入了社会日常生活，因此，全方位的社会强控制是这种国家社会日常生活的必须。一种完全缺乏抵抗空间或非暴力反抗余地的日常生活，使得社会生活经常以运动形式表现出来，要么是显示出寂静一片，要么是丧失理性的激情四溢，完全处于两极跳跃状态。在民族国家建立与发展的初期，基于传统社会的性质以及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处境和现实任务，决定了民主化对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最基本现实含义，就是寻求主体的解放与自主。首先是国家主权的独立与解放，其次是社会与个体的独立与解放。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社会与个体的独立与解放则显得愈加重要。作为担负重任的政党应该清醒地认知这个排序，要知道推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遭遇到的冲突与矛盾远比民族国家的建构更为复杂和艰难。实际上，革命秩序的建构可能使得人民享有的民主面临被剥夺的困境。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科尔曾坦言，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斗争结束后才有可

能建立。因此，对革命党而言，民主不是供自己享用的东西，而是“一种对外出口的物品”。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政党不仅要个人的权利服从政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权力的分散无疑也会因其消减政府的权威而受到批判，“使大众服从于少数人的意志日益被认为是民主的最高品质之一”。① 随着社会与个体的独立与解放，人们的主体性要求更加强烈。由于党政一体化，党政不分，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人们对于某项政策的不满，很容易引发成对政党、对国家根本制度的不满，从而引发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政党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美国学者李普塞特曾说过：“铁板一块的政体不鼓励公民对体制和在职官员作一区分。公民们易于把政体与个别领导人的政策相提并论，一些掌权者自然而然地利用对国家的忠诚来为自己获取支持。在这种社会里，任何对政治领导人或对主要政党的抨击都很容易变为对政治制度本身的炸弹。有关具体政策或具体义务的争论很快便会提出制度存亡的根本性问题。”而在建立起相对较为完善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社会中，党政分开，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保护其国家不受公民不满引起的破坏：抱怨和攻击针对的是那些仍在其位、仍谋其政的官员，而不是整个制度”。② 尽管其中某些人可能会被指斥为离经叛道，但并未引发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李普塞特的这个思想不失清醒与睿智，应当引起相当的重视。在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党一般推动较为低调的代议制民主、程序性民主和人民民主，而不是高调的直接民主制、实质性民主和个人民主。如果过于关注对社会的控制，在政治行为中主要实施临时应变的行政策略，而没有把策略与规则法律化、制度化、理性化，那么对民族国家今后的发展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政党与民主国家的维系

如果说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政党的主要职责就是争取主权与发展权，

---

①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政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页。

② 〔美〕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那么，在民主国家中，政党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人权与推动民主发展。因为在民主国家中，一般强调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体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等人权的自由。洛克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他很早就注意到自由对人的重要性，他说："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①] 维护个体自由权利的制度建构，就是要防止公共权力越界扩张侵犯个体的权利，所谓自由的宪政就是决不能让个人的利益"无端地牺牲给国家的理由（reason of state）"。[②] 美国权利法案第一条修正案明确提出，无论政党与政府都不得"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③] 可见，民主国家建设的核心是人民主权，它强调个体的生命尊严与社会的公平正义。

人民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所有者，这意味着任何国家权力都是有限的，需要得到人民的定期确认。作为以谋取国家公共权力为使命的政党，在争取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也与人民主权结下了不解之缘。既然现代性社会中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必须以组织化的方式进行，那么作为公民自身组织的政党所获取的公共权力就不再是无限的、终身的，而是有限的。民主选举制度则是这种权力授受关系的周期性确认。政党通过选举掌握公共权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以政党的名义直接向政府发号施令。这是保证政府维持其社会公器的前提。进入政府的党员受政党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政党的忠诚和为日后继续当选的需要而产生的对政党的依赖上。这正如布赖斯所总结的那样，从好的方面着想，政党可以使政府能在一个分子极复杂的大国家区域内很稳固地运用，使多数人民能够一致地团结。滥用职权的趋势在小社会之内是很大的，但在这大区域内却是减少了。在民主国家的维系中，政党的基本使命就是推动民主化，促进民主始终是围绕着实现人的独立与自主展开，使民主化最

---

① 〔英〕洛克：《政府论》（下卷），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59 页。

②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23 页。

③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63 页。

终落实于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

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中，现代政党政治起源于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政党政治与资本主义议会政治、选举政治相呼应，共同支撑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揭示了政党自身存在的“冲突”与“整合”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政党是冲突的力量。由于政党是作为“部分”而行动的，它必然要维护所代表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为了有效地维护这种利益而与其它政党展开竞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深刻揭示了政党的本质，认为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是政党得以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也意味着在阶级社会里政党具有阶级性，政党总是社会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党。恩格斯曾揭示：“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①] 第二，政党是整合的力量。政党不仅代表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而且政党谋求公共权力获得执政地位，必然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以最大努力满足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这样一来政党又具有整合化解矛盾与冲突的作用。政党上述二重整合功能标识了政党所具有的整体属性的二重规定：特殊性中的普遍性，普遍性中的特殊性。

在民主国家维系与发展中，政党同样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在，但这种影响又有着明确、严格的边界。公共权力有自己的运作规律，并在权力所有者与权力使用者之间形成相应的法理关系。政党可以通过各种符合法律规范的手段对国家公共权力施加影响，但其底线是不能改变国家与政党之间的法理关系。政党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灵魂存在于政治运作的背后，控制整个政治运作过程，而不是直接浮现在政府行为当中。另外，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先有国家、政府和宪法后有政党的事实，使政党政治只能在宪法框架内才能取得合法性。在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中，政党制度的存在不仅是自由民主的标志，更是其不可或缺的条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因为，政党为人们在一个“观点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有秩序地、和平地表达自我创造了条件”。[①] 与此同时，政党使社会“系统反抗的导火索卸去”，使“对立的角色制度化”，使政权的和平更替“通畅化”。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作用。“现代民主完全是建立在政党上的；民主原则应用得越彻底，政党就越重要。”[②] 这是因为：首先，政党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自组织方式。人们通过政党的方式表达与维护自身的权益，并进入社会政治生活过程。政党共同体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中，通过相互之间的自由竞争达到分权与制约的目的，这就如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分析揭示的那样，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还存在着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并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成立的独立社团。但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构成了一个非政治性的社会领域，而毋宁在于它们构成了政治体系中权力分立及多样化的基础。紧要的并不是它们外在于政治体系的生命，而是它们被整合入政治体系的方式，以及它们在该体系之中的作用”。再者，政党又是抵制专制、坚持民主政治的一种现实途径。社会对于国家的监督、制约，如果离开了政党，就可能是软弱无力、甚至微不足道的。因为政党这一特殊社团是一种现实、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对国家起着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鉴于此，孟德斯鸠进一步指出，在民主国家，关于结社的科学才是一切科学之母，社团是抵制温和专制的唯一堡垒。在民主国家维系与发展中，政党主要承担以下基本功能：

1. **政党成为竞争的主体**。在民主国家中，政党的政治行为主要是为争夺国家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始终在民主宪政框架内进行。政治主体无论大小、强弱，都有平等进行政治竞争、争夺国家公共权力的机会与权利。政党间竞争以公民拥有政治生活中的自由选择权为前提。没有公民的自由选择，既谈不上真正的民主，也谈不上真正的政党竞争。政党之间的竞争对于公民来说，就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只有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争夺公共权力时，公民才有自由选择的可能。在竞

① 荣敬本、高新军编：《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6 页。

②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0 页。

争性政党关系中，政党总是尽可能地宣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以便争取到最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从而在选举中获胜。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政党之间的竞争并不是纯粹在几个政党之间进行的、与普通民众毫无关联的政治游戏，而是一种以政党竞争形式出现的社会民众的普遍政治选择过程。政党竞争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了社会公众的利益选择。这种竞争选择不仅是形式性的，更有着深刻的实质性内容。

政党之间为争夺国家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往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充满悬念，甚至不失某种惨烈。但是，如果政党间关系仅仅是种竞争性关系，政党相互间仅仅是为争夺公共权力而进行竞争，那么结果只能是导致社会分裂为两大集团，互相厮杀，造成社会的无序与纷争。政党间的这种纯粹竞争性关系，不合乎宪政社会的本质规定；因而，必定要为宪政社会本身所否定、矫正。现代社会中的宪政制度规定了政党不仅是冲突的力量，而且也是整合的工具；政党间关系不仅有竞争性，而且还有合作性、包容性和互补性。事实上，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两大政党之间除了进行激烈的政治竞争外，还有广泛的合作。例如，在英国，由工党政府首创的改革思想，后来可能由保守党政府进行实施，只是做了些适合他们政策的修改；美国的两大政党在根本公共政策方面基本一致。比如国内政策均以经济繁荣、教育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外交政策则确定为贸易、人权与安全三大目标。尽管两大政党在政策目标上会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主要是一些枝节问题上的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的本质揭示，仍不失深刻：西方国家每隔几年一次的选举，只不过是由人民来决定由谁来统治他们，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执政，对人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

2. **政党成为利益表达与整合的工具。**现代性社会是多元与差异的社会。多元与差异的社会利益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才能得到有效表达。政党作为现代性过程中的产物，是公民表达、维护与实现自身正当权益的一种制度性安排。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借助于政党进

行利益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党又是代议制民主得以实现的工具。与此同时，政党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能，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就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尽管这种动员所形成的广泛的政治参与会给国家（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它有助于国家对社会进行整合。在现代性社会，政党既作为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存在，同时也作为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整合组织存在。因此，各政党在代表一部分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整合它所代表的这些部分的利益。布赖斯曾经对美国的政党政治在整合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做过分析。他认为，政党的组织确已统一了全美国的人民，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无论是乡区或城市，穷的或富的，本地生长的美国人或从全世界迁移来的外国移民，都因政党的关系，同化起来了。政党的组织又帮助与训练他们互相合作。假使政党是根据民族或宗族的不同而组织的，那么，人民间种种不相容的状况又势必会更加剧烈。但在美国，这种不相容的状况却因政党而减少了。多数的爱尔兰移民是加入民主党的，多数的德国移民是加入共和党的，但民主党中也有很多的德国新教徒，共和党中又有很多的爱尔兰旧教徒，只要内部分子不致分裂，一个政党是愿意容纳各种各样的意见的，就是种种怪癖的观念，或一时的风尚也会偶尔提倡。正如美国学者利普塞特认为的那样，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一方面，每个政党都建立了跨地区的沟通网络，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正是它的竞争性帮助建立了超越融合小团体和帮派之上的全国性政府体系。”[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是“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②] 可见，政党体现的就是它作为整合工具的作用。这种利益整合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政党内部的整合，即政党集中代表自己所属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这种整合是特殊中的普遍。其二是对社会不同阶级、阶层

① 〔美〕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6 页。

② 〔美〕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7 页。

和社会集团的利益进行整合。在多元与差异的社会中，政党的表达与整合的功能更加凸显出来。

3. **政党凸显公共性品格。**在现代性社会中，通过政党间的互竞及其角色互换，通过他们所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开放的历史过程中会得到相对平衡，进而使国家的公共性品格得以体现。西方政党正是通过竞争这一独特机制维护政党的公共性品格。在现代性社会中的多元主体，为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而组织成为各式各样的团体或组织时，政党就是公民们组织起来的一种有效方式，且这种自我组织起来的政党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某一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掌握国家公共权力，利用手中所操控的国家机器，可以更好、更方便地为其所代表的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服务；与此同时，它也就为其它政党的存在留下了广阔空间。当这些非执政党以在野党身份与执政党及其所掌握的国家公权力相对时，它们就成了反对党。反对党亦有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集团。如果这些社会利益集团的民意呼声若不被倾听、利益不被关心，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削弱。这也就为反对党或在野党获得公共权力成为执政党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对公意的体现与维护主要通过政党竞争得以实现。这里的关键在于：须从一种时间的连续性中理解政党对公共性的维护。正如前述，政党首先是作为“部分”存在，但政党要成为执政党、拥有获得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根据，就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尽可能“大多数”这一“整体”的存在。正是周期性的选举制度，保证了政党对于公意、公共性的尊重与维护。通过周期性的选择制度，在保证国家权力公共性品格、确证国家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保证了政党对于公意、公共性的尊重，以及由此所确证的政党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正是这种国家权力与政党执政二重合法性确证，使得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的权益能够得到基本尊重与保护。这从一个侧面意味着：现代性社会背景下的公共性，是多元社会主体间在宪政框架下通过政党轮流执政形成公共理性，而不是由某种外在力量的赋予。

（三）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中政党功能的差异性分析

通过上述对政党在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维系中的不同结构与功能以及发挥的不同作用，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具有的差异性和比较特点。这种差异可以从政党在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的方面的差异，政治行为与政治理念方面的差异和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差异等方面去分析说明：

1. **在意识形态及组织结构上的异同。**现代性社会以来，政党在现代政治中一直处于显现的地位。在民族国家中，政党是整个社会的政治轴心，政党拥有辐射社会的权力；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党的控制，被高度政治化、政党化。作为中心政治的“逻格斯”式的政党，掌握着抽象理性主义、普适性方法论、严密的逻辑和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的宏大叙事话语权。这种政治，追求的是同一性、普遍性，强调一致和秩序，强调权力统治、中心和等级，具有一种宏大的普世精神和理想的终极目标。这种“逻格斯”式的政党，正如利奥塔所言：“决策者力图采用一种输入输出模式。按照这样一种包含元素可通约性和整体确定性的逻辑来管理这些社会云团。”① 所谓政党意识形态，是指足以使得国家之作为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对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基础之基本价值的共识。无疑，民族国家在实现国家建构中，需要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观念基石，但是，建构过程中要依赖于相对于原来国家结构而言的外生力量来动员社会各种资源进行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独大政党就有了代表民族利益与愿望的机会空间。在民族危机中，道德自我正当化的政党就有一个要求民族成员跟随这一政党的理由。所以，当通过政党力量建立起国家组织架构之后，党化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撑也就通常是义务型民族主义与义务型爱国主义。所谓义务型民族主义，就是不问民族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不问他们作为个体活动者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而只是在民族危亡关头，被政党动员

①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 页。

起来而成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民族救亡者。所谓义务型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对于国家就不能质疑它对于个体自我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而只能质疑自己热爱国家的忠诚程度问题。与之伴随，独大的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之上和之外运作的。国家作为号召民族凝聚为政治实体的道德主体，转换为政党作为号召建立国家的道德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与组织的“寡头统治铁律”发生作用的机制特别明显。政党领袖在政党国家的建制中，发挥着“导师”与“领袖”的共同作用，他就此成为政党的象征与国家的象征。

在民族国家中，政党一般信奉着普遍理性、宏大叙事和先验“元”规则的政治观念，强调“阶级话语”，坚持“革命意识形态”。当政党掌握权力进行执政把意识形态升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往往会牺牲社会上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将社会认同简化为阶级认同和政治认同，以阶级政治取代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正如经典现代政治观所认为的那样，世界是“一个被划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设计者和设计的遵从者——其中第一类人让设计符合自己的心愿，而第二类人既不希望也不能够去窥探行动计划并抓住它的全部意义——的世界；一个作出对它自己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选择的世界。”政治现代性内在的丰富都被格式化了。传统的政党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政党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向管理，追求的是一种线性的权力结构。权力沿着层级自上而下，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但是，这种结构性的权力已经不适应具有网络信息特征的后现代性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对传统的威权政治的神秘性、权威性冲击很大。传统的威权政治已不再高高在上，面临着去魅化与去等级化，如同人们的日常消费一样，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事情密切关联着。

在民主国家中，由于人们不再把阶级、统治与斗争等作为重大政治问题，而是以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的利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且人们围绕这些问题正在形成新的社会认同。由于地方性和全球化的交错互动，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需要更加细致而有特色，这样一来，传统的阶级认同逐渐陷入困境，正如哈贝马斯断言：“阶

级的社会同一性解体了，阶级意识涣散了。被纳入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妥协，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参与者和当事人，成了一个人。”①生活向度的改变，必将导致人们需要以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认知、参与和日常生活等社会认同逐渐去代替阶级认同，这必然导致政党的认同要同步地进行现代性调整。政党在民主国家发展维度中，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党分化由当初以阶级为基础开始向以议题为基础的转变，人们不再纠缠于阶级性而更关注问题性；二是传统政党竞争结构中的“左与右”分野呈现空前的多维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左派或者右派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斗争焦点；三是选民传统意义上相对稳定的党派忠诚开始趋于弱化，将注意力转向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诸如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女权、政治参与、社会救助、战争与和平以及对人类生存的反思等方面。这样，传统的以某一阶级作为其相对稳定的支持来源、长期以某种意识形态为“旗帜”的“阶级政党”，逐渐让位于具有较强应变能力的注重形象塑造的政党。传统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阶级斗争”观念也悄悄消退，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去意识形态化”趋势。而这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政党支持者在阶级构成上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政党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已经并正在继续改变，这一基础不再是传统政党那样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核心阶级群体，而是在阶级来源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和多元性。

由于政治日益开放与透明，更加民主和贴近现实关注生活的具体问题，传统管制的政治逐渐向生活政治转变，导致公共权力运行弥散化，不再仅仅受到政党与政府支配，一些社会共同体和个人也获得了权力资源，权力不再为政党与国家专享，真正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传统的政治一元权力中心将逐渐分解为多个中心，权力的垂直等级制越来越倾向横向连接，权力日益弥散化且流动性增强，可能会被更多的人分享与实践。权力逐渐由等级机制向平滑机制演进，其实质是“权力的有效传递方式”，是“在所有的层次上都有避免官僚的办法”。由

① 〔德〕哈贝马斯：《何谓今日之危机？论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第56页。

于权力的弥散化、流动性增强，任何政治个体都可以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日益个体化、弥散化，促使个人将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政治日渐世俗化、平民化和人性化，这说明个体的政治能力得以增殖。可以说民主国家发展的时代是个体政治能力增殖化的时代。在组织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的情况下，政党追求的治理应当是一个上下互动左右结合的动态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权力流向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政党治理是指政党引导各种机构管理公共事务，主要作用是调和各类矛盾、协调各方利益，达到社会正常和有序运转的目的；通过治理政党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政党充分尊重各个政治主体的平等与自由，并在政治生态环境中，与其他的主体之间保持一种合作、协商、对话的关系，从而推进一定范围内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这些主体不仅仅包括政党组织、网络共同体，还包括其他的一些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力求建立一种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最终实现多元和谐共存。在政党组织结构方面追求扁平性，把更多的权力让渡给较低层次的组织和个体，使其能实现 JIM（just－in－time，适时制）治理。由于这种趋于扁平的组织结构形式，要求组织提供服务的主体面临的将不再是一个个生硬、无能的官僚器官，而似乎是整个组织机体在为它效力。西方企业组织在点、面、体三方面进行高度整合构成扁平组织模式，并进行灵活高效的运作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也从中受益匪浅。西方政党在考虑政党内部治理结构时，对此给以充分借鉴和吸收，政党进一步打破官僚科层制可能给组织带来致命的危险，增强开放性，丰富现代性。现代社会发展速度呈几何级数上升，不确定性已是常态，组织若再固守科层制教条则可能被边缘化，其“核心活动”将难以获得认同。为此，在民主国家中，政党为了生存发展需求，必须强调组织的开放性，使部门间、组织与环境间变得“可渗透”，各种组织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政党才能与时代保持同构，才

能跟上时代的节奏。

2. **在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方面的异同。**政治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各个领域，政治不仅具有深入性同时又呈现出广延性，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谈到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到现代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①] 突显出政治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政治是一种特定的活动或过程，与利益、公共权力或权威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民族国家建构与建设中，由于政党是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建立国家（政府）的特权，政党替代了民族作为国家建构活动的主体。政党意志代替了民族意志，政党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国家责任意识。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枢纽，是国家建设的主体，以一般诉求、阶级对抗、民族解放等解放政治为表征，这种解放政治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政党坚持"阶级话语"与"革命意识形态"，政党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充斥着"斗争"、"运动"、"战役"、"宣传"、"集体主义"、"无私奉献"、"两类矛盾"等术语。在民族国家中，作为中心政治的逻格斯式的政党，掌握着抽象理性主义、普适性方法论、严密的逻辑和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的宏大叙事话语权。这种政治，追求的是同一性、普遍性，强调一致和秩序，强调权力统治、中心和等级，具有一种宏大的普世精神和理想的终极目标。正如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②]，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在实质上这种解放政治观，没有克服而是加剧了人与其本质属性的分裂和对立，因此，政治解放一定要转化和提升为社会解放。社会解放高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的实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与获得。"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③]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富裕时代"、"后工业时代"或"晚

---

① 〔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版，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时代的转变也表明了“解放政治时代”已进入“生活政治时代”。由“注重阶级斗争”向“生活水平改善”的转变，并且仍力求完成“解放政治”时代的任务。尤其是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这些新社会运动的发起人声称生活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活动的主战场，他们肯定权力形式的分散化与多样性，提出“个人的便是政治的”口号。

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 chance），一种为他人实现的政治；生活政治则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 decisions），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无论是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之说，还是最近的“后物质主义”的提法，当社会、家庭、个人的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人们总会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以外的问题，特别是人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自由。在政治领域，政府与社会也进一步关注生活中涉及政治的问题。从西方国家近年政党选举、总统选举中可以看出，决定他们是否获胜的关键不是国家大政方针，而是他们为公民设计的涉及生活各方面的选举纲领，诸如对生态问题的态度与保护政策（生态政治）、生殖政治、身份政治等等，也即上述的“生活政治”。英国学者吉登斯提出了生活政治观以图超越解放政治。他认为：“生活政治的关怀，预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变迁，实质上这是在现代性社会秩序形式发展的‘另一边’发展的。”① 也就是说生活政治使高度现代性社会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展现出与解放政治截然不同的特征。吉登斯将生活政治定义为：“关涉的是来自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② 在这样的一种时代中，政党的价值理念定位，在顺应民主理论发展趋势的同时，在研究方法层面也顺应着20世纪以来政治科学细化、量化、规范化的趋势。将高深莫测的“民主”从离普通民众遥远的政党竞争、领

---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2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2页。

袖选举等拉回到社会生活中，还原为公民身边具体的生活常识。将所谓的“民主”问题转化为切切实实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民主变得越来越具体化、越来越可操作。这样，“民主的实现途径”这一核心问题便由难而易。而民主与“生活世界”的靠近，则是随着现代性的进展，表现为在后工业社会中民主自身修正和突破的更进一步的趋势。后现代哲学语境中所谓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多元的、差异的、不确定性的自由领域，是各种不同的思想、价值、观点、语言在其中都具有生存权利的领域。多元、差异、自由、权利这些现代民主所追求的价值在此都得到了契合，多元和差异在“生活世界”的共存，从某种意义上就可被称为“民主”。公民越来越离开政治领域，而退回到私人生活领域中。生活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民主的价值内涵的扩展，民主价值的实现途径也渐渐地由政治领域转向生活领域。通过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方面的民主文化建设来影响政治决策构成了当前民主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民主对话也就构成了当今政治生活中获得政策上的一致或取得公民政治认同的一种途径。在“生活民主”的语境中，性关系、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等都被纳入民主所考虑的问题之列；自由、平等仍是人们孜孜以求的价值；信任、宽容、尊重被作为基本的美德而存在；对话、交流、沟通、协商成为这些价值的主要实现方式。通过在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各种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不断建立对话和沟通的管道，普及信任和宽容的精神，促进相互的尊重和理解，“民主”就不再是逐渐离我们远去的政治标语和投票箱，而是一种越来越贴近生活、贴近心灵的制度和文化。在民主的价值结构与民主价值的实现途径这两个核心问题上，“生活民主”理论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使它并不完美，但可以承认的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冲击下，在政治民主进程遭遇了发展瓶颈的今天，这不失为一种民主发展的应对方案，而在这种理论变迁趋势当中，民主的活力也得到了显现。在从“政治民主”到“生活民主”的变迁趋势中，政党的政治行为应当保证，民主始终没有完全脱离权力来源、权力合法性这样一些政治学的核心命题，承认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治权力必须为保护人民和促进人民的福祉而存在，这是民主的核心与本

质，也是政党存在的必然性所在；“民主”越来越远离的是“统治”的语境，在肯定其传统的自由、平等等价值追求并不断扩大其内涵的同时，从更广泛、更规范的角度去探寻这些价值可细化、可操作的实现途径。这是民主理论变迁的一种应然趋势，也是西方政党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原由之所在。

3. **在国家与社会方面的异同**。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政党并不是把国家与社会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使其丧失主动性，而是依靠政党这个政治工具对国家与社会实施调配，保持两者的制度均衡，既保持制度之间的“适调态”[①]，又保持各个群体、共同体的“合意态”[②]，实现双向协调发展。两者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根本无法解决，如何协调两者关系，既能够对国家掌握的公共权力制约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又能够促进社会的活力与繁荣，这就需要现代性政党出面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政党，一般表现为革命性政党或者是非竞争性政党。政党作为体制外政党不是建立在现代民主制度发育成熟的基础之上，而是奠基于为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斗争与民族的复兴之中。这类政党从诞生起就肩负着民族国家的整合性建构，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任。这类政党是通过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与缔造，获得了领导国家的合法性认同与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与权威，政党享有高度垄断性的权力，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吞噬力。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者关系中，政党已经超越国家与社会起着总揽全局的作用；这种社会制度安排具体表现为：政党实现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和直接控制；政党的权威和对社会的整合是通过“一元化”的执政体系、人格化要素、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政治动员等来维系的。政党的执政体系的构建呈现明显的政党主动引导的“整体性”行为推进的特点，政治关系的设定和制度化是执政党主导的结果。这种一体化格局，“实际上是党通过自身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对国家、对社会实行集

① 曾峻：《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学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9 页。
② 张旭昆：《论制度的均衡与演化》，《经济研究》1993 年第 9 期。

中统一领导，从而把国家和社会全面整合进党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之中。”① 整个社会发展状况表现为政党、国家与社会高度三位一体。政党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缺乏明显的界定与分工，不仅党政难分，以党代政，甚至政党权力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政党不仅总揽全局，甚至承担父权与保姆的双重角色。大量理当由国家政权系统或由社会系统承担的权责却由执政党系统去完成，导致执政党系统越位、错位和缺位。就国家政权系统而言，长期官僚化、效率低下；缺乏主体意识、淡化其责任，一旦出现困境就可以把一切责任和错误都推给执政党；就社会整个系统而言，长期缺乏自主、活力、民主和权利，造成社会系统对执政党系统的冷漠，使执政党系统有可能失去社会系统的合法性资源支持。例如，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苏联社会生活中，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异，苏联政党不仅高于社会，而且高踞于国家之上，甚至是党魁统帅一切，高度集权而且缺乏任何制约。这样的政党关系不仅无法消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将政党自身引入一种普遍对立的困境之中。由于党政一体化，党政不分，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政党体制异化为党国体制，人们对于某项政策的不满，很容易引发成对政党、对国家根本制度的不满，从而引起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可能引发政党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早在马克思批判地吸收黑格尔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时候，就认为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分离的独立领域，这种领域不但构成国家的基础，而且对限制国家权力过度向社会延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特别指出，“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存在，而现代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② 这说明国家与社会分离的重要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国家与社会混在一起，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还不是现代性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政治制度时刻面临合法性危机。正如美国学者利普塞特所说：“铁板一块的政体不鼓励公民对体制和在职官员作一区

---

① 林尚立：《领导与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 年第 6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3 页。

分。……在这种社会里，任何对政治领导人或对主要政党的抨击都很容易变为对政治制度本身的炸弹。”[①] 在民主国家中，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主要围绕国家政权展开活动，不管是竞选还是执政过程，都以国家政治领域为核心。这种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和前提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国家与社会边界区分明显的环境下，政党获取公共权力进入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后，其执政行为主要在国家领域，而不能随意侵入社会领域。如何更好地融入国家与社会之中而又不随意干涉并保持着各方适当的张力，20 世纪末，欧洲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可以视为整合国家与社会，确保各自优势并相互增权，实现互惠的努力。这种超越“左”与“右”的持中之主张，反映了他们平衡传统与现代性的政治智慧。政党执政的政治钟摆一直没有停止，折射着社会与民意的诉求，不再固守极端思维而是互相学习、彼此借鉴，力图超越“国家—社会”简单的二元对立，尽力保持平衡和谐状态。

从政党制度运行的角度来看，政党对国家的领导体现为对国家制度的有效运作和控制，对社会的领导则体现为在法治的规约下对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整合（而非直接控制社会），使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依然能够聚合在政党的周围，同时政党要依靠社会寻求社会的合法性的认同和支持。这样，一种全新的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位阶与序列格局开始呈现出来，三者的关系不再表现为简单的干涉、支配的关系，而是在政党的引导下协同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过去的二元对立逐渐转向相互增权，以冀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冀望能够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权（mutual empowerment）。[②] 一方面，政党共同体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在尊重社会独立性的前提下要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中，并对社会中各种共同体的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协调和引导，或者为它们创造适宜的活动条件和公平正义的环境；另一方面，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民

---

① 〔美〕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6 页。

② 参阅莱斯特·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的视界》，贾西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Neil Gilbert, 2002："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Silent Surrender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主政治的实现，需要政党率先引导社会严格遵守法制规约，在法律范围内享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并最终与国家形成“双向的适度的制衡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

通过两类政党的理想化区别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到来，工业革命时代的官僚科层制由于难以应对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挑战而逐渐转向网络性、扁平性和开放性，以适应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工业革命时代的组织与后工业革命时代的组织相比较，前者信息纵向流动，决策时信息上流、指令下行，后者信息纵向、横向流动，决策由信息发生地做出；前者管理层级多，呈高耸状，后者管理层级少，呈扁平状；前者强调形式和结构稳定、按部就班，后者主张重视过程、结果和产出；前者突出专门化和被聚焦的个体，个体的职业路径是纵向和线性的；后者则突出专门化和被聚焦的组织，个体职业路径是灵活、侧向和非线性的；前者将分析问题的背景设定为自身所在的地区、国家，其思维、行为方式为单一的强势文化所主导，后者重视世界眼光，从全球化角度出发去思考、行动，允许观点和行为的多样化。那么无论对民族国家中的政党还是民主国家中的政党，都要加强党内治理结构的建构，突出网络性、扁平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保持政党内部治理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构性，打破原组织中部门间一个个孤立的“岛屿”，充分重视团队，创造更广泛的跨部门、跨职能的横向信息分享与合作，以提升对外界的应变能力。

第三章　政党的总体性谋划与适应性变迁

当社会由经典性向反思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时候，政党制度模式及其政治功能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动与调整。传统政党制度中主张宏大叙事，强调集中与统一，实行自上而下单向性的结构特征，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性社会发展变化要求，需要革新与应变。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著名思想家葛兰西以苏联政党体制为模版，对东方国度与西方国度、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深刻思考，构成了他的“总体性”的政党理论。而直接以民族解放、国家建构和严密组织构成体系的苏联政党，已经超越了葛兰西的“总体性”政党，极化为党国体制型政党，主要通过异化为国家官僚制的民主集中制，实现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实现党内政治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连接，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化思维、党化制度、党化教育和党化生活的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欧洲共产党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作为新的社会主义流派，试图摆脱前苏联共产党实施的一种固定的革命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策略，并付诸于实践；欧洲社会民主党也纷纷提出改革主张，以图刷新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借鉴其他政党执政经验的时候，有的国家的执政党，试图依靠幻想中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采用暴力手段，彻底颠覆现实社会中存在着的正常的秩序与传统，试图用政党权力对人性实施彻底改造，进而实现社会结构的重构，但最终结果是政党的解体和乌托邦主义的弥散。

一、政党的总体性谋划

伴随着现代性由经典性向反思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转变，民主制度的一些传统功能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动，这也直接导致了政党的模式以及政治功能也随着政治文明的现代性演进，相应地发生变化与调整。政党共同体则由最初的封闭型的密室型政党到追求总体性和统一性的总体性政党；由科层制度影响下产生的偏重于工具理性的卡特尔政党和“政党寡头”到主张集权和等级的党国体制型政党，这类政党可概括为具有经典现代性意义的政党。随着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社会运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发展以及转型期间造成的一些动乱与危机导致政党发展与调整发生了诸多变数。经典现代性意义的政党一般主张宏大叙事，强调集中与统一，政党组织按照科层制，以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结构为特点，注重对社会进行控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总体性政党、政党寡头和党国体制型政党等。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在对“历史主义”观指出质疑时，曾说：“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历史是一条有源头的河流，他们可以弄清楚它会流到哪里去，也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预测未来，这在道德上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在波普尔看来，现代暴行的基础来源于这样一些危险而错误的思想：柏拉图等级森严的完美国家，黑格尔把国家作为美德思想的实现这一观念，以及马克思的历史观。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都相信，人们能够通过认识“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规划社会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下称《历》）中予以批判的思想。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下称《开》）一书中，波普尔进一步解释和拓展了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在波普尔看来，不可能有历史规律。因为所谓的历史并不是人类全部的历史，而只是经过选择后的一堆材料。很多意识形态的蔽辞就成为了美化、包装现状的旗帜。有些执政党的领导人来不及，也不可能对“未来社会”进行理想设计，因而充满“乌托

邦”幻想，因为误读马、恩经典，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兑现给民众“平等、富裕、主人”的社会承诺，因为其对马、恩经典的断章取义和教条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葬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辉”。他们留给世人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就是开启了后来者的反思之门。

20世纪20~30年代期间，不仅是世界政治大动荡的年代，也是世界政党进行嬗变与调整的时代。这期间，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不仅活跃着以英、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一些传统的政党，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党，还有以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法西斯政党。这些政党的活动不仅深刻改变着世界政党政治的结构，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面对上述政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葛兰西以当时的经典现代性社会的发展为背景，对政党共同体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研究。葛兰西认为，政党不但表现为一定阶级的，而且表现为社会其他劳动群众的，即表现为代表社会“总体”利益的。他认为政党不但具有阶级性，同样具有社会的“总体性”，且阶级性往往是内含于社会“总体性”之中的。正是基于此意义，葛兰西提出了“总体性政党”的概念。他认为：“虽然任何政党都是社会集团的，且只是一个社会集团的；可是某些政党却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单独一个社会集团的，因为它们在本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之间实行平衡和仲裁，同时成功地使本集团得到联盟集团的拥护，在这些集团的协助下发展，……所以，政党成为总体性的。”[①] 从上述葛兰西提出的定义来看，“总体性政党”是个一般性的政党概念，泛指经典现代性社会中各国一般政党，既包括无产阶级政党，也包括资产阶级政党，不应当把其看作从属于一般阶级性的政党。他曾指出资产阶级立宪政党也属于“总体性政党”，这种政党“规定君王（或共和国元首）‘统而不治’的宪法条款正是在本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之间实行平衡和仲裁的法律表现”。[②] 葛兰西同时认

---

①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1973.），第148页。

②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1973.），第148页。

为，虽然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都具有“成为总体性的”政治共同体，但两者之间在利益代表与利益诉求与利益实现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异。

葛兰西提出了“总体性政党”的核心思想与理念落实在实践层面就是“总体性革命”。“总体性政党”如何推动“总体性革命”，葛兰西从四个方面给予解释：即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政治社会是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代表国家的正式组织系统，即法庭、警察、监狱、军队等社会强制暴力机构；而市民社会则是指非正式的、非暴力的、民间的种种组织结构系统和精神力量，以及直接、间接影响政治的各种辅助力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党、教会、工会、学校以及各种文化组织如报刊、杂志、学术团体等，作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织与技术手段，“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或文化的领导机关”即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理解，简言之，与暴力相对应，它代表舆论；与专政统治相对应，它代表道德和伦理；与“公共政治”相对应，它代表“私人”和民间；与“守夜者”、“宪兵”相对应，它代表“教育者”、“意识形态机器”，它看似在国家之外，其实它正是隐秘的国家本身。“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效果”。[①] 在市民社会这个领域，人们似乎认为他们是最自由、最民主、最没有强制性、最随心所欲的，但事实上正是在市民社会中，统治阶级静静地、兵不血刃地通过一系列加工制作及通俗化、大众化过程，将其统治所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改造成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常识”和群众自发的哲学，从而赢得所谓“民心”。葛兰西还以战争作喻，他认为政治社会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还有坚固的工事和地堡，猛烈的炮击只摧毁了外线工事，工事后面还有“一

① 〔意〕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192页。

道十分坚固的防线"[1]。这实质上表明，革命所面对的不仅是政治国家，还有市民社会。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夺取政权的途径与手段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他断言，西方革命不应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正面攻击，而应采取新的战略，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葛兰西精辟地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环境中，最重要的不是经济统治，也不是政治领导权，而是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才是最重要的。葛兰西认为，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与专政暴力部分相比，国家结构中的市民社会部分及意识形态领导权作用会愈益凸现和强化。关于俄国的政治生态，葛兰西认为革命前的俄国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2] 葛兰西认为广义的领导权既包括政治领导权又包括文化领导权。这两种领导权在"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与道德领导'的形式中"。[3] 但是，葛兰西的政治领导权观是从自己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与列宁的政治领导权观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更看重文化领导权的作用，他主要是从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来运用这一概念，这也正是葛兰西思想的高屋建瓴之处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拓展之所在。葛兰西认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呈现了新变化，即"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今天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绝不单纯是通过强制暴力使被统治阶级服从；相反，通过教会、学校、工会等社会团体，以文化、宗教、习惯、教育等作为媒介，在智力与道德上说服被统治阶级，使其积极地认可、赞同统治阶级的领导，这

---

① 〔意〕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页。

② 〔意〕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③ 〔意〕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才是问题的核心与要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已成为把握政治经济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假如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那么它也根本不可能是经济的。

作为对“总体性政党”概念的丰富与补充，葛兰西还提出著名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文化领导权”贯穿着葛兰西对东方国度与西方国度、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等一系列的深刻思考，构成了葛兰西的“总体性政党”推进总体性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在葛兰西思想领域中，“国家”这个概念主要从两个方面意义上使用，即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与特殊意义上的国家，即与市民社会相对的政治国家或政治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权力主要体现为“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而在政治社会中，权力的表达式则是“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①] 换言之，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同属于上层建筑，但后者实行强制、统治和暴力，前者作为“精神和道德领导”[②] 的形式则要基于被统治者的积极“同意”。可见，统治与领导权（hegemony，另译为霸权）构成了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式。它们虽然本质上都表征着权力关系，但前者是强制的，后者则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是非强制的。葛兰西认为，国家统治的基本方式不能等同于强制和暴力，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他所说的市民社会或“道德国家”、“文化国家”[③]。那么在葛兰西总体性革命战略中的政党的地位与作用就很明确了，政党转化为“总体性政党”，主要发挥着总体性革命的作用。

葛兰西对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等领域的思考，同样构成了“总体性政党”的理论指南。“总体性政党”理论要义在于：

首先，政党要表现为代表社会“总体性”的利益，具有综合协调社会各个方面利益的功能。葛兰西认为，政党“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个人、

① 〔意〕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文选》，李鹏程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4页。

② 〔意〕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③ 〔意〕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文选》，李鹏程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

具体的个体，而只能是这样一个社会有机体和复合成分：在其中，被人们认识了的，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动表明自己集体的意志已经形成。历史已经产生了这个有机体，它就是政党。这是第一个细胞，它集中了力图成为普通的、总体的、集体意志的所有胚芽。”① 葛兰西认为“总体性政党”和其他一般政党的区别主要体现为：这种类型政党能够集中代表社会“总体性”的利益要求，显然具有宏大叙事的功能。这是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一个方面的含涉。

其次，“总体性政党”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总体性国家”，并取得领导与支配的权力，这直接由它代表社会“总体”利益的性质所决定。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政党（总体性的，而不是派别的）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方法发展成为国家（总体性的国家，而不是机械的政府）。”所谓“机械的政府”就是指封建主独裁统治的古代、中世纪式国家。所谓“总体性国家”，主要表现为：国家不但有专政的职能，而且主要是有“领导权”（指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的职能，国家因而是“加上了专政的领导权”。国家“领导权”的职能通过“公民社会”——即家庭、学校、工会、政党、报刊和文化团体等来实行；国家专政的职能通过“政治社会”——即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来实行，所以国家又叫“政治社会+公民社会”。葛兰西认为，历史发展到了现代，“总体性国家”已经存在于社会现实中，这要归诸于资产阶级在理论及实践中所完成的变革。葛兰西又认为，资产阶级政党为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始终解决不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根本矛盾，因而到底没能建立起真正的“总体性国家”。只有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进而消灭阶级、政党和国家本身，建立真正民主、平等与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总体性国家”。只有致力于同化整个社会，消灭一切阶级，同时消灭无产阶级及其国家，且能够表现出这一过程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真正的

① 〔意〕安东尼·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awrence and Whishart, 1973.），第129页。

"总体性国家。"①

再次，"总体性政党"应当建立一个系统性的"总体性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能在整个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对思想和行为方式实行改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提出了"总体性政党"的概念。他认为："任何政党都是社会集团的，且只是一个社会集团的；可是某些政党却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单独一个社会集团的，因为它们在本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之间实行平衡和仲裁，同时成功地使本集团得到联盟集团的拥护，在这些集团的协助下发展，……所以，政党成为总体性的。"② 根据葛兰西的论述，"总体性政党"是个一般概念，泛指现代世界各国一般政党，既包括无产阶级政党，也包括资产阶级政党。他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立宪政党也是"总体性政党"，它们规定君王（或共和国元首）统而不治的宪法条款正是在本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之间实行平衡和仲裁的法律表现。不过葛兰西认为，同样"成为总体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还有很大差别。资产阶级政党所谓顾及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利益，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了骗取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以争得或巩固本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因此，它们代表社会"总体"利益的程度是很低的，即以能够实现资产阶级统治为最大限度。无产阶级政党则不同，它们的阶级本质和最终目标决定自己必须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忠实代表，必须切实体现社会"总体的"利益，因而是真正的"总体性政党"。葛兰西指出"总体性政党"的实质在于，"现代君王，神话君王，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个人、具体的个体，而只能是这样一个社会有机体和复合成分：在其中，被人们认识了的，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动表明自己集体的意志已经形成。历史已经产生了这个有机体，它就是政党。这是第一个细胞，它集中了力图成

① 〔意〕安东尼·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awrence and Whishart, 1973.），第259~260页。

② 〔意〕安东尼·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awrence and Whishart, 1973.），第148页。

为普通的、总体的、集体意志的所有胚芽。"①

可见，政党所以"成为总体性"的，是由于它要表现为代表社会"总体的"利益，这是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总体性政党"总要建立国家，但它要建立的不是封建独裁统治的古代、中世纪式国家，而是"总体性国家"，这直接由它代表社会"总体"利益的性质所决定。

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政党（总体性的，而不是派别的）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方法发展成为国家（总体性的国家，而不是机械的政府）。按照葛兰西的观点，所谓"机械的政府"就是指封建主独裁统治的古代、中世纪式国家。所谓"总体性国家"，主要表现为：国家不但有专政的职能，而且主要地是有"领导权"（"hegemony"，指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的职能，国家因而是"加上了专政的领导权"。国家"领导权"的职能通过"公民社会"——即家庭、学校、工会、政党、报刊和文化团体等来实行；国家专政的职能通过"政治社会"——即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来实行，所以国家又叫"政治社会＋公民社会"。葛兰西认为，历史发展到了现代，"总体性国家"已经存在于社会现实中，这要归诸于资产阶级在理论及实践中所完成的变革。他说："资产阶级在法律理论从而在国家职能中所完成的变革，主要是顺应的意旨和国家及法律的伦理性质。以前的统治阶级就其实质来说是保守的，因为他们没有设法使其他阶级有机地转移到自己这边来，即没有同时在'法律和意识形态方面'扩大本阶级的范围；他们的理论是闭关自守的帮会主张。资产阶级作为处在不断运动过程中的有机体确立起来，它能够吸收整个社会，把整个社会提高到自己文化的和经济的水平。因此，国家的职能有所改变，国家成了'教育者'，成了'领导权机器'"，即成了"总体性国家"。不过，葛兰西又认为，资产阶级政党为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始终解决不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根本矛盾，因而到底没能建立起真正的

① 〔意〕安东尼·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1973），第148～129页。

"总体性国家"。只有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进而消灭阶级、政党和国家本身，建立真正民主、平等与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总体性国家"。

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总体性政党"必须建立"总体性世界观"。其目的在于能在整个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对思想和行为方式实行改造。总体性政党的理论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能够发展的国家思想。这一方面的内容是由第一、二方面的内容所决定的。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社会政治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中，"总体性政党"、"总体性国家"和"总体性世界观"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必然关系："总体性政党"建立"总体性国家"，建立"总体性世界观"；"总体性世界观"又反作用于"总体性国家"和"总体性政党"，使它们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如果没有"总体性世界观"而要建立或巩固"总体性政党"和"总体性国家"，那就会像"政权还俗主义"者主张"使一个人失去灵魂以拯救他的国家"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为此，葛兰西特别指出：要高度重视"总体性政党"内部可能产生宗派的狂热和盲信趋势，它会使"总体性世界观"的发展受到破坏，使"总体性政党"缺乏"政党精神"，而"政党精神"正是"国家精神"的基本成分。根据葛兰西的意思，所谓"政党精神"和"国家精神"都是"总体性世界观"的表现。缺乏"政党精神"或"国家精神"就表明不存在着"总体性世界观"，因而就更谈不上"总体性政党"和"总体性国家"的建立或巩固了。①

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总体性政党"要实施"总体性功能"——"教育的"、"组织的"、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这一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第三方面的内容的直接发展。葛兰西认为，所谓"总体性世界观"的建立，实际上是"总体性政党"要使自己的世界观及思想纲领和政治路线为本阶级及全社会其他劳动群众所接受和拥护，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为一个社会"总体"力量，为

① 〔意〕安东尼·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1973），第266~267、147页。

建立“总体性国家”而行动。葛兰西认为：阶级产生出政党，政党发展成为国家，在这些现象和功能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有益的和有效的关系。因此，政党应系统地研究和发现决定自己阶级的本质的因素及其发展过程，应进行理论的和教育的活动。对此，葛兰西还有更加直截了当地表述：对于“总体性政党”，“问题的关键是指导的和组织的功能，即教育的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一个商人不是为了做生意才参加政党；一个企业家不是为了以较少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才参加政党；一个农民不是为了学到新的耕作方法才参加政党，……在政党中，经济社会集团的成员超越了其历史发展阶段，成为具有民族和国际特征的、总体性活动的代理人。”①

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报纸、杂志、电台往往是“总体性政党”实施“总体性功能”的重要阵地。他明确指出，一家报纸（或一些报纸），一家评论性杂志（或一些评论性杂志），总是一个政党的，或是一个派别的，或是执行一个政党的功能的；甚至许多所谓“通报性”的、“非政治性”的、体育的和技术的报刊也实施“总体性政党”这个功能，这是由现代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既然“总体性政党”要实行“总体性功能”——“教育的”、“组织的”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那么，“总体性政党”就应该努力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属脑力劳动者，他们的社会活动构成了历史中精神、文化、知识和理论的能动作用的“中介”；他们的存在实质上就意味着一种社会总体性功能；或者说他们是社会总体组织和上层建筑复合体的“功能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说：“政党只不过是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中（而不只是在生产技术领域中）精心制作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特殊方式。……这些知识分子带有社会集团发展、生活和形成的一般特征和条件。……政党要精心制作自己的组成部分（那些已经产生并发展成为‘经济’集团的社会集团的成分），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完整社会（公民社会

① 〔意〕安东尼·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1973），第258、227～228、16页。

和政治社会）有机发展过程中所有活动和功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①

最后，“总体性政党”具有特殊的政治录用功能和社会化功能。葛兰西认为“总体性政党”要实施“总体性功能”——“教育的”、“组织的”、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葛兰西认为，所谓“总体性世界观”的建立，实际上是“总体性政党”要使自己的世界观及思想纲领和政治路线为本阶级及全社会其他劳动群众所接受和拥护，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为一个社会“总体”力量，为建立“总体性国家”而行动。葛兰西认为，政党要系统地研究和发现决定自己阶级的本质的因素及其发展过程，并进行理论的和教育的活动。对于“总体性政党”，“问题的关键是指导的和组织的功能，即教育的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一个商人不是为了做生意才参加政党；一个企业家不是为了以较少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才参加政党；一个农民不是为了学到新的耕作方法才参加政党，……在政党中，经济社会集团的成员超越了其历史发展阶段，成为具有民族和国际特征的、总体性活动的代理人。”② 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报纸、杂志、电台往往是“总体性政党”实施“总体性功能”的重要阵地。“总体性政党”就应该努力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关键。在葛兰西看来，他们的社会活动构成了历史中精神、文化、知识和理论的能动作用的“中介”；“他们一存在就意味着一种社会总体性功能”，“或者说他们是社会总体组织和上层建筑复合体的‘功能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说：“政党只不过是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中（而不只是在生产技术领域中）精心制作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特殊方式。这些知识分子带有社会集团发展、生活和形成的一般特征和条件。……政党要精心制作自己的组成部分（那些已经产生并发展成为‘经济’集团的社会集团的成分），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完整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机发展过程中所有活动和功能的领导者和

①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awrence and Whishart, 1973.），第15～16页。

②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awrence and Whishart,, 1973.），第258，227～228页。

组织者。”①

“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探索与应用具有独特的方面，虽然其理论论述并不十分完善和精当，如他通常用‘社会集团’一词代替‘阶级’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政党的阶级性。把当时社会中的政党界定为‘总体性政党’，很显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尽管如此，葛兰西紧密联系当代社会实际，独创性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认为政党只是就其本质特征而言才是阶级的，而在通常的活动中，政党共同体表现为代表社会‘总体’利益，因而具有‘社会总体性’，成了‘总体性政党’，强调了政党在综合与协调各种利益方面的独特性，这是他对现代性政党理论最大贡献。”② 葛兰西强调“总体性政党”要建立“总体性世界观”，并努力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来实施教育、组织的“总体性功能”，使其“总体性世界观”及其指导下的产物——党的思想纲领和政治路线为全社会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拥护。这种“总体性政党”观是与当时经典现代性社会发展状况相一致的。

但是，“任何综合总是谨慎地、相对地、严肃地对待内部的多样性。统一性不能靠自身来超越多样性。”③ 时代发生的变迁具有不可逆性，不能预先进行设置，具有不可以用真理进行规划的多样性与特殊性。“由事件组成的历史既不是朝向一个终极目标的运动，也不是相同事实或相同循环的无限重复。它是随时间流动的纯粹连续性和多样性。”④ 如果企图为一个社会或为历史整体指明一个决定的原因或根本，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样，政党主宰国家生活，垄断一切资源而造成社会其他阶层、集团失去发展空间，由此必然引起社会各界或骤或渐的反弹与离散，驱使独大的政党逐渐分权予其他社会政治共同体，渐渐淡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势愈加明显。同时，掌控国家一切权力的独大政党本身的结构也不得不容

①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awrence and Whishart, 1973.），第15~16页。

② 赵宬斐：《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112页。

③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④ Aron, 1985 : “Three Forms of Historical Intelligibility”, in Truth, Liberty, ed. By Franciszek Drau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45.

纳异质因素。这类党国体制型政党在后现代性社会中，要必须学习与其他政治共同体和谐相处并与他们共同分享权力和政治资源，并为其他政治共同体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提供合理适当的政治空间。

二、“欧洲共产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

20 世纪中后期，欧洲政党为应对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转型，纷纷做出适应性变迁，或在理想目标、价值理念，或在党章党纲、方针政策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欧洲共产党，汲取了葛兰西的阵地战和市民社会的思想与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和“多中心论”，提出了“欧洲共产主义”以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发展模式；欧洲社会民主党，利用社会发展的转型，积极进行现代性反思，采取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理念，适时地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确立了一系列“中性”的理论和原则，以谋求更好地执政；其中，以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与“人民党”的推出与应变，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以“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等系列构成的“瑞典模式”最为世人称道。

1. **“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的提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欧洲共产党，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引起的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新形势与新发展，为摆脱一种固定的革命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提出了一系列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策略，并付诸于实践。这一新的探索政党发展模式的流派被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新词最初是由意大利的一位名叫弗拉内·巴尔别里的记者创造的。1975 年 6 月 26 日，弗拉内·巴尔别里在为米兰《新报》撰写一篇名叫《清算勃列日涅夫的时刻已到》的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近来，S. 卡里略（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阐明的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思想越来越定型了。它以西欧集团为支柱，而不那么符合莫斯科的

战略意向。"[①] 1975 年 6 月 3 日，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在巴黎演讲中，破天荒第一次使用了“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词。这样，一个新的术语正式诞生了，它被用来区分罗马、巴黎、马德里主张的社会主义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同时，对那些现有的模式而言，“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使用表明西方共产党“自主路线”的诞生。

1976 年 6 月底，欧洲共产党在东柏林举行会议。会上，贝林格说："有人把这些新的探讨和结论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显然不是我们创造的，但是，它如此广泛流传的事实本身就正好说明，在西欧各国，寻求并提出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来改造社会的新型解决办法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和普遍。"[②] 在大会后不久，西欧一些共产党相继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个新概念。“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

其实，早在 1946 年 2 月，第三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索菲亚的一次讲话中已指出，“各个民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不会走预先规定的道路，不会走向苏联一样的道路，而是各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这种方式取决于本国的历史、民族、社会和文化状况”，要“寻走我们保加利亚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后陶里亚蒂、多列士等共产党的党魁也发表类似观点。这些思想观点被看成欧洲共产主义的发端。1956 年，苏联、南斯拉夫联合发表《贝尔格莱德宣言》。《贝尔格莱德宣言》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其后东欧的独立倾向和中苏论战，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推动。1977 年 3 月，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三党总书记贝林格、卡里略和马歇三人在马德里举行了第一次举世瞩目的“欧洲共产主义”开拓者会晤。会后三国共产党总书记联合发表《通向民主和自由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联合声明。被誉为“欧洲共产主义宣言”的联合声明，首次提出了西欧国家“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并系统地提出了“欧洲共产主义”一系列基本主张：

---

① 〔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 页。

②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 页。

第一，各党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和自主地制定各自的方针政策；第二，主张建立多党制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同各种民主力量、教会力量进行对话，争取谅解与合作；第四，三党将在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国际主义团结和友谊；第五，反对军事集团，争取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没有军事基地的欧洲。这些原则的确立，表明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正式形成。马德里的会晤，向世界正式宣告了欧洲共产主义的诞生。欧洲共产主义将作为一支独立自主的政党力量，登上欧洲的政治舞台。

欧洲共产主义是战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产物。高科技的发展和白领阶层的增强，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欧洲统治阶级对工人的让步和福利国家措施，使合法斗争思想深入人心；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使暴力革命主张难以传播。当时，在世界上有 18 个国家的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其中在西欧 20 个国家的共产党中有 14 个。被誉为“欧洲共产主义”中坚支柱的是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另外有英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瑞士共产党、瑞典左翼共产党人、荷兰共产党、希腊（国内派）共产党、圣马力诺共产党、芬兰共产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冰岛统一社会党。在亚洲有日本共产党；在大洋洲有澳大利亚共产党；在拉丁美洲有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它们大多数是第三国际时期建立的老党，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相继走上了“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些党已遍及于四大洲，拥有党员 330 万，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的 75% 以上。他们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冲破大党中心主义、单一道路和单一模式的束缚，发展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政党力量。从此，“欧洲共产主义”便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股颇有影响的新思潮。

2. **“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来源。**“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和价值理念，主要来源于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共产国际的代表葛兰西

的阵地战和市民社会的理论以及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陶里亚蒂[1]的“结构改革论”和“多中心论”思想。

从1922年5月起，意大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葛兰西开始担任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葛兰西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就悉心考察和比较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在发生、发展、条件与结构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在1924年，他初步提出了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当走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战略思考。1924年6月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后，就以意共中央的名义批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专权独断作风，并要求共产国际就革命的具体情况应当尊重各国共产党并多与其商量办事。他多次表示反对共产国际作为“世界的党”，实质就是代表苏联共产党一家权力与利益的这种霸权行径。他极力反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唯苏联共产党马首是瞻，盲目服从整体利益和适应苏联党的要求，更不赞成苏联共产党党内对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的方式，以及把这种残酷斗争推广到国际范围的蛮横行径。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必须始终用民族的语言来阐明一个特殊的文化、语言和传统；国际主义的革命团结固然需要，但国际主义如果采用固定的、统一的模式在政治上是极其愚蠢和有害的。后来葛兰西又在《狱中札记》中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处理国际主义与本国民族特殊性的关系，提出了发展趋势是国际主义、但出发点应当立足于民族的卓越见解。葛兰西指出，意大利共

---

①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别名爱尔科里。出生于热那亚一个职员家庭。青年时代投身社会主义青年运动。1914年参加社会党，次年毕业于都灵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18～1920年先任社会主义报《前进报》编辑，后参与创办支持共产国际的周刊《新秩序》。1921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后，历任党中央委员、执委会委员和总书记。还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执委会书记。1922年任意共机关报《共产主义报》主编。1927年起先后在莫斯科、巴黎、比利时和瑞士成立意共国外领导机构。1937年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到西班牙支持民主阵线政府，反对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意资产阶级政府，先后任政府部长、副总理、司法部长等职。1948年任众议院议员，是意共议会党团主席。1956年提出“结构改革论”，主张在资本主义宪法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国际共运中主张实行“多中心主义”，反对领导党和领导中心，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主要著作有《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的战争生活》、《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团结问题备忘录》等。1965年苏联出版了多卷本《陶里亚蒂选集》。

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总的战略指导，但是这种指导必须符合民族情况，不影响意共独立的创造性的政策。如果仅仅尽义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那是不会有成果的。这种强调革命进程中自主路线的理论，对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的产生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在对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兴起与西方国家的革命衰败不振的比较中，葛兰西经过认真思考和探讨提出了与俄国革命迥然不同的新战略——阵地战的思想。对此，他作出如下经典式分析，他说："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个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的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屹立着一个强大的碉堡工事网。"① 这种碉堡工事网实质上就是葛兰西所谓的"市民社会"。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是指在一切思想文化领域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织和技术手段，如政党、工会、学校、教会、报刊、文化团体等；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是指国家压迫的机器，如法庭、监狱、警察、军队等。葛兰西认为，"政治社会"是行使暴力的地方，采取的是强制手段；而"市民社会"则是行使领导权的地方，采取的是说服教育的手段。他认为，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国家不仅是"压迫机器"，而且也是"意识形态机器"。正是基于对在现代性社会中，现代国家发展的全面、深入与系统地认识，葛兰西提出了西方革命应走与俄国"运动战"道路不同的"阵地战"道路。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一举成功，而应该坚持顽强的战斗，一个一个地摧毁资产阶级的内部堡垒和工事，夺取敌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阵地，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从而稳固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由于"阵地战"战略的基本思想对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是适用的，所以，随着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葛兰西这一思想自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是葛兰西对政党政治的发展的独创性贡献之所在。

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和"多中心论"思想，则把葛兰西的

---

① 昆廷·霍尔编译：《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 1978 年英文版，第 26 页。

“阵地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进一步深入化与具体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解除了斯大林设立的禁区，为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发展、摆脱苏共的控制创造了客观条件。当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严重动摇了各党对苏联政党体制模式的信念，各国共产党纷纷提出要走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所走过的道路，重新出现了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革命道路的热潮。此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在西欧各国共产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它进一步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与民主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反思。1956年12月，陶里亚蒂在意共八大系统地提出了“结构改革论”和“多中心论”的思想，并确定以这“两论”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他是继南斯拉夫共产党之后，欧洲共产党人中第一个对苏联持公开批评态度的人。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国家专政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最根本的观点，在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陶里亚蒂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说，“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①] 二是关于道路选择。陶里亚蒂认为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②]。他很看重利用议会争取斗争，他说，“我们可以谈论充分利用合法途径、甚至利用议会以实现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③] “必须赋予议会以充分的权力，使它不仅具有立法任务，而且具有它所应有的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职权”[④]。“要把议会权力确实地扩大到经济方面”。[⑤] 三是关于社会结构调整。陶里亚蒂认为要“摧毁这个最落后和最累赘的意大利社会结构，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不能够也不应该推迟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得政权以

① 参见陶里亚蒂1956年6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② 参见1956年12月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意大利共产党纲领声明大纲》
③ 参见陶里亚蒂1956年3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④ 参见《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⑤ 参见《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提纲》。

后”[①]；“建立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民主制度是同形成新的历史集团紧密地联系着，这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改变社会结构而斗争，而且是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②] 总之，陶里亚蒂的所谓“结构改革”就是“改变国家内部均势”，主要指，在保存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议会的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使新的阶级强行进入国家的领导。

陶里亚蒂在提出“结构改革论”的同时，针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又提出了著名的“多中心论”。陶里亚蒂针对当时社会发展变化情况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指出：“整个体系成了多中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再有什么独一无二的领导中心了。”[③] 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出现多中心，是因为苏联的经验不能解决各个不同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因为苏联模式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各国必须接受的唯一模式；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应该建立多中心体制。“这样就形成了具有不同方针和不同发展水平的不同据点或者不同中心”，从而就形成了多中心体系。[④] 可见，多中心是指社会主义道路和各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多样化。在谈到各国共产党内部，陶里亚蒂指出：“我们党内谈‘多中心主义’是为了强调不存在唯一的中心，从而强调各党在共同思想和共同斗争的基础上的完全自主，而不是为了要求建立各个区域中心。”[⑤] 陶里亚蒂坚持各党的独立自主、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国际团结、反对国际中心、反对照搬固定模式、反对分裂活动。这一切都为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

陶里亚蒂的上述思想在欧洲共产党人中立即产生了反响，各国党提出要对苏联官僚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实施苏维埃民主的方式进行根本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苏联共产党为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倾向，恢复苏联在世界共运中的领导地位，苏联领导人决意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

---

① 参见1956年12月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意大利共产党纲领声明大纲》。

② 参见《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③ 参见《陶里亚蒂言论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④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108页。

⑤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149页。

党会议。克里姆林宫想通过这样的会议进一步遏制各党的独立性，使它们按统一的总路线办事，重建共运的“一个中心”。但是苏共领导人的意图遭到了不少党的反对。1959 年 11 月，西欧 17 国的共产党代表在罗马开会，听取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报告，并发表了《罗马宣言》，称“结构改革”是反垄断资本的民主改革的新方针。1964 年陶里亚蒂在《雅尔塔备忘录》中，再次阐明了独立自主和结构改革的理论。“两论”的形成和发展，实际是对苏共“老子党”地位和苏联模式“典型化”的公开否定，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欧洲共产主义者”继承了陶里亚蒂的“多中心论”，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上，反对大党中心主义，反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一个“领导中心”，反对外来控制和照搬某种模式。卡里略曾说：“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宗教，不需要有自己的信徒与教皇、自己的信条和自己的不可或缺的中心。……它必须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根据每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和条件解决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同问题。要想通过干涉来限制多样性，这种愿望无异于企图挡住太阳。”[①] 1968 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和苏联侵捷事件，促进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1968 年 1 月，捷共中央选举倡议改革的杜布切克为党的第一书记，4 月，中央全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方案。他们推行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对西欧各国共产党颇具吸引力，获得了他们的有力支持，但是，却遭到了苏联共产党的强烈反对。苏联政府在 1968 年 8 月 20 日夜，公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用武力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这一事件激起了西欧各国的强烈义愤，17 国共产党公开表态支持“布拉格之春”，并发表联合声明进行抗议。这是欧洲共产党第一次联合抗苏，并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路线形成的标志。

欧洲共产主义在继承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宝贵的思想遗产的同时，继续进行富有创造性的革命理论探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

---

① 参见卡里略：《在罗马尼亚一次集会上的讲话》，1971 年 9 月。

提出了通过“第三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1981 年 12 月 30 日，意共在对波兰危机发表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通往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概念。他们认为，从 19 世纪末出现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到 1914 年这些党大多数丧失革命性，这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第一阶段；十月革命的胜利到 1981 年波兰事件后的意大利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展开的大论战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对西欧国家的革命已没有推动力了；自此西欧国家已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既不能走苏联的老路，也不能走社会民主党的老路，而要开辟能够适合西方社会特点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新路，即“第三条道路”。而直接倡导和设计“第三条道路”思想的则是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三巨头”——贝林格①、马歇②和卡里略③。他们认为只有走一条“独特的民主道路”，才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抉择。所谓“独特的民主道路”，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民主力量的广泛联盟，

---

① E. 贝林格（E. Berlingwer，1922 ~ 1984），出生于意大利撒丁岛北部萨沙里市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是一位律师、社会党议员和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他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15 岁时就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曾学过法律，后因从事政治活动而中途辍学。1943 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44 年 1 月，因组织反法西斯斗争，被捕入狱，5 个月后获释。在党内多年从事青年工作，曾经担任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书记处书记，以后还担任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从 1945 年起，一直是党中央委员，1972 年当选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他继承和发展了陶里亚蒂制定的路线，当年就提出同天民党实行“历史性妥协”方针。在主持意共中央工作期间，努力探索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民主道路”。1980 年 11 月后，调整战略，提出“民主替代”的新方针。1984 年 6 月 7 日在竞选演说中猝然发生脑溢血，11 月不幸逝世。他留下的重要著作有《贝林格言论集》、《波兰以后》等。

② G. 马歇（G. Marchais，1920 ~ 1997），出生于法国卡尔瓦多斯省奥盖特市一个矿工家庭。1947 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46 年至 1956 年，先后任法国总工会地方和省一级五金工会书记，法共雷诺汽车厂书记、南塞纳省委书记。1959 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年以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主管组织工作。1972 年法共二十大上当选为总书记。1973 年 11 月，发表题为《让我们说实话》一书，阐述了法共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③ S. 卡里略（S. Carrillo，1915 ~ ），出生于西班牙希洪的冶金工人家庭。童年时代就参加工人斗争，1928 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曾任《社会主义者》杂志编辑。1936 年任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同年 6 月加入西班牙共产党。1939 年流亡国外，先后任西共国际书记、西共政治局委员、希拉尔流亡政府部长。1960 年在西共六大上当选为总书记，并任党刊《我们的旗帜》总编辑。1976 年秘密回国。次年，意共、法共、西共三党总书记在马德里会晤后，发表《“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对“欧洲共产主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全面探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民主道路和国际共运中坚持独立自主路线的问题。

改造和利用现存的国家机器，逐步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的国家政权，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在寻找这条道路的过程中，“欧洲共产主义”政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欧洲共产主义者认为，通过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把议会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他们反对把民主道路简单地说成是议会道路，强调“低估或否认群众运动的作用，从而不管群众运动的问题，认为只有代议制机构的行动才是根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①] 同时，卡里略不同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谈到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治形式“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他说这句话“只有一半道理”。他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政治形式实质上是工人的领导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也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形式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必不可少的。

①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第四章　社会民主党的现代性探索与绿党的现代性纠错

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也在积极探索。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社会演变的实际情况对政党自身发展进行了现代性反思，通过了《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史称为《哥德斯堡纲领》。其推行的政策被冠以“瑞典模式”而倍受世人关注，成为西方社会民主党吹捧的典范。如何解决人类社会现代性发展陷入的生态危机，人们提出了诸多的思潮与理念作为应答，而绿色政治学及绿党的兴起，则把人们的反思进一步推向实践层面。由深绿到浅绿，现代的人类到底需要何种的政治生活？为此，绿党前瞻性地提出了一套纠正人类传统政治生活方式的更加和谐发展的思想主张与政治理念，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勾画出了一幅新的蓝图，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政党政治的现代性。

一、社会民主党的现代性变革

（一）《哥德斯堡纲领》与“人民党”的推出与应变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社会演变的实际情况对政党自身发展进行了现代性反思，通过了《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史称为《哥德斯堡纲领》。该党纲领宣布：“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

哲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终的真理"；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把"自由"、"公正"、"团结"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和"成为国家和生活的普遍制度"的民主，同时宣布"社会民主党已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①]。从上述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提出党的性质由"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变为"具有不同信仰和不同思想的人们的共同组织"，党由对工人阶级负责，发展为对全民族负责，这一重大转变表明德国社民党完成了从政治边缘到权力核心，从纯粹反对派到主要执政党，从工人阶级政党到（左翼）人民党的转变，在组织、纲领、决策机制和竞选战略等方面都进行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尝试。

《哥德斯堡纲领》的出台表明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历史上十分重大的一次转型，就是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的转型，它构建了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基本理论框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公有制、放弃工人党性质的党纲。在德国政坛的政治光谱中，社会民主党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显示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开放性。该党适时地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确立了一系列"中性"的理论和原则，并给社会民主党得票率带来了一路飙升，不仅突破了30%的大关，还在1972年超出联盟党达到45.8%，并使该党从1969年起连续数十年赢得执政地位。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其足迹一直可以追溯到1848年革命。在历史上的第一个百年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一个阶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个纲领党，有着鲜明的路线和方针；也是一个党员党，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无论遭受了怎样的打击和压迫，德国社民党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毅力和昂扬的斗志，不断成长壮大。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转型，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149～165页。

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要求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演变为一个包括广大公民阶层在内的奉行改良主义的全民党。决定这种身份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后实现了从一个长期在野的政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换的一个现实。为了实现这一角色的根本转换，争取选民支持上台执政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从1869年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纲领与章程》（史称《爱森纳赫纲领》）开始，到1989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纲领》（史称《柏林纲领》），再到2007年10月28日，德国社民党制定通过了《汉堡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先后通过了10个纲领。其中最具转折性意义的是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召开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纲领》，即《哥德斯堡纲领》。这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影响的纲领性文件。

《哥德斯堡纲领》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通过的纲领相比较，最本质和最突出的变化是提出了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这三大价值概念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纲领明确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根植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它不想宣布什么是最终真理，放弃了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宏大叙事式的意识形态斗争手法。声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政党，在党的理论信仰上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改变为信仰的多元性，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政治共同体。他们的一致性建立在共同道德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追求这种思想，那么，我们在短期内就会变成失去任何政治影响的宗派。”① 该党认为，作为一个全民党必须努力争取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支持自己的观点和任务，并使他们相信党的主张和宗旨的正确性。为此，党对于个人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或其他哲学动机都采取宽容态度，抛弃学理主义的狭隘性，才能保障自己发挥核心的社会主义领导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以“自由、公正、互助”作为社会主

① 赵永清：《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义的三项基本价值，就是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以价值社会主义取代制度社会主义，从一定程度上讲德国民主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就是伦理社会主义。“从基本价值上看，民主社会主义依然是一种典型的伦理社会主义模式。”[①] 这种判断应该说是基本准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基本价值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基本价值论在德国社民党党纲中的明确提出和确立，使以伦理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思想理论路线得以在该党内形成并巩固，这不仅对德国政党而且对其他国家的政党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阐释，在现代性社会日益变得复杂的背景之下，既不能以固定不变的模式来设想政党的纲领，也不能将具有约束力的组织模式和结构模式作为政党采取政治行动的指导方针，只能把政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当作规范化理念用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的改造。因此，社会民主主义不是一种制度替代，也不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专利方案，更不是可以输出的现成模式，而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领域来融合不同的政策方案。[②] 正如《哥德斯堡纲领》所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们的一致性建立在共同道德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基础之上。社会民主党努力追求一个体现这种基本价值精神的生活制度。

《哥德斯堡纲领》宣布社会民主党不再是工人党，而是人民党，虽然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一次明显转折，但它实际上并没完全放弃自己作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这既表现在其政策的倾向性上，也表现其工人党员和工人选民比例一直较高。比如英国工党直到 1966 年工人党员仍占党员总数的 69%，德国社会民主党 1969 年的工人支持率为 58%，挪威工党战后长期执政靠的是 2/3 的选票来自工人阶级。也正因为如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中屡屡出现反对党中间阶层化的现象，

---

① 龚加成：《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探索——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国际纲领与政策的演变》，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 页。

② 龚加成：《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探索——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国际纲领与政策的演变》，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 ~ 38 页。

并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社会民主党在德、英等国在野时间的延长，它的思路渐渐发生变化，新一轮向中间阶层靠拢的转型快速发展。这是一种典型的中间化理论，其最典型的代表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民之家”的主张及其实践。瑞典社会民主党是瑞典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也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社会民主党，并建立起令人称羡的“瑞典模式”。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产生的绿党提出的中性政治观，可以说是西方政党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一个经典范例。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相互排斥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方向发展。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向中间靠拢，左与右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博采众长的中间主义精神也日渐显现。应当说，面对社会发展变化要求和政党政治进化的趋势，执政党都被迫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务实地调整，当代西方国家政党逐步打破传统框框的束缚，其纲领和政策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包容性，其政治参与方式是温和的、渐进的和务实的，政党的原则性逐渐减弱，而工具性、实用性日益突出。什么纲领能够吸引选民，什么纲领就被采纳，各个政党都有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 政党在遭遇环境压力和权力吸引力双重影响下，对自身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出的一种新的补充、调整与选择，造成了西方政党为应对时代的变迁，积极促进其意识形态概念的滑移。

（二）“瑞典模式”的变革理路

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党始建于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亚尔马·布兰亭早年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总体上属于改良主义，并热衷于议会道路。社会民主党作为曾拥有100多万党员的瑞典第一大党，在国内民众中影响很大，在瑞典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其推行的政策被冠以“瑞典模式”而倍受世人关注，成为西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方社会民主党吹捧的典范。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阿尔宾·汉森接任主席，并于1932年组成其第一届政府以后，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瑞典模式的探索与建设。

1. **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瑞典模式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在这期间推行的福利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与基本理论依据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普遍的福利，因此，为福利所做的一切就是社会主义；进而又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福利社会主义源于当时瑞典社会民主党党主席阿尔宾·汉森对社会民主党传统思想的改造。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成立时，宣告自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党的任务是争取选举权和通过议会改变劳动者的处境，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其首任主席布兰廷虽然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却还把社会化看作是为实现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终极目标而进行的逐步、渐进的改良。汉森接任瑞典社会民主党成为该党的第二任主席以后，逐步以福利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取代了社会化的方针政策，不再热衷提倡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终极目标，从理论到实践彻底完成了向社会改良主义的演变。

汉森在1928年前后开始提倡社会民主党应自称为“人民的党”和建立“人民之家”的思想。他认为，为了使党赢得农民和中间阶级的支持、打开合作的道路，瑞典社会民主党应自称为人民的党，以使人民获得自由、为人民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如果把社会民主党局限在阶级意识形态方面，不利于党在现实中活动和实现党的目标。汉森把国家比作家庭，提出建立人民之家的目标，说如果瑞典社会要成为它的公民的好家庭，就必须废除阶级差别，发展社会照顾，实行经济平等，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民主。1929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给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实现“人民之家”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当时，失业工人几乎达到工人总数的1/3，罢工斗争不断发生，党内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应赶快实行社会化。但是，汉森却认为，危机还不意味着资本主义马上就要崩溃，他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充分就业、刺激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反危机纲领，

强调通过劳动市场和政治改革去实现经济平等，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反危机政策的出发点是“全体人民”，宣称民主是实现社会民主党理论的唯一秩序，强调了遵守民主的义务以及为群众的利益而进行阶级合作的重要性，结果使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选票104万余张，占总票数的41.7%，从此开始了其长达44年的连续执政。汉森组阁任首相后，当即提出按照团结、合作等原则来改造社会，奠定富裕的基础，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的方针，特别强调要关心近期目标，要用阶级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协的方式实现福利社会主义的目标，建成“人民之家”。为此，他以首相名义向私人企业主发出正式的合作邀请，又与代表大农场主利益的农民党进行合作，并采取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如扩大公共工程，给工人以相当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工资，向反失业措施和国家各类应急工程提供资助，放松对失业救济的限制，向各地的住宅建设、市政工程提供贷款，对私人企业提供贷款或补助，实行旨在对国民经济结构的模式加以指导的结构计划等等。汉森还改变了以往福利的社会救济性质，使之向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向发展，并实行一系列福利措施。这些措施在世界市场好转的大气候下获得了成功：生产增长、市场活跃、失业率大幅度下降，危机得到了缓和，人们把它与罗斯福在美国推行的新政相提并论，称之为“汉森新政”。在1936年开始的第二届汉森政府，进一步贯彻了社会福利政策：它不仅再次修改了养老金条例的法案，使医疗保险体制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开始全面实行普遍的家庭政策，包括给孕妇、母亲、儿童以一定的津贴，提倡结婚贷款，鼓励结婚和生育，政府的福利开支比上届政府提高30.2%。汉森政府还鼓励工会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在1938年签订萨尔茨耶巴德协议，规定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和机构。在汉森于1946年10月逝世后，继任者埃兰德继续坚持了他的福利政策，并提出要以“自由、平等、团结、合作”作为基本价值，实现一个充满“保障、自由、合作、团结与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并先后实行了比例选举制、公民投票表决法、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等等，使瑞典的社会福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是，由于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权力结

构和阶级差别，并没有消灭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系列弊病，因而随着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运动和新左派思潮的传播和扩展，福利社会主义的局限和弊端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益凸现出来。正是基于瑞典国内外对于福利社会主义的性质的怀疑，时任社会党国际总书记的汉斯·雅尼切克强调“已经出现了对旧价值旧信息的大怀疑，以及对旧的行动和处事方式的再思考”；“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来说，简单地宣称自己能够比自由企业的捍卫者更人道、更有效地管理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将证明在（20世纪）70年代只是一种日益失效的战略，富有政治觉悟的年轻一代，对60年代给社会民主主义留下的印记感到厌恶，这就是已经出现的危险的信号”。瑞典社会民主党决定进行“意识形态再思考”，在对福利社会主义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来取代“福利社会主义”。

2. **职能社会主义政策。**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把20世纪60～80年代初期实行的瑞典发展模式特征概括为“职能社会主义”。首先对“职能社会主义”提出新的理论概括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冈纳·阿德勒·卡尔松。1965年，卡尔松在向一批访问瑞典的拉丁美洲学生领袖介绍瑞典情况时，萌生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做出新的理论概括的想法，当即撰写和发表了题为《运行中的社会主义：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小册子，经过修订、扩充以后，他在1969年将它更名为《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以英文发表。从此，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职能社会主义”不但盛行于瑞典，而且对整个欧洲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为对瑞典模式的特征的一种新概括，职能社会主义不同于福利社会主义之处，在于它迎合新的时尚和思潮，把福利社会主义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做法，改变成为直接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入手，承认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从福利社会主义全面否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做法，改变成为主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结构内实行职能社会化的做法。卡尔松就通过否定正式社会化的办法来论证其“职

能社会化”的可行性和优越性。首先，完全的正式社会化不利于经济进步，“如果要在某个正在运转的经济中实行诸如完全的正式社会化一类过于剧烈的变革，那么经济进步就必然遭到挫折”，而且资本主义表现出有一种不仅能生存下去，还能进一步适应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民主条件的能力。而苏联的50多年的发展则证明，生产资料的正式社会化并不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充分条件，它甚至都不能有助于实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极不公正的状况的存在，变革又是必要的。卡尔松认为，经济组织的逐步社会化是可以取代正式社会化的，而且这是一种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选择方案。其优势在于：第一，在今天，正式社会化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变革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而在核时代，暴力的每次运用只是趋近最后毁灭。对于资本家集团来说，职能社会化向他们提供了他们所能够同意的一系列妥协，而正式的社会化向他们提出的只能是用革命代替核战争来毁灭他们。对于资本家而言，这两种结果是一样的。由于他们占有核武库，因而，要是对他们实行正式社会化，他们宁愿拉着整个人类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第二，正式社会化同革命相联系，而职能社会化同进化相联系，卡尔松把他提出的职能社会化比作斯堪的那维亚逐步剥夺其国土权力的办法。由于卡尔松的《职能社会主义》一书从所有权理论上概括了瑞典模式的经验和成就，因而它首先得到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和鼓励。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大都引用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中的一些说法来概括瑞典的经验。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林德贝克在《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所有权的意义完全是相对的，并且完全随各个国家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措施而定”，“在原则上，是能够通过把权力交给国家当局、雇员或者消费者的办法削弱到这样的地步，以致物质财产的所有权按经济权来说……同银行户头所有权不会有多大区别。”

卡尔松的《职能社会主义》一书的影响还远远超出了瑞典的范围，在短短5年内已连续再版16次，被译成7国文字在国外出版。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职能社会主义是被用来替代福利社会主义并对瑞典模式经验作

的新概括，并不是被用来替代福利社会主义而实行的新政策，正如有些人所说的，与福利社会主义相比，职能社会主义无非是对瑞典社会民主党传统理论的不同表述罢了，并没有对当时的制度进行根本性地改造。在对“职能社会主义”解释中，卡尔松写道：“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实证理论，职能社会主义取得的成果不大。”“我曾经认为，有可能剥夺资本家的一切重要职能，正如我们对待瑞典国王所作的那样，他今天仅仅是年老夫人们的谈话资料了。这当然只是色拉米香肠策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卡尔松又进一步指出：“如果确实存在过瑞典模式的话，那么它通过 1973 年的石油危机已严重受到震动，因此不管人们对社会民主党 44 年（1932 ~ 1976）执政的成果还会做出其他什么评论，这些成果是缺乏坚实基础并不能持久的；随着经济的日益国际化，特殊的瑞典模式倾向于同普遍的资本主义西欧模式相融合。人们不能说，在瑞典存在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除非人们真正打算把概念搞乱。”随着“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基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崛起。

3. **基金社会主义政策。**“基金社会主义”，最初是因为在 1983 年底瑞典议会通过建立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而得名，随着这一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而逐渐被人们所关注和了解。

由于“职能社会主义”主要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对瑞典模式进行重新概括，但是，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福利社会主义”所固有的种种弊端，这就使瑞典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陷入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因而催生了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瑞典议会通过建立的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为标志的“基金社会主义”。1983 年 12 月 21 日，瑞典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两项法令：《利润分享税法》和《全民保险养老基金有关规则法》。但是，作为瑞典模式第三阶段的“基金社会主义”企图对私有制有所触动，从而促使资产阶级各集团联合起来，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发动反攻，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却因为在意识形态、政策纲领和政治战略上都没有做好向私有制提出认真挑战的准备，因而终于没有逃脱连议会通过了的法案都被资产阶级所

推倒、“基金社会主义”遭到废弃的厄运。

瑞典社民党的发展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1889年成立到1932年是社民党赢得普选权到上台执政的初始与探索时期。第二阶段1932年到1976年是社民党连续执政、创建瑞典福利社会的时期。自1976年到现在的30年，主要是其调整政策、再谋发展的时期。在第一阶段，该党理论上处于探索时期，曾三次修改党纲。第二阶段是其理论成熟与发展时期，对党纲也进行了三次修改。第三阶段它曾于1990年和2001年两次修改党纲，主要进行理论总结与革新。总起来看，其党纲的修改过程就是社民党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了它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瑞典实际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轨迹。其第一份党纲是在1897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份党纲庄严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它政党，其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纲领指出，“当今文明的种种弊端的主要原因在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然后把所有生产资料——运输工具、森林、矿山、车间、机器、工厂和土地等全部改造为社会财产”。这份党纲，不仅观点上而且语言上基本上照抄了著名的德国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而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这在该党于2001年11月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八份党纲中有鲜明的体现。新党纲的某些理论观点与政治主张虽不同于旧党纲，但其基本主张沿袭了过去的精神，没有原则性的变化。

在社会党国际所属各党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占有特殊的位置，因为它在20世纪两次连续执政的时间，加起来就超过半个世纪；其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和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中更是首屈一指。瑞典是一个人口只有800多万，面积不过45万平方公里的北欧国家，然而，在一段时期里，它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却超过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重的4倍，出口超过9倍，所提供的机器和设备超过14倍；就业率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长期保持1%到2%的低失业率，在人均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保健、教育、环境保护和其它指标方

面，都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二、绿党的现代性纠错

如何解决人类社会现代性发展陷入的生态危机，人们提出了诸多的思潮与理念作为应答，而绿色政治学及绿党的兴起，则把人们的反思进一步推向实践层面。由深绿到浅绿，可以说是绿党应对现代性生态危机中完成的一种僭越性的跳跃，这表明绿色政治学的重大转变并没有发生在激进意识形态范式的根本转变上，而是出现在宽泛与务实的政策领域中，这种从价值绿化转向政策绿化的转变，可以说是绿党及其绿色政治学理论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一）欧洲绿色运动与绿党的产生

绿党是20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生态运动的发展而出现的左翼政治组织。经过近30多年的发展，绿党从单纯的、激进的环境保护力量发展成为在欧洲政坛和社会中占有重要席位的政党。20世纪末以来，德国、芬兰、瑞典、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绿党组织先后入阁，欧洲十几个国家的政府中一度都有绿党成员。法国绿党在2002年大选中得票甚至超过了共产党。2004年，在欧洲一些国家中，绿党还建立了统一的地区性组织——欧洲绿党。欧洲绿党包括29个国家的32个成员党。新成立的欧洲绿党将继续坚持其传统的政治路线，致力于发展一个生态合理和社会公正的欧洲。

欧洲绿党的一个现实任务是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提出共同的选举纲领，以期赢得选举的胜利。早在1979年，当欧洲议会第一次实行直选时，各国绿党就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由于绿党刚刚兴起，影响力不够，加之人们对其政治理念和政策关注不够，绿党的候选人没有进入欧洲议会。到了1984年，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绿党开始进入议会，与其他一些议会成员组成了“彩虹党团”。在198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意大

利和葡萄牙的绿党第一次进入欧洲议会。1994 年，卢森堡和爱尔兰的绿党也第一次进入欧洲议会，同年德国绿党在欧洲议会中取得了 10.2% 的支持率。1999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几乎所有的绿党都取得了好成绩。正如当时德国外长费舍尔所言，理想与目标虽然好，但要务实要追求参与执政，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2004 年新建欧洲绿党的纲领性文件谈到了他们的追求目标：

第一是保护环境。首先是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健康和拥有放心食品；其次是改变能源政策，使各国政府遵守“京都议定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建立高效率低污染的交通体系，要征收导致污染的“生态税”等。

第二是为社会尽义务。绿党的核心任务是为欧洲所有公民提供一个具有社会保障和生态保障的生存环境。主张在社会和就业政策中要考虑妇女的利益、家庭和职业间的协调、保障残疾人的就业和参与公众生活的权利，主张普遍的医疗保险、公正的养老金、接受良好教育权利等等。

第三是扩大民主。要充分保护公民权、人权、妇女权利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第四是从下层开始实现全球化。强调欧盟必须在当今不公正的全球化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欧洲绿党坚持在贸易活动中应当考虑社会和生态标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欧洲社会掀起的这场新社会运动，既包括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也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等运动。随着这些运动的崛起，“其中许多政治力量与社会民主党相互竞争。人们感觉到，现行政党和组织无力适应这些新事业，这就致使那些持有这样价值观的人组成了自己的政党，如绿党。”① 伴随着这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的绿党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它成为这场绿色政治运动的核心力量，并很快成为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党派，同时也根本转变了人们对传统政党政治的理解与看法。1973 年在绿色政治的

① 史志钦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政党变革》，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2 页。

发源地欧洲出现了第一个绿党——英国的人民党。1979 年，第一位绿党国会议员在瑞士产生。1979 年出现了西德环境保护者组成的政党——德国绿党。德国是欧洲第一个正式意义绿党的诞生地。到 1983 年，西德绿党的注册党员已达 25222 人，追随者逾 200 万，并在当年的大选中成为第四大政治力量。1987 年，西德绿党在十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已获 8.3% 的选票，在 1995 年大选中赫然成为第三大政治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希腊、爱尔兰、卢森堡、瑞典、瑞士等相继建立了绿党。从 1981 年起，西欧绿党开始进入各国议会与政治结盟。1984 年，绿党代表进入欧洲议会，在欧洲议会选举前通过的《欧洲绿党联合宣言》和《巴黎宣言》中，欧洲绿党（重建后的"欧洲绿党协调"或"欧洲绿党"）第一次明确阐述了该党关于欧洲的基本观点与政策主张。[①] 在简短文件中，绿党批评了欧洲的非生态现实和经济社会中的集权结构，要求人类与其他自然存在、社会贫富阶层之间关系的重建，并重点强调了和平与防御、农业、反核能、可持续经济、妇女权利与人权等。另外，绿党主张，要想以一种绿色观点改变欧盟的结构、目标、政策和工具。这表明了欧洲绿党对欧盟的总体性态度和欧洲议会在其中作用的看法已发生了重要改变。欧洲绿党公开宣称，"绿党支持欧洲一体化。欧盟——尽管其存在许多值得批评的地方和并不能独立完成欧洲的一体化——将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因素。"[②] 显然，欧洲绿党已接受了一种"从内部改革欧盟"的现实主义政治战略，并将欧洲议会作为主要的制度参与渠道。绿党主张一个扩大的欧洲公民权以便更好地保护生活在欧盟中居民的基本权利；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从而增加欧盟的民主合法性。借用绿党自己的话说，其目的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尊重基本人权与环境正义的社会"、"通过非集中化和公众在相关政策决策中的直接参与来深化民主"；"绿色方法"是"激进的、现实主义的和改革主义的"，而"绿色价值"是"团结、革新、独立

① See Sara Parkin, 1989: "Green Parties: An International Guide", London: Heretic, p327 ~ 330.

② The EGP, European Elections Manifesto of 1994, p29.

和开放”。[①]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洲绿党支持欧盟的公平扩大、一个独立而内在一致的欧洲外交政策和新签署的欧盟宪法。环境保护和其他议题也有所论述，但它的重点明显是欧盟的扩大及其相应的职权扩展。应该说，这些政策主张体现了欧洲绿党将其政治形象从一个单一议题党，扩展为更全面的泛左翼政党的持续努力。欧洲绿党在200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权力结构，即“欧洲绿党——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党团——成员党”。从理论上说，这会导致一个组织更完善的政党联盟机构、一个更加平等的政党联盟及其成员党间的关系和一个强化的对议会党团的政党控制。

（二）绿党政策的调整：由深绿到浅绿的僭越性跳跃

20世纪是主体扩张和理性蔓延的社会，主体的扩张导致“人”之外的一切成为对立的客体，理性的蔓延将人类带入了因经济和技术进步而产生的人为风险社会。而在这个风险社会里，随着“人”的淫威膨胀，自然不再是人的家园而成为掠夺与践踏的对象。生态批评家克力斯多夫·梅内斯在《自然与沉默》中对此深表痛惜，他认为在人类咄咄逼“人”的淫威下，自然已从“万物有灵论”的在场转换到象征性的符号在场，从“会说话的主体”转变成“沉默的客体”。针对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和紧迫性的生存危机，绿党认为不但应当把解决的对策与方法上升到制度和结构层面给予批判和回应，而且已经尝试从现实生活实际中给予针对性地解决。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出现的中左政府联合执政浪潮及与之相伴的“红—绿联盟”就是绿党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从此，绿党实现由群众性基层运动转向了传统绿党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红—绿联盟”中的“红”就是“红党”（Red Party），在西方政党政治中主要指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左翼，以批判资本主义、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其政党组织的核心内容。“红党”认为要实现自然的绿化、经济的绿化，其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实现政党的绿化、权力的绿化

① The EGP, Green Strategy for the 1999 European Elections. p3.

以及心灵的绿化。这类左翼政党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同生态危机联系起来，并把社会主义理论与解决生态危机联系起来，成为“红党”走向政治生态化的时代选择。“绿”就是“绿党”（Green Party），是以生态问题为核心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政治观念、政治组织、政治规范的政党组织。“绿党”的基本主张是生态共生、基层民主、社会正义、世界和平。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治理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生态政治化成为“绿党”在当今生态危机面前的政治选择。

西方许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最新的党纲中把“绿色”条款置于中心地位，来“绿化”红色政党的经济纲领，并要求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红—绿联盟”。从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共产党率先提出“红—绿联盟”的设想，到1998年德国“红—绿联盟”的胜利，左翼的“红—绿联盟”战略经历漫长的努力进程终于结出了硕果。“红”、“绿”双方在反资本主义体制这一基点上找到了批判的共同兴趣点和政策支点，从而结成文化批判的同盟军和政治联盟中的伙伴。从某种意义上说，“红—绿联盟”既扩展了自身内部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脉，也标志着绿党活动向泛绿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说，主流绿党不仅在政治上谋求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左政府，实现红绿联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绿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识形态，迫使整个政治景观出现泛绿化，客观上推进了政党政治的“绿化”进程。

1. **深绿的突进**。绿色运动虽然起源于经典现代性社会中，但其主旨是反对工具理性主义，在性质上应当属于后现代的社会运动。绿色运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社会基础——新中间阶层的后现代价值取向；而对现代工业社会官僚体制的不满、拒绝和抵制的新一代青年则是新中间阶层的典型代表。随着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演进，西方社会还会持续地发生社会分化，其社会结构仍在嬗变的过程中，这必将使绿色运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与增强。作为20世纪后30年新产生的社会运动，已压倒了传统的工人运动成为21世纪西方社会动员中最广泛最有前途和生命力的运动。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绿色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深绿”色的。例如，流行的生态基要主义（生态原旨主义）、生态中

心主义（简称生态主义），都属于“深绿”范畴。深绿理论的一方面是主张对现行政治、经济、社会实践作根本的变革，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公司体制是一种为了经济利润而剥削他人和自然的，鼓励竞争的、贪婪的、追求无限增长的体制，这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极不协调。深绿理论的另一方面是主张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中央集权一元政治，目的是取代工业文明整体架构，建立无等级、无中心、泛道德的生态社会。从本质上看，深绿理论是一种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主张“动物权利”与“生物权利”的理论；强调生态先于一切，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放弃“人类尺度”，集中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否定经济增长论。这也表明：“在激进绿色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阐释以及它就业已存在的极度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所提出的各种替代性方案中，我们将听到更多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声音。”①

2. **浅绿的回归**。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绿色运动的哲学理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上，渐渐形成共识，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标志着绿色运动的哲学理念已经从“深绿”转向“浅绿”。“深绿”的激进观点与激进做法，随着理性主义思潮的抬头，开始变得温和、宽容与开放，并逐渐朝寻求多方共赢的方向发展。在转变过程中，这种哲学理念逐渐被绿党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之中，即绿党坚持把扩大民主、保护公民权、人权、绿色价值批判等理念，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得以实现。在此期间，绿党组织数量得以迅速增加。自从 1973 年欧洲第一个绿党“人民党”在英国诞生，绿党就开始在欧洲政坛异军突起。1979 年至 1980 年初，瑞士、比利时、西德等国绿党先后进入国会。不久，在欧洲，大多数绿党进入地方性政府和议会，政党政治成为生态政治运动的主体。1998 年起，绿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结盟成为德国执政党，开辟欧洲绿党执政的新时代。近些年来，绿党发展更快，填

①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29 页。

补了主流政党留下的政治真空，从而使自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主流政党理想的执政伙伴；随着绿党的逐渐强大，绿党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冷战时期，各国绿党虽然有共同的理念，但是并不互相联合，大都局限于本国事务，仅仅是设立了西欧生态团体协调局；冷战结束后，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洲各国绿党希望以新的组织形式将其扩大到整个欧洲，加快了国际合作的步伐。1993 年，欧洲绿党联合会成立，宗旨是建设环境优美、社会公正的欧洲，并同其他大陆绿色政治组织联系，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即“绿党国际”。2004 年 2 月，来自欧洲 29 个国家的 32 个绿党组织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欧洲绿党（EGP）成立宣言，成立第一个统一的欧洲政党。新成立的欧洲绿党将继续坚持其传统的政治路线，致力于发展一个生态合理和社会公正的欧洲。

绿党提倡以组织性代替民间性，以制度性代替运动性，努力进入主流政治之中，坚持从更宽泛、更务实的视角提出政策。其一、政治立场：从激进退回到温和。虽然绿党依然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是基本改变了过去对现存制度的根本否定态度。2004 年欧洲绿党的成立，从它的奋斗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制度性批判目标已经整体退场。其二、纲领主张：从理想回归到现实。欧洲绿党不仅立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社会的理想模式。而现在的绿党在政策定位上力图融入到社会的主流思想中，他们认可市场经济，主张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些都表明其政策主张中理想或浪漫化成分逐渐减少，在做法上一步步务实。其三、组织原则：从分裂到合流。绿党曾经强调在思想上与传统政党彻底划清界限，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危机有关。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绿党逐渐改变了对传统政党的看法，以求扩大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

（三）绿党政治发展的时空转向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绿色政治理论不再单纯地“关注生态”，而

是转向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来推广其绿色政治理论与思想，坚持从自然中心主义向人类中心主义的部分回归，认识到人类思维不应走极端，保护环境必须“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应以“人类利益”为尺度。传统的左右两分法的政治判断标准也无法将新社会运动涵盖进去并加以制度化。为此，绿党提出中性政治，从“非左非右”到“绿”联盟，要建立一个生态平衡、无暴力、无剥削的社会，绿党的政治哲学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左一右”派别，确立了不同于传统政党的生态政党形象。绿党政治发展的时空转向表明其谋求进入权力中心的意识增强，并不断进行角色转型，把实现进入议会、参政、执政作为重要目标，因而对现存制度的批判锋芒减弱，对政府的质疑态度发生很大变化，希望通过上台后在政府决策与施政过程中来施加自身影响，走建设性的环保道路，并实现自己的长远奋斗目标。正基于此，欧洲绿党逐步改变了只作反对派的传统立场，而更加注重在现行体制内活动，扩大影响。两极化的意识形态逐渐为“合作政治”和“共识政治”所取代。

由“深绿”向“浅绿”的淡化与减色，绿党放弃了一些原来的政治特质，努力驾驭着策略让步与原则妥协、现实趋近与理想变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各国的政治角逐，力图为人类提供更为宝贵的政治财富。

1. **在政治立场方面：从激进到温和。**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深刻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生态危机的必然性，仍然是绿党政治的重要的理论内容。但是对资本主义文明不再给予根本否定，绿党在政策定位上力图融入到社会的主流思想中，以求扩大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他们认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主张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虽然绿党依然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立足点在于改造而不是代替，基本上改变了过去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根本否定态度。现在，多数绿党已不大提及制度性目标，而更加关注改造。2004 年欧洲绿党的成立，在它的奋斗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制度性批判目标已经整体退场。

2. **在纲领主张方面：从理想化到现实性。**欧洲绿党不仅立足于对当

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社会模式，具体体现在纲领方面的调整：一是在政治上，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放弃了自然中心主义思想，力图在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为此形成了一套更加完整、系统的政治理论体系。在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方面，更加重视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社会变革的途径方面，既坚持“非暴力”原则，又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二是在经济上，主张用“社会生态经济”模式取代现行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要积极吸取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在如何推进“社会生态经济”模式发展时，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和主张：比如强调为实际需要而生产，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产品性能；采取严格的环保措施等等。他们强调经济理性，从单纯追求增长和创造利润到满足人们必要的需要，减少浪费和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在社会变革上，既坚持“非暴力”原则，又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强调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新的生活范式。现在，欧洲绿党在政策定位上力图融入到欧洲社会的主流思想中，他们认可市场经济，主张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些都表明其政策主张中理想或浪漫化成分逐渐减少，在做法上一步步务实与温和。

3. **在组织原则方面：从决裂到合流。**绿党曾经强调在思想上与传统政党彻底划清界限，这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危机有关。一方面，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使人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了；另一方面，尽管资产阶级高唱“历史终结论”，但人们又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平等、低效率的现实感到不满，产生失落感。这样，自我标榜既非“红”色，亦非“白”色或“黑”色，而是一种“绿”色的生态政治的出现也就正常了。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党逐渐改变了对传统政党的看法，以求扩大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获得欧洲主流社会的认同。两极格局终结后，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有更多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脱离原来的党，纷纷加入绿党，使绿党分化为红

色绿党与绿色绿党。与以前相比，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即积极投身于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党政治。绿色运动组织形成政党以后，更加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投身于全球化进程中，尤其热衷于全球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绿党还积极投身于选举，获取公共权力，谋求执政地位。各国绿党都一再声称，他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是前瞻派，其主要目标就是获得选民的理解与支持。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欧洲出现的中左政府联合执政浪潮及与之相伴的“红－绿联盟”现象，使绿党的斗争主题从单纯的群众运动转向了传统绿党最为拒绝的复杂的政党政治。绿党运动进入政党政治的框架，其民间性、社会性有所降低，而官方性、政治性色彩有所加重。

4. 在角色转变方面：从超越到参与。以绿色政治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的突出特征是政治主体不是以阶级为纽带，而是包含着广泛的社会层面。它既代表了新的中间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利益和愿望，从而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也吸引了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如妇女、移民的广泛参加，因而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政治主体的转换必然导致政治主题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绿色政治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则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阶级界限。它不再像传统政治那样以彻底解放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为最高目标，而是主张按照生态要求重新确定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更加强调建立在非物质价值基础上的生活质量，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新的意识形态抛弃了过去的宏大阶级斗争思维，而更加关注身边的具体事务。尽管绿党一再标榜自己是“反对党”，但并不是仅仅充当一名搅局者，而是以政党的形式出现并参加议会选举，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按绿党自己的看法，走议会民主的道路，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不是强化和加强议会民主制度，而是要通过“卷入”来改造和弱化这一制度，走进制度是为了超越制度，参与制度是为了建构制度。

5. 在国际政策方面：从单一性到全面性。绿党成立之初，其国际政策最突出的是和平与反战，强调全球的生态整体性联系和相互依赖，主张各国合作，而不是争夺和对抗。主张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

政治稳定，缩小南北经济差距，这就大大增加了世界和平的基础和可能性。目前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生态威胁面前没有国家利益，而只有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维护“地球村”的安全是各国共同的责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绿党继续巩固和平政策，赞成多边主义和裁军。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希望欧洲远离这类武器的威胁。他们主张积极捍卫人权和民主、社会和生态价值的自治和团结的欧洲对外政策，进一步推动公正的全球化。绿党放弃了一些原来的政治特质，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宗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各国的政治角逐，这极大地提高了在现实政治中的参与绩效。绿党一直在努力驾驭策略让步与原则妥协、现实趋近与理想变卖之间的关系，力图为人类提供更为宝贵的精神。一是绿党依其对生态环境关心为核心的新政治议题的强调和基于生态哲学观的生态激进政治宗旨，确立了绿党不同于传统政党的生态政党形象，确立了欧洲当代政治冲突和政党格局中的绿色向度，政治思维与选择也就由传统的左右轴线的平面性质改变为左右轴线与上下轴线交叉的立体性质。二是绿党政治向度是一个左翼倾斜的向度。正如托马斯·波格特克（Thomas Poguntke）已经指出的，绿党的政治范式和政治目标都不是纯粹异质的或纯超越的，而是与传统政党特别是左派党有着更多的联系，表现在政治格局上就是新政治向度和左右向度并不是垂直的而是向左倾斜。现在，绿党更多地是进一步承认全球合作或全球管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在谋求多样化的基础上强调“全球责任”作为基本的价值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并在区域化的基础上重塑全球秩序。

（四）时代课题：政党如何容纳绿色政治

对欧洲绿党政治性质的理论分析，还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容纳绿色政治以丰富和充实当代政党理论的时代课题。笔者认为，当代政党制度对绿色政治的吸纳可以有两个基本切入点：一是在理论方面，实现作为构成政党制度的主权在民、以权利制约权力，保障政治主体各项权利的核心观点与后现代生态政治哲学的对话与融通；二是在实践方面，努

力探索符合每一个政治共同体以及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平等、协调的生态型政党发展模式。

绿党认为，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政治的发展与人类和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为此，绿党一直坚持通过实践来推动政治生态化。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其实，这是一种“民主制度的生态延伸”。[①] 这样一来，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绿党认为，在组织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的情况下，追求的治理应是一个上下互动左右结合的动态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权力流向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政党治理是指政党引导各种机构管理公共事务，主要作用是调和各类矛盾、协调各方利益，达到社会正常和有序运转的目的。通过治理政党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政党充分尊重各个政治主体的平等与自由，并在政治生态环境中，与其他的主体之间保持一种合作、协商、对话的关系，从而推进一定范围内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这些主体不仅仅包括政党组织，还包括其他的一些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

绿党还非常注重强调基层民主原则，绿党认为传统的政党政治已和大资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上层决策者们由于其官僚化和等级化的组织结构与下层党员和群众相脱离，失去了社会责任感，无法再代表下层群

---

① 〔德〕乌尔利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生存问题、社会结构与生态启蒙》，梁展选编：《全球化话语》，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76 ~ 77 页。

众的利益和愿望。科尔曼乐观地表示："社群是自立经济活动的基础，是政治生活的根基，也是生态社会的根基。正如基层民主使生态型生活成为可能，社群为这种生态型生活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家园。"[①] 只有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并把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公民才能"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挑战非持续性"；才能有资格也有能力"介入政治以及其他形式的抗拒和反对环境恶化的结构性原因与不可持续性实践的非环境因素的斗争。"许多生态政治学家相信，一旦当生态决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格能为所有将受到该决策影响的成员平等享有，并且这些成员能积极地参与决策的过程时，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对生态问题予以"切身化"的理解，而且能够激发人们正确处理这类切身事务的实践能力，并提出与之相符的政治、经济方案。在欧洲绿党看来，欧洲现行的议会民主和政党竞争已经阻止公民的政治参与并导致政治失望，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应大量引入政治自决、直接民主等手段来克服。绿党认为，未来民主制度的理想形式，是一种非集中的、以社区为权力核心的、内部团结合作和直接民主控制为主要手段的基层政治。

现代的人类到底需要何种的政治生活？为此，绿党前瞻性地提出了一套纠正人类传统政治生活方式的更加和谐发展的思想主张与政治理念，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勾画出了一幅新的蓝图，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政党政治的现代性。绿党的横空出世，是针对人类政治生态域中出现的困境而提出的现代性纠错方案的一种尝试。人们有理由相信绿党会在实践过程中，重新审视民间运动与组织和传统政党之间复杂的现代性关系，充分调用人类的智慧，做出满意的解答。

---

① 〔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5 页。

第五章　欧洲社会转型中政党的现代性变革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影响下，各种反体制运动此起彼伏、潮起潮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最具典型；这场运动后不久，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又掀起了新社会运动，以非传统方式形成了对传统的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严重冲击；1998年以来，西欧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再一次使社会陷入动荡与危机之中。上述三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西方在走向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必然反映，充分彰显了战后政治的不确定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特点。这段期间，现代性社会在转型调整的过程中，又迈入了信息网络与风险社会发展阶段。随着网络政治学的兴起，必将在传统的政治参与、传统的政治管理组织体制以及传统的政治知识的传播、交流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为应对社会运动可能对政党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网络与风险社会发展造成的挑战，如何更好地提升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适应性能力，U. 贝克、吉登斯和Z. 鲍曼等学者纷纷提出了建议与对策，他们认为政党要调整传统政治功能，借鉴和吸纳亚政治、生活政治或共和政治等治理模式，以应对传统政党政治可能遭遇的风险与危机。把政党政治置于现代性风险社会中去考量，的确是人类化解风险的一个重要路径与维度。在风险境域中，人们因政治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和差异而产生诸多冲突，往往借助于现代政党进行调解和整合；而政党在规避和化解风险中，如何既能秉持合法性与世俗化的价值原则，

适时调整、修缮和整合传统的话语叙事，又能够创建新的适合全球化、信息化发展要求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风险社会中出现的“民主的新理由”所带来的问题关键不是抛弃政党政治本身，而是实现政党执政模式的根本转型，使之更好地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与风险化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特别是在网络空间中，积极通过网络所开发和聚积的新政治资源和能量，来补充现有政党制度政治资源的匮乏，同时要积极改造既有政治框架，应对实体政治与虚拟政治的博弈，关注网络政治发展，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在网络场域中的风险意识。

一、一场丰衣足食的运动带来的现代性震荡

20 世纪 60 年代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代。在此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实行由“福特主义”[①] 向“后福特主义”[②] 的转变，以实现第二次现代化；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则大力实施以“福特主义”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以中国等刚刚获得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代表，则第一次实行现代化，刚刚迈进工业文明时代的门槛。在这个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在追求现代性发展模式过程中，正处于自我的深刻转型和相互的激烈交锋的非常时刻；期间，又夹杂着第

---

① 福特主义（Fordism）这一词最早起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他使用“福特主义”来描述一种基于美国方式的新的工业生活模式，它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较低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的刚性生产模式。按照调节学派的观点，福特主义关键性的基础是从一种粗放型的资本积累战略，其特点是以大规模生产方式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表现为大规模生产、大量消费和国家福利主义，是一种向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密集型资本积累战略的过渡生产模式。

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后福特主义（Post - fordism）、新福特主义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发展的最新描述与概括。这些新概念不仅逐渐被引入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如地理（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而且也渗入到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领域。后福特主义是指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它生产、消费、组织构成等方面具有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特征。

三世界国家为谋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建构的反复的曲折与探索，使20世纪60年代显得与众不同。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不但是激情迸发、动荡不安的年代，而且是一个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释放的年代。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十分奇特而又重要的时代，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评价道，20世纪60年代，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充满了激情与幻想。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呈现出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错勾联，导致了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向。过去惯于在左翼或右翼坐标中进行思维和决策，以强调阶级冲突和阶级认同的宏大政治话语逐渐失去了合法性。这为西方政党的现代性转型与发展提出一个思考：西方政党如何调整与改变自己意识形态的最初出场形态，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现代性社会需求？显然，这是关系到西方政党如何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一场丰衣足食的运动

二战后，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物质财富得到了巨大的累积。当人们过着衣食无忧生活的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场域，却展现给世人一幅奇特的景观：在后现代主义、个性解放、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影响下，学生造反、工人罢工、反战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体制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这些思潮与现实运动交相激荡，猛烈地冲击着现实社会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以1968年震动世界的法国学生运动为典型代表。这场运动可以说是一场丰衣足食的运动。2001年，法国学者德里达曾经这样评价道：“60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在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向世人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理念：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正处于由第一次现代性向第二次现代性转变的反反复复调整的过程；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主要采取政党主导型的整体推进式的计划经济方式，但各国共产党在如何看待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认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如何认识社会主

义、如何认识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也日益激烈；而属于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后，在探索建设与发展模式，以适应世界发展变化的需要也遭遇到诸多困惑与挑战；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中国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从爆发的原由以及全过程来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充满了神秘、惊诧与痛苦。可以说整个事件呈现出：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热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的本能性拒斥等特征。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美国，一个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民间组织，于1962年6月在密歇根州的休伦港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休伦港宣言》。《宣言》公开批评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一种“没有公众的政治”，宣称美国的公民时刻受到一种他们所不知道的力量的威胁。《休伦港宣言》一出台，立刻对当时的美国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事件也标志着美国新左派组织的正式形成。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年之后，1963年6月12日，密西西比州一位民权黑人领袖遇害，随即成为全国性抗议运动的导火索。随后，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此起彼伏，演绎得轰轰烈烈。一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到1965年夏季，达到高潮。1968年1月至6月中旬，在反战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共发生221起大规模游行示威，遍及101所大学，有近4万学生参加。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占领学校，一些学校的学生在校内建立“解放区”。1968年4月4日，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标志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非暴力战略的终结，愤怒和绝望的黑人掀起的动乱大潮旋即席卷美国40多座城市。自此，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欧洲的一系列的抗议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从1967年开始，意大利都灵、

比萨、那不勒斯等城市学生反对现行大学制度的罢课演变为占领大学的风潮，至1968年已发展到与警察发生严重的对峙与冲突；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1967年6月领导的学生运动，使全国多所大学陷于瘫痪；而在亚洲的日本，东京大学为抗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开始宣布无限期罢课。至1968年1月，日本已有116所大学先后举行罢课。东京大学等大学的学生与冲进学校的警方进行长时间的紧张对峙。

1968年5月，发端于法国的学生运动迅速把全球学潮运动推向高潮。在法国巴黎，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在1968年5月10日这一天，终于酿成震惊世界的“街垒之夜”事件。当时，整个巴黎烽烟四起，处处街垒。一位学生领袖声称：“今夜街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整整一代人在反抗某种社会制度。”随后，工人和市民也自觉地加入到这场波澜壮观的伟大运动之中，至1968年5月28日，总人口5000多万的法国有1000多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在“五月风暴”中，学生、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中高举着胡志明、格瓦拉、毛泽东的画像。法国已处在革命的风暴之中。“五月风暴”打碎了二战后西欧“升平盛世”的神话，成为1968年甚至整个20世纪60年代左翼思潮和行动高涨的形象标志。1968年，全球学生仿佛早已协商好似的，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到东方社会主义世界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各地一片学潮。青年人对现状的愤怒与反叛，已经汇成一股汹涌澎湃难以阻挡的潮流。

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潮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财富急剧膨胀的时代中，人们也许会这样问道，富裕社会中造反的基础和原因何在？这些“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沉默的一代”和“顺从的一代”为什么会突然变成“爆发的一代”、“造反的一代”和“厌倦丰厚物质生活的一代”？很显然，这类运动既不是贫穷的产物，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与斗争运动。它有新的主体、新的原由和新的特征，要回答的是新的问题与新的追求，如果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显然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在这场规模浩大的运动还没有完全退场的时候，又引发了战后的第二波动荡。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一些民权运动团体，以反对工业化严重后果的生态运动和以反对冷战对峙的美苏两方在西欧等地区布署导弹的反核运动、和平运动为中心，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生态运动。在这场新社会运动期间，西方各大中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并多次组织全欧反战行动，抗议核威胁、核污染和各种形式的生态破坏。具体地说，新社会运动主要是指西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发生的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抗议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动物权利、选择医疗、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以及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等。这场新社会运动以非传统方式，不但对西方社会秩序与稳定造成巨大影响，同时对传统的西方经典代议制民主也造成了严重冲击。

1998 年以来，西欧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是战后西方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危机。青年、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反“托宾税”[①] 等社会组织在巴黎、米兰、纽约等世界各大城市多次发动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主题的跨国大型群众抗议集会。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遭受全球化与社会危机冲击下的中产阶级人群和被“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大量加盟这一运动，抗议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与群体，其中既包括失业后备军和无业人士、持股人和食利者、“在家办公”的自由者，也包括流浪者、“光头党”、“嬉皮士”和“雅皮士”等另类人士。与 60 年代的学潮运动和 70、80 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相比，介入反全球化运动的社会群体，表现出更加多元与差异，其社会成分构成也更为复杂多样，抗议主题也更为分散和具体。在全球竞争中，资本主义各国在社会层面承受的内在压力将使它们难以摆脱社会危机的困扰。战后的社会危机和抗议运动，显现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迥然不同

① 托宾税（Tobin Tax）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旨在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这一税种是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在 1972 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出的，他建议“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该税种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缓解国际资金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规模急剧膨胀造成的汇率不稳定。

的新特点。这些造反的社会主体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而是以新中间阶层为主体的西方社会各阶层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些反叛行为不属于阶级政治，而属于生活政治和文化抗议；这些社会危机的性质不是对根本制度的挑战，而是战后出现的新社会力量对西方后现代化阶段产生的新矛盾提出的多元权力要求与抗争。

上述三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西方在走向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必然反映，尤其是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变化，在彰显战后政治的差异和多元性特点的同时，更加突出了自身发展的公民向度和主体向度：

一是在政治价值方面。法国当代社会运动政治价值的最突出特征是它们具有明显的公民基础。这些运动的主要功能就是加强社会与政治权利及自由，将这些权利扩大到新的或处在不利地位的社会团体。这些运动当遭遇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或侵犯时，便动员公众对其支持。在实现这一功能时，这些运动诉诸于经典民主价值或主题。与传统政党不同的是，它们集中关注的是基本人权和民主化与公民化的政治参与概念。反种族主义团体种族拯救（sosracisme）的创始人宣称：我们唯一的意识形态依据就是人权。我们既没有理论纲领，也没有宣传提纲，最多是一个基本章程，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时间的浪费和分歧的源泉，我们的哲学是人道主义。与此同时，提倡平等和团结也是这些社会运动的特点。

二是在组织结构方面。以法国为代表的当代社会运动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一般寻求一种独立于正式政治结构的地位。这些运动所动员的很多游行活动是以缺乏正式的政治代表或结构为主要特征。为了避免正式或持久的组织类型，这些游行是由一些特别的协调委员会组织的，而游行结束后它们就宣布解散。同时，许多反种族主义游行活动既是反对极右派的，也是反对主流政党的。这些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经历了一个相对活跃的发展时期，但这些新兴起的社会抗议活动却很难用20世纪60年代抗议运动来进行简单解释；从这类新社会运动或新政治运动在政治体制中所承担的角色来看，应当把他们定位在“新公民权”运动框架中，并给予适当的解释，可能获得一定的解释力与说服力。

三是在选择性行动方面。从这类社会运动来看，传统抗议形式作用的下降导致了新的选择性参与形式的兴起，这类社会运动一般采取象征性行动、节日活动、媒体指导的事件、签名运动和公民抗议等。与早期的抗议形式相比，它们可以称为是直接民主，具有最具体和直接的参与性。这类运动尽量避免传统的军事化形式，而是强调个体与团体在政治行动中的直接参与。例如，他们把传统的游行理解为一种集体要求与利益的表达而不是狭隘地代表一个特殊社团或运动的观点。在某种形势下，游行甚至是文化价值的庆祝而不是不满与愤懑的表达。当代社会运动策略中的一个重要革新是基于战略目的的媒体的使用。如果说传统新社会运动依赖于政党渠道来达到它们的目的，那么当代社会运动往往是利用媒体给予个体以直接接近政策决策中心的方式。大量运动的成功是由于它们对媒体渠道的集体利用；另一个增加使用的战略是象征性抗议活动，但是，它们包括不同于传统抗议形式的从公民抗议到占领或媒体指导的事件。参与策略的象征性形式往往被设计用来表明或代表一个特殊的社会议题或难题而不再是呈现出的对抗与斗争。

如何正确应对和治理新的社会冲突和危机的问题，既要面对社会多元主义，即要在政治上努力吸纳和整合社会内部的参与民主因素，并通过具体实践层面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政策；又要促进社会活力，同时克服和消化社会的动乱因素，从而使社会回归秩序，保持健康与稳定，需要人们长期关注、思索和探讨。

上述谈到的“新社会运动”，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系列大众抗议运动的一个描述性概念。其理论模式及其经验一直得到西方的思想界和理论界的探索和研究。西方的思想界和理论界对这类大众抗议运动的激进目标、非传统参与特征和社会生活改革性质的运动给予积极回应，并提供种种理论解释与分析给予支持与证明，最具有影响的则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理论、“价值变化与参与革命”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1. **“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认为，西方新社会运动是与西方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的。新社会运动是西方社会

发生结构变迁的产物。一方面，随着社会由机器大工业文明向后现代文明转变，城市化、交通信息网络与大众媒体迅速发展，在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这些为新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新社会运动又是现代化的结果，因为任何社会运动都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未能解决的难题的一种回应。新社会运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中现代性的一种累积，即社会结构变化中负效果不断进行积累的结果。资本主义工业增长不仅导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陷入危机，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不断殖民化，因而引发一些团体、组织诉诸于各种形式的抗议手段来表达政治诉求。

2. **“价值变化与参与革命”的理论**。“价值变化与参与革命”的理论认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主要因为社会公众“后物质主义”观与“自我实现”观的变化，导致相应的政治参与取向的位移，不是仅仅根据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分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加强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国家的干预、公司的专横、技术的统治和精英至上的科层制，使得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敏感地意识到发达社会对他们的压抑，要对资本主义的正统价值标准提出挑战，认为这些标准是可以改变或重新界定的，他们不再像前辈那样“为取胜而拚力比赛，而是向比赛规则挑战，或者干脆拒绝比赛”。他们尝试用签名、静坐、游说、游行示威和市民抵抗等非传统形式的草根民主挑战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新社会运动进一步激发了思想界对自下而上的参与民主的高度重视，关于“基层民主”、“地方民主”、“社区自治”等的研究风靡一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社会多元主义理论。该理论主张去阶级化政治，将以往被遮蔽了的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代际和生态等矛盾与阶级矛盾等量齐观，倡导一种基于文化差异认同的社会多元主义的民主政治，用大众参与和草根民主挑战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

3.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社会运动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社会运动的话语、话语的策略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尤其是对政治机会结构给予充分的关注。根据对

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一些学者强调社会结构与人们心理的变化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政治机会的有无和多寡才是决定社会运动的最关键因素。泰罗（美国政治学者也译为“塔罗”）认为，政治机会是指那些比较常规、相对稳定、能改变人们的社会政治运动参与度的政治环境。因为政治机会有很大的包容性，所有能够促使社会运动成功的变化都可以看作是政治机会，这就导致了政治机会概念的滥用。对于这个理论的解释困境，美国学者威廉·甘姆森指出，政治机会不是完全结构化的，很多政治机会先于运动而存在。如何定义和寻找机会是政治运动非常重要的一环。麦克亚当在《政治过程和美国黑人运动在 1930 ~ 1970 年间的发展》一书中强调社会变化对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政治机会是任何能改变现有政治秩序的社会变化，政治机会只是给组织力量强大的运动群体。麦克亚当格外强调认知解放的作用，要使一个社会运动从潜在变为真实，某一社会运动群体必须要经历一个认知解放过程。有了认知解放以后，原来在人们眼中合法的东西变得不合法了，原来觉得不可以企及的东西变得可以实现了。一个社会运动有了良好的组织和社会网络以后，这样的社会群体就更有可能经历所谓的认知解放。麦克亚当的理论源起于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的变化，社会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面对变化时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变化、结构、话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关系。

新社会运动突出表现为超越现代政治中基于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利益冲突而转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政权政治或政党政治的一系列政治化议题。新社会运动因“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参与意识，使运动组织结构呈现非集中化的基层民主特征。新社会运动只能始于并且很可能力求保持一种分散化与基层民主为特色的组织结构，行动形式从庙堂走向街头巷尾，运动形态多样化，直接参与特征明显，很显然带有很多的“政治机会结构”特征。新社会运动的流动性、分散化、周期性特征使其特别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且外部环境的任何趋利变化似乎都是对动员机会与能力的削弱而不是强化，利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对新社会运动给予解释和说明，进一步拓宽了人们的认识与思维。

（二）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范式转向

意识形态自从被引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党共同体这个领域中以来，其自身具有的政治性特点越发明显。意识形态经常被作为政党共同体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与维度。通常情况下，政党都与各种主义联在一起。一个政党区别于另一个政党的标签主要是依靠自身鲜明的意识形态。20世纪的世界可以称得上是政党把各种意识形态引入实践的一个重大的试验场域。

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意识形态，可以说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的灵魂，而政党则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意识形态经常被作为政党共同体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与维度。人们已经习惯于根据政党的意识形态把政党划分为左翼政党、右翼政党和中间政党。因为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往往从意识形态上就能看得出来，因为它是政党的灵魂。政党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需要意识形态给予强大的思想支持。正如冯·贝米所评价的那样："在很长时间里，在自身建设方面获得成功的，只有那些立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政党。"①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②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任何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都存在一个限度，要受到具体的条件和一定的环境发展变化的制约，如果"意识形态就是超出或者说否认这个限度，把自己树立为绝对真理，并成为支配人们认识和行动的政治思想，使人们无视事实盲目信仰，失去自己的理性和选择的自由"。③ 那么意识形态就可能转变成一种宰制社会的政治统治的手段。如果提到政治就立刻等同于意识形态，那将无疑是可怕和危险的。过去，人们习惯于根据意识形态把政党划分为左翼政党、右翼政党和中间政党，不同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各执一端，左右政党

---

① 〔德〕克劳斯·冯·贝米：《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政党》，高韦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③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版2004年版，第84页。

之间泾渭分明，相互之间尖锐对立。不同政党之间，都尽量拉开相互间的意识形态距离，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独立性。政党之间互相斗争、互相冲突，立场鲜明，几乎完全忽视政党之间的共性和通融性。但是，随着社会由经典现代性向后现代性演进，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各个阶层群体演变以及新的各种社会共同体的出现等，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却遭遇了诸多困惑。过去那种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和斗争向度的意识形态，似乎成了政党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往往更容易使政党的方针与政策走向极端。例如，作为构成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阶级问题，其属性的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的社会中，阶级主要不再体现为特定的利益团体，更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人特性，而越来越少地体现为集体的命运；相对于阶级制度而言，个人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后匮乏社会表现出的特征，不足以构成划分不同阶层和集团的根据；阶级不应当具有持续的历史属性。过去，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往往与他的出身具有密切关系，而在今天，阶级的“代代相传”将被打破。[①] 时代的变迁导致“政治决策者的意识形态思考并非静态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因而，握有权力的意识形态信奉者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②] 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尖锐对立，使参与其中的人们很难吸收对方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中的精华，不但容易导致对对方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且更容易抬高自己，自以为自己的理论是真理和规律。“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他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问题。”[③] 在冷战时期表现地尤其突出与明显，“冷战以两大竞争性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抗为始，两大对抗阵营也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来划定，并相互冲突对抗。而意识形态对抗的核心，不仅是

---

①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版 2004 年版，第 132 ~ 133 页。

② Douglas J. Macdonald . Formal Ideology in the Cold War : Toward a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Analysis in Odd Arne Westad , ed. , Reviewing the Cold War :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 Theory . London : Frank Cass, 1996. p. 193.

③ 〔美〕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 页。

通过竞争来决定哪一方更强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竞争来显示谁更优越。”① 可以看出当年“冷战所需要解决的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制度层面的问题。”②

当代社会的转型，造成了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呈现中间化趋势，政党之间的明显对立的意识形态越发模糊而走向趋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传统意义上的敌对与排斥逐渐走向相互借鉴与融合。无论是我们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怀疑主义、政治宽容和多元差异的时代。传统的政体、政策和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权力的等级与位置的牢固关系已经被打开、并转移到了各个阶层与群体之中，各种各样的生态保护者和女性主义者或工人团体以及新社会运动代表等社会共同体，不仅改变了社会的传统结构，并且通过多种形式的非正式接触、讨论集会、行业法规、特殊杂志、集中公关、代表大会等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传统政治。传统社会强调的阶级之重要性逐渐衰落、较之而言的文化和价值因素之重要性的增加以及较之生产领域而言的休闲和娱乐之重要性逐渐增加。所有这一切对于社群共同体的形态变化和集体特征的形态变化影响巨大。社群中培育出许多群体与社团，他们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对传统政治进行反思与批判。这些群体与社团意味着这些自由力量在社会的深层次中，在经济、社群和文化政治活动中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是一种自反性的亚政治化。“亚政治”的发展导致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国家、政党和公共权力等占据的领域逐渐被清空，让位给社会中自我生成的团体组织起来的一些亚政治群体。现代性社会中“亚政治”的发展不仅剥离了政党的传统政治功能，接管了政党控制的某些领域，同时对政党制度中权力结构的排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迫使政党权力由纵向转向横向，由一个中心转向多中心，由统一转向分散发展的可能。这种现实发展也

① Chen jian , 2001: “Mao’ 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 6.

② John Lewis Gaddis, 1997: “ We now know :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 282.

表明任何一种理论或观念都不可能垄断真理性的认识，都不可能具有终极意义。“历史不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没有人能够把握它的一个终极意义。当然，‘意义的多元性’并不是暗示着理解的失败而是暗示着事实的丰富性和历史解释的多变性。”①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宏大叙事与意义失落的时代，人们被现代性从确定性和一致性转变过来，并指向后现代的差异与多元之中。全球化与现代性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激活了意识形态本身潜在的一些元素，这些元素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原初出场，使原来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宏大抽象的空洞，而是一个动态、积累性的过程；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多元性、宽泛性和模糊性的，人们把意识形态作为手段和工具，借助于意识形态能够促使统治关系合法化。意识形态的概念发生重大的滑移，自身具有的含蓄性、神秘性和偶然性被置放于一个更广泛的架构中被人们所理解，人们开始从中剥离出最具有共性的意涵和实质性内容。

应当说，面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和政党政治进化的趋势，执政党都被迫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务实地调整。当代西方国家政党逐步打破传统框架的束缚，其纲领和政策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包容性，其政治参与方式是温和的、渐进的和务实的，政党的原则性逐渐减弱，而工具性日益突出，什么纲领能够吸引选民，什么纲领就被采纳，各个政党都有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法国社会党提出以新的方法为传统价值观服务，德国社民党认为要重新理解“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观，连极右的意大利民族联盟也提出了“民主革新”向“民主的、温和的右翼”演变，这些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现代性反思与调整。意识形态趋向中间化，反映了西方政党对变革时代的积极回应。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 政党在遭遇环境压力和权力缺乏统治力的双重影响下，对自身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出的一种新的补充、调整与选择，造成了西方政党为应对时代的变迁，积极促进其意识形态概念的滑移：

①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81 页。

1. **从宏大政治叙事到多元生活叙事**。现代性社会以来，政党在现代政治中一直处于显现的地位。政党是整个现代性社会的政治轴心，政党拥有辐射社会的权力；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党的控制，被高度政治化、政党化。作为中心政治的“逻格斯”式的政党，掌握着抽象理性主义、普适性方法论、严密的逻辑和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的宏大叙事话语权。这种政治，追求的是同一性、普遍性，强调一致和秩序，强调权力统治、中心和等级，具有一种宏大的普世精神和理想的终极目标。这种“逻格斯”式的政党，正如法国后现代学者利奥塔所言：“决策者力图采用一种输入输出模式。按照这样一种包含元素可通约性和整体确定性的逻辑来管理这些社会云团。”① 这种中心权力体系，充满了强制和暴力，无疑要遭到社会中边缘政治的激烈反对。社会不可能是完整的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共同体和文化群体构成的。整个社会中充满了纷繁复杂的差异性元素，并会形成各种新的汇合点，以诉求政治、参与政治，“一些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的显然很小的事件都以它们对全球利益平衡的可能的影响来解释。”② 这样一来，社会时刻处于各层界限面临崩溃和重建的过程，以确保政治的生长点遍布于社会各个角落。传统政党所固守着的普遍理性、宏大叙事和先验“元”规则的政治观念，其背后必然隐藏着差异政治的多元性、后理性政治的实然性、游戏政治的随机性以及边缘政治的碎片化。这些是对政党追求整体政治的现代性的一种否定与挑战。鉴于这种状况，后现代多元主义提出“差异政治”观，他们认为政治价值根本不可能是假定的、单一的和统一的，而是现实的、多元的和异质的。所谓“差异政治”，当代学者任平教授曾给予经典的表述：“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学理论的一种理解方式。它的基本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德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

①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 页。

② 〔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 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0 页。

治哲学，反对‘宏大叙事’，强调多元的‘小叙事’及政治价值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主张多元政治、差异政治等。”① 差异政治发展表明，人们已经充分考虑浸润在人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例如，L. 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罗尔斯的“交叉共识”、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都对传统政党的政治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范畴。如果以预设的普世式政党政治，将差异多元的社会统摄到一个大而统的范式之中，无疑是乌托邦，是对当今政党意识形态发展现实的一种逃避与无知。

2. 坚持以“链接原则”代替“阶级话语”。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开始兴起，随后的发展十年由于苏东剧变后国际政治出现的重大转折，导致这一思潮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得以泛滥。这种思潮坚持以“话语理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加深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政治在西方的决定性“危机”；尤其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人物拉克劳和墨菲，他们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提出后阿尔都塞主义、新葛兰西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链接原则”（anticulating principle）和霸权理论，以图对当代欧洲社会发展提出理论说明，同时也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使政党开始转向后现代取向的多元主义社会话语认同和多元化的激进民主政治。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存在不应以具体的“阶级话语”，例如，阶级斗争、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而应以抽象的“链接原则”来理解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链接原则”本身并不是话语存在，但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链接了各种潜在的反体制力量以创造工人阶级的霸权，提升工人阶级的影响力，而阶级话语的功能却逐渐隐退。拉克劳和墨菲的“链接原则”在某种程度确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陷入政治危机的深度，他们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非阶级和大众民主因素已经压倒了工人阶级话语，阶

① 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35 页。

级话语不再具有链接大众民主因素的霸权功能。工人阶级的传统霸权理论应当放弃，工人阶级的特殊政治角色应当转换，转而主张一种在话语中不断建构与解构的没有固定本质的普遍性的东西。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和社会主义斗争仅仅是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的一环，要求左派放弃阶级政治，并以链接不同的民主政治为首要目标，从争夺阶级的话语霸权，最终转向非阶级政治的多元民主激进政治，从而达成了与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多元政治理论的“链接”，并以此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多元取向的激进民主政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主张去阶级化的激进政治，直接从政治上攻击工人阶级政治本体，以权力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实现激进的多中心的文化抗争和民主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后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行批判的一种差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坚持以“链接原则”代替“阶级话语”，对当代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 **以社会认同代替阶级认同。**在经典现代性社会中，既有传统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也有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特定的生产方式、特定的社会利益和特定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特定阶级阶层。这些阶级、阶层和集团一般都坚持“革命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总体而言是一种社会学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总体性、超越性与神圣性。当政党掌握权力进行执政，并把意识形态升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往往会牺牲社会上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将社会认同简化为阶级认同和政治认同，以阶级政治取代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代性社会向后现代性社会转型，“后工业社会”、“后物质主义”以及“科技革命”的层出不穷，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人们的政党忠诚度已经下降；阶级利益观开始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人们不再把阶级、统治与斗争等作为重大政治问题，而是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更加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且人们围绕这些问题正在形成新的社会认同。由于地方性和全球化的交错互动，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需要更加细致而

有特色，这进一步促进人们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这样一来传统的阶级认同逐渐陷入困境，正如哈贝马斯断言：“阶级的社会同一性解体了，阶级意识涣散了。被纳入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妥协，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参与者和当事人，成了一个人。”① 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并没有消失，但是确实已经缓和，冲突不再具有传统的阶级斗争的冲突性质，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可以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冲突。当代西方政党去阶级化的社会根源，主要在于新中间阶级的崛起及其引发的价值观改变，导致阶级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并产生了所谓中性化新政治的现象，这种中性化的新政治就是和传统政治对立的一种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即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从‘解放政治’投射的阴影中凸显出来。”② “生活政治涉及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传统和习俗已失去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科学和技术已经改变了许多过去是‘自然’（nature）的东西。这些变化几乎都超出了价值或伦理方面的问题，但并不仅仅是与社会正义有关。”③ 生活向度的改变，必将导致人们需要以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认知、参与和日常生活等社会认同代替阶级认同，这也导致政党的认同要同步地进行现代性调整。

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最初出场形态因当今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错勾联而发生重大的范式转向——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日趋明朗。“中间化”最明显的体现在西方政党的纲领、政策的调整上，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成为目前西方政党尤其是执政大党的主流发展取向。在政治文化上，传统的左右分野逐渐让位于多元化政治标准。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命运，不再具有宏大叙事和革命史诗般的英雄主义气概，对意识形态的调整与转变能否为执政带来巨大优待，这有待生活世

① 〔德〕哈贝马斯：《何谓今日之危机？论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哲学译丛》1981 年第 5 期，第 56 页。

② 王振华，陈志瑞：《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2 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1 页。

界的进一步检验。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似乎陷入某种困境之中，是否表明一个“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代正在到来？

“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呼声并不是当下时代的新呼喊。从20世纪50和60年代始，西方就有一些思想家如法国的雷蒙·阿隆、美国的丹尼尔·贝尔等人不断地抛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甚至认为不但意识形态，而且历史也将会终结。但是，这些认识的提出立即遭遇到一些学者的反驳与阻击。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美国学者利普塞特认为：“并不是说所有意识形态的死亡，或者不再有任何政治分歧或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终结’这个短语，按照它的提出者和支持者的看法，只是意味着：第一，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已不足以指导民众运动……，第二，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冲突在日渐枯萎。”[①] 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在谈到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时曾批评说：“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②] 可以说，“意识形态的终结”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可能是对意识形态发展的另一种尝试，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启蒙。

随着现代性社会的演进，意识形态的一切构成要素都会或多或少地丧失自主性特质，丧失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在极端的状态下意识形态甚至会走向反传统、反文明的歧途，最终必将导致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与文化合法性危机。但是，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人类发展的中枢神经，无论现实社会如何发展与变化，我们决不能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深刻关切，如果忽视对意识形态的正确引导，那必将是放弃了精神而只抓住了躯壳，舍本逐末。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存在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关联的理解的论述仍然具有真理性意义。政党的政治制度不同，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也就必然会有差别，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的社会制

---

① 〔美〕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页。

② 〔德〕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意识形态》，张世鹏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

度，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不同阶级、不同制度间意识形态的斗争仍会存在，只是意识形态外在的表现形式不同于过去而已。当今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确实陷入危机与困惑之中，但是，这种危机与困惑正好为政党自身和整个政党体制的调整带来契机，现实的世界各国政党政治中，意识形态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终结。而摆在政党面前的，就是如何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实现相应的转化，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状况。显然，这是关系到政党的生存、发展，获得认同与巩固合法性的又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二、实现对“左”与“右”政治光谱的超越

在传统的政治中，政治共同体的各个政治主体因政治信仰与价值取向的差异，通常很容易从政治光谱反映出来。政治光谱用坐标轴加以划定以左右的界线加以描述。根据每一个政治主体因政治信仰与价值取向的差异，在政治光谱中给予“左翼”或者“右翼”等称呼。但是，在当今越来越复杂的现实政治世界中，传统的简单的左右两分和参照式的政治光谱是无法准确描述和正确说明任何问题的。现实政治舞台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群体，为了具体的利益目标相互竞争，有时彼此发生冲突或对抗，有时又彼此达成默契和联合；在一些问题和观点上可能形成一致，而在另一些问题存在巨大分歧；另外，中间阶层的变化导致意识形态呈现中间化、模糊性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如何实现对“左”与“右”政治光谱的超越，欧洲社会民主党提出“第三条道路”，作为现代性纠错方案的一种尝试。

（一）政党的政治光谱定位与分析

政治光谱，是一个政治学上的习惯用词，没有获得规范性的界定，通常是以形象化比喻政治共同体之间因政治信仰、观念和价值的差异而把自身置于一个或多个几何坐标上，从而显示不同的政治立场。根据政

治光谱的划定，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政治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观念，给予自己一个适当的位阶与排序，可以是左派、右派、中间派别或者是中间偏左、中间偏右，或者是其他的选择。这样每一个政治主体就可以因为所属的政治派别有选择地加入一个阵营或其他一些阵营。在现代政治文明中，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政治光谱通常以“左—右”的界线来加以描述和区分。这个传统的政治光谱以保守主义、神学以及法西斯主义（“右派”）为坐标轴的一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左派”）为坐标轴的另一端来加以定义。这种“左派”与“右派”政治术语对现代政党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翼”与“右翼”构成了政治光谱最初的主要内容。对“左翼”与“右翼”的追溯，可以说最早是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左翼”与“右翼”是针对当时法国各类（分为三级）立法机关原初时期的座位安排而作出的一种划定与分类。通常情况下贵族坐在了报告人的右边（传统上象征着荣誉的位子）、评论者则坐在左边，因此，逐渐产生了所谓的右翼政治以及左派政治这样的专门术语。在当时，被称为“右派”者是指支持贵族或皇室利益的派别，而“左派”则指是站在“右派”立场的对立面上，一般是指中产阶级和新兴起的资本阶级。从此，“左翼”与“右翼”逐渐进入党派之争的政治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其内涵也有所调整。

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兴起后的200多年的时间里，关于政治光谱坐标上的“左翼”与“右翼”的划分逐渐固定为西方国家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认知和评价的主要标识。尽管“左翼”与“右翼”的内涵与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度里，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是，“左”与“右”的划分还是比较明确的，围绕和参照“左”与“右”进行的政治倾向定位、政治结盟、政治斗争与竞争，以及政党纲领的制定和宣传、政治讨论和辩论等等，基本上涵盖了整个政治叙事和政治话语体系。关于“左”与“右”的政治发展，在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确立，发展到了顶点，整个世界几乎简单地区分为“红”与“白”。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关于“左”

与“右”的政治光谱区分，越来越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挑战，单维度的“左”与“右”的区分，无法给予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以充分的解释与说明。一时间，关于“左右划分过时”的观点、“左右划分简单化”的观点和“超越左和右”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和政界喧嚣一时、此起彼伏。传统的政治光谱之所以遭受强烈地挑战，归纳起来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带来的挑战。冷战结束以后，在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成为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学者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最早源于福山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随后，他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并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这篇文章（1989年），标志“历史终结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出笼。“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在福山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福山依据以苏联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灾难这一历史事件，公开宣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战胜了其他与之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并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我们已“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受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喧嚣影响，一些人认为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保持过密切联系的左翼运动与理念，对现实生活已变得没有任何阐释力和说服力。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不要再沿袭传统政治光谱上这种无意义的符号界定，应当共同去顺应和致力于自由民主理念的历史舞台上的独舞和普适性发展。“左翼被劝说和建议加入到自由民主领域中那些寻找解决办法的人的队伍中来。”[①] 很显然，朗西斯·福山是把“左”与“右”的政

① Charles Derber (ed.), 1995: “What's Left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Postcommunist Er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p. 18.

治区分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冲突，不知这是他出于无知还是有意。如此一来，传统的左右翼的政治划分就被统摄到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之中。实际上，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只要有利益的存在，“左”与“右”的政治区分就不可能退出人类政治舞台，只不过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

二是面对政治现实复杂性的挑战。在越来越复杂的现实政治世界中，简单的左右两分和参照是无法描述和说明任何问题的。现实政治舞台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群体，为了具体的利益目标相互竞争，有时彼此发生冲突或对抗，有时又彼此达成默契和联合；在一些问题和观点上可能形成一致，而在另一些问题和观点上又可能不一致。有人比喻在政治舞台上就像在舞厅里一样，参加者在一曲终了之后，在下一曲中就转向新的舞伴了。面对现实的复杂多变，再以左右翼划分，以这样简单的参照标准是无法涵盖和包容的。例如，西方学者马克·斯库森在其文章《既不左也不右》中写道：“各种媒体还继续使用昨天的陈旧政治字典来进行着文字谋杀的游戏，但是我坚决抵制这种陈腐过时的和极具误导性的左翼—右翼/自由—保守的战线的划分。我根据每个学者、候选人和哲学家自己的价值来看待他们，而不是根据一些武断的标签。”① 这种观点在具有“后现代性”特征的西方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认同的基础，具有颠覆传统的政治认知标准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倾向。同时，有许多理论家也在积极寻找能够代替左右翼划分的更符合现实的其他参照系和政治划分方案。

从过去到现在，历史性地考察左右翼政治光谱的划分，其实它并没有否定现实政治生活的复杂性，至于如何迅速适应现实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并能够给予充分的指导性说明，才是认识发生分歧的焦点所在。在左和右的两个线段端点之间，是各个点的连续，每个点都可以根据两个端点和中点来确定自己在坐标轴上的位置。所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经常谈论“中左（右）翼”、“温和左（右）翼”、“极左（右）

① Mark Skousen, “Neither Left Nor Right”, http://www.markskousen.com/article, 2000.7.1.

翼"，这也可以理解为在"左"与"右"的两个端点之间的连续或跳跃的点，或向左一点就可能成为人们所讲的"温和的左翼"和"激烈的左翼"；或向右一点就可能成为人们所讲的"温和的右翼"和"保守的右翼"。无论作为对政治倾向进行认知和判断的参照，还是反映现实政治多样性本身，左右翼的划分都是一种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便捷的方法，它并不否定和排斥其他方法的划分，反而能够同它们相结合。同时，左右翼政治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指向。例如，在美国，左右翼政党的划分标准一般很模糊，但实际上人们更倾向于把共和党看作是右翼，而把民主党看作是左翼。再如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法国的社会党与保卫共和联盟、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等。总之，左右翼政党趋同或纲领内容的变化，正是政治复杂性的体现，而不是左右翼划分的终结。在复杂的政治世界，左翼和右翼并不代表着两组固定不变的思想，而是整个政治生活围绕其变化的轴线。当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时，就不能仅仅代表本阶级的利益，更不能完全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来治理国家，必须与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结成联盟，并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说，"第三条道路"就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为适应这一转化而提出的新思路。正如英国学者吉登斯所坚持的那样，由于得到了如此广泛的选民的支持，第三条道路正在进行着新现代化运动。它在接受了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了阶级政治，寻求了一种跨阶级的支持。他的理论计划不是消极地抛弃左与右，而是积极地"超越左与右"，"如何摆脱或左或右的固有因果关系"，"考虑大胆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并规劝传统左翼走一条新的保守主义道路，即"温和的激进主义"[①]。这种"超越"就是在保持激进主义的基本价值的同时，从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营养，形成的新的政治意识观念，它具有"世界主义"的普遍意义。正如鲍比欧在其论述中设喻所言的那样："灰色划分了黑与白，黄昏划分了白天和黑夜。但是灰色却没有丝毫改变白与黑的划分，黄昏丝毫没有

---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

改变白昼与黑夜的划分。”①

（二）“粉红色欧洲”现象与现代性变革

1. **“粉红色欧洲”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在其“复兴”和“神奇回归”中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及其所谓“中性化”和“新政治”理念，其实不过是社会民主党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调整的结果。20世纪后半世纪西欧社会党普遍经历了曲折沉浮的历史过程。20世纪80~90年代中期，西欧社会民主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陷入党员人数锐减、主流派分裂、议会选举失败、理论迷惘和社会政策失调等危机与困境之中。在这些危机与挑战面前，西欧社会党的领导人及其理论家们在长期的反思中寻找应变策略以回应危机与挑战，他们更多地强调党要以自身的变化来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强调在危机形势下党的高层领导在目标选择、战略决策、政策调整等方面所作的主观努力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欧洲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和规律。随着对政党的理论、政策、目标、活动方式的不断反思和自我修正，社会民主党在西欧的政治舞台上定会重振雄风。欧洲社会民主党提出一系列现代性纠错方案，并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末，西欧社会民主党最终走向全面复兴，出现了“神奇回归”。例如，在野16年的英国工党，在野14年的法国社会党以及在野12年的德国社会党，分别在英国布莱尔、法国若斯潘和德国施罗德这些新生代政党首脑的领导下获取了执政权力，重新走向政治舞台。从20世纪末以来，社会民主党引人注目地在欧洲12个国家获得执政，尤其在欧盟国家中几乎是清一色。由于这些社会民主党的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崇尚社会主义，但又认为和前苏联信奉的社会主义存在根本的区别。如果认为前苏联奉行的社会主义是传统的极左的红色的话，那么欧洲社会民主党奉行的社会主义则是温和的左翼，呈现粉红色。因此，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欧洲，被一些学者称作“粉红色的欧洲”。无论是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

① Norberto Bobbio, 1996: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Polity Press, p. 5.

民主主义之争；英国的“新工党理念”，还是所谓“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国家”的“荷兰模式”的出现；波兰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人道的资本主义”之争等等，这些政党都在反思中进行了思想与价值取向、纲领及策略上的全面调整。“粉红色的欧洲”给全球思想界造成巨大的震荡和反思，人们看到的是“粉红色欧洲”远比“白色欧洲”（传统资本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更热心于普适性的人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更愿意支持和帮助落后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与发展。

2. **由“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吉登斯对现代性的批判，符合“超越左右”的政治变革及规范民主政治的诉求，主要以结构化理论凸显一条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现代社会演变轨迹，从中推演出处于这样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左翼政党谋求社会民主的新策略，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论述显然有迹可寻。这种政治理念在传承了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努力创新，企图对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分裂与对立局面进行全新的多元综合。

“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和“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是吉登斯针对社会民主党如何更好地适应现代性社会的变迁而提出来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概念。在吉登斯看来，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模式，它们所出现的时代背景不同，它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不一样。生活政治所关注的很多问题，是无法包括到解放政治的架构中的。他之所以在解放政治之后提出生活政治，目的是力图把当代西方社会的各种问题都纳入政治议程之中，扩大政治关注对象的范围与领域。他之所以强调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是有其现实的考虑和目的的。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的解放政治，是一种以人群的区分为前提，凭借一种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的，通过将权势阶层的权力分配给弱势阶层来实现人们的普遍自由和平等。这在早期是很有必要的，但在当代社会，再用这种模式去治理国家，容易造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利于社会的团结，也不利于争取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生活政治则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你都会遇到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无论你尊贵还是低贱，你都不可能避免地同生态环

境问题发生关系。吉登斯认为，随着西方社会进入晚期现代性时代，工具控制的体系比以前暴露得更加赤裸，但作为一种反向作用，生活方式的选择需要更加细致。于是，在地方性和全球化的交互关系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道德难题。“‘生活政治’即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从‘解放政治’投射的阴影中凸显出来”,[①] “生活政治涉及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传统和习俗已失去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科学和技术已经改变了许多过去是‘自然’（nature）的东西。这些变化几乎都超出了价值或伦理方面的问题，但并不仅仅是与社会正义有关。”[②] 因而更加关注新政治问题的价值理念。新政治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后工业化、全球化、生态危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引发的新的政治追求，有相同追求的团体凝聚成一股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这些运动所产生的价值理念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新动向，为越来越多的政党所关注，更为西欧社会党所广泛吸纳。对于西欧社会党来说，因新政治运动而出现的选民政治支持兴趣的转移和数量的减少现象，直接威胁着它的生存和发展。只有把新政治问题纳入政党的政治视野之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

3. **纠错的路径在于治理**。以超越“左”与“右”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表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治理越来越面向实用主义，目的是为了相互促进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因为各个目标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或相互交叉的。第三条道路的治理观认为，对社会的治理不是一个单独层面上的治理，它要融入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治理体系之中。目前的治理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治理，即一阶治理，是指公共行为体与私人行为体来自多个行为体之间共同解决问题的实践。比如一个城市开发的项目，在新的治理理念下，不仅是市政府的代表，而且企业及市民的代表都要参与。这种公私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必须纳入到一

---

① 王振华，陈志瑞：《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个体系当中去，最终解决的是能够问责。第二个层面的治理，即二阶治理，涉及到制度建设，是指在制度的框架下解决问题的实践。主要包括法律上的、组织上的建设。比如伙伴式的合作关系，要有鼓励公众参与的机制。第三个层面的治理，即三阶治理，是指要把相互合作的制度形式，纳入到规范当中，使公众知道实施的制度是合法的，以得到公众的支持。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前提是放弃统治与控制的观念，这不仅需要从上到下，更加注重从下到上进行双向互动的治理；再者，一个政党不能仅仅通过精英代表来治理，而应当更多地与社会各个层面的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形成互相合作的关系。吉登斯认为前苏联共产党通过集权通过计划对社会全面控制与管理的模式是“控制论模式”。吉登斯曾经对这种模式展开批评，认为是一种“简单的现代化”，而不是“具有灵敏反应的现代化”，实质上是缺乏现代治理的理念。

社会民主党的治理理念放弃了过去的宏大叙事，而采取实用主义；放弃了原来强调的制度社会主义，反对将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有限替代，强调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社会运动和一种政治实践，是一种调节社会和使市场经济为人类服务的方式，是一种思想启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动方法和一种始终如一的民主和社会价值的参照。他们倾向于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更多地从个人责任、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等方面对社会主义做出论证，把社会主义目标规定为“开放与多元、自由与团结、公正与安全的社会”。

4. 进行“滤合式”的修正与完善。社会民主党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为了迎合时代变化的社会环境和不同层次的不同口味，总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原则进行折中和重新解释，对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实践进行调整更新，力求实现社会变革。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探索通常被称为“滤合式”方式修正和完善。“滤合式”是一个化学术语，在实践中体现为“模式减肥”，例如，在斯堪的那维亚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是以调整性措施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在理论上体现为“范式渐进”，是通

过主流学术群体里工作的人以累积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开拓知识的前沿，以达到政党政策的逐步完善和有效。我们再从吉登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探索历程中可以看出，他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一书被视为“第三条道路”的范式雏形，1998年的《第三条道路》则标志其理论范式正式形成。鉴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在理论纲领和战略目标方面出现危机，社会民主党极力赋予原有的价值目标以新的内涵与指涉。他们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以民主为核心，民主主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突出“自由”的目标，认为自由是全面享有提高生活水平的资源，要保护和扩大自由，建立真正自由的社会；强化伦理色彩，确保人权、环保、就业为重点。

自布莱尔和克林顿英美两国首脑在1998年2月华盛顿会晤之后，进一步促进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政治舞台上作用的发挥，第三条道路作为他们的行动纲领得以全面地实施。在实施过程中，第三条道路理论也得以全面检验、修正和完善。在本世纪初，社会民主党引人注目地在西欧12个国家获得执政，欧洲变成“粉红色的欧洲”就是明证。各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工党）、工会和左翼思想界在反思中进行了思想与价值取向、纲领及策略上的全面调整，以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为指导，随时随地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保持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包含多元伦理特征，是源自于其多元意识形态理论，主要体现在：一是多元价值观。即认为社会主义不应以某一固定的社会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而应兼收并蓄任何符合其发展需要的思想观点。二是多元社会主义观。主张社会民主党可以根据本国的不同国情和社会经济结构选择不同的实践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对他国的发展道路横加干涉。为适应当今社会的深刻变化，必须加强政党共同体的自身建设，向着实行政党共同体的民主化、分权化、地方化和组织功能分散化、占据媒体阵地等方向改革。三是多元政治观。从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开始，社会民主主义就一直在资本主义多元政党制度框架内进行资本主义改良。认为多元是民主概念的首要含义，而多党制则是民主政权的基本特征，强烈谴责前苏

联的一党制是专制、集权和官僚主义的温床。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就是要超越传统的政治分野，即新右翼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和老左翼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在它们之间。但是，“19 世纪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政治舞台上呈现的左派和右派政治方案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原教旨主义的对立实际早已是过去的事了。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的社会理解和政治理解相重合的领域是很多的。”① 社会民主党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上，体现了非左、非右亦非中间的超越性。在对待国家权力方面，老左翼推行建立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突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作用。新右翼强调通过自由化激活市场，提高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而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寻求在各个层次上重建政府，推进宪政改革，提高行政的透明度和地方民主水平。

---

① 〔美〕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 21 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3 ~ 175 页。

第六章　西方另类政党的发展与底层抗争政治的崛起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与演进，在传统主流政党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另类或非主流政党。这些政党以具有后现代性特质的相对新颖、激进、搞怪甚至是要杂式无厘头的政治表达与政策主张，不仅触及了一些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对部分弱势群体、下层选民和极端主义团体相当有吸引力，而且触及了人们埋藏在心底压抑很久的对政治的欲望。与主流政党的政治行为相反，这些政党另辟路径来表达自己对传统政治和主流政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元叙述”的愤懑，关注生态政治和伦理政治、族群政治，追求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提倡抗议民主、激进民主，实现权力的边缘化、多元化、平面化和生活化，成为“反体制政党”。当今社会不仅是全球性、去管制性的社会，同时也是信息增殖性和去精英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渴望主宰自我，渴望权利增殖，渴望分享与行使，这正好为另类政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与空间。

一、另类政党的谱系学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传统主流政党的发展理路上，出现了另类或非主流政党。这类政党产生原由、成分、类别以及纲领与价值理念多元差异，很难用单一的分析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和说明；本文在叙述中，采

取法国后现代大师福柯提出的谱系学观点以尝试对另类政党进行分类与排序，以揭示其生成的原由以及对传统政党造成的冲击。谱系学不仅仅是一种辩证的哲学观点，同时也是一种深刻的分析方法。福柯在其著作中采取谱系学的分析方法，旨在选择以身体作为一个新视角，透过“现在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来考察产生知识的真理体制和求真意志是如何在某种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中诞生的。近些年来随着新社会运动的深入发展，出现了“茶叶党”、“性爱党”、“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金发美女党”和“恋童癖党”等另类政党，这些另类政党强调自由与独立、反对主流政党政治，关心身边生活政治，具有后现代性的一些特质。另类政党的出现预示着当今政党政治的发展具有后现代性的一些特质。另类政党的出现也预示着政党政治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这种趋势正在动摇传统政党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本文借助谱系学的分析方法，揭示另类政党的生成与发展，期望为人们考察和研究现代政党提供多重视角与路径，来分析和解读政党的“传统政治”困境以及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丰富多彩。

（一）福柯谱系学的辨析

谱系学的概念最早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的，出自于他的《道德的谱系》一书中，法国哲学家、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则把谱系学给予系统地展开。谱系学是贯穿于福柯晚年的《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以及治理术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中的。可以说，福柯成熟时期的思想，主要是依靠“权力谱系学”的方法，代替其早年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进行阐述的。

与“知识考古学”相比较，“谱系学”放弃了对“深层”的探索，将目光转向表层，它寻找时间的细节、微小转换以及细微轮廓的外现。关于对谱系学的认识与理解，福柯是这样评价的，“谱系学是灰色的，注意细节的……谱系学要求耐心和对话细节的知识与广泛的原材料的积

累”。[①] 由于不存在什么深层的本质、宏大的意义需要解释，因而每个事物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对每个事物都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每一个解释毫无疑问都不是必然的、唯一的、绝对正确的，都包含着任意的成分。“谱系学”是想向世人说明，对历史的解释不存在唯一性，而具有多样性解释。在本质上，谱系学打破人们对纯粹、高尚本源、本质、同一的幻想。“谱系学”的方法论对历史中的一致性和规律性采取坚决的拒斥态度。它明确地告诉人们：这些一致性和规律性完全是虚构的、纯粹的假面具。福柯认为现代主义主要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根据现在写过去的历史。即把现在的概念、模式、制度、利益或感觉强加到历史中去，强加到其他时代，然后宣称发现这些较早期的概念、制度等具有现实的意义。二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在过去的某一点发现现在的核心，然后揭示从那里到现在的发展的必然性。福柯认为历史并非存在终极目的，历史并非普遍理性的进步史，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观念展开的历史，它是人类统治到另一种统治前进的权力的戏剧，是一部“没完没了重复进行的关于统治的戏剧”。福柯的谱系学是一种把握“差异”的方法，试图在过去人们发现“一致”的地方找到“差异”。福柯的谱系学综合了尼采的权力生命哲学以及视角主义和解释学的思想，将西方的主体性、知识论、真理以及人文科学视为权力——知识的效果，视为求真意志的结果，视为真理游戏的产物，同时考察了视为劳动的、说话的、知识的、生物主题的个体是如何在权力——知识中被制造出来的；以及某种话语是如何被权力——知识关系在欲望的主体上产生出来并散播的。可以说谱系学的方法就是一种生命政治的解剖术，一种微观权力的光谱分析，一种现代社会规训权力和治理术的发展史。

本文尝试借助谱系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些另类政党的产生、发展以及对当下处于统治地位的政党政治可能带来的挑战进行分析和说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抗议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动物权利、原

---

① 〔法〕福柯：《尼采、系谱学、历史》，《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教旨主义宗教运动和新时代运动等为特征的新社会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同时遭受到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洗礼，以非传统方式形成了对传统的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严重冲击，同时导致西方政党在处理和化解社会动乱和危机方面的理路和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尤其是对政党自身的转型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现实正如福柯的谱系学所揭示的那样，“差异”胜过“一致”，“个体”超越“整体”，过去的一元叙事已经转变为多元的小叙事，宏大的统治权力已经分解为细微的治理权力，虽然这些社会变革还并不构成对根本制度的挑战，只是战后出现的新社会力量对西方后现代化阶段产生的新矛盾提出的多元权力的新抗争，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在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发展理路上，出现了单一问题党、反复无常的抗议党、平民党、自然法党、狂野疯人党、新千禧焗豆党、金发美女党和“恋童癖党”等另类或非主流政党。这类政党不断涌现，从不同的侧面挑战主流政党的垄断地位，主流政党的合法性与政治认同面临着严重考验。

（二）社会转型中的另类政党的范式显现

1. **“茶叶党”**。2010 年 5 月 18 日，美国“茶叶党”候选人兰德·保罗当选肯塔基州议员。“茶叶党”候选人这次竞选的胜利震惊美国政坛，尤其是对美国传统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触动很大。翻开美国历史，我们知道有一件值得载入史册又为人津津乐道的重大事件，就是 1773 年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实行的不公平税收等而导致的波士顿爆发了“倾茶事件”①。此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当时向英国当局反抗示威者们最响亮的口号是“税收得够多了！(Taxed Enough Already!)”这句话的英文首字母拼起来就是单词“茶（Tea)”。

美国的“茶叶党”运动发起于 2009 年初。“茶叶党”的政治纲领主要包括：一是反对“大政府”。茶叶党人认为，要解决问题，靠政府不如靠个人。他们担心政府过多干预造成权力过度集中。二是反对高税收。

① 1773 年严冬，一群打扮成印第安人模样的“波士顿茶党”将东印度公司的 342 箱茶叶全部倒入波士顿港，从而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美国民众，尤其一些偏重于保守的民众认为，高税收有可能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时有可能对美国民众的自由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三是反对民主党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等政策措施。尤其是奥巴马上任后，为应对经济危机，大刀阔斧出手救市，这更引发了一些人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和加剧赤字的担忧。美国民众不愿意看到更多的政府与政党的干预，希望通过基层民主治理来自下而上改变现状，重塑美国政治格局。茶叶党的支持者以白人保守派为主。“茶叶党”以一百多年前的波士顿“茶叶党”命名，主要目的就是表达对当政的民主党出台的高税收政策表达不满。

2009 年初，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拉穆塞在节目中抨击奥巴马动用巨资拯救房奴，谈得兴起时他挥动着茶包说：“是时候成立茶党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被这位“名嘴”随口一说要成立茶党，立刻就被各大网站转载后迅速引发共鸣。不到 24 小时，几个茶党网站相继发出号召。其中，来自连德研究所的约翰·奥哈拉和《美国观察家》杂志的弗莱里凑到一起，迅速采取行动，开始谋划成立茶党计划。2009 年 4 月 15 日，也就是美国人年度纳税截止日的当天爆发了一场全国性茶党游行示威大活动，这次示威大活动就是约翰·奥哈拉和弗莱里两人策划和组织的。这次游行示威规模之大让美国政坛震惊。接着 2010 年 2 月 27 日，约翰·奥哈拉和弗莱里两人组织了名曰“一个新美国”的茶话会。同时，在全美 40 个城市发起了“茶党抗议活动”，示威者打出“TEA”标语，意思既是“茶叶”，也是“税已经征够了”的英文缩写。从此，茶党以互联网为据点，在全美铺开网络，迅速发展。2010 年 5 月 18 日美国“茶叶党”成员兰德·保罗战胜了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支持的竞争对手，一举赢得国会中期选举肯塔基州共和党预选。这一结果立即在美国政坛中搅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浪。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大党派不同，根据“茶叶党”目前的构成、组织结构和纲领等来看，只能视为一个新的松散型政治运动组织或共同体，不能算是美国政党政治生活中的新的第三大党。

“茶叶党”由数百甚至上千个松散的团体组成，他们在餐厅、起居室、图书馆、办公楼甚至通过网络进行聚会。“茶叶党”延续上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民间政治运动思潮，民粹色彩较为浓厚，感性成分较多，理性思考偏少。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茶叶党人”苏珊·柯伦在最近一次公开场合演讲中说：“是我们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我们这些民众。我们是雇主，而这些被选举出来的议员是雇员。我们必须停止称呼他们为官员，不要再赋予更多他们应得的信任。”这表明在美国当下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民间对政府政策存有诸多不满，故而谋求改变决策。

“茶叶党”的兴起对美国政治生态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林恩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沃森针对“茶叶党”的崛起评价道，茶叶党是从阿拉丁神灯中召唤出的精灵，力量强大却有诸多变数。他认为茶党本身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个激进的保守派运动，它太过远离政治中轴线，比主流共和党更靠右。选民们对现状越来越不满，他们希望变革，但问题是何种变革？茶叶党是否做出了充分的准备，还要拭目以待。而且“茶叶党”准备与成立的仓促，还不具备一个成熟的政党的基本条件，可以说茶党本身不是一个政治党派，而是代表了大多数沉默的美国人。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旧的政治。茶党官方网络社区“茶党爱国者”的资深成员唐·巴特菲尔德这样向人们解释他所理解茶党的定义。但是，“茶叶党”的诞生和发展的意义告诉了人们美国传统政党对政治的掌控，无法让美国民众满意，美国民众认为共和党与民主党控制的时代是问题丛生的时代，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很难带给美国民众一份满意的答卷。茶叶党认为当前美国存在一大群厌倦美国传统政党政治的人们，他们愿意相约一同来到酒吧、餐厅或者咖啡厅，边喝边吃边谈或边看相关电视节目，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对于就业、医保、税收、社区民主等关乎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政策发表看法，谴责的谴责、抱怨的抱怨、讽刺的讽刺、愤怒的愤怒，把积压在胸中对当局者的不满和郁闷情绪宣泄出来。

2. **“房租太他妈高”党。**2010 年 11 月 12 日中国一些媒体对美国的“房租太他妈高”政党（The Rent is Too Damn High Party）做过相关报道。在 2010 年 10 月 18 日的纽约州长竞选电视辩论中，不管是共和党候选人卡尔·帕拉迪诺（Carl Paladino）还是民主党候选人安德鲁·库奥莫

（Andrew Cuomo）都拥有各自阵营的有力支持，但谁也没有想到，成为了这一天竞选话题的人物将会是名不见经传的独立候选人吉米·麦克米兰（Jimmy McMillan），他的竞选党名是：房租太他妈高了党（The Rent Is Too Damn High Party）。

“房租太他妈高”党成立于2004年。发起人是一位名叫吉米·麦克米兰（Jimmy McMillan）的64岁黑人：这位越战老兵和退休邮局工人。最初，这个党只有3名注册党员。2005年，麦克米兰参选纽约市市长，得到4000票；2006年参选州长，得到1.3万余票——这个结果相当不坏，虽然离当选者的200余万选票还有很大距离，但比最后一名，“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候选人的4000票还是好看不少；2009年，麦克米兰再次参选纽约市长，但只得到2600票。但是，麦克米兰的胜利只在互联网上。他的辩论视频已经被浏览了460万次，他的个人网站点击率达到了2150万——他成为了网络红人。而就在选举日当天，他的说唱音乐专辑也得以发布在iTunes和其他音乐播放器上。

2010年11月2日是美国四年一度的中期选举日。这次选举改选了众议院全部435个议席、参议院100个议席中37席，以及50名州长中的37人。麦克米兰剑指纽约州长的宝座。大约两周之前的纽约州长竞选电视辩论中，麦克米兰造型奇异的胡须、银色向后梳的长发、独特的语言感染力和强大的自身逻辑让他出尽风头。他在镜头前滔滔不绝地说：“这场辩论纯粹是搞政治的老一套！这愚蠢的游戏我才不玩。‘房租太他妈高’党代表的是广大付不起房租的人们。在我说这段话的时候，他们中就有人被解雇，他们吃不起早饭、午饭和晚饭……听！他们的肚子在咕咕叫！你们听到没有？”

他把纽约人面临的所有问题归咎于一点，即他的党的名字，“房租太他妈高”。“人们常常同时有三份兼职，但女人们无力照顾自己的孩子。”麦克米兰说，“我们的孩子没钱找个地方住，什么地方都没有。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对！房租太他妈高了”。“房租太他妈高了”党表示该党只代表纽约五个主要行政区布朗克斯区（TheBronx）、布鲁克林区（Brooklyn）、曼哈顿（Manhattan）、皇后区（昆斯区）（Queens）、斯塔滕岛（StatenIsland）人民

的利益，和偏远区域的人们毫无关系，因为房租太他妈高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发达的市区。“房租太他妈高”了党表示纽约市区8274527名选民们的力量完全可以让该党成功当选州长，同时也希望纽约州其它部分的人民们给予理解和支持。对于美国选举中常见的争议性话题，诸如堕胎、枪支管理、医疗保险，麦克米兰不屑一顾。谈论到同性恋是否可以结婚时，他干脆说：“你要愿意和一双鞋结婚，我也没意见。”

“房租太他妈高”党官网的音乐是麦克米兰自己的饶舌音乐，满篇令人眼花缭乱的超级链接地址和闪烁的动漫形象，包括他自己被网友恶搞的“绿巨人”形象在内。信息量如同纽约当地媒体所说，“超出你的需要”。

网站是麦克米兰自己设计的，在这个网站上，他告诉选民们，他若当选纽约州州长，就将强令降低房租，创造300万至600万个工作岗位，解决饥饿问题、无家可归问题、就业问题等等。

该党官方网站列举的数字说，纽约市区的一居室每月房租可能高达4600美元，这也是纽约市民常常抱怨的话题。竞选人麦克米兰许诺，他如果当选州长，将申请通过“紧急状态经济法案”，法案将赋予州长降低房产税率和强制规定房租上限等权力，“不服从的家伙可能要进监狱”。“比如，现在纽约人每月花1800美元租房子，如果你让房租降到900美元，他们兜里就会多剩下900美元。”麦克米兰说，“人们更有钱花，更多的钱投入流通领域，这些钱继续生成财富并越来越多，还能够解决失业的问题，用简单的数学就可以搞明白这个道理……”

麦克米兰知道有选民说他是疯子，但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一定有效。他说：“因为我是花钱上的天才。我在全球最大的城市建立了我的政党参加竞选，在1600万人口的城市里，我只用了16.91美元。”16.91美元是麦克米兰今年参选州长所筹得的全部捐款，这笔钱还躺在他的银行账户里。当然，他可能还有另外收入：在“房价太他妈高党”网站上，印有党的名字或者麦克米兰头像的T恤每件卖18~39美元不等。当然，仅凭这点钱，麦克米兰依然不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竞选活动，更别说电视广告了。七位志愿者帮助他一起组成了竞选团队，其中包括一名社区大学的

教授和四名律师。

但麦克米兰的目标远不止于仅仅参与竞选。在该党网站上，麦克米兰表示，主要寻求纽约市选民的支持——因为纽约州北部地区并不存在“房租太他妈高”的问题。他深信只靠纽约市区的选票就可以将自己送上州长宝座。

他甚至开始规划，当州长每年会有 14 万美元的薪水，这些钱都可以给他的孩子们——包括他那个失业的儿子。同时他也向记者反复承诺，绝不举办任何庆祝活动。“一旦我胜选——我一定会的，我就马上去拜访那些无家可归者，请他们去吃饭，午饭晚饭都可以。在那些人得到住所和食物之前，我不会庆祝，也不能庆祝。”

2010 年 11 月 1 日是西方传统的万圣节，这一天，人们通常会在晚上身着奇装异服聚会庆祝。麦克米兰说他会打扮成“自己的样子”，然后让人们说：“嘿！你看起来像吉米·麦克米兰！”“然后我告诉他们，我就是吉米·麦克米兰。哈哈！因为我想听到他们的笑声。”2010 年 11 月 2 日晚，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揭晓。纽约州长选举结果像大多数民调机构的预测一样，民主党候选人安德鲁·科莫以 52% 的选票数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卡尔·帕拉蒂诺（获 44% 选票），当选新一届纽约州州长。而麦克米兰与其他独立参选人一起，只获得了总票数的 4%。虽然失败了，但他如约在投票日当天晚间 10 点来到 WQAD 电视台的谈话节目，痛苦地质问选民们：“你们今晚为什么要这样投票？我不懂，这真让我心碎。”他还对那些没有投他票的人发出了警告：明年纽约的房租还会上涨。他甚至表示，会去车站或者机场跟那些付不起房租被迫离开纽约的人挥手道别。“房租太他妈高了。”他又一次强调了这句话，尽管稍有落寞。麦克米兰：唉，2004 年“房租太他妈高”党成立的时候，没人相信我。他们只觉得我是个笑话……但 2004 年，房租太他妈高，2005 年，太他妈高，2008 年，高！2009 年，高！……到了 2010 年，你猜怎么样，房租还是太他妈高了！现在人们发现我说的是对的，他们本来可以早点相信我的。

“房租太他妈高”党虽然选举失败，但其知名度以星火燎原之势在美国攀升，甚至已经有人制作了《飞屋环游记》Remix 版的宣传和对他进

行恶搞式的宣传。随着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参选人名单上很可能会出现两个黑人面孔，一位是现任总统奥巴马，另一位就是麦克米伦。

3. **性爱党**。2010年7月20日，在澳大利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性爱党”在墨尔本发表竞选声明，宣称要参加当年澳大利亚国会大选，并力图打破传统主流党派对澳洲社会的控制与束缚，目的是让澳洲民众对“性爱党”有个全面客观地了解，并对该党推出的“跟性爱有关”的议题采取正面而积极的态度。澳大利亚的“性爱党”成立于2008年，2009年在澳洲选举委员会正式注册为一个合法政党。该党的党主席叫菲奥娜·帕滕。

2010年1月，澳大利亚政府为防止儿童接触网上色情及暴力信息，决定要求强制网络服务供货商，过滤掉不适合入屋和在学校浏览的淫亵及其它被认为是不雅的内容。澳大利亚政府的这项决定一下子激起国内色情行业不满，他们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没有尊重民意擅自做出决定是典型的独裁和霸权的表现，于是决定于2010年1月20日在墨尔本组织一个政党叫“性爱党”来对抗政府，并推荐澳洲成人产业零售及娱乐界游说组织“爱诺斯协会”会长帕滕，担任“性爱党”党魁。“性爱党”自我标榜“我们对性是认真的”；反对政府强制过滤信息。“性党”认为政治已令澳洲变得太过古板和保守，他们要在卫道之士和墨守成规的政客面前，为澳洲人正常的性需要作出政治响应。“性爱党”党魁帕滕，认为澳大利亚政府于2010年1月宣布将强制过滤互联网的计划，是他们组成政党的导火线。帕滕对澳大利亚政府批评道，在20年前被认为可接受的信息，竟到今日又被禁止，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她认为政府这样的做法不仅会损害色情行业，更重要的是这种过滤方法实际上会把任何成人网站均列入黑名单，而成年人在澳洲的报摊却可合法地买到这些色情物品。除了反对互联网过滤外，“性爱党”还在党纲规定：开设国民性教育课程、减少政府对性爱审查及支持同性恋婚姻，以及包括推动安乐死合法化、促进私人使用各种药物正当化、废除过于苛刻的反色情法律、推动全国性教育课程、放宽审查制度标准、废除澳大利亚政府现有网络净化政策提案以及支持同性恋婚姻法等主张。

针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现任总理吉拉德领导的工党和反对党领袖托尼·阿博特领导的联盟党提出的口号分别是“前进澳大利亚”和“站起来，开始行动”。“性爱党”的党魁帕滕讽刺说：“我们的‘性爱党’才是一直都在前进并且真正在行动。”“性爱党”渴望打破澳大利亚的传统政党政治，给澳大利亚民众带来新鲜的政治感官与视觉享受。

4. **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Official Monster Raving Loony Party，简称 OMRLP），是在英国正式注册的一个政党，由著名音乐人 David Sutch 在 1983 年创建。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的现任党魁名叫阿伦·霍普。1987 年，阿伦·霍普（即现任党首）当选德文郡 Ashburton 镇议员，1998 年，他当选该镇镇长。该党曾经推出了大量候选人参加过 1992 年的英国大选，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到 5% 的选票。英国的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已经在英国政党政治生活中奋战了 20 多年。从 1999 年该党领导人萨奇勋爵逝世后，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就开始采用一种轻松搞笑的方式来参加它的第一次英国大选。2008 年，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更是推出他们的猫领导人——曼笃，作为党派候选人。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的口号是：“投票给疯子吧，你们知道这才是明智之举！”该党的领导人霍普说：“青少年不会投我的票。有些人即使看到了、听到了（英国的不民主），他们仍然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只能用政治来开玩笑，用我们的方式来改变这一切。24 小时酒馆、18 岁就有资格参加竞选这些政策都是我们在 1964 年首先提出来的。1979 年，当我们说‘给宠物发护照怎样’时，所有人都是一阵哄笑，但现在，这已经成为现实。”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的政纲是：誓言要引入 99 便士硬币减少找头；禁止使用邪门的 13 号号码；把学校课桌的尺寸变小拼到一起，实践小班教育。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每次提出的竞选政纲在变化之中总会保持其连贯性。

5. **金发美女党**。2006 年 3 月 8 日，俄罗斯“金发美女党”横空出世。“金发美女党”的总书记是一位美女经济学家叫沃洛希诺娃，该党主席则由一位叫谢尔盖·库什涅夫的男士担任。2004 年，沃洛希诺娃很偶然地进入一个叫“金发情人俱乐部”的互联网论坛。这个论坛是由一个

名叫谢尔盖·库什涅夫的人创建的。最初，他们在论坛上的话题以逗乐为主，进而转向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在对当前俄罗斯女性面临的各种问题方面，他们的共同点越来越多，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女性政党。他们认为，要在党派林立的俄罗斯政坛立足，并能吸引民众的眼球，新组建的政党就得与众不同，于是就出现了这个“金发美女党”的名称。

为了使“金发美女党”迅速壮大，党的总书记沃洛希诺娃必须让俄罗斯选民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她自己和她的政党。她为政党的发展设计了3场“战役”，以展示自己的能力：第一场战役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参加“金发美女党”。沃洛希诺娃说：“由于种种原因，大量俄罗斯金发美女离开了祖国。我们必须创造更好的条件，吸引她们回国。这样，很多男士就会被我们吸引过来，投我们的票。”第二场战役就是争取国内知名金发美女，以壮声势。圣彼得堡女市长马特维延科、著名网球明星莎拉波娃，以及社交名媛克谢尼娅·索布恰克等都在沃洛希诺娃的邀请名单上。第三场战役就是尽快打造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团队。沃洛希诺娃透露，“金发美女党”也欢迎有能力的男人加入。比如，“党主席库什涅夫就是一个男士，为了党，他甚至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金色”。沃洛希诺娃“野心”颇大。她说，“金发美女党”要在下届总统选举中挑战梅德韦杰夫，“我们已在他的身边安排了一个‘内应’——他的夫人斯韦特兰娜。她也是一位金发美女。”希望斯韦特兰娜能够加入“金发美女党”。

无独有偶，统一俄罗斯党在竞选的时候也打过美女牌，做过很好地尝试。2007年12月，俄国家杜马选举前夕，普京曾抱怨说，统一俄罗斯党内漂亮迷人的女性太少了，很难吸引男性选民。随后，这一“错误”很快得到“纠正”。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迅速地把前奥运会体操冠军霍尔金娜等5名光彩照人的美女网罗麾下，迅速被推举为统一俄罗斯党的党代表。5名美女刚一出场，就使统一俄罗斯党人气猛增。尤其是霍尔金娜，当年她每次出场都“让对手感到绝望”。以霍尔金娜等5名美女的加盟令统一俄罗斯党星光璀璨，尤其是霍尔金娜、卡巴耶娃、朱洛娃和娜塔丽娅这4名体坛美女，都是俄罗斯非常有名的体育明星。这些明星美女加入到统一俄罗斯党后，进入不同选区，凭借着广泛的知名度和

极高的人气，她们都成为所处选区的高票获得者。如朱洛娃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列宁格勒区分部，在10名竞争分部参选国家杜马议员的党员中，只有排名前三名的党员才获得参选资格，朱洛娃的得票排第二位，并最终顺利当选国家杜马议员，目前她是国家杜马法律委员会成员。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甚至强调，普京与执政党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包括霍尔金娜等在内的五大性感美女功不可没。如今，霍尔金娜等五名进入国家杜马的美女议员已经被外界称为“普京宝贝”。沃洛希诺娃认为，统一俄罗斯党的此次尝试表明，美女在俄罗斯社会上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而这种“冲击力”完全可以转变为政治动力或政治魅力。她希望自己所在的政党能够把俄罗斯女性的魅力转变为“政治奇迹”。“金发美女党”成立后把政治目标盯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希望由一位金发美女把梅德韦杰夫总统拉下马，让一名金发女郎当上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近百年来，俄罗斯从没有出现一位治国的女性领袖。如果说“普京宝贝”为老人理政的杜马席位添上一抹亮色，那么“金发美女党”力求松动俄罗斯政坛的性别闸门。

2010年7月15日，在罗马尼亚国家中，同样也出现了一个名叫“美人党”的无厘头政党。该党党魁是一名性感模特叫苏兹安娜。“美人党”只招收长相漂亮的人，该党的党魁苏兹安娜认为，国家如果想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地位，就必须让公民都有好看的外表与形象。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都能光鲜亮丽就能给国家带来形象加分，很自然，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上去了。苏兹安娜还主张对肥胖者进行征税，每超重1公斤就征收10欧元的税；同时对那些嘲笑美人们胸大无脑的人进行惩罚，她认为这种人应该送进监狱去反省。“美人党”的其他政治纲领与主张还包括：对无信仰者罚款100欧元，对从事导游工作的人只准是身穿比基尼的模特们。她认为后者能振兴罗马尼亚的旅游业，让世界见识罗马尼亚的魅力。她希望“美女党”的出现能使罗马尼亚政治家的传统形象一举改变。

6. **“恋童癖”党**。2008年5月，荷兰一群恋童癖者组成了“兄弟之爱、自由和多样化党”，简称“恋童癖”党，该党同时声称要进军政坛。该党此举立刻遭到荷兰举国痛骂。一个儿童权利保护组织还诉诸法庭，

要求将其取缔。为此两家对簿公堂，结果这家儿童权利保护组织败诉。而“恋童癖”党所以胜诉的原由在于该党的党纲、党规以及行为并没有触犯相关法律，因此它被允许作为合法政党，参加荷兰政治生活。荷兰是欧洲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不过，自从1996年邻国比利时发生震惊世界的马克·达特洛克斯恋童癖谋杀案后，恋童癖的话题在荷兰一直是个禁区。随着欧洲各国对同性恋、卖淫等与传统道德相违背的行为越来越宽容和理性，恋童癖者又蠢蠢欲动。“恋童癖”党的一些主张偏激，公然宣扬废除对恋童癖的禁令，要求将发生性行为的合法年龄从16岁降到12岁；允许电视台白天播放色情节目，晚上播放性暴力的节目；允许儿童接受性教育；允许16岁以上的青少年出演色情电影等，完全违背荷兰主流生活。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恋童癖者们的挑衅主张激怒了荷兰社会。近来的民意调查显示，荷兰高达82%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取缔该党。

7. **香港的社会民主连线**（简称社民连线或社民连；英文：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LSD）是香港一个由激进民主派组建的政治性组织，社民连主要成员在2006年4月17日于乌溪沙青年新村成立，该组织将以香港泛民主派左翼光谱为号召，辅以基层路线，并打出反对私有化等作为旗号。时事评论员黄毓民当选主席。该党旗帜鲜明地捍卫基层利益，标榜自己宣扬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社民连表明自身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是一个支持民主的左翼团体。”

社民连中央的十二大政纲：1. 全面落实普选，一人一票选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2. 立即取消区议会委任及当然议席；3. 维护法治，反对人大释法；4. 保障言论自由，开放大气电波；5. 停止公营事业私有化，制定公平竞争法；6. 改善贫富悬殊，革新税制，建立全民退休保障；7. 保障劳工权益，恢复集体谈判权，订立最低工资、最高工时；8. 确立公营房屋制度，增建公屋，恢复出售居屋；9. 维持全面、公平的公营医疗系统，反对肆意加费，取消药物名册；10. 免费学前教育，普及十二年免费教育，增扩大学资源；11. 保护环境、引入再生能源，积极除硫、减低空气污染；12. 制定完善的文化、保育及艺术政策，改革城市规划，促进市民参与。2008年9月，以言行出位、立场偏激著称的社民连政党，虽

然才成立两年，在参加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参加直选的5名候选人有3人当选，累计票数多达十几万。社民连的崛起是否说明香港的政治生态和选民的情感结果发生了变化？以社民连为代表的所谓的泛民左翼，或者说泛民里面的极端派，他们跟泛民是有区别的。为什么社民连这样的一种色彩很激进，言行很出位，特别是以黄毓民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形象，能够在选战当中取得相当令人注目的成绩？可以这样看，这次选举投票的人，登记的选民是300多万，但是实际参加投票的只有45%，也就是150多万，而社会民主连线，就是社民连这样的一个小党，这个没有什么钱的，没有多大资源，它基本也没有什么基层组织的；但社民连的三个主要负责人黄毓民、梁国雄等三人一共拿了15万的选票，这很惊人。以这样的一个小党，以这样的一个没什么资源，也没多大影响的小党，竟然能够获得十分之一的选民投票；可见，你不能不注意他们在香港的政治生态当中，在香港选民的选择与取舍之中，他们代表了某一种趋势。

社民连党部负责人之一的陈伟业，就社民连的成功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认为，社民连的魔力在于黄毓民的个人魅力，但是，一个合格的富有生命力的政党的长远发展不能全赖于一人的影响力，当下，需要有计划地举办政治培训班、成立党校，以把党主席的个人魅力转化成组织系统，也就是把个人权威转化为组织制度权威。社民连打算搞培训班、成立小组，改善社民连的行政架构。社民连于2007年举办过两期“地区事务工作坊”，每期工作坊约三十人，均于短时间内爆满。社民连希望藉此招揽有意参与地区工作的会员，工作坊邀请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及资深地区工作者主讲，内容包括社区工作理念、地区工作组织手法等，辅以个案研习，并加设例子解释。除工作坊外，社民连又会定期举行讲座邀请嘉宾与会员分享及讨论时事，如曾邀请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朱幼麟，计划中的嘉宾则有前商务及经济事务局局长马时亨、现任环境局局长邱腾华等。有的对于民主理念非常熟悉，有的则热衷于讨论时事议题，但大部分均对地区实际工作认识不多，他则要求参加者承诺完成课程后一定要“落区”尝试地区工作，工作坊结束后学员会分成若干小组在地区进行三个月的实践计划，社民连会向每组学员给予1000元的资助，让他

们尝试自订议题筹办地区工作，再定期检讨。

在香港的政治生态当中，在香港的选民选择当中，他们代表了某一种趋势和潮流，就是贫民无法通过主流政治渠道争取利益以及各个阶层、群体对主流政治的不满和怨气。在街头抗争，哪里有抗议，哪里就会出现这些人。为什么有15万的选民会选出这么一批人，他们对香港目前的政治经济的结构，有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有种无奈的感觉，但他们希望有人给他们出头，替他们抒发怨气，为他们搅乱主流政治，于是就有了社民连的出现。虽然可能是一个小的派别，但是可能是一个破坏性很强的派别。多了像黄毓民这样的搅局者，但肯定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而且引起激烈讨论的。社民连的崛起，主要在于其一方面侧重的是本土议题，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在特区政府未来施政中重视福利主义的这样一种呼声，解决低层民主生活问题。

上述谈到的无论是“茶叶党”、“性爱党”、“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还是“金发美女党”、“恋童癖”党和香港的“社会民主连线”，它们的出现决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们是当今社会转型中的另类政党的范式显现，这类政党的出现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活在政党统治的时代是问题丛生的时代，是政党掌控绝大多数政治资源的时代，一些另类政党渴望以另类的方式带给民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新鲜的政治感官享受，搅乱主流政治，制造政治奇迹，渴望打破传统政党的统治霸权。

二、“隐藏的文本”再现及其意蕴

在由经典现代性社会向反思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有别于传统政党政治的另类政党。这类政党以相对新颖、激进、搞怪甚至是无厘头的政治纲领与政策主张对抗传统的政党政治，认为主流政党的政治是政治精英的公开的虚伪与戏耍，无法满足也不可能满足社会各个层面和群体的多元与差异的利益诉求，而人们希望通过支持新兴

的“反体制政党”或“另类政党”来表达自己对传统政治和主流政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元叙述”的愤懑，希望借助这种隐藏的文本作为底层反抗现实政治的工具，以另类或极端的政治参与形式，关注生态政治和伦理政治、族群政治，追求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提倡抗议民主、激进民主，实现权力的边缘化、多元化、平面化和生活化。

（一）“隐藏的文本”再现

美国著名的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①]在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个重要概念，用以解释底层群体生存与反抗的逻辑。“隐藏的文本”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而存在的，是指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它们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斯科特曾指出，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形式不同的各种“隐藏的文本”，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表达不满或者提出一种批评，它使从属者可能破除虚假意识和神秘化的迷障。当下，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非主流或另类的政党政治，其实也是一种“隐藏的文本”；因为，这类政党无法像主流政党获得权力支持，公开借助议会、集会等庙堂形式合法地有序地对民众进行压迫和撒谎，只能以另类的隐匿的形式表达人们对传统政党政治的不满与抗争。这种“隐藏的文本”让人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搞笑、恶作剧或发泄不满等无厘头行为，而是关涉每个民众的权利、自由以及政治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恶搞”当然是无奈之举，是一种感性的表达和情绪的发泄，但它也是一些弱者的武器，

① 詹姆斯·C. 斯科特是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他以研究农民问题而著称，其有关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1976）、《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6）、《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1992）。而“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就是贯穿于这三本著作的核心概念，并体现了作者对农民政治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推进。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斯科特为底层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并为人们理解农民反抗和农民政治提供了极富洞见的分析视角。《支配与反抗的艺术》一书，则可以视为是对这一议题的更为深入的研究。这本书的一个中心要点就在于其有关“隐藏的文本”的讨论即作为底层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是如何被创造、保护和阐释的。

是草根的表达方式与工具。因为另类政党所代表的政治共同体不是强势者群体，没有权利去掌握具有合法性的“公开的文本”，对他们而言，公开的、正当的、自由的表达渠道是封闭的。他们只能借助于“隐藏的文本”，向处于统治地位的政党宣告这类底层群体仍然存在，仍然在力争各种权利与权力。

斯科特的研究告诉我们：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争夺的地带。但是这块交接地带并不是一堵结实的不可翻越的墙。底层民众围绕这一界线的不懈斗争或许是日常冲突和阶级斗争日常形式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隐藏的文本”，以此去抗争，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反抗所要达到的成就。这种空间不能指望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也不能寄希望于被赐予，而是通过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是在努力表达中获得的。我们不能简单从事物的表面现象来判定“性爱党”、“官方妖怪狂欢发疯党”和“恋童癖”党等另类政党，过于恶搞、低俗甚至下流，岂不知主流政党背后的下流和恶搞，更是超乎人们的想象，只不过其作呕和下流行为被隐藏得很好，很难进入普通人的视界之中而已。

（二）底层社会的抗争性政治

1982 年，由古哈、查特杰、查克拉巴提、沙希德·阿明、潘迪等五位研究南亚历史的历史学家共同撰写了一本专著叫《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又译为《庶民研究》）。作者在这本书的第一卷首次提出了“底层研究”这个命题。“底层”（Subaltern，或译为“庶民”）在《简明牛津词典》中的解释是“低等级的”。在《底层研究》中，“底层”超出了一般意义的理解，主要是用来指代南亚社会中被宰制下层（subordination）的总称，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的，还是以其他任何形式来表现的[①]。纳吉特·古哈等学者在研究南亚社会中下层群体的生活状况运用“底层”这个词，主要是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

① 参见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序言”，林德山 译，载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者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借来的。“底层”一词最早出现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 Gramsci）的《狱中札记》中，他用了Subaltern Classes一词，可译成“底层阶级”，从书中看来，葛兰西用“Subaltern”的用意是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阶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著作里的“无产阶级”应该与“底层”保持着密切关联。但，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葛兰西的“底层阶级”所包含的人群范围要大于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应当包括马克思主义中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其他被压迫阶级或阶层，比如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无业者等。

葛兰西之所以用“底层”一词包含了这些阶层，自有他的深义。《狱中札记》一书中，葛兰西的一系列笔记都以“属下阶层历史”为标题。如1934年编号为Q25的笔记整个标题就是《在历史的边缘：属下阶层社会群体的历史》。官方历史记载中没有属下阶层的历史，统治阶级的主流叙事将属下阶层的历史边缘化。因此，只有从历史转折时刻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才能理解属下阶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属下阶层的界定为，被剥夺了历史原动力，处于连续却散乱状态，无力从根本上超越自我，仍受国家权力和弥漫整个社会的霸权实践制约。葛兰西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关键在于其思想视野的开阔与独到，他不仅注意到统治阶级，更关注底层阶级与阶层，他认为属下阶层是哲学视野中独特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样态，应当受到高度重视。

著名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一书中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他认为，“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① 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则被第一个阶级以有多少是合法的、又有多少是专断和粗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

① 〔意〕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由精英构成的统治阶级被看成是主流政党政治的主体，而被统治的底层大众只是政治的承受者，被排除在主流政党政治之外。主流政党所代表的这种精英主义政治观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对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分析和判断，也主宰着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但在实际上，正如社会永远不是铁板一块，社会的结构与组合总是处于不停地变动着的，精英政治根本不可能涵盖和控制社会所有的领域，在精英政治之外，底层社会的政治主张和行为不仅存在，而且对政治社会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底层政治表现的更多的是底层民众的自发行为，其行为方式也许是隐性的、自发而零散的，也许是民粹的、感性而盲目的，他们只有通过另类政党这类政治共同体所代表的“底层人物”的意愿和行为的凝视，人们才可能清晰地看到隐藏在社会发展与变革这一宏大话语背后的种种微妙复杂的因素，才能洞察和理解当代社会的隐秘与真实。在传统政党政治的话语体系中，政治是精英们的专利，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而另类政党的政治只能算是一种反应性或应对性，它是对传统政党给予的现实政策的解答表示不满的一种解释的方式和解决的路径。从理论和法律的层面上说，政治是对民主政体中所有人开放的。精英和大众都在追求政治权力，但在实践中，一些人政治参与及其获利比另一些人更多。由于有着良好教育和经济境况的人就具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他们即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但是，理性算计和利益诉求却是精英和底层民众进行政治行动的共同依据。另类政党所代表的底层民众同样要追逐利益，要分享利益，要改变自身的处境状况。当前，如何关注另类政党的“隐藏的文本”？前提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对政治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我们需要深入到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底层民众是一群被社会排斥的群体。社会排斥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其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圣经所记载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例如，罗马的剥夺公权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统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① 这种横向延伸的特性可以有效地破坏纵向的官僚等级结构，使社会结构逐步扁平化，这也导致人类的交往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因为网络具有扁平化、聚集化和弥散化等特征，可能导致工业社会的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纵向等级权力结构发生重组，例如，权力下移，组织扁平化，集权和专制正在让位于分权和民主，一元决策中心正在发展为多元决策中心。在互联网上，所有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是均等的，因为“网络倾向于水平延伸，而不是纵向发展。”② 也就是说，网络关系是同等级之间的横向联系，这是金字塔结构所没有的。可以说“网络中的各个环节属于平级，或根本无等级区别。”③ 网络上交流的主要是信息与思想，而不问交流各方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是说，网络交流剥去了网民的权力、财富、身份、地位、容貌等因素，只就思想言论进行交流，尽管参与者的身份地位可能不同，但在思想交流上是平等的。网络的权威是凭藉着能力和魅力树立起来的，而不用以社会等级或官位作基础。俄罗斯学者拉特波夫曾形象指出，在“万维网”上，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在控制空间（“虚拟现实”）中，乡巴佬心理消失了，这里没有“首都”、没有长官、没有垄断，也没有国家和政府。网络空间领域的这种特性是属于非确定领域，和传统意义人们理解的公共领域具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种非确定领域中，人们既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科层体制，也反对代议制民主，更多的是追求个人自治、个人自由，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通过网络而出现的这类新型政治参与主体，虽然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力，但是，同时也进一步疏远了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导致一些政党正在承受着经典现代性的负面结果，而陷入“党派地质学”的长期震动之中。

---

①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吴迎春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 页。

②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吴迎春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0 页。

③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吴迎春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0 页。

就可能由于政治参与的剧增而产生政治动乱。[①] 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而失控并危及政治秩序的现象非常普遍，尽管在发达国家中，这类现象并不普遍，但是遭受社会与政治排斥的群体，不甘心陷入贫穷、苦难之中，必将进行抗争。他们的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等非正式的政党组织与合法性的表达渠道。他们不甘心作为被“合谋”的沉默一族，采取散布于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的生活政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解放政治，以各种另类运动的方式参与政治表达与利益诉求。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政治排斥问题，化解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逐步提高政治体系对于政治参与扩大的适应性，通过逐步的政治变革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就会导致政治风险的累积，增加政治发展的代价。

在传统政党的政治生态时空中出现的这些另类政党，它们之所以能够生成与发展，似乎表明传统政党政治的具有明确目标的功能性活动将逐渐向一种表达与表演的功能性活动转变，政党政治将日益面临去精英化而走向世俗化的趋势。人们的政治生活可能不再仅仅依赖特定政党组织或团体而获得，完全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诸如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和平运动、社会自助等等非政府组织等政治共同体而获得。这些政治共同体或因为某种价值理念或因为某种特殊事件可能走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冲击传统政党，来扩展社会权力。

当前，在一些西方国家中，由于政治体系结构的僵化，对于政党来说无法从容应对晚期现代性带来的挑战；对于民众而言，政治参与日渐冷漠，投票率逐年降低，对政党忠诚度逐年下降，社会上“反政治”的氛围逐渐高涨。对政治的大规模的集体认同与社群意识渐行渐远。当下的社会呈现出的是大众文化日益分殊化，社会阶层日益多元化，人们的身份认同日益混杂化，政党传统结构与功能日益衰退化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既不同于传统的专制社会，也不同于自由民主的社会，政党很难用传统的“政治”概念来理解这个社会中的现实政治，政

①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页。

早在1964年，法国学者皮埃尔·麦斯（Pierre Masse）在其报告《Les dividends du progress（利益成长）》中首次采用“排斥”一词。紧接着，在1965年，法国学者克兰弗尔（J. Klanfer）以社会排斥为题出版名叫《L’exclusion social（社会排斥）》的一本专著。同一时期，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也开始频繁在其作品中使用“排斥”概念。例如，在布迪厄的《学生文化》（1968）、《文化资本》（1977）、《体验》（1984）、《法国大学》（1988）、《文化产品》（1993）、《学术话语》（1994）等中，我们均能看到“排斥”和“自我排斥”（Self exclusion）等概念。但是，第一个提出真正具有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首推法国社会政策分析家勒努瓦（Rene Lenoir）。1974年，勒努瓦发表题为《Les Exclus，un Francais sur Dix（被排斥群体：法国的十分之一人口）》的论著，他在这本专著中，用“Les Exclus”（被排斥者）这个概念指那些没有被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人，包括单亲父母、残疾人、失业者等易受伤害人群。[①]“社会排斥”概念几经发展，最终替代了“贫困”或“剥夺”概念，成为了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新概念。人们通过研究发现，基于性别、民族、种族、宗教或社会地位而引出的歧视可能导致社会排斥，尤其是政治排斥，可能使人们长期陷入无任何政治权利的陷阱之中。在一系列的社会排斥中，政治排斥对人们的伤害最大，尤其在欧洲社会，人们的物质需求已经基本上得到了保障，人们更多的是需要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政治排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广度，增加了他们政治参与扩大的难度和风险。扩大政治参与一直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否则就可能导致政治动荡，使政治发展的进程遭受挫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出现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这个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状态，使这种对政府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难以得到缓解和集中的话，

① Tania Burchardt, Julian Le Grand and David Piachaud ,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ian 1991 - 1995, Social Policy&Administration, Issn 0144 - 5596, vol. 33. No. 3. September, 1999, p227 ~ 244.

第七章　新传媒时代与党派地质学的震动

随着现代性的变革和新传媒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以皮下注射论、“把关人”的控制理论和“沉默的螺旋”等理论构成的经典传播文论遭到了解构。在新传媒时代中，网民不仅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科层体制，同时也存在反对代议制民主的倾向，他们所追求更多的是个人直接民主与自治，而不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虚拟网络空间中，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和“散漫”的地方，网民喜欢采取小规模的、分权的、开放的、流动的组织方式进行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和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产生。网络社会的发展，正悄无声息地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政治生活，使得以研究和揭示人类政治关系、政治形式、政治活动以及发展规律的政治学和人类的民主政治实践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社会所展现的空间政治学意蕴，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未来的政治生活。

一、网络共同体与非确定性领域生成

和以往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组织相比较，网络时代中的“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①]“在网络组织里，信息本身就使一切事物趋向平衡。”[②] 可以说网络“削弱了旧权力系

①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孙道章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②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孙道章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党在传统治理过程中，遭遇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在合法性危机过程中催生的另类政党，很明显地表现出后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与个性。随着现代性社会的推进，民众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关注更为强烈，一是人们对民主体制当中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不断增进的了解；二是个人政治责任的自觉意识逐渐增强；三是人们的独立社会良知的成熟以及在此一良知统辖之下不断增长的要求。① 面对民众对政治的敏感与自觉，捷克总统哈维尔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否定政治的政治”。他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认为：“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不作为权谋、操纵技术的政治，不是作为对人类作程控式驾驭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呢？哈维尔认为应当是为道德、为真理服务的、为人性关切而尽力的政治。显而易见，这种政治是来自于真实生活中所蕴涵的力量，并非在权力层面上的一种政治较量，从这种政治观来看，所谓政治上的成功，已全然不能用权力的转移、交换、更替等既有公式来度量。哈维尔认为，“这是一种细菌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以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种“否定政治的政治”，主要是来自真实中的生活，是源于人性中向往自由的冲动与力量，是源于个人的良心与责任。当然，这种遍布日常生活的政治也可能转化为政治组织政治活动，转化为“更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工作”。但是它与其他的生活之间并无极为严格的界线。规范性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可能只是一座冰山浮在水面的十分之一部分，而更多的散布于真实中生活中的“生活政治”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前文谈到的一些另类政党无论是其生成还是政治发展都与现实生活中具体而清楚的事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对另类政党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分析，应当有充分的理由给予政党在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以新的定位，同时，给予最基层普通民众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性”以高度的重视。

---

① 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0 页。

（一）现代性的变革与网络共同体的特质

“网络共同体”，顾名思义，是指“网络”与网民组成的“共同体”合成的产物，是网民在网络上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属性或共同兴趣所结成的一种“团体”或“组织”，是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信息网络技术的产物。和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相比较，在网络共同体中，网民是组成网络共同体的基本单元，网民之间结成共同体的媒介是信息网络，基础是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属性或共同兴趣。信息时代的西方社会结构在变化，知识阶层、网络阶层在兴起，进一步促进网络共同体的发展壮大。网络共同体在网络社会中已经存在并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已经成为网络时代新型的政治参与主体。

由于互联网上存在大量政治信息的汇聚，网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热点各异，加之网上利益表达自由度增大，必将导致各种观点各异的思潮兴起。由于网络方便快捷的联系方式，为网络共同体迅速崛起提供了便利，网民往往由于寻求共同的利益诉求而形成网络共同体，这其中不乏政治性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利益表达。随着网络的普及，尤其是虚拟社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生，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电子方式把网民“链接”在一起组合成网络共同体。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网民在网络中进行交流或组织活动显得异常简单。网络政治共同体成为网络时代的重要政治主体之一。随着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推进，网络政治共同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关于政治共同体，西方学者对其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也被称为政治社区。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公认的政治机构和特定的居住区域的人们所构成的社会集合体。美国政治学家 K. W. 多伊奇则把政治共同体看作是类似于政治系统的东西，他说，政治共同体是“辅之以强制和服从的社会互动者”，它由形形色色的政治行为者构成；美国政治学家 E. B. 哈斯把政治共同体当作一个理想的、典型的政治单元，认为政治共同体最主要的要素不是地理区域而是政治关系，尤其是公共的政治权利以及公民对核心政治机构的忠诚；另一位美国政治家者 D. 伊斯顿把政

治共同体看作是联结政治系统成员的一种纽带，最基本的要素是情感的联结。他对政治共同体所下的定义是，“政治共同体这个概念，指的是政治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则认为，政治共同体以种族、宗教、职业和共同机构为基础，它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对政治和道德规范的某种共识；二是共同的利益；三是体现道德一致性和共同利益的政治机构及政治制度。尽管政治学家们对政治共同体的认识不同，理解各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政治共同体，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是政治利益的共识，并且拥有共同的政治机构。实质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利益共同体”，或者说是“利益集合体”。而且这些政治共同体是在其成员共同认同和利益共识的基础上构成的，与社会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是社会政治生活有序性的一种结构基础，具有重叠性和不变性的显著特征。即使是在网络时代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研究的“网络共同体”也具有“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它具备了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元素。网络共同体并不是因为存在而存在，只有当其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并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影响时才有实际意义。正是由于网络共同体产生的时代背景、技术基础等特殊性，使网络共同体具备了不同于一般意义“政党”、“社团”、“组织”的特质：

一是在价值观方面。网络共同体在价值观上是反现代主义的，反对在经典现代性社会中，把经济增长当作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的现代主义价值观；主要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推崇人际团结（interpersonal solidarity），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科层体制；更多的是追求个人自治、自由和生活权力，而不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总而言之，网络共同体渴望通过网络而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身心关系、两性关系、工作伦理和消费价值观等。

二是在行动方式方面。网络共同体在行动方式上既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科层组织制度，也反对代议制民主，追求直接民主表达。网络共同体喜欢通过网络进行游行、请愿、静坐（sit - in）、进占（occupation）等体制外的、“非常规的”、直接民主的政治参与方式；在组织形式上，它

倾向于采取小规模的、分权的、开放的、流动的组织方式。这一点与工人运动通常采取的工会和政党的斗争方式是根本不同的。

三是在自主性方面。尽管各种各样的网络共同体形成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没有一个网络共同体是管理者强制产生的。相反，任何管理上的强制措施反而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由于网络共同体是组织成员自发形成的，成员间的联系完全依赖个人关系和网络链接，而不是组织机制，因此成员可以随意跨越功能障碍，体现了充分的自主性，他们是一些典型的“看门人”（gate keeper）和“边界跨越者”（boundary - spanner）。

四是在构成的背景方面。网络共同体是依据网民个人兴趣和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在一起经常会谈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包括生活的和工作的以及政治的，其成员都具有相同的兴趣和相似的专业及职业背景。和一般政治共同体相比较，网络共同体的特质具有以下几个属性：

1. 网络共同体的“民间组织”属性。网络共同体与现实中的“政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其各自独特的内涵。政党一般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具有系统化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原则，政党一经成立就有其稳定性。而作为网络政治中的政治主体——“网络共同体”则不同，由于其组成单元的虚拟性、目标的多元性以及组织的松散性等特征，导致它不同于我们所说的“政党”组织。说它是政治主体之一，主要是由于一些网络共同体组成目的直指公共利益和权力这个“政治”的核心目标所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网络及网络共同体的发展，它是否可能成为政党性质的组织，还有待于时间给予检验，这一点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

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共同体是一个与现实社会中“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社团）”性质相似的概念，但两者似而不同。无论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还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需要一种开放性，以利于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间组织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丰富其内涵或扩展其外延。民间组织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是，公民自愿组成，

从事非营利活动的社会组织。其中，“自愿”意为“不被强迫地参加或不参加某一组织”；“非营利”指该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的成员不直接分享组织可能获取的市场利润；“公民自愿组成”表明其是非官方的，即具有民间性。可见，“自愿”、“非盈利”、“民间”是民间组织的显著特征。显然，网络共同体也具有上述基本特征。因为，网络共同体的组成单元是“网民”，组成的方式则是“自愿”和“非盈利”的。组织形式的松散性：网络共同体不像现实社会中的政党组织那样，他们往往没有明确的团体目标，成员间的联系以个人关系、兴趣、特征为纽带，没有任何强制性措施，因此其组织形式是松散的。有的成员可能不经常参加团体的聚会，甚至经常不参加团体聚会，他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要有选择地参加聚会。团体也不规定具体的聚会方式和时间，成员之间的Email、QQ联系、网上讨论、探讨问题等，都被视为网络共同体间的聚会，呈现组织松弛、自由和散漫的特征。虽然这是一些组织结构相对松散的临时性群体，成员之间或许从未谋面，但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共同关注的社会主题、共同的利益需求，或者仅仅是为了追求斗争的感觉，都足以使他们走到一起。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网民在网络中进行交流或组织活动显得异常简单。网络共同体成为网络时代的政治主体之一。应当说，在网络时代，网络共同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2. **网络共同体的参与场所的虚拟性**。网络社区是网络共同体政治参与的重要场所。网络社区是网上特有的一种虚拟社会，因而表现出一定的虚拟性。社区主要通过把具有共同兴趣的访问者集中到一个虚拟空间，达到成员相互沟通的目的，网络社区是用户常用的服务之一，由于有众多用户的参与，因而已不仅仅具备交流的功能，实际上也成为一种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聚集场所。当网络社会化（网络归于社会，成为人人共有的财产）向个人网络化（全民上网，人人都会利用网络，网络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转变的时候，个人必然要成为互联网世界的主宰。相应地，为个人提供集中化、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的网络社区必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与潮流。随着网络社区快速的发展，网络社区活动

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还将不断丰富，影响力也将不断扩大。互联网的存在状态是无形的，在网上的交流中，人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文字、形象和声音都变成了数字的终端显现，形成了另外一个时空概念。除非你告诉对方或对方告诉你相关真实的信息，否则交流对方的一切真实信息，将无从知道，因而网上是一个充满幻想和随意性的虚拟世界。

社会的转型与社会阶层、群体的分化促进了网络共同体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社会阶层、群体进一步分化，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这样一来利益的分化强化了人们的阶层认同感，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被唤醒。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逐渐结成不同的团体，采取集体行动向政治系统表达所在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以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团体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日渐活跃。各类新生网络共同体开始成为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的一个重要的主体，为社会的政治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力量，逐渐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实现形式。在传统社会，由于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的控制，社会团体组织的自主性相对较弱，无法得到正常的发育，各类社会团体往往是作为一种准政府组织的身份出现，还远远不具备一般社团应有的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和功能。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缩，权力资源开始由国家流向社会，社会权力得以彰显，社会领域的独立性和自治性逐渐增强，团体的有效参与正在提升，对利益的综合、表达能力有所提高。网络共同体的逐步发育，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阶层、群体背景越来越浓，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网络共同体把分散于网络中的个体整合起来，网民以网络共同体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力。

由于在网络上网络共同体组成的便捷性特征，使得网民在网络中可以自由地表达意愿和进行辩论，能够更加切实地感受到民主的精神，因此，利用网络表达政治意愿成为网络政治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比尔·盖茨在其《未来时速》中预测："未来几年中，虚拟社区建设将是网络应用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网络将极大地增加您能参加社区的数量。在以往你可能有时间加入一个邻里社区，或费心去加入一两个社会组织。

而在互联网生活方式中，能限制你的仅仅是你的兴趣”。“网络使得你可以加入全球各地的社区，同时也提供了您与自己社区联系的机会。”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在网络政治中，网络共同体的发展速度将会更快，影响及作用将会更大。

3. **网络共同体的场域集群特征。**网络社会中，个人的政治交往方式主要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贴帖子、聊天等形式来表达观点，与传统政治交往的方式不同，各方在虚拟空间中都是一个信息代码，没有任何可以标志身份的东西存在。影响传统政治交往方式的身份、国籍、文化、资产等在虚拟空间中都被抹去，在虚拟空间中打破限制个人与个性自由发展的条条框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进行一定的物质交往和自由创造，在交往中，每个公民自由选择并融入一定的团体，增强人的自主空间，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真正由“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①，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

信息网络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各类工作场所；90年代，由于因特网和多媒体的爆炸性发展而深入渗透到家庭和文化之中，其速度远远超过了两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发明……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了以这场技术革命为中介的结构改革。”② 它无所不在，超越时空界限，无疑将促使人类在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跨入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走向数字化生存。信息社会、网络时代，它带给我们的将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飞跃和前所未有的社会繁荣及发展机遇。按照波普尔的理论观点，世界是由三部分构成的，世界1是物质世界，世界2是心灵世界，世界3是人造世界（虚拟世界），三个世界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尤其是世界3，它对人类社会的特殊意义在于：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中介系统，提供了一个符号化的世界——“比特世界”；而且为发展人类知识，进而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信息网络的发展增强了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预测和选择能力，为人类更好地生存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②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享受创造了生活条件，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区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影响。显然，随着信息与网络技术向各个方面蔓延，人和社会的生存和交往的空间形式发生巨大变化，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也将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在网络社会中，一些共同体因兴趣爱好、对具体事件的关注开始形成一种场域集群现象。例如，从早期的BBS、新闻组、留言版等单向度纯文本社区，到各类聊天室，再到如今种类繁多的博客、播客、MSN群、QQ群等，网络的互动性逐渐凸显，虚拟身份间的沟通越来越频繁，“线上”与“线下”互动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成员之间的Email、QQ联系、网上讨论、探讨问题等。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能够快速在网络上形成“风暴”，网络都起到了组织、策划、推动的作用。网络共同体的空间发展向度，在虚拟空间中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和拓展。网络共同体成员由于具有相似的技术背景和专业经历，他们使用网络即时在线的方式进行交流，因此可以实现快速沟通。一项统计研究也表明，非正式团体比正式团体具有更好的沟通性。这是因为正式团体中频繁的会议容易使成员产生厌恶感而降低沟通的积极性，并因此造成信息超载与浪费；再者，非常规、体制外的自组织活动在近年来呈现出上升的势头，如网络民主和上访活动。这些自组织活动对政府与政党来说具有不可预期性和难控制的特点。如何将这些网络自组织活动常规化、正常化将是今后政府和政党面临的一大问题。在网络社会中，网络共同体和一般政党共同体存在的差异维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交往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传统的信息传递是以面对面的双向传递的；而在网络社会中，人们进入真正的“大众传媒”时代，通过即时而廉价的电子数据以光速传输信息，传递者和接受者相互间不仅仅传递信息，还可以对信息进行选择、分析、整理、加工，形成新信息。国家与政党，不仅无法像处于前信息时代那样封锁或垄断信息，反而必须为人们实现权利而提供信息，而公众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搜寻、衡量或者制造信息，不再被动等待国家与政党提供信息。通过网络，人

类的交往范围大大拓宽，交往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之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个体性交往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群体性交往所代替。网络交流不再局限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与特定的某个人或某些人之间，而是个人与群体，甚至是全社会之间的交往。你可以通过网络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不同角落，就有无数的大脑在帮助你思考和出主意。通过网络，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任何问题与任何对象进行互动式交流，它是网状扩散的，由此人们能够充分共享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

2. **新型政治参与主体的出现。**在现实社会中，各类政治主体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目的在于实现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并通过政治参与行为影响政治体系的决策、政策及其执行。政治参与主体主要包括作为政治主体第一层次的政治权力的源泉和基本力量、政治权力直接或间接承担者的政治生活中的人（个体），以及作为政治主体的第二层次的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政治团体、政党和政治性宗教等组织。而在网络社会中，“网民”和“网络共同体”则是新型的网络政治参与主体。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国家和政党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缩与放松，权力资本开始由国家、政党逐渐流向社会，社会领域的独立性和自治性逐渐增强，团体的有效参与正在提升，对利益的综合、表达能力有所提高。各类网络共同体的政治参与功能在网络中得以发挥，并且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网络共同体的逐步发育，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阶层、群体背景越来越浓，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网络共同体把分散于网络中的个体整合起来，网民以网络共同体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力。从政治参与的外延来看，政治参与应是公民以合法手段，规范地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但是，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非常规参与，尤其是非法参与的影响扩大。互联网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结构，任何一个支点都可以变为中心，没有一个终极的管理者，网上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完全自由和在相当程度上不

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的，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说话做事，是一个真正的无根基的“自由”乐土，因而互联网彰显的价值观往往表现为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产生，甚至有人断言，互联网是历史上存在的最接近真正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东西。同时，网络具有一种再造和遮蔽的作用，能够把人的身份随意进行修饰涂抹，这一点和传统社会相比较可以说完全不同。因为互联网自建设之初，出于保障隐私的目的，就没有设定有效的身份鉴别的功能，一组代码，一个角色符号，就成为一个网民身份的标识，网络成员身份被数字化、电子化、虚拟化了。匿名性和隐蔽性被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使得网民能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自由操作，大大减少了政治参与的不安全感，从而摆脱现实社会的规范，肆意放纵自己的行为。

3. **具有长尾理论的动员能力**。网络的组织动员和传统意义的动员相比较更简捷、更容易聚众。在互联网时代，那些常常容易被忽视的“小人物”、非主流人群，因网络的组织动员功能而开始被发动、组织起来。例如，奥巴马在竞选中通过手机短信、E－mail、Facebook 等各种工具，吸引着庞大的非主流人群。奥巴马就是成功地把“长尾理论”运用于竞选并大获成功的人，他这次竞选资金中大部分捐款金额都在 100 美元以下，捐钱的金额不大但捐钱的人数很多。这种现象可以用长尾理论给予说明和解释。长尾理论是由《连线》杂志主编查尔斯·安德逊（Chris Anderson）在一篇文章中（2004 年 10 月）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在营销过程中，如果用正态分布曲线来描绘营销业务中的人或事，人们不能只关注曲线的“头部”、重要的人或重要的事，更要关注曲线“尾部”的人或事，往往就是这些人或事起着质变的作用。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对网络舆论影响力的思考。在互联网时代中，众多的“草根”群体加入到网络的报道和评论中，他们逐渐成为舆论报道的尾部，每当有重大的舆论事件发生时，真正起到舆论催化作用的可能正是潜伏在论坛里的那条“长尾”。每一个网民的舆论可能非常渺小，甚至是无力的和苍白的，数以千计的“长尾舆论”散落在网络的世界里，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就会发生强大的聚合效应，强大的网络舆论就这样形

成了。

“长尾理论”是对传统的“二八定律”的一种彻底叛逆。“二八定律”也叫“巴莱多定律”，有些地方也译为“帕累托定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帕累托）发现的。他认为，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20%，其余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因此又称“二八定律”。流传最广的一句说法是：“80%的收入来源于20%的客户”也称为20/80法则。“多数，它们只能造成少许的影响。少数，它们造成主要的、重大的影响”。生活中普遍存在“二八定律”。商家80%的销售额来自20%的商品，80%的业务收入是由20%的客户创造的；在销售公司里，20%的推销员带回80%的新生意等等；我们通常用80%的精力，去做那些只会取得20%成效的事；目前国内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管”与“理”普遍按照8∶2的比例，而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管”与“理”却遵照2∶8的比例。“二八现象”竟如“黄金分割”一样普遍，现实生活与工作中到处都存在二八现象。

长尾理论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二八现象，使得99%的商品都有机会进行销售，市场曲线中那条长长的尾部（所谓的利基产品）也“咸鱼翻身”，成为我们可以寄予厚望的新的利润增长点，揭示了网络在组织80%零散的个体方面的强大力量，打破了传统的“二八效应”。

千万不要忽视每一个网民个体，因为无数零散的网民，涓涓细流可以汇聚成强大的力量。在网络社会中所突发的事件，一般情况在爆发后2小时内网上就会出现文字或视频；6小时左右就可能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左右网上跟帖就会达到高潮，形成热点。长尾理论在网络时代发展表明，政党与政府要增强能力与巩固合法性认同，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方法与手段，而要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来提升对网民的影响力。

（二）非确定性领域生成

从“公共领域”概念生成的历史角度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指古代公共领域。古代公共领域主要指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的一个中介性的，并能实现两者相互交流的场域。在这段历史时期，公共领域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两者之间只是处于原始合一状态，私人生活只能通过政治生活获得其规定性，而政治活动则借助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公意”获得其合法性。二是指近代公共领域。近代公共领域主要指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以来而产生的，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分离，其产生路径与社会的经济组织方式和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相适应。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各种利益调节的领域，这个领域既可以是由诸多非政府组织、团体和群体组成的以表达国家制度和政府行为的合理性意见的领域，也可以是国家或政府表达公共意志的领域。但是，真正形成和拥有公共领域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或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地反映和满足公众的愿望和要求时，并能够及时、公正地把他们的意志转变成社会舆论时，才真正形成和拥有公共领域。“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概念，是致力于复活共和主义理想的美国杰出的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最早提出的；但是直到1989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领域进行详细阐述，“公共领域”才得以广泛传播。

哈贝马斯在《公共空间的结构性转型》一书中提出，近代社会的公共空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遭到了严重蚕食，民主受到很大威胁，相对于18世纪的布尔乔亚式的公共空间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倒退。那么，在网络年代，当公共空间由现实世界伸展至网上虚拟世界时，是倒退还是进步？新兴的新闻网站对网络公共空间的建设又是否担当正面的角色？当人类踏入21世纪的时候，当互联网日渐普及的时候，人们开始关心在互联网时代的公共领域发展的命运。

我们知道公共领域的存在必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公共领域必须是公开和自由的，公众有公平的机会参与讨论，并能畅所欲言。二是资讯的收集及发放必须完整和客观的，能正确传达给大众。这个公共领域要独立于政权及市场之外，它需要摆脱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操控。三是公共领域必须提供辩论场地，而大家进行的沟通及辩论又必须是理

性及具批判性的。换言之，在量的方面要全民投入，在质的方面要理性深刻，其目的是促进民主政治与民主治理的发展。但是，在网络社会中，脱胎于戏院、茶楼、文学沙龙的公共领域，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已演变为大众传播的方式，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和聊天室，这些已成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表达意见的平台，而同时，它们也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重要载体。相应地，活动主体之间的行为也从交互主体性变成了交互活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公共舆论的新空间极易形成更为深远的政治主张并成为更为激进的挑战源泉，经由网络技术这一充分表达和诠释民意的主力军，可以营造出一种要求变革其社会和文化的机制，是不可忽视的政治资源，也为下层社会群众表达意愿提供了机会，显示了他们的声音，促进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

再从另一方面看，网络技术对民主和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至少使“公共领域”这一观点有了一种相当新的用法，大众可以明了什么是共同关心的事情，而社会的政治机构、执行部门和立法机构，必须直接面对公众的大量反馈信息，并利用网络这一平台公开政府信息，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广泛沟通，扩大公众的民主参与程度，增强公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感和支持度，做到“上行下通”、“下情上达”，网络就成为政府和公众都需要的集会空间或是公共空间。个人都将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数字化数据所构成的虚拟世界。在这两个迥异的生存空间，人们之间的行为交往也从交互主体性变成了交互活动性。网络活动的交互性、开放性、全球性、自由性和虚拟性等特征，一方面直接导致公共领域内面对面的交流机会缩小，公共领域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网络之被接纳到公共领域，拓展了公共领域研究的新视域。可以说，正是网络技术，以独特的节奏催生和创造了一个没有强权和中心的、全新的、平等的信息空间，引起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在一个人人都可能进入的网络自由流动区，网络技术的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的功能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公共领域的组织界限和特征，使传统的公众意见模式、观念模式、舆论模式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向公众打开了一条政治参与的全

新路径。同时，由于网络张扬个性化和自由化，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弱化公共权力机关的政治控制能力。虽然国家与政府不会袖手旁观，放任自流，但它要想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须适时实现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的转化，积极推广一场新的“公开论坛”运动，以引导和吸引民众的广泛参与。

在民主的社会，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元素。美国民主先驱者杰弗逊曾说，资讯是民主的流通货币。在网络年代，网络新闻媒体打破了时空界限，加强了互动性，发挥了多媒体的优点，照顾了个人与群体的要求，在资讯社会体现了网络式的连结，大大扩充了原有的媒体公共空间。公民透过新闻网站更轻易地获得更多资讯，又能加入讨论，这令他们更能行使政治社会权利，进而促进民主过程，确立民主社会范式。新闻网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盟友，甚至有可能协助我们进一步走近加拿大传播学家麦鲁恒（Marshall McLuhan）所言的“世界村”这个大同理想。

健康的公共领域是民主的必需条件，但却非充分条件。网络媒体可以扩大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让公民可以对时事议题多作探讨，但这并不等于就能达到理想境界。要实践民主的真谛，还要很多条件配合，其中包括消减知识，缩小数码鸿沟，打破商业主义的垄断以及建立社区意识和身份认同。个人因应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而作选择，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大家的联系只限于一些特殊的兴趣和事件，社会渐渐失去共同的话题和关心的对象，认同归属感的失落，反过来削弱了民主社会要求共同参与和沟通的基础。这就会产生像网络工程师斯托尔（Clifford Stoll）所言的现象：在互联网上我们有很多人际接触，却找不到人性（humanity）；互联网开启了许多扇门，但却只通往空的房间；资讯高速公路提供的不是资讯，而只是数据。因此，需要人们在积极利用网络媒体扩展公共领域之余，还要着力寻求其他条件的配合，方能发扬民主，改善人民福祉。

在现代性的社会中，国家、政党与公众关系和谐的标志和特征之一就是信息交流的畅通与共享，即国家、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最鲜明的体现是拥有一个大众可共享信息资源的“网络”。网络技术所拓宽的

"公共领域"作为民主政治之外的公共活动空间，使普通公民们的声音也开始左右政治权力的政策与决定。只有通过公共交往，以理性的政治舆论和政治意志形成为核心的自由才能得到实行！而来自于日常生活、形成于公共领域的公共意见，作为公开化和公众化了的、合民心民意、代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合理化的建议，要与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党与政府的社会评价体系和行为主体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新的组合点，相互之间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力，必须实现良性互动，才能体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共领域"所呈现的理论价值导向和目标。其实，网络公共领域所拓展出的民主政治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于网络自身，而是来自于它所代表的公众的意志和呼声。但网络技术使受众的视野得以不断扩大，培养公众一种"自我编程能力"，不断增强自我获取信息的能力：即公众能自行决定什么样的信息是自我所需要的，从哪儿获得，怎样综合处理等，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网络化可以使公众与政府在交流中超越时空以及社会分层的限制，使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来，增强公众的政治认同感、对政府的信任感和凝聚力，增强使国家与政党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得以贯彻和落实的优势；使得公众共同努力，通过政府控制之外的各种组织和方式来影响政府活动的运作过程能够实现。这并非让政府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民主政治本来是从公众中来，到公众中去的，是公众所关注的中心。当然，民主与政治的公共空间不能仅存在于"虚拟"的网络中，它还须是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以达成共识。

社会的网络化发展，正悄无声息地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政治生活，使得以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政治关系、政治形式、政治活动以及发展规律的政治学和人类的民主政治实践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世界，而没有种族、经济权利、军事力量和出生形成的特权和偏见。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那里不管多么奇异，任何人任何地点都可以表达他或她的信仰。① 在虚拟人格和无障碍自由交流的网络公共领域中，每一个主体都可以以自我的元认知角度

① 〔美〕戴维·申克：《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黄锫坚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反映客观事实，每个有能力说话和行动的人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每个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提出新的主张，表达其态度、欲望、需求及偏好；每个人不可借由内部或外部的强制剥夺参与者说话的权利。尽管现实生活中可能还存在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的沟通限制，但是作为网络交流和信息传播的新手段、新模式，博客的问世无疑对公民话语权的拓展、公共议程的设置、政治表达和民主政治的进程带来深远的影响。

（三）网络空间政治秩序建构

空间概念在早期的哲学命题和一般的理论阐述中，只是被看作一种容器或者物的关系，在人们的思辩中，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参照、依托和动力。从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们对空间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对其本体论的探讨，更加关注空间的社会实践意义，以及人们在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和空间的资源分享，尤其是人们在空间政治的自主权与发展权问题。空间问题在现代性社会中，不仅变成了可以承载现实一切重大问题的容器，而且与时间、信息和各种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希望、机遇、风险与危机，表现出与传统社会、经典现代性社会不同的后现代性特质。法国学者福柯（Foucault）就认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联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①] 空间不仅表现为一种静态意义上的人类实践空间场所的营造，而且作为一种动态性的组织机制，重新规划着现代性的生产过程与规模，并有效调控实践主体在场的行为张力，并构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基础。空间意义重大，已成为"普遍共识"。[②] 在网络时代中，出现了"时空分延"（time - space distanciation）和"时空压缩"（time - space compression）。空间、时间和现代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胶着状态。空间不再仅仅表现为容器，空间充满了差异性的政治行动。空间是政治的（Lefebvre，1977：339 - 352），而政治也

---

①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选自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8页。

② Michael. Dear,："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Blackwell. . 2000. 4.

是空间的（Elden，2001：151）。空间充满了各种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也只能在空间才能有效地得以展现。社会变成了空间，空间变成了社会（Allen Pred，1985：337－365）。从批判的视角来看，网络社会中展现出的空间是一种现代性的进展，给人们重新阐述空间如何成为认识经验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新的视角，正如福柯所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间，将我们从自身中抽取出来……这种空间撕抓和噬咬着我们，这是一个异质性的空间，这是一个可以安置各种个体和事物的空间。"[①] 福柯对于空间的创造性解释，在于揭示一种关于异位的异质性和关系性的空间，以及对于空间、知识和权力的社会学考量。"空间的维度关牵着实践和政治"[②]。这说明人类充分意识到自身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人类总是忙于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可以说人们生活的网络空间，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地牵涉到实践性、政治性和价值性。网络空间充满着围绕资源、自主、权利而产生的种种搏弈，网络空间不仅可以间距性同时可以用即刻性来衡量，可以说网络空间充满了政治学意义。

网络空间的崛起为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空间性成为洞察人类社会的重要纬度。在认识论上，人们基本认同空间并非自然的、静止的，而是变动不居的、活生生的，是构成性的；在方法论层面，人们关注的是空间理论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都企图摆脱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而期望以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去检视空间的产生、运作和消解，从而更好地把握社会的结构与过程。空间并非是中立的、无色的和"纯净"的，而是政治的、丰富多彩的，可以说空间充满意识形态。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离开意识形态或政治内容就不是一种科学对象，它总是包含着政治性和策略性（Lefebvre，1977）。列斐伏尔摆脱了空间是空洞和静止的观念，认同空间是具有社会性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

① Foucault, M., 1986, p. 23.

② 〔美〕爱德华·W. 索亚：《重描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后大都市〉第一部分导论》，收集在包亚明：《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产。因此，列斐伏尔曾断言，（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在他看来。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但是，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而是一束关系，是一个政治过程，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因而，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是一个各种利益奋力角逐的产物，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制约与权衡。可以说，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时刻充满着意识形态。列斐伏尔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把空间带进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点，尤其是他所提出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物，给予我们很大启发。空间不仅充满着意识形态，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空间不仅是纯自然性的空间，更是社会性的空间，而且与整个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说空间与社会处于一种相互建构的持续的绵延状态。按照美国学者索亚的理解，空间是一种物质产物，与其他的因素相联系，例如人，而人自己又进入了各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给空间（并给这一结合体的其他因素）带来了一种形式、一种功能、一种社会意指。

网络空间就其电子物理空间而言，它是一个有序的社会；但对于软环境而言，它又是一个无序的社会。在网络空间中，目前还没有同步立法对其规约，而现实空间中的对人类行为起规范、监督、控制作用的机制，对网民来说，其约束力却明显减弱。网络社会发展趋势是一个去中心化、去等级制的社会。在网络中，任何一个支点都可以变为中心，网上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完全自由和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的，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说话做事，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和“散漫”的地方，因而可能导致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和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产生。再者，网络还具有一种再造和遮蔽的作用，能够把人的身份随意进行修饰涂抹，这一点同传统的电视、电话可以说完全不同。在网络社会中，仅仅依靠一组代码，一个角色符号，就可以成为一个网民身份的标识，网络成员身份被高度数字化、电子化和虚拟化

了。匿名性和隐蔽性被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使得网民能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自由操作，大大减少了政治参与的不安全感，从而摆脱现实社会的规范，放纵自己的行为。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恐怖组织、邪教组织等就可以利用互联网散布政治谣言，进行政治煽动，制造混乱，攻击和诋毁政府与政党。正像埃瑟·戴森所指出的：“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①] 网络社会中，缺乏规范、监督、控制和约束，有可能被无节制滥用，必须建构一定的空间秩序与游戏规则，来规范网络空间的发展。

因而，空间不单单是提供利用社会结构的一个机遇，而是每一个历史整体的一种具体表述，在这样的历史整体中，一个社会才能得到具体的说明。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奠基人列斐伏尔，他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翻转成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并在 1974 年发表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列斐伏尔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将空间和地理的分析带进马克思主义中。他认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在重建空间理论中要建立“空间辩证法”或“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ospatial dialectic)。这种路径要旨在于，不仅抓住了空间的物质属性，更重要的是把空间的社会属性纳入到空间理论中。列斐伏尔摆脱了空间是空洞和静止的观念，认为其并非自然的、静止的，而是变动不居的、活生生的，是构成性的，强调空间所具有的社会性，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列斐伏尔，2003a：48）。土地、山脉、大海、湖泊、河流、空气、甚至光线、气候、信息和虚拟空间等，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利益，网络空间正在成为利益争夺的焦点。对于执政党来说，一定要加强空间意识形态建设，对空间的认识要充满辩证法，主动引导政治文明，强化执政的民主性、参与性和人民性，充分保障民

① 〔美〕埃瑟戴森：《2.0 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 页。

众的各项权利，缩小不合理的空间分裂和差距，强化合理化的空间差异与流动，提供空间正义，加强空间维权，打造良好的生态政治，实行动态的区域政治平衡，实现和谐共容的空间政治。

二、党派地质学的震动

传播学中以“皮下注射论”、“把关人”的控制论和“沉默的螺旋”等理论构成的经典传播文论在新传媒时代遭到了彻底的解构，经典传播文论的解构，对西方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西方政党对意识形态和舆论等领域控制的传统手段与方法不得不重新审视与调整。西方一些政党正在承受着经典现代性的负面结果，而陷入“党派地质学”[①]长期震荡的局面之中。

（一）经典传播文论的解构

1. **皮下注射论**。传播学当中的“皮下注射论”，又称“子弹论”或“魔弹论”、“靶子论”。施拉姆曾对“皮下注射论”的本质做过如下概述：“传播被视为魔弹，它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②] 皮下注射论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大众社会论基础上的受众观。如果用大众社会论的受众观来看世界与问题的话，那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大群呈原子结构的、沙粒般的、分散的、无防护的个人，这些个人在大众传媒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播活动面前是被动的、缺乏抵抗力的。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媒介本身被认为是根据媒介和媒介内容的控制者的意志，以强大的力量去形成舆论和信念、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并指导人们的行为。随着经典传播媒介的迅速普及和发展，人们对它们的社

① 赵宬斐：《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党派地质学”，指在全球化和存在高度风险的社会中，政党在处理现代性问题时，很难平稳安全度过，往往陷入震荡与波动之中，甚至丧失执政地位。

② 转引自张隆栋：《大众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会作用和影响力既寄予高度期待，又认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会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为。媒介是万能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影响受众，从而产生巨大的传播效果。当时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大众媒介具有“魔弹式”的威力。代表这种观点的理论被称为“枪弹论”、“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这种观点产生的理论背景与缘由主要是借助于当时西方盛行的本能心理学和大众社会理论。本能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正如动物的遗传本能反应一样，是受“刺激—反应”机制主导的，施以某种特定的刺激就必然会引起某种特定的反应。大众社会理论是在孔德、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和韦伯等有关工业化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观点认为，大众社会中的个人，在心理上陷于孤立，对媒介的依赖性很强，因而导致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大。

2. **“把关人”的控制理论。**“把关人”（gatekeeper）是新闻传播业务中常见的词语，主要是指对相关信息与新闻的一种控制。“把关人”中的“关”（gate）是传播者对信息做出处理的关节点，而“把关人”（gatekeeper）就是完成信息处理的角色。“把关”是对信息和新闻的选择，对于受众来说，这是一个外部世界的基本框架被全新建构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仅仅包含对信息和新闻的选择，“把关”的过程是把来自外界的千万条信息缩减成几十条信息传递给受众的过程，它涉及处理、控制等各个方面。对“把关人”的研究其实就是研究影响“把关”过程的多种因素，即研究是什么因素导致“把关人”做出新闻选择。

对“把关人”的研究始于1947年。当时，美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首次把“传播”（communication）与“把关”（gatekeeping）作为一对术语出现，卢因基于“渠道理论”进而建立了把关的思想，作为他研究对象的是食物的流通渠道，即研究食物是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来到饭桌上的。身为心理学家的卢因认为影响渠道通行的首要的因素是人，并把它归纳为“把关人的认知结构”和“把关人的动机”两大因素，总的来说，他认为人的心理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在卢因提出“把关”这一

概念之后，许多研究者沿这一思路深入发掘，形成了一系列的把关学说，其中以怀特（D. M. White）的研究成果最为经典。他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输入信息—输出信息 = 把关过滤信息"。[①] 即通过对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的对比，考察在一个具体的把关环节上，信息是怎样被筛选、过滤的。怀特的理论采用个案研究法，聚焦于把关人，将把关行为的内核凸显出来，使把关探讨得以深入，这是怀特研究的主要价值所在。但其突出的缺点就是过分强调把关者的个人权限，忽略了各种联系所形成的必然性与社会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吉伯（Walter Gieber）为代表，将影响"把关"过程的因素从个人扩大到了组织，重视信源和新闻官僚机构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把关人"的模式逐渐演变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②] 舒梅克（Shoemaker）根据"把关人"发展实际，从个人层面（individual）、行业规则层面（routines of communication work）、组织层面（organizational）、媒介制度层面（social and institutional）和社会体制层面（societal）5 个层面，拓宽了对"把关"的研究[③]。

随着吉伯、舒梅克等学者的研究深入，"把关人"的发展范畴已经脱离了初始阶段只注重个人因素的狭窄视野，转向将"把关"作为整个社会体制的产物来研究。随着新传媒时代的到来，"把关人"传统意义上的位高权重的情况有所改变与调整，因特网上富裕的媒介资源给了受众挑选媒介的权利和拒绝与接受的自由，受众完全可以向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媒介组织说"不"，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快速提高，"把关人"希望通过筛选信息控制信息流动、控制舆论的意愿将会受到严格地制约。

3. **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本来就是一个政治传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的开创性研究还是后来的深化扩展，无不围绕着政党选举、政

---

① David Manning Whiter, "The ' Gatekeeper ':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in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27. No. 4, Fall, 1950.

② Walter Gieber," News Is What Newspapermen Make It", Lewis, A. and White, D. M. (Eds.) (1964), " People, Societ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 Free Press, p160 ~ 172.

③ Pamela J. Shoemaker, " Media Gatekeeping", p79 ~ 91. " I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Michael B. Salwen & Don. W. Stack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96.

治人物形象、政治议题、政治决策等问题展开。因此，议程设置理论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形态。这一观点最初是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McCombs，M. E）和肖（Shaw，D. L）提出并确定下来的。麦库姆斯和肖以 1968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为题展开了一项调查研究，并在 1972 年的《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此后又出版了《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一书，系统地考察了媒介赋予事件的重要性程度与人们对该事件重要程度认知之间的关系，并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假说（agenda - setting）。麦库姆斯与肖认为：“受众通过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及其他事情，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论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① 从此议程设置理论概念得以广泛传播。

议程设置理论在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因为，它不但以新的视角启发了人们对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效果的认识，而且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如果说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对某个信息显著性增加或削减而“引导”或“转移”受众的注意，从而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那么，推而广之，政府和政党的决策管理也是有议程和重点的，传媒可以帮助政府和政党“引导”和“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和关注点。犹如施拉姆所谈到的那样：“议程设置的理论是基于两个观点：即各种媒介是报道世界上的新闻的必不可少的把关人；其次，人们经常感到对复杂的政治世界需要把关人为他们指出方向。这就是说，把关人帮助他们决定那些超出他们有限感受的哪些事件和问题，是值得关心和加以注意的。”② 总之，正如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和肖所认为的那样：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主观性功能，而是一种间接的、客观的媒介效果；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还要看公众对媒介的接触频率、公众对媒介的需要程度以及当时的人际交流情况和不

---

①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4 页。

② 〔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李启、周立方译，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7 ~ 278 页。

同公众的兴趣等因素，需要对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

由于议程设置理论表明了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功能——可以有效地转移和控制公众的关注热点，这一功能使这一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正是由于这一假说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被研究者做出极为实用主义的理解，因此要正确看待这一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研究传播宏观效果的假说，是一种客观的观察媒体活动特点的假设，而非传播的“社会控制”理论，绝对不能把它当作对社会和民众的一种控制与操作来看。“议程设置”提出的环境背景是，各种新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任何话题，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自行选择所报道的事实，因而媒体的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而公众也有较多的横向信息进行比较。如果媒体的议程设置很大程度上是非自然的，公众只能看到某一类信息源而另一类信息源被封锁，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议程研究”的初衷。在网络传播中，用户在面对海量信息的同时，接触大量人际传播，可以对信息进行自由选择，包括选择信息内容和信息的接收形式以及接收的时间和顺序。再加上以 Blog（Blog 是网络日志）为代表的民间新闻写作的崛起，以及 RSS（RSS 为“简易信息聚合”也叫聚合内容）等个性化新闻工具的普及，在网上，无论是信息的发布还是信息的接收都获得了以往没有的自由，从而更接近麦库姆斯和肖在提出“议程设置”假说时的媒介生态，那就是自主性和自由度。“议程设置”理论从来就不能解决“设置论点”的问题，而只能解释“设置论题”的现象。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在《媒介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曾经指出，“在多数时间，报纸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what to think）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时，却是惊人地成功。”这句常常被舆论引导者们忽视的话，实际上却是对议程思想最精辟的概括。互联网新媒体时代，是一个“读者主权”确立的时代，人人都有表达的权利，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意见超市”里，妄想如过去那样不仅为公众安排注意的对象，还强行设定结论、态度和立场，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这个时代正如尼葛拉庞帝所预示的那样：这个时代是“沙皇退位，

个人抬头!”① 的时代。沙皇的退位，必将导致个体权利的迅速增值!

4. **“沉默的螺旋”理论。**“沉默的螺旋”的概念是由德国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教授提出的。1974 年，她在《传播杂志》发表了论文《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理论》，其后的 1980 年又以德文出版了《沉默的螺旋——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正式提出了“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 理论，并对该理论进行了全面地分析与阐释。

沉默的螺旋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1965 年德国阿兰斯拔 (Allensbach) 研究所对即将到来的德国政党大选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两个政党在竞选中总是处于并驾齐驱的状况，第一次估计的结果出来，两党均有获胜的机会。然而6 个月后，即在大选前的2 个月，基督教民主党与另一个党获胜的可能性是4∶1，对基督教民主党在政治上的胜利期望升高有很大的帮助。在大选前的最后两周，基督教民主党多赢得了4%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却失去了5% 的选票。最终，在 1965 年的大选中，基督教民主党以领先9% 的优势赢得了大选。这一年大选带来的困惑和对它的解释逐渐发展成为沉默的螺旋的概念。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从六个方面对“沉默的螺旋”这一理论做出全面解释：

第一，大多数个人力图避免因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造成的孤立，因而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更得势。即看到这些趋势并相应地改变自己观点的个人越多，占支配地位的那一派就显得更占优势，另一派则更是每况愈下。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双向螺旋过程，这种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的意见。

第二，人们感觉舆论压力的最强大来源是大众媒介。因为媒介具有普遍性、累积性、雷同性等特点。于是媒介的意见被认为是主流意见、有发展前途的意见、可以公开发表而不会受到孤立的意见。

第三，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这种意见具有一种强制力——公开与之唱反调就

① 〔美〕尼葛拉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 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9 页。

会陷于孤立状态，就有遭受社会制裁的危险。所以，人们在公开言论中避免与其发生冲突。

第四，公共舆论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是一种社会粘合剂，在引导和干预公众见解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第五，由于公共舆论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因此，沉默的螺旋只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域中摆动。

第六，具有人数上优势的意见阵营的观点并不必然决定公共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的是对民意的社会控制功能。在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教授看来，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由“沉默的螺旋”所形成的民意，在双重意义上成为“我们的社会皮肤”，它是根据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来调整自己适应环境行为的“皮肤”；同时作为社会系统，民意又具有在维持社会整合方面的重要功能，就像作为“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①] 1973 年，在德国大选及一系列舆论调查之后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发表了《重归大众传媒的强力观》一文，宣称大众传播在影响大众意见方面仍能产生强大的效果。纽曼发现，与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也具有对被孤立的恐惧，以此为基础，她提出了关于“沉默的螺旋”的五个假定：（1）社会使背离社会的个人产生孤独感；（2）个人经常恐惧孤独；（3）对孤独的恐惧使得个人不断地估计社会接受的观点是什么；（4）估计的结果影响个人在公开场合的行为，特别是选择公开表达观点还是隐藏起自己的观点；（5）这个假定与上述四个假定均有联系。综合起来考虑，上述四个假定形成、巩固和改变公众观念。在这五个假定的基础上，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又发展

---

①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3 页。

起了一整套以“沉默的螺旋”假设为核心的关于舆论的学说，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个人意见的表达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这个学说综合起来解释就是指，大众传播具有意识的累积性、普遍性及共鸣性。大多数人都力图避免因单独持有某些态度而被孤立。一个人一旦了解哪些观点是占优势的或普遍得到支持的，便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认真观察，如果确定了自己的意见同占据优势的观点不一致，便沉默起来；随后大都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并和优势意见相一致，所以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愈加得势，另一方则越来越失去支持的声音，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如果这个过程有大众媒介参与，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也更明显。“沉默的螺旋”理论加深了人们对民意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为政府和政党等组织机构进行民意管理与调控提供了依据和启发，因而对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二）经典传播文论的解构对政党带来的震动

人们在对皮下注射论进行追踪研究时发现，对这种理论的研究大都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结论，是一种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并未经过严密的科学调查与验证。这种理论过分夸大了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同时也忽视了受众对大众传播的自主权这个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受众群体一般是具有高度自觉的主体，他们对信息不仅有所选择，而且还会自行决定取舍，具有高度的自主意识。另外，皮下注射论在一定程度上还忽视了影响传播效果的各种社会因素。传播效果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媒介环境、群体心态、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背景存在密切关联。我们不能把传播效果放到“真空”中去考察。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网络传播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第二媒介时代，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为这个新媒介作出

这样的定义：新的传播关系将是“双向的、去中心化的、异质性的”。[1]在第二媒介时代中，人的主体身份将是“不稳定的、流动的和多重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提出“第二媒介时代”这样的时代标号。第二媒介时代最大的特征是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拒绝权威，也就同样拒绝了伴随大众媒介上百年的“把关人”角色，“把关人”的角色遭到了挑战，甚至面临被消解的危险。因此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可能是和第一媒介时代中的“把关人”全然不同的，“把关”的规则也会有所差异。

进入第二媒介时代以后，原先的中心化的传播方式转向去中心化的、双向的传播模式，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发现，基于因特网的新的传播技术给“把关人”的角色带来困惑，哪怕是在同一个新闻单位内，作为母媒体和网络版的新、老两代“把关人”，他们的选择标准和尺度也并不相同。从纸质版到网络版，原先影响“把关”的各个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传播的特征表现出去中心化和双向性，如同众多社会学家所注意到的那样，网络传播蕴含着远胜于报纸、广播、电视的巨大的民主力量。它对拒绝权威的同时也解构传统“把关人”的角色。媒介“把关人”位高权重的情况有所改变，因特网上丰富的媒介资源给了受众挑选媒介的权利，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向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媒介组织说“不”，受众的地位越来越高。

上文也谈到，“议程设置”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研究传播宏观效果的假说，是一种客观的观察媒体活动特点的假设，而非传播的“社会控制”理论。但如果“议程控制者”们无视“误读议程设置”这一事实，认为在非自然的媒介生态里能够控制公众议程，在自然的媒介生态里也一样能够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自然的媒介生态中，“议程设置”假说常常被证实是不成立的，如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北卡罗莱纳州收集到的有关电视的数据那样，恰恰是“公众议程”左右着“媒介议程”。再者，“议程设置”理论从来就不能解决“设置论点”的问题，而只能解释“设置论题”的现象。网络上传播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

---

①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273页。

我们有机会更好地检讨过去对传播规律一厢情愿的简单认识。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过去合理的现在未必合理了，过去无法想像的今天成为了现实。从结构的设计来说，网络的特点是平权、自由、无限包容。在这种理想的信息传播结构下，关于议程的问题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趋势——议题“零和博弈”的消失。

传统的议程设置过程，存在一个各议题之间相互竞争、彼此消长的“零和博弈”（Zero - sum Games）现象。即博弈双方的得益之和为一常数，一方所得增加，另一方的所得必然减少。在传统的大众传播中，由于公众的时间和注意力是一个常数，媒介的传播形式是预先固定的，报纸的版面不可能任意增加，电视的播放时间也不能随意延长，对一个议题的报道力度加大也就意味着对其它议题报道力度的减小。这也就是说，就具体某一议题的设置而言，它不仅受到媒介对此议题报道程度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媒介对其它议题报道程度的影响。当媒体集中对某一议题进行报道时，必然弱化其它议题。

网络传播具有传统传播媒介所不能比拟的信息承载能力，它既不会像报纸那样受到版面大小的限制，也不会像电视或者广播那样受到播放时间的限制。从理论上讲，它几乎可以随时向任何人提供无限量的信息。这一改变对“议程设置”来说是致命的。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精心设置的议题常常被海量信息所淹没；尤其是 BBS、Blog 作为“我的媒介”出现，门户网站或新闻网站那种类似传统媒体的简单的“议程设置”必然受到冲击；用户不仅拥有“说”的权利而且更拥有了“写”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公众议程，消弭了政府与政党组织机构的系列议程。人们在使用和选择传播媒介及其“议程”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个人首先有强烈的融入团体的愿望。人们研究发现人需要群居的这个特点，于是敏思博客就推出了“敏思群组”，让单个的 blogger 们又集合在一起。由于群体、团体的存在，网络的议程研究必须重视人际传播和团体传播在人们寻求信息过程中的作用，承认受众的议程设置行为实际上是大众媒介和团体传播（或人际传播）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凭借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个人和团体的联系不再需要依赖传统的大

众传媒，个人通过加入团体，使个人议程与团体议程融合变得顺理成章。要合理解释这种在新媒介中出现的议程现象，必须引入一个全新的假说，这便是“议程融合论”。基于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麦考姆斯和肖在1999年，即提出“议程设置”假说后的第17年对该理论重新进行了修正。他们与D. 韦弗和B. 哈姆共同发表了《个体、团体和议程融合：社会分歧论》（Individuals，Groups and Agenda Melding：A Theory of Social Dissonance）一文，首次提出了一个源于而又高于“议程设置”的新假设——“议程融合论”。[①] 此后，肖还和他的学生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家媒介效果研究会议上，提交了一篇题为《公共议题的衰落：个人怎样通过议程融合形成新的社团》的论文，从媒介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议程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对议程融合的假设从媒介发展史的视角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不过它的主要观点一直遭到众多学者的质疑。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和瑞典学者斯文·温德尔是两个最早对“沉默的螺旋”理论提出质疑的人。1981年，他们合作出版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就直指纽曼理论的偏颇之处：“这里指的是这样的情况，即许多人不能相互交流私人的意见，从而感觉到他们属于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实际上，当允许强有力而又畅言无忌的少数派将错误的舆论强加于人们时，多数派或许私下里也会持同样的看法。”由此我们可知，“沉默的螺旋”理论严重违背了舆论是在人们相互交流、自由表达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特性。美国威斯康星的著名学者潘忠党曾对舆论的前缀public与crowd（聚众）、mass（大众）三词做过比较：crowd，指某一个个体受某一共同事物的吸引而形成的临时群体，个体之间互不相识，没有理性的传播；mass，由差异很大、很少交往、分散在可能很大的地域内的个体组成；public，指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一是共同面临一个议题，二是对如何处理这个议题有争议，争议性是舆论重要

① D. Shaw, M. MaCombs, D. Weaver & B. Hamn, (1999). Individual, Groups, and Agenda Melding: A Theory of Social Disson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11, No. 1, p. 21.

特性，三是就议题之解决展开讨论，所以讨论也是舆论的核心内容。从对 public 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舆论的重要特性及核心内容是争议、讨论，而争议及讨论如果没有一个相互交流且能自由表达的氛围是很难达到的。倒是 crowd、mass 所指的大众个体与个体之间往往互不相识或很少交往，缺乏交流。由此可以看出，“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在缺乏自由表达及相互交流的条件下形成的，这不仅违背了舆论的特性，而且就理论本身而言也是十分片面的。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局限越来越明显。在传播的实践中，面对媒介意见的倾泻，受众并非毫无主见、任其摆布，而且受众一旦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体，对其利益的认定非常执着，媒介设有的议程很难对受众产生感化的作用。网络传播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最快捷、便利的传播方式，可以说它是人类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传播手段。同时，网络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拓宽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与传播形式的界限。网络传播的迅速交互性、传播容量的无限性、物质载体的无形性等等，都使网络传播对传统的传播理论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沉默的螺旋”理论来讲，它面临的最明显的挑战就直接来自于网络传播的显著特性之一——匿名性。由于网络上的传播交流载体是打印的文字，既没有面对面人际传播的表情等直接接触的阻碍，也没有大众传播声音和图像的影响，所以网上交流使人们无需留名留姓，无需自报家底，无论是你胡言乱语，还是直抒胸臆，都没有人干涉你，因为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说，到底他说的是真是假。因此，网上传播带给了人们更大程度的交流与自由表述的空间，而这正是“沉默的螺旋”理论假设中所缺乏的。

在网络时代中，即使按照“沉默的螺旋”的议程设置观点，如果不与民众意见相一致，人们也不会因为代表大众的舆论是什么观点，而放弃自己的想法的，因为这种传媒本身就违背了民意，而且“沉默的螺旋”假说还忽略了舆论变化过程中“少数派”的作用。S. 莫斯考维希指出，群体合力中的“中坚分子”表现出意志的坚定性、主张的一贯性和态度的强烈性，可对“多数派”产生有力的影响，甚至可以改变群体合力

（合意）并推动新的合力形成。这是与“沉默的螺旋”不同的另一种舆论的形成过程，即由少数人意见向多数人意见演变的舆论机制。

经典文本的思想与理念一直被一些政党用来作为理论资本，在信息规范和舆论指导方面对社会和大众进行控制与规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来看，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的平等性、匿名性和不受地域的限制，导致上述传统的经典文本解构，政党也因此失去了在这方面的主导权，这有可能使政党长期地陷入一种“党派地质学”的震动之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应该对这种现象高度重视。

三、实体政治和虚拟政治的博弈与对接

——网络政治中政党现代性的进路

网络社会虽然是由纯粹的数据、数字、图表或各种表征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在这里，虽然不存在有生命的个体或有形的物质实体，但与现实的人类社会却发生着密切联系。因为不管网络技术发展的程度如何，它毕竟是一个“人造物”，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政治行为、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网络社会关注的中心是虚拟世界的系列政治行动以及网络对真实世界中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它正在改变现实社会中政治民主的内容和形式。随着网络社会的逐渐深入发展，人们把通过网络而表达的政治理念、政治诉求与政治行为称为网络政治学。网络政治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它把政治学带入到一个新的领域。网络政治学是“新”的政治学。与以往政治学相比，“新”体现在它是没有基点的政治学。因为传统政治学和现代政治学都有一个关注的基点，并在这个基点上构建理论体系。而网络政治学由于网络是一个没有中心点的扁平化的开放系统，所以它是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政治学。随着网络政治学的兴起，必将在传统的政治参与、传统的政治管理组织体制以及传统的政治知识的传播、交流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在网络空间中，网民以网络为媒介、为平台来创造新社会现象、新社会活动

和新社会结构，通过网络所开发和聚积的新政治资源和能量，作为来补充现有政治资源匮乏之源泉，同时又作为改造既有政治框架的动力和工具，进而影响实体政治。那么作为实体政治的最重要的代表——政党来说，受到网络政治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越来越多的事例在凸显和证实这一现象。政党要积极应对实体政治与虚拟政治的博弈，关注网络政治发展，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在网络场域中的风险意识。

（一）实体政治和虚拟政治的博弈

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国家权力一般可以分为“硬权力”（hard power）和“软权力”（soft power）。“硬权力”指可以用物与器描述或度量的那一部分权力，如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软权力”主要指难以用物与器来描述或度量的那一部分权力，主要指国家的形象、权威、合法性认同以及对信息网络生产、传播、交流的控制与影响的权力。政党与国家在网络空间中占有的权力也可称为软实力。随着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看重网络空间中展现出一种对他人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和传统意义的能够直接控制和影响他人的权力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与信息传播存在密切关联，显然是一种“软权力”。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人们在网络空间活动频繁并结成各种关系，使网络空间转变成社会空间时，在网络空间活动的人群因某种爱好、兴趣、利益或特殊事件而结成了网络共同体，以虚拟政治的样态与实体政治样态围绕利益诉求、政治表达等发生着博弈，这种博弈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1. **网络大众与现实精英之间的博弈。**网络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共同体人群，那就是网络大众，网络大众通常以“民意”、“民生”、“需求”和“情理”等来表达差异与多元叙事，而掌握和执行权力的现实政治精英则以表达“领导”、“控制”、“秩序”与“纪律”等来表达元叙事和话语权。随着网络社会的深入发展，网络大众与现实精英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习惯等领域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现实精英总是想维持着既存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网络大众却在诸多方面并不与现实精英合拍，只是想颠覆他们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由于网络社会的特殊性，

对现实精英的地位优势造成了很大冲击，而网络空间中展现的平等、自由和随意性使网络大众群体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可以说绝大部分网络大众正在有意无意地行使着自己颠覆的权利，用自己学到的网络技术、编程技术、图象处理技术，甚至是一般的建立个人网页、浏览、接发 E－mail 等技术，不断对现实精英所构建的合法性的体系进行分化、解构、重组，以普遍的开放性和广泛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使网络空间里的权力特殊性、特点得以逐渐形成。网络大众是自由、平等的，是没有权力等级划分的共同体，可以摆脱一切控制与束缚，发动系列群体性活动，对现实社会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支持或反对；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现实精英往往从社会稳定、政治体系控制等角度来处理和对待现实社会既存的问题。随着网络信息的进一步发展与推进，网络大众与现实精英之间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2. **“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博弈**。加拿大学者乔治·S. 塞奇（George S. Sagi）在他的《直接民主理论》一书中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在一个新的时代里，民主是否因技术变迁而带来形式上的变化。乔治·S. 塞奇把直接民主界定为一种“非政治的自我治理”，是“还权于民”。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直接民主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直接民主来源于古希腊城邦民主。古希腊版本的直接民主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演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国家扩张和职能复杂化，由于幅员、时间和物力等众多条件的限制，直接民主难以在大而复杂的国度实行，逐渐被代议制民主所代替。在代议制民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民众通过委托代表和精英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是，人们研究发现，在代议制民主中，代表和精英在行使自己的职责时很难保证充分实现民众的意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消解了距离、提供了及时的互动以及低廉的成本，具备了推进直接民主的巨大潜力。互联网的发展将很有可能深刻地改造基层单位民主，使较大范围的直接民主成为可能；同时互联网的发展还为作为直接民主最高形式的全民公决提供技术支持和现实可能性，使全民公决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惯例。未来数字化武装的公民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将不仅是民主形式的改变，而且是民主性

质的转变。这就为世人提出一个问题：代议制民主是否会回过头来重新向直接民主演进？代议制民主制度是否会消失？

网络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它正在改变政治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就提出，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数字民主赋予人民直接行使民主的权利，突破资本主义文明中绵延数百年的代议制民主，人民民主的发展将会对精英民主提出巨大挑战。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曾预测，第三次浪潮的到来，使过去存在的直接民主的局限性在今天可以得到解决。代议制概念动摇了，未来的民主必然是从依赖代表转为依靠人们自己即半直接民主。确实，网络技术为人们广泛参与政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它开辟了直接民主的可能性，使选民“屋子装不下”的问题可以得到逐步解决。未来的选民只要坐在各自的家中，甚至在旅途中利用具有识别选民身份功能的、连通信息高速公路的掌上电脑，通过网络即可轻松投票，全民公决的实施将变得十分容易。可以肯定，未来民主的内容和形式与传统民主相比，将要发生某些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政治学的民主研究增添许多新的内容。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网络技术在整个社会普及的程度尚没有达到人人都能随时随地上网的地步，网络直接民主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推广，还有诸多因素夹杂在里面。例如，美国第43届总统选举因在佛罗里达州总统候选人选票接近而重新统计选票，重新统计选票竟然是用手工方式来计算的。但是，信息技术能够改进政府公共服务，促进政务活动的公开化和民主化；能够完善现有的民主程序和运作，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投票，运用信息技术改进数据处理、信息传输和信息沟通等诸多环节，节约费用和时间，从而在整体上提高民主运作的效率，实现民主运作的效能。从长远来看，信息网络的发展必将推进直接民主，最终实现民主的根本性变革。

3. **扁平化组织与等级化组织的博弈**。传统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合作是通过垂直方向的控制与命令进行连接与实现的；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是通过从上而下直线方式进行的。处于组织结构的底层是完全被动的，无法发挥自我的主体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它的等级制是知识

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① 而在网络社会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削弱中间层级尤其是弱化处于金字塔顶部层级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模式。在这种组织结构模式中，从上而下的直线传送信息方式完全被打破，由于信息发布、沟通和交流的及时，适应能力越来越强。欧美等国一些政党在这种形势下，力图改造自身组织结构，打造扁平化组织结构模式并通过授权、分权等形式来适应网络技术的挑战。欧美等国政党试图通过网络化组织结构深入社会中，通过与社会各组织网络的合作来实现执政和治理目标。政党组织和社会组织采用“网络”式的组织合作形式，即在水平方向上交流和合作。传统的等级制组织呈金字塔型，合作是通过垂直方向的命令链来实现的；而网络社会中扁平化组织呈水平方向，组织间是通过相互适应来进行合作的，两者之间展开的交锋必将引发组织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与改善。

4. **网络政治资源与现实政治资源之间的博弈。**在网络社会中，一种以网络为媒介、载体、活动和存在方式的新政治生活的空间和运行方式，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间。这种网络政治不仅扩大了现有政治的资源，丰富了政治资源的种类，同时也拓展了资源贮备和利用的空间。这些资源不仅包括公众对特定政策的支持、公众与政府关系的和谐程度，以及特定资源投入的效率，还包括时空的转变与拓展等。不难看到，这些资源主要具有“软性”和“弹性”特征，看似无形，但常常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是决定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形态人心向背和生死存亡的关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政府、一个政党尤其是对执政党来说，在其政治行为过程中其拥有的政治资源是逐渐损耗的，这个发展过程是不可逆的；那么对于一个政府或一个政党来说，就要千方百计地保持资源的存量、扩大资源的增量，寻找新的政治资源及其存在的空间。但是，在如此严峻的现实条件下，不少执政党在政治资源枯竭和空间持续萎缩的压力面前，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出现执政行为的倒错：在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版，第 302 页。

个政治资源越来越枯竭的社会环境中，执政党应当集思广益去寻找和开辟新资源，尤其重视对网络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但实际上人们通常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对为数不多的存量政治资源进行挥霍，而即使是在一些相对“理性”的领域，也由于实行了一些本质上过度追求短期统治收益而罔顾政治社会总体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客观上也起到消耗、灭失政治资源的严重后果，从而进一步导致政党的稳定与自身统治的安全置于危险的境地。这些政党既有的政治空间已被新兴的网络共同体占据、分割殆尽，而新政治资源的生长、发挥功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又不具备，同时，一些极端自私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也会千方百计地阻隔新资源的出现。因此，对执政者来说，寻找到新的资源和空间，扩展原有的资源与空间，是实现政治资源扩充的主要手段。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人类活动的新天地，成为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新载体。在网络空间里，一些新的政治共同体及其政治生活方式得以生长并发挥其应有的影响，新的政治力量得以形成和集结，新的政治价值和意义得以显现。由网络所开发和聚积的新政治资源和能量，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是补充现实政治资源匮乏之源泉，是改造既有政治框架的动力与工具，同时也可能是造成现实政府和政党资源耗损与匮乏的黑客与蚕食者。

无论是网络大众与现实精英、“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争，还是扁平化组织与等级化组织，网络政治资源与现实政治资源之间的博弈，都充分说明：网络时代，人们渴望自主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追求表达和维护利益的民主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民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更适合于调和自由和权威的关系，适合于释放创造性的参与，适合于鼓励并促使私人采取初步行动，负起责任来。”随着网络的发展，社会多元化进一步加剧，利益要求也日益多样化，网络为公众表达不同的利益要求、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更加合理的、多元互动的公共空间。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自由交流，不受单一原则或规范的限制，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可以在同意别人的意见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各不相同的主张都能在网络聚集。网

络使得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观点和想法有了表达的可能，给人们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提供了展示个性、表现自我的机会和平等交流的平台，私人话语可能成为大众关注的话语，个人意识能推进到集体意识的层面。在网络世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某个论坛。现实政治实践中民主论坛的发言必须一个一个地交替进行，因为在特定的时空中，人们不能同时听取一个以上的人发表言论，而网络论坛能在同一时间形成一个多人同时发表意见的网络，往往由某人引出特定话题，如果该话题也为其他参与者所关心，其他参与者就会作出积极回应，随着参加讨论的人数增多，讨论就可以以同时发生的多路对话的形式进行。总之，在多元异质社会里，应该运用妥协的智慧，使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得到尊重。

（二）政党在网络场域中的风险意识

网上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完全自由和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的，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说话做事，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网民身份可以被数字化、电子化、虚拟化了，匿名性和隐蔽性被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使得网民能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自由操作，大大减少了政治参与的不安全感，从而摆脱现实社会的规范，放纵自己的行为，这种绝对个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行径，给现实的风险社会增添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同时也为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增添诸多的危机与挑战。信息网络带来的危机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信息的“外爆”与社会结构的“内爆”双重冲击。**当前的信息网络具有极大的兼容性：不仅有报纸媒体的文字、图片，也有广播媒体的声音，还有电视媒体的图像，更具有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交互性和虚拟性的特点。网络空间的信息交流既有点对点、点对面的信息互动，也有交互性的、兼容性的交流。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针对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特点，提出信息“外爆”的观点。他认为，承载着政治、经济、娱乐各个方面信息的电视、网络、通讯系统宛如宇宙大爆炸，无终止地向外扩张。在这种“外爆”的冲击下，以往由印刷文字隔离开来的美学、

政治、经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等级界限统统被打破了，人们会栖息在一个相互交叠的社会，没有文化等级也没有领域分工，过去人们之间水平的和垂直的界限都会被打破而给予重新建构。随着信息“外爆”的冲击，现实的社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会产生“内爆”现象。所谓内爆就是消除区别、打破隔离的过程，各领域相互渗透，无论是政治领域、公共领域还是商业和文化领域。社会结构的内爆发生意味着社会交往方式表现为更具参与性、交互性的全球性交往形式，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感必将增强。

2. 网民的“群体极化”现象日趋明显。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学家卢梭提出过“公意”、“众意”、“私意”的划分。卢梭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私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卢梭推演公意的产生过程有两步：从私意到众意；从众意到公意。从私意到众意，是一种物理性质的“聚合”，也就是说，这只是量的聚集，不发生性质变化。而从众意到公意，是一种化合的聚变，化合产生一种新的物质——即“公共人格”，或称“道德共同体”。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Blumer）则从社会互动论的理论出发，对社会群体划分为聚众（crowd）、公众（public）和大众（mass）三种形态。他认为，这三种群体形态是可以区别的。“聚众”是很多个体受某一共同事物（如街边斗殴）吸引而形成的临时群体，个体间互不认识，相互没有理性的传播，而只有情绪的相互感染。群体内没有任何组织，吸引他们的临时性的事物一消失，这个群体也就消失了；“公众”是指共同面临一个议题，因议题而发生争议，为此展开讨论，最后形成妥协意见和解决办法的群体；“大众”则又不同，它是由很多差异很大、相互匿名、很少交往、分散在一个有可能广大的地域内的个体的集合，它内部没有什么组织纽带，也不具备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

在网络空间活动的一些网民充其量只能算是布鲁默所说的“大众”。他们之间互不认识、很少交往、分散在各种虚拟的空间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组织纽带，也不具备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但是，有了网络平台，他们之间的交往形态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就具有了布鲁默所说的“公众”

所具备的特征了。网民的聚散，也是由于一个共同的议题，也有了争议，也展开讨论，如此等等。显然，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成为舆论主体的大众，在网络空间里就可能轻而易举地网罗成了舆论主体。网络下聚集的群体，是由分化而类聚的，表现出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性，这样极易导致群体认同的现象。由于网络平台具有的网罗性，使得舆论主体由“非实体”，变成了可清楚地界定的“实体”。网民在网上表达意见，其主要途径是通过网络中的电子公告栏，一个网民可能会以多个化名出现，这样会使人们对网民的界定变得困难。网民以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的特点聚集，志同道合的网民群体以某种事件结成群体，形成舆论优势，出现了严重的“群体极化”倾向。网民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网上通过交往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这些群体极化现象会对机构、团体、公众人物尤其政党和政府的政治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加之，虚拟社区往往缺乏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的约束，加之某些成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容易导致虚拟社区言行缺乏审慎和理性，对虚拟社区而且对现实政治的发展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詹姆斯·斯通提出的，后经美国当代法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进一步阐述。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①] 一方面，群体中非理性、易激动的特点在网民中更为严重。这一特点在讨论中很容易导致言说者态度偏激，并以十分激烈的言词表现出来。在 BBS 上浏览，你随处可见网民争相发言之激烈。新的舆论媒介——网络下聚集的群体，是由分化而类聚的，表现出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性，这样极易导致群体认同的现象。例如，网络讨论团体

① 〔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7 页。

中有一群人将自己界定为高税金反对者、动物权倡导者，或是最高法院批评者，这样的讨论只会将他们导向更极端的地方，因为他们彼此推波助澜。正如《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的作者所说："毫无疑问，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讲到这里，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

"群体集化"现象是由网络社区的特殊认同方式与舆论传播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网络社区不是一个统一的社区，而是由分化成不稳定的互相抵制的差异性明显的小团体所构成的。尤其当负面舆论出现之后，少数的意见领袖总是能够通过煽动性的言论将舆论往极端的方向推进。而对于公众而言，从众心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这些煽动性的一边倒的负面言论。这样，负面舆论通过"滚雪球"的方式不断积聚，关于事件的舆论就因此而被定格。网络信息通过"虚拟串通"传播，使得负面舆论随时都可以在大范围内出现一边倒的可能。网络上，每一个节点之间彼此联通的线路是无数的。这种横向交错的结构有助于信息串联。正因为每一个节点之间彼此有着无数线路相互链接，信息随意通过任何一条链接都能以光速在任意一个节点之间传递。只要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从任何一个节点获取信息，也可以将信息传递给无数节点。这种信息传递与获取使物理意义上的时空不再有意义了。网络这种超时空的信息链接，使得任何信息，不管其是真是假，只要达到引爆点，就有可能以燎原野火之势迅速在网络之中蔓延。负面舆论也是如此，当其出现在网络上吸引了一部分网民的注意，马上就可能通过 BBS、博客、跟帖、网络聊天等形式迅速传播。传播的面越广，信息的真实性就越没有人去质疑；最后哪怕是谣言，在网络之中也被认为是真实。与其相反的舆论则会慢慢地在这个信息自由市场中被驱逐出去，整个网络世界，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网络社会这种"群体极化"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如何掌控舆论领域，引导舆论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3. 从"灌输式"到"交互性"发展。前文第五章第二部分在介绍党

派地质学的文论中，谈到的皮下注射论、“把关人”的控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沉默的螺旋”理论等这些经典传播文论在具有后现代性资质的网络社会中，却遭到了彻底的解构。经典传播文论的解构，可能对现代性政党带来很大的影响，导致西方政党陷入党派地质学长期的震动之中。

在传统社会和经典现代社会中，作为对舆论宣传、信息传播被动获取与接受的民众一般被称为“受众”。这种定义在那样的时代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民众很难发挥自主性，经常处于“受众”者位置，在网络社会中，由于受众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自选能力增加。像皮下注射论、“把关人”的控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沉默的螺旋”等理论对民众采取“灌输式”方式受到强烈的质疑与挑战。这种情况下，受众的地位自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众一方不再是孤零零的靶子了，由于受众的主动性增强，选择余地加大，媒体与受众的关系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代之而起的是“人际交往”的作用。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的意见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受了媒介的宣扬、引导与控制，而是受了人们主体自觉意识是否认可的影响。如果一种观点在这个站点上受欢迎，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而一种观点得不到某个站点的支持，它必然会转向另一个站点，直到在那里受欢迎为止。由于受众的自发意识和主导意识增强，而在此中，尤其是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对于舆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受众的自选能力、自我辨别能力与自我掌控能力逐渐增强。

和传统社会、经典现代性社会相比较，在信息网络社会中，互联网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交互性”（Interactive）。这里的交互性内涵一般可以从两个角度给予理解：一是在网上，传播与接受几乎同步进行。由于互联网的速度快、范围广和超文本链接等特征使得传播者在发出信息的同时可以立刻得到相关反馈，更重要的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是平等、自由的，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规训与被规训。二是原来的接受者改变了自己过去从属的地位特征，只要拥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就可以随时在网上发布信息或改写信息，在成为受众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个信息的传

播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安香学者，曾经提出了一个“网众”的概念来说明这种现象。他认为在未来的网络传播中，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将逐渐模糊，所有的角色都可以用“网众”这一词语来概括。另外，由于因特网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很方便地掩藏身份，因此这种“交互式”讨论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在这种环境下，人的心理状态会更接近他的“本我”，即潜在的、一种赤裸裸的“原生态”的“本能”展现。而网络媒体提供给人们更多的是“可写”、“可抒”和“可叙”的自由，是一种“极乐”的享受。在互联网上，“自我”和“本我”的意识都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个体政治能力得以扩张和增殖。

信息时代，由于传统的权力运行方式和途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权力日益个体化、弥散化，促使个人将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政治日渐世俗化、平民化和人性化，这说明个体的政治能力得以增殖。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说全球化 1.0 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全球化 2.0 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全球化 3.0 的独特动力就是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而这赋予了它与众不同的新特征。我们把这种使个人和小团体在全球范围内亲密无间合作的现象称为平坦的世界，而这正是我在书中所要详细论述的主题。”① 这充分表明，当今时代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里，世界是平的，它的根本特点是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的领导和管理的模式，开辟了一个广阔而平坦的竞争场地，使得每一个基层单位，甚至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自主地进行决策和参与竞争。可以说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这表明在网络时代里，个体的能力会得到充分展现与发挥。无论是博客、“融合媒介”②（Convergence Media），还是“融合媒体”③，都给人

---

①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 页。

② 融合媒介是指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各类媒体为争取受众市场而主动采取的技术融合基础上的新媒体形式，这些新媒体形式适用于各类传统与新技术媒体的内容传播。

③ 目前已经有 3500 家美国媒体购买 Brightcove 的使用权传播原有媒体内容；是一个授权给视频内容生产商或者节目制造商、以宽带为技术依托、受众可以自行控制与选择的互联网视频系统。早在 2004 年，这个融合媒体由剑桥与马萨诸塞的 Jeremy Allaire 互联网公司开发，并得到积极推广。

们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提供了展示个性的机会，使得个体的政治发展平台更加广阔。马克思曾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① 表明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技术，而是一场复杂的政治与技术的互动过程，必然深深地改变着现实政治活动的方式与路径。

4. **以公民权利超越政治权力。**随着网络社会的深入发展，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再一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在网络社会中，权利和权力的配比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格局呢？和传统社会、经典现代性社会相比较，权利和权力关系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在当前变动着的社会中，对上述提问想作出一个满意的回答无疑是一种乌托邦，但我们不能否认一个现实，那就是，当前的社会是权利得以还原和扩张，权力受到制约与退却的社会。公民权利得以还原和扩张主要是从日常生活方面和私人领域开始的，在这类领域中，政治权力的干涉与控制遭到了公民权利的激烈地反抗，被迫退却；政治权力退却的过程也是公民权利逐渐进入的过程，公民权利得以逐项回归与落实。

在传统社会和经典现代性社会中，个人权利常常被异化为虚拟政治权利，而且经常被一些政治精英有意识地利用，以至于放纵为泛滥成灾的个人权力；经常是政治生活压倒日常生活，只有畸变的政治权力，没有正常的私人权利。当传统社会和经典现代性社会向信息网络社会转变的时候，也正是个人权利得以伸张的时候，公民在网络空间中肆意延伸个人的私权。每个人都应该能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享受生活，但是他既不许靠着损害别人以求得自己的享受，也不许让别人妨碍自己的享受。从理论上看，公民权利中的"私权"部分大致就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而公民政治生活的权利则对应于所谓的"积极自由"。自由是权利不受障碍的状态，从自由到权利，公民首先需要恢复的也是属于"消极自由"的自身生活权利，其次才是"积极自由"范畴下的政治权利。日常生活是政治生活的基础，人类生活的原始发生就是从日常生活过渡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4页。

政治生活，而且人类个体对这两种生活的介入也是这个顺序。按照这个顺序求自由、争民主，是顺推，而不是逆取。个人与国家、与政权的关系犹如地基和房舍，如果略过个人的具体的权利而直奔国家的民主，这样的民主是凌空蹈虚的，极易为一些政治力量所利用。国家与政权拥有公民让渡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是为公民服务的。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领袖丹东认为政治制度应当承认个体的感性偏好及其差异，尊重个人的选择与自由。他认为："政权形式应该像一件透明的衣裳，熨贴可体地穿在人民身上。血管的一起一落，肌肉的一张一驰，筋脉的起伏涌缩都应该从衣服上显现出来。肢体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它有权利保持自己的原样；我们都无权利任凭自己的好恶给它剪裁一件袍子。……我们要的是赤身裸体的天神，是酒神巴克斯，是奥林匹克的游戏和歌唱优美曲调的嘴唇。啊，那使人销骨溶肌的罪恶的爱情啊！……罗马人如果愿意蹲在墙角煮萝卜吃，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想干涉……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应该是快乐欢畅的伊壁鸠鲁和臀部丰满的维纳斯，而不是道貌岸然的马拉和沙里叶。"应该说，丹东确实深刻认识了制度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以及与权力相比公民权利的重要性。随着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深入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与政治生活方式的改变，公民权利必将逐渐走出日常生活领域而进入政治生活领域，进而超越政治权力。这个时代应当是重估人的价值，促进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建立的时代。

第八章　西方政党发展现状及前瞻

纵览西方国家政党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从权贵党到群众性政党的调整，从全方位政党到卡特尔政党转换，还是从兼容性政党到后现代性政党的变革，不同的政党结构、功能与组织形态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制度前提下执行着特定的功能。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环境的变迁，西方各国政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与新挑战。从整体看来，当前，政党政治发展表现为传统主流左右翼政党趋同性加强，政党边界愈来愈模糊，政党政治发展方向感不断迷失，主流政党及其体系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边缘性政党、中间化政党的作用逐渐增强，开始凸显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只有顺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潮流，及时调整政策倾向，政党才能得以维持生存、扩大发展空间，政党政治也才能实现创新和完善。

一、西方政党发展的现状分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环境的变迁，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各国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模式不再适应这种社会变化，传统政党纷纷通过改革来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与之同时，许多新型政党也应运而生，这就使得稳定的政党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多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并存，西方政党政治格局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政党格局呈现出区域化与国际化特征。当前各国的政治环境正发生着重大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也呈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这也为许多新型政党产生创造了机会与条件，传统政党纷纷通过改革来调整过去的执政思路，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区域化、国际性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之间越来越加强密切的沟通与交流以应对区域化和国际性问题，西方各国一些政治主张相似的政党逐渐意识到：若要在本国众多党派中脱颖而出，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就必须结成跨国性的政党组织或政团，就容易就共同关心的国际社会、区域性问题协商、探讨与交流并提出看法，这样就产生了利益交叉点，使之成为可能，使得政党组织区域化、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这种发展趋势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也不断增大。尤其以西欧表现最为明显，欧盟权力的不断扩大，促使各种跨国党际合作组织和党团纷纷成立，如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欧洲民主联盟党团、绿党党团等，主张扩大政党在国际多边组织及活动中的影响，提升国际地位，积极参与国际体制机制改革进程，更好地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这些跨国性政党组织和党团在地区乃至国际上都发挥着独特作用，既可以影响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为和决策，又可以加强非政府性的对话和交流，使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这也使得稳定的政党局势日益复杂多变，政党调整与适应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主流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下降。近年来，民众越来越关注与切身利益密切关联的具体政策，其价值取向和政策偏好日益“具体化”、“碎片化”和“分散化”。一些主流政党向社会输送的政策很难满足民众的需求，政党对社会发展的掌控能力日渐减弱，同时却又面临着移民问题、跨国犯罪、生态治理、疾病控制和恐怖主义等诸多全球性风险问题。在发达国家，一些左翼政党强调市场与国家发挥“双重作用”，倡导全球治理，谋求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治空间和国际思潮；而右翼政党则适度与新自由主义“切割”，强调以效率促公正，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正义；一些政党为获取执政地位，采取媚俗策略，纵容甚至利用民粹主义以吸引选民，甚至有的政党采取噱头，进行“炒作”，高调自我标榜的议

题，取悦选民谋取选票，给政党政治发展造成很大的困境。例如，2010年大选过后，英国就出现了36年来首个“无多数议会”，澳大利亚则产生了70年来首个“悬浮议会”，匈牙利前执政党社会党只获得不到1/6议席、维持了近20年的“左右均势”被彻底打破，2011年爱尔兰共和党也被迫交出执政大权等等。发达国家一些主流政党的各类思想理念交锋、差异日趋明显，在政治理念、政策举措，发展模式上存在诸多分歧，不均衡性日渐突出，政党的治理措施很难适合现实发展的需求，在政策的输出与回应方面顾此失彼，整合能力下降；政党越来越难以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三）政党政治进入阶段性震荡期和快速演变期。发达国家党争政争不断，社会运动蓬勃兴起，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均衡性依然突出，使政党政治进入阶段性震荡期和快速演变期，其发展前景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由于各国民族特性、政治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政党政治乃至民主模式的调整与演进过程中面临的共识必将多于差异和分歧。例如，近来欧洲政党在一系列选举中越来越呈现出的主流政党碎片化、政党体系遭到分解、主流政党被迫让位、小政党纷纷崛起等等，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放眼整个欧洲，一面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导性政党在民众支持方面不断地呈现出碎片化与分散化趋势；一面是形态各异的新的类型的政党不断出现，例如，“单一问题党”、“抗议党”、“极左政党”和“极右政党”等不断涌现，标榜民族主义政党和宗教性政党的力量也逐渐获得话语权；当生态问题日益影响全球时，出现了绿党；当为吸引眼球、标新立异，就出现了“性爱党”、“金发美女党”、“茶叶党”和“狂野疯人党”等“另类政党”；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出现了网络党、媒体党等等，这必将促成多党竞争、多党联合执政的现象，政党政治也必将进入长期性的震荡与快速演变阶段。

（四）右翼政党迅速崛起。近年西方政党发展演变过程中，最引人关注的现象就是极右政党势力的崛起。据《欧洲时报》报道，极右政党势力已在35个欧洲国家里频频活动，发展势力迅速，渗入国家政权的现象并非个别。例如在瑞士、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国，极右政党势力在立

法选举中得票数均已超过15%，在塞尔维亚接近30%，瑞士和挪威也分别达到28.9%和22.9%；2011年6月，在最新的五年一届欧洲议会选举当中，英国、丹麦、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奥地利、荷兰的极右翼党派均获得了席位，第一次有欧洲极右翼团体进入议会并有了合法的代表。另外还有很多右翼党派，诸如英国的国家党、奥地利和荷兰的自由党、法国的国民阵线、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等等；在瑞士、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中，一些右翼政党势力已经作为联合政府成员开始执政。在当今欧盟中，共有27个极右翼政党已对其所在的18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2010年8月，来自法国、英国等欧洲8个国家的9个极右翼政党还联袂到日本参拜靖国神社。追溯右翼政党发展渊源：一是主要来自于与法西斯有直接联系的传统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如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和德国国家民主党；二是与传统的法西斯保持一定距离的新兴极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瑞典民主党、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丹麦及挪威的进步党等。虽然，从当前欧洲极右政党势力的发展状况分析，他们还没有获取上台执政的能力，但却在欧洲政党政治中扮演着搅局者的角色，对欧洲政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五）政党的政治发展的“极化”现象明显。当前，欧洲政党政治弥漫着“极化”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表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面是主流政党与边缘小党的对立；一面是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分离；一面是诸多单一型政党、问题型等极端政党的崛起，尤其是极右翼和激进左翼势力的壮大给各国其他政党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例如，法国极右派候选人勒庞以反对外国移民和法国应该离开欧元区的主张，在2012年4月12日法国举行的第一轮总统大选中获得650万张选票，得票率位居第三；虽然，勒庞在后来的国会选举中以100多票之差落选，但是他所在的政党却成功赢得两个席位；在荷兰，以反欧盟和反穆斯林为重要主张的民粹自由党在2012年4月成功倒戈，迫使荷兰于9月提前举行国会选举，该党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人维尔德斯，因为鼓吹荷兰退出欧元区和针对荷兰欧盟成员身份进行公投的主张，受到民众广泛热捧；在丹麦，人民党也以反对多元文化、强调维护丹麦传统和认同，主张实行有限度的移民政

策等获得丹麦民众支持，该党甚至公开表示“多种族的丹麦社会将是国家的灾难”。该党在 2007 年和 2011 年两次选举中分别获得 13.8% 和 12.3% 得票率，稳居第三大党。这些政党在各国的崛起进一步促进了欧洲政党政治发展的极化现象。欧洲政党政治产生的“极化”，一方面表明选民日趋选择与其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比较接近的政党的过程，再者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文化观、道德观和价值理念等冲突日趋明显。

（六）政党的运作逐渐媒体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大众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政治的核心主体——政党的生存方式和运作模式。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动与调整。在新型大众传媒发展的时代中，政党自身功能在调整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媒政党化逐渐转向政党传媒化，即对媒体从追求所有权控制和作为阶级斗争及政论工具使用，转变为追求媒体青睐和参照媒体运作改革自我，并相当程度上依据媒体反应选拔领袖和抉择政策。新媒体发展对西方政党的影响巨大，西方政党逐渐改变传统的运作方式，使其日渐媒体化，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传媒工具为宣传政党政策主张、塑造政党良好形象、实现信息快速传递、增强组织吸引力创造有利条件；通过大量媒体宣传提升政党候选人的自身形象，由于候选人代表着该党的社会形象，这使其在利用媒体自我造势、突出了个人魅力的同时，也试图宣传政党政策，扩大政党的政治影响。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导致民众的自主性、独立性意识增强，民主诉求、政治参与的途径快捷便利，也迫使政党更加关注自身民主建设和民众的生计。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只有切实代表选民的利益，努力实现竞选诺言，才能取得选民的信任，才能为自己开拓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西方政党发展的前瞻

当今，由全球化引发的各种问题仍将是导致国别、地区乃至世界政党发展变化的主要诱因；其次，各国民族特性、政治传统、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政党政治乃至民主模式的调整与演进将更加多元差异，而不是局限于单一性与趋同性；再者政党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将更趋广泛、务实；虽然西方政党的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其发展轨迹依然可以给予辨别与预测：

（一）“多元化”政党格局逐渐向中左、中右两极对垒的方向发展。国际与国内复杂多变的局势交织在一起，导致西方政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左、中右对垒的方向演进。究其缘由：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左翼政党力量发展前景逐渐暗淡，尤其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势力普遍削弱；二是传统意义上代表中间力量的政党也在发生分化与调整，逐渐向中左或中右阵营转化；三是不少传统的右翼政党也开始向中间方向转化；四是新中间阶层的人数大量增加。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中间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和政党取向上通常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保守性和实用性，既不愿意太左又不喜欢极右，偏爱中间化趋向，例如，风行欧洲多年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明证。近年来欧洲各国主流政党纷纷采取积极措施推进中间化道路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结合本国国情提出了“新中间派政策”；法国社会党则提出了“新阶级联盟”战略；意大利左民党（意大利“左民党”，前身为1921年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1991年改名。）完成了向社会党的全面转化，逐渐成为“橄榄树”中左势力的核心；而瑞典社民党与荷兰工党等都先后重新解释了“民主社会主义原则”，提出了“改良主义的中间路线”，力图要建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正的中右特色的“欧洲社会模式”，喊出了“欧洲的未来在中间”的口号。政党发展态势总体表现为左翼政党格局向偏中间靠拢，右翼政党格局向偏温和方向靠拢。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同为体制内政党，在治国理念上没有根本性的分歧，都是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中，经过“多元化”政党格局变动之后，逐渐采取比较理性与渐进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积极推进福利国家的建设，协调和平衡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从而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

（二）政党的联合执政模式成为未来政党政治发展趋势。近年来，在欧洲政党政治中，主要以两党主导的多党制国家中，政党之间开展联合

执政的现象逐渐增多。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政党在经历一段“多元”与“分歧”发展过程中，在一些国家中，传统意义上的“中左”和“中右”轮流执政的局面常常被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党所取代；即使一些主流政党能在选举中取得优势，但受制于各种条件，无法获得单独组阁的权利，只得联合一些小党以政党联盟形式组阁。例如，2010 年 5 月英国选举后，保守党只能联合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就是采取与生态主义的绿党组成红绿联盟执政模式，而现在则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与自由党组成联盟执政模式。从一般政党价值观与执政理念分析，联合执政模式一般是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才有可能达成，但是从目前英德两国的政党联盟执政模式来看，这些联合执政的政党之间无论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皆存在巨大分歧，他们一般纯粹为了组阁与执政才走向联合。在希腊政党选举中，新民主党、左派政党联盟和泛希社运（“泛希社运”：希腊在野党，1974 年 9 月成立，曾在 1981 ~ 1989 年和 1993 ~ 2003 年执政，现为在野党。）得票率排在前三位，根据希腊相关法律，这三个政党只能联手共同组阁。近年来，澳大利亚、荷兰和比利时等一些国家中出现了“悬浮议会”；在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中的政党，不得不实行多党联合执政，才能使政府运作下去。从目前欧洲政党发展态势来看，不少国家中的“彩虹政府”现象必将持续一段时间。

（三）政党结构与功能进入深刻纠错与调整阶段。欧洲政党发展中，传统政党的党员数量日益减少，各类选举中选民的参选意愿屡创新低；新兴的小党又频频出来搅局，使得民众的党派认同感和信任程度逐渐降低；西方主流政党在其发展的“黄金时代”以“群众性政党”面貌出现时，形成的代表性功能出现了弱化趋势，无法应付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政党对社会的变动作出的及时反应，加强结构与功能的调整，将社会变动以更加缓和的方式传递到政治体制之内；同时又以自身的变动回应外界的变动以释放压力，使之不至于积累到危及政治体制的稳定。政党在维护与修缮其代表性功能的同时，又加强制度性（程序性）功能的建设。制度性或程序性功能主要表现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对国

家领导人的确定、议会和政府如何构成等方面。由于议会是西方政党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控制社会和公共权力的根本途径，因此，西方政党普遍重视对议会控制的主导权，通过政党控制议会，政党在处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上也是不断丰富其制度化的内涵。从目前西方政党功能的变化趋势分析，其重心由社会向国家转移。这样一来西方国家政党功能的转移又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尽管政党的制度性功能的发挥仍使政党在短期内无生存之忧，但从长远看，其代表功能的日益削弱终究会动摇政党本身的合法性。这是西方主流政党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挑战，与此同时，全球化、生态问题和各种新社会运动发展，必将促使西方政党的结构与功能发生进一步调整，才能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求。

（四）政党与新媒体耦合的趋势加强。在新技术支持下的博客、维客、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楼宇视屏、对话链和虚拟社区等新媒体发展正全方位地影响着当代政治生态，尤其是政治媒体化过程越来越明显，这也促使政党政治的结构功能与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调整与转变。新媒体与政党政治的深切关联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凸显。新媒体表现出的全球性、大众化、形象化、去管制性和增殖性等特性，对政党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深刻，政党不得不改善自身结构与功能，更加重视政治营销、政治舞台效果、感官享受与消费诉求，期望在政治景观中使政党的媒体形象得以建构、调整、发展和完善。面对新媒体的发展，西方政党不是采取疏远与脱离的办法，而是实施亲近与融合的策略，逐渐放弃传统的靠广大党员和基层组织来传递理念的方式，更多地依赖政党的领袖的媒体宣传与表演来感染受众，寻求认同，扩大执政基础。在新世纪，阶层多元化、社会分散化、生活个性化，人们生活目标、观念和价值取向千差万别，媒体在政党的政治行为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多数西方政党已充分意识到这项新技术对政党政治的意义，在实践中不仅建立自己的网站与网络组织等，也注重通过网络来加强与国内外的本党组织和本党党员的联系，同时还加强网络时代的议程设置以提升执政能力。

（五）主流政党引领发展的难度增大，对发展模式的探索更加深入。

近年来，西方政党形势发展深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民众抗议活动风起云涌，政党自身结构与功能一直处于调整期，政党之间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政党发展的困境加深，执政面临的压力上升，虽然在总体上西方政党保持着稳定状态，但是，稳中趋乱，政党治理表现出的脆弱性、低效性较往年突出。能否妥善处理好政党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党之间合作关系以及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决定着西方政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由于西方长期奉行自由主义选举式民主，一些政党为了选票而放松了如何更好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功课；由于选举频繁举行，执政党也顺水推舟避免触及社会深层问题，仅仅为上台做足表面功课，这种“选举政治”导致了主流政党功利、短视，在政策理念上趋同性日益突出，丧失了以往的个性和特色，以致当前西方政党政治轮替中，无论哪个党上台都难以解决目前社会面临的困局，主流政党引领社会发展的难度日益增大。面临日新月异的问题，西方主流政党纷纷加大对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创新，顺应世情、国情、党情变化，谋求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随着西方国家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这些国家中的政党意识到更需要凝聚共识、采取有序合作而不是强调分歧、不能展开盲目竞争，一些主流政党也自觉地降低党争的烈度与分歧，主导建立“一党主导、多党联合”、“政党联合组阁”等执政模式。西方主流政党对政党发展模式的探索，也影响了其他一些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近年来，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倡导了“可控民主”、“主权民主”模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则实践着“托管式民主”，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实施了“参与式民主”。这些主张和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同时也是对人类政治民主模式的有益探索。世界各国执政党对发展模式的选择与调整不但关乎党的执政业绩，甚至影响到党的执政安全。发展模式关乎执政党的政治理念，选择不当容易使执政党陷入被动。某种程度上，执政党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其政治理念的延伸，时常成为党与党之间、一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争斗的焦点。执政党在确立和推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可持续发展压力。全球化加速发展，

执政党越来越难以凭借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赢得长久的执政业绩。政党对发展模式的调整与创新，在发展理念上，普遍强调发展是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全面发展，不断丰富发展模式的功能。在选择发展模式时，尽可能避免陷入非左即右的极端"陷阱"，走适度、平衡的"中间道路"；以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出发点，根据本国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创新发展模式；执政党在选择和确立发展模式时，应以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平衡发展为目标。这已经充分引起学界的关注。

西方社会能够长期保持其制度稳定，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政党制度无疑居功至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结构与环境的变迁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西方社会已经迈入后危机与后物质主义时代，生态问题、女权问题、移民问题、宗教与信仰等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不但追求着在生活质量方面的"更高层"价值观念，还追求着充分自由的消费主义理念，对自身关于自由、参与和民主等权利的渴求越来越强烈，这是西方政党正在面临和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政党只有充分运用先进信息平台和信息网络等手段，主动融入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潮流，有效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以民生为重，着力维护社会公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要求，加强执政党理论纲领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才能增强政党的效率性、参与性和民主性，才能争取到民众的信任度和认同感，以巩固政党的合法性。

中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3、6、7、8、9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8、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列宁全集》第3、12、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列宁选集》第3、5、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波〕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7.〔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8.〔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9.〔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10.〔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任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1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3.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5.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6. 〔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危机》，孙治本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7. 〔德〕乌尔里希·贝克、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9. 〔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1. 〔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蒋仁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4. 〔德〕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民意——沉默螺旋的发现之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6.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27.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8.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29. 〔法〕雷蒙·阿隆:《民主与极权主义》,加利马尔出版社1976年版。

30.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选自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1. 〔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文明》,陈峰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

32.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 〔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4. 〔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35.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6.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7.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8. 〔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时宪明、邱泽奇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39.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40. 〔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41. 〔美〕哈罗德·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纬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42. 〔美〕波尔斯比等:《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43. 〔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44.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45.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46.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

47. 〔美〕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48.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49. 〔美〕G·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50. 〔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51.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52. 〔美〕莫里斯·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53. 〔美〕卡罗尔·布鲁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54.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彬等译，新星出版社 2007 年年版。

55.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梅艳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56.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57. 〔美〕戴维·申克：《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黄锫

坚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8. 〔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李启、周立方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59.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60. 〔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李启、周立方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61.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2.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3. 〔美〕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4. 〔美〕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65. 〔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66. 〔美〕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7.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 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8.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銛，王宏周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69.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0.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71.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历以平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72. 〔美〕第默尔·库兰：《偏好社会伪装的社会后果》，丁振寰、欧阳武译，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

73.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阈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74. 〔美〕哈罗德·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纬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75. 〔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6.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7.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

78.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版。

79.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80. 〔美〕贾恩波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1. 〔美〕杰克·富勒著《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展江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82. 〔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83.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彬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84. 〔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任晓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85. 〔美〕列奥·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下），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6. 〔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政治科学新

手册》，钟开斌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87. 〔美〕罗伯特.K.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88.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9.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0. 〔美〕罗纳德·H. 奇尔科德：《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高铦，潘世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91. 〔美〕M.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92. 〔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3.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94.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95. 〔美〕内森·罗森堡、L. E. 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刘赛力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96.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活》，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97. 〔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98. 〔美〕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9. 〔美〕乔治·萨托尼：《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00. 〔美〕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01.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

务印书馆1990年版。

102.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3.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104.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05. 〔美〕托马斯.R. 戴伊等：《美国民主的嘲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6.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7. 〔美〕沃纳·赛福林，小詹姆斯·坦克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08. 〔美〕西里尔·E.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09. 〔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0.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11. 〔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贾星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12. 〔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113.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4. 〔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刘小林、张胜军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115.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6.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赵洵、林英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117. 〔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党治制的由来》,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18. 〔以〕列奥纳得·根得林:《受害的一代》,明宇、舒会译,群众出版社 1986 年版。

119. 〔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张慕良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

120. 〔希〕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121. 〔希〕尼科斯·波朗查斯:《国家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122. 〔意〕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23. 〔意〕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124.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25. 〔英〕戴卫·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126.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出版社 1998 年版。

127.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 年版。

128.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29.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

130.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131.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132.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133. 〔英〕安东尼·吉登斯，〔英〕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

134. 〔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135.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东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36. 〔英〕J. S. 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137.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赵伯英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138.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139.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140. 〔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41. 〔英〕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142.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143.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赵洵、林英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144.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 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145. 〔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6. 〔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147. 〔英〕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8. 〔英〕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景跃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9.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50. 〔英〕E. 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1. 〔英〕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152. 〔英〕弗·奥·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3.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154. 〔英〕赫伯特·斯宾塞著：《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155. 〔英〕J. S. 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56. 〔英〕J. S. 密尔：《论自由》，许宝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57.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58.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9. 〔英〕拉里·埃里奥特、〔英〕丹·阿特金森：《不安全的时代》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60.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161. 〔英〕罗宾·科恩，〔英〕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62. 〔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

163. 〔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164. 〔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65. 〔英〕以赛亚·伯林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166.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167. 陈其人等:《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168. 程映虹:《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转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 年版。

169. 郭国良，徐建华:《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170. 郭台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171. 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17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73. 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74. 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175.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176.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77. 郎有兴：《第三条道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8. 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9. 李道揆：《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80. 李建华：《执政与善治——执政党伦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81.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82. 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3.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4.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85. 刘小枫：《〈施米特与政治法学〉序言》，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86. 陆南泉：《苏联兴亡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87. 陆学艺：《当代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88. 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189. 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90.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1.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2. 彭芸：《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

193. 孙关宏等：《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4. 谭君久：《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5.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6.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97. 王铭铭著:《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198.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99. 汪翔，钱南: 《公共选择理论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00. 吴惕安，俞可平主编:《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01. 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从文化的角度看》，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202. 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203. 徐向东:《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04. 薛福康:《我看美国媒体》，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205. 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206. 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207. 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208. 张凤阳:《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209. 张林，蓝艺等:《大事背后》，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5 年版。

210. 郑莉:《理解鲍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11. 祝基滢:《政治传播学》，三民书局印行 1983 年版。

212.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213. 汪晖:《死火重温·“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214. 邓正来:《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15. 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 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216. 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217. 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218.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219.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220.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221. 荣敬本，高新军编：《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222. 曾峻：《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学林出版社 2005 年版。

223.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

224. 杨奎松：《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恩恩怨怨》，江西出版社 1999 年版。

225. 水如：《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226. 蒋光化：《访问外国政党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版。

227. 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年版。

228. 王振华，陈志瑞：《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29. 史志钦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政党变革》，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年版。

230. 惠志斌：《社会性软件——网络社会的纽带》［J］，《特别观察》，2006（05）。

231. 李建国：《苏东各国执政党处理媒体宣传问题上的教训》［J］，《求实》，2004.（11）。

232. 李瑞昌：《现代政治民主的结晶：政党与民主》［J］，《人文杂志》，2003（4）。

233. 刘文富，顾丽梅：《网络政治学解读》［J］，《探索与争鸣》，1999（11）。

234. 潘伟杰，余波：《信息革命的政治挑战和理论困境》[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3）。

235. 林尚立：《领导与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6）。

236. 唐娟：《传媒、政府、政党——对近现代欧美国家传媒与政府关系之演进的历史考察》[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4）

237. 王瑜：《互联网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8）

238. 杨雪冬：《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4）。

239. 张衍前：《执政党掌握网络媒体话语主导权自议》[J]，《理论学刊》，2005（10）。

240. 张亚泽：《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探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0（5）。

英文参考文献

1. Adam Michnik, 1990: "The New Evolutionism", in Letters from Freedom: Post – 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ed. Irena Grudzinska Gro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A. G. Frank and B. K. Gills, 1993: "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 Reorien, 1993: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5. Barker, E, 1967: "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Barrie Axfordetal, 2002: "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 London: Routledge.

7. BernardC. Cohen, 1963: " ThePressandForeignPolicy",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8. Bobbio, Norberto, 1989: "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9. Charles Taylor, 1989: " Sources of the Sel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 Claus Offe, 1984: "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 , London:

Hutchinson & Co. Ltd.

12. C. Mueller, 1973: " The Politics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Conway, 1991: " 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CQ Press.

14. Daniel Bell, 1973: " The Coming of Post –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5. Danielle Allen. "Invisible citizens: political exclusion and domination in Arendt and Ellison" . in Melissa S. Williams and Stephen Macedo (eds.) . Political exclusion and Domination.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 Dan Nimmo, K. R. Sanders.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

17. David Manning White, 1950 : "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in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27. No. 4, Fall.

18. Davis, L. North, 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 Diamond, L. .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Colo. : L. Rienner Publishers, 1993.

20. D. M. Mcleod, G. M. Kosicki, J. M. Mcleod. Resurvey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ffects. in J. Bryant, D. Zillmann (eds.) .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 New Jersey: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2002.

21. Douglas J. Macdonald . Formal Ideology in the Cold War : Toward a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Analysis in Odd Arne Westad , ed. , Reviewing the Cold War :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 Theory. London : Frank Cass, 1996.

22. 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1993.

23. Dyson, K. H. F, The State Tradition in Western Europe: A study of an idea and institution, Oxford: Matin Roberson Press, 1980.

24. Emerita Dionisio Distor, "Maoisi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Arif Dirlik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ies Press, 1997.

25. E. Shils, Center and Periphe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26. Frank Baumgartner and BryanD. Jones, AgendaandInstabilityinAmerican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993.

27. Frankenfeld, Philip J, Technological Citizenship: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Risk Studie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Vol. 17, No. 4, 1992.

28. Fraser, Ronald. 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 London: Random House: Pantheon Books, 1988.

29. Fukuj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30. G. A. Almond, C. B.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s Processes and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31. GiandomenicoMajone, Evidence, ArgumentandPersuasioninthePolicyProcess, NewHaven: YaleUniversityPress, 1989.

32. Gibson, J. L. Putting up with fellow Russians: Political tolerance in a fledging democracy. Glasgow, Scotland: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1996.

33. G.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 By K. H. Wolff), Free Press, 1950.

34.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5. Hajer, Maarten A. The Politics of Envior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5.

36. Halfmann, Jost. Die gesellschaftliche Natur " der Technik –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soziologische Theorie der Technik, Leske + Budrich, Opladen 1996.

37. Hall, John, ed. Civil Society: Theory, history and compari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38. H. H. Gerth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39. Hobsbawn , Eric (Ed.) . Magnum throughout the World. Distributed Art Publishers, 1998.

40. Inglehart, Ronald. The Silent Revolution :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41. Inglehart ,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42. Inglehart, Ronald. Modernization and Postmaterialism: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43. Inglehart, R. , & Norris, P.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4. Inkeles, A, &Smith, D. H.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45.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6. Janie Percy – Smith, "Int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social exclusion" . in Janie Percy – Smith (ed.) . 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inclusion Buckingham ; Philadelphia :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47. Jason Brownlee, "Durable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Ph. D. diss. ,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4.

48. Jeffrey C. Goldfarb, Beyond Glasnost: The Post – Totalitarian Mind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49. JohnW. Kingdon, Agenda,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2nded.) NewYork: HarperCollins, 1995.

50.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Zhao Yan Dong etc.)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51. Kornai, Janos.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2. Leszek Kolakowski, "The Escapist Conspiracy", in Toward a Marxist Humanism: Essays on the Left Toda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53. Lupton, D. Risk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

54. Lynda Lee Kai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 Jersey: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4.

55. Mann, M.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56. Mann, M.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57. Mann, M.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58.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1988.

59. Marshall, T. H.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3.

60. Mary E. Stuckey.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ban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61.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62. Matthew A. Crenson, The Un2 politicsof Air Pollu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63. Martin Shefter,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erienc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64. McLuhan , M. Classroom without Walls. In Carpenter , E. & McLuhan , M. (eds.) 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 Boston : Beacon Press, 1960.

65. Miklos Haraszti, The Velvet Prison . New York: New Republic Books, 1987.

66. Milan Kundera, The Farewell Party .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67. Mills, C. Wrigh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68. Milovan Djilas, excerpts from "The New Class", in From Stalinism to Pluralism, ed. Gale Stokes . New York: Praeger, 1967.

69. Mythen, G. Ulrich Beck: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Risk Society,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70. Niklas Luhmann,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trans. by Rhodes Barret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3.

71. Norris, P. Does television erode social capital A reply to Putnam.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96.

72. Norris, P.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3. P · Harris ed: Civil Disobedi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 1989.

74.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Rinehart & Company, Inc, 1957.

75. Putnam, R.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76.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77. R. B.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78. R. E. Denton, G. C. Woodwar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1990.

79. Robert A. Dahl.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Autonomy vs. Contro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80. Robertson, Roland.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81. Robyn Eckersley,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82. Roger W. Cobband Charles D. Elder,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Agenda Building.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5.

83.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84. R. R. Fagen. 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1996.

85. Rugman, Alan.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 A New and Radical Analysis of Globaliza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 London : Random House, 2000.

86. Sale , Kirkpat rick. SAS (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 . New York : Random House, 1973.

87. Sartori, G. , Political Party and Party System,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88. Scott Lash. Risk Society and Risk Culture. See Li Hui Bin ed, Globalization and Civic Society.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3.

89. Shils, Center and Periphe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90. Shin, D. C. Democrat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Global Citizenries. In R. Dalton & H. – D. Klingeman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1. Simmel, Georg. "Stranger" . In Georg Simmel. The Sociolog 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1950.

92. Skinner, Q.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93.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94. Smith, Anthony.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95. Stanislaw Baranczak, Breathing under Water and Other East European Essay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96. Stepan, A.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97. Tawney, R. A.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Penguin Publisher, 1954.

98. Thomas A. Birkland, AfterDisaster: AgendaSetting, Public Policy and Focusing Events. Washington, D. C. : George 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7.

99. Tilly, Charles,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100. Tim Jordan.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1999.

101. Vά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Vά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ed . Jan Vladislav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102. Walter Gieber, "News Is What Newspapermen Make It", " Lewis, A. and White, D. M. (Eds.) "People, Societ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 Free Press, 1964.

103. R. A. Dahl, 1989: "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Yale University .

104. Micheal Levin, 1992: " The spectre of democracy", Macmillan Ac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

105. Joel S. Migdal, 2001: "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 and Society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6. Evans ed. State - 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107. Fred. Greestein, 1963: "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Prentice—Hallinc.

108. HughABone , American Politicsand PartySystem. Mcggraw—Hiokll BoCompany, 1974.

109. E. E. Schattschneider, Party Converment. New York: Rinehart &Winston, 1942.

110. AlanWare, 1996: "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1. Norberto Bobbio, 1996: "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Polity Press.

112. See Sara Parkin, Green Parties: An International Guide London: Heretic, 1989.

113. Norberto Bobbio, 1996: "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Polity Press.

人名索引

利奥塔（Jean – Francois Lyotard）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
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 ）
劳伦斯·迈耶（Laurence Mayer）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g）
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Merton）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
罗纳德.H. 奇尔科德（Ronald. H. Qier cod）
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
列奥纳得·根得林（Aonade · Gendelin）
拉里·埃里奥特（Larry Elliott）
罗宾·科恩（Robin Cohen）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
马歇尔·梅耶（Marshall W. Meyer）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马丁·杰伊（Martin Jai）
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G. Roskin）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玛莎·费丽莫（Martha Ferimo）
麦金太尔（Alasdair · MacIntyre）
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Castells）
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内森·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
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ola Negroponte）

尼科斯·波朗查斯（Nikos Polangchasi）
尼格尔·多德（Nigel Dodd）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乔·萨托利（Joe Sartori）
乔·奥·赫茨勒（Joe Austrian Hertzler）
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
乔治·S. 塞奇（George S. Sagi）
乔治. 霍兰. 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
让·布丹（Jean Bodin）
让 – 雅克·卢梭（Jean – Jacques Rousseau）
塞缪尔. P.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S. 卡里略（S. Carrillo）
托马斯·波格特克（Thomas Poguntke）
泰勒（Charles Taylor）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
托马斯. R. 戴伊（Thomas R. Dye）
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
瓦尔泽（Michael Walzer）
西里尔. E. 布莱克（Cyril E. Black）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小 G. 宾厄姆·鲍威尔（Small Bingham G. Powell）
伊丽莎白·内尔—纽曼（Elizabeth Nell - Newman）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约翰·洛克（John Locke）
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约瑟夫·奈（Joseph Nye）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
亚里斯多德（希腊语：Αριστοτ λη，英语：Aristotle）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后　记

这份报告终于脱手了，无论怎样地看待它，毕竟已经成为一种模样摆在了我的面前。面对着它，我的心中却起着万般的不自在。平常一些会议式的乏味工作与各种繁琐事务的应酬，已经剥夺了我许多进行阅读与写作的愉悦与机会。在奔向学术崇高的殿堂中，我注定只能以一个断断续续的当零工式的学习者身份呈现；这使我从安静、平和的阅读中剥离出来，无论是对学术前沿的关注、对浩如烟海般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还是对系统理论的掌握和对严谨学风的锤炼，再也不可能做到一如从前那样的详实与从容。留存在我心里的，只是对阅读的回忆与感动。如斯的阅读与研究，必然使我丢掉了漫步在象牙塔式的“学院”派林荫道路的那份悠闲与自信，走上了“印象”派式的长途跋涉与艰难。在这期间，面临了两年的停顿、迷茫与无助，而大把大把的时间又是消磨在买票坐火车、飞机、汽车、地铁与三轮进行路途颠簸中，在颠簸中小睡，在小睡中梦醒，在梦醒中思考，在思考中筹划，在筹划中突破。

伴随着写作过程中更多的是奔波与劳累的掺和，失去的是一种典雅与自由，得到的是一份心酸与无奈；心累、神伤、体倦，挥之不去，难以排遣，常常是浸润在书本与资料中，毫无头绪，又是不分时间地对着计算机键盘不停地敲打；过着清教徒一般的日子，很难介入精彩多姿的社会生活；个中滋味，只有夜深人静，冥冥之中方能体味。而作为一介书生又喜欢妄议当下大事，一时间，国事、家事以及诸多烦心事，一下子涌现在三尺书桌前；一份学者的自信与从容，一如春水东逝。外在的光鲜与奢华和内在的脆弱与落寞交织在一起，只有自己才能触摸到那份

纠结。繁华落尽与风景看遍，心中顿生悲绪与惆怅、落寞与伤感。

如何才能救赎与突围，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我变得脆弱、怯懦，甚至害怕表述。我不知道自己该怎样表述，用什么样的态度与方式表述。为了克服这种脆弱、怯懦，我慢慢培养写作的感觉，然后顺着感觉进行下去，期待着真实的感觉的到来，再慢慢得到真实的感觉后，觉得自己不再被先入为主的一些理论和思想所禁锢与奴役，怎么想就怎么表述，难得的是一次自在的洒脱，有时候简直是信马由缰，可是，如此一来失去的则又是进一步的缜密与深刻；因为学术文章毕竟又需要理论支撑与思想铺垫。这本该是一种高超的接近完美的辩证艺术，在我看来，竟然是将相失和、楚汉相争与阴阳混淆。这矛与盾的对抗，使我无法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至少目前，我还找不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唯有不断地鞭策自己，踏踏实实地去践行。所以说，这个报告，注定只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一个对自己的反省。

研读知识不仅是一次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是一个历练和淬火的过程，更是一种提升品质的追求。有人认为世界上最动人的征服，是对知识的征服；我却认为世界上最动人的不是征服而是分享，是对知识的分享。

进复旦后，如何确定报告的选题和框架，任平教授建议我在以前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围绕政党现代性进一步深入探索西方政党现代性变革及路径；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林尚立教授多次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与研究经验方面，耐心地指导着我不断转换研究视角与拓展新的领域。进驻复旦进行写作与研读的日子并不是总那么枯燥与单调，仍然有这么多细节让人难以释怀和眷念，校园里不仅仅布满着花红柳绿，甚至连空气都弥漫着书香的气息，我深深地感谢复旦学府中的师友们，尤其是复旦大学统战研究基地的肖存良博士、季保蕙女士、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的肖素萍、顾美娟、王益新等诸位师友，还有分享散漫生活旨趣的陈波、希坤等师友。凡是为我师者，我都永远心存一份属于弟子的虔诚感激。这种感激将永远深深埋藏在心里。短暂的人生中相识、相聚是缘。当我怀着一份感恩的心数点着在人生艰难时世中一颗颗友善相助的

心灵时，就会觉得以往遭遇的所有委屈与痛楚，一如被衣袖抖落的尘埃。没有一声声的安慰、一份份的搀扶，也许就没有这份报告，或者连我的人生又该是另一种写法了。在复旦的一些日子里，仍有诸多好日子值得记挂，和好友一起坐在房间读书习文、品尝美食，然后是散步，然后是看着街道来来往往的车水马龙，一时间阅读的感悟、写作的快感和对生活的热爱一下子涌上心头。我感到从未有的温暖与满足，并觉得这是最大的幸福。平时缠绕身边的一些对世俗的体验恍惚一下子换了新装，使我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重新整理与思索自己对幸福的认知与感悟。

这份博士后报告在获得国家规划办后期项目资助后，我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了调整与修改，今天得以出版，更期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尽管报告展现出的是一些文字，但字字收入了我的过去、我的现在与我的未来，同时也收入了我的怀念与期盼。我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如果有人愿意翻翻这个报告，那么有幸的人必定是我，我会把内心真诚的感激献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我永远的读者，也会是这份报告永远的主人。